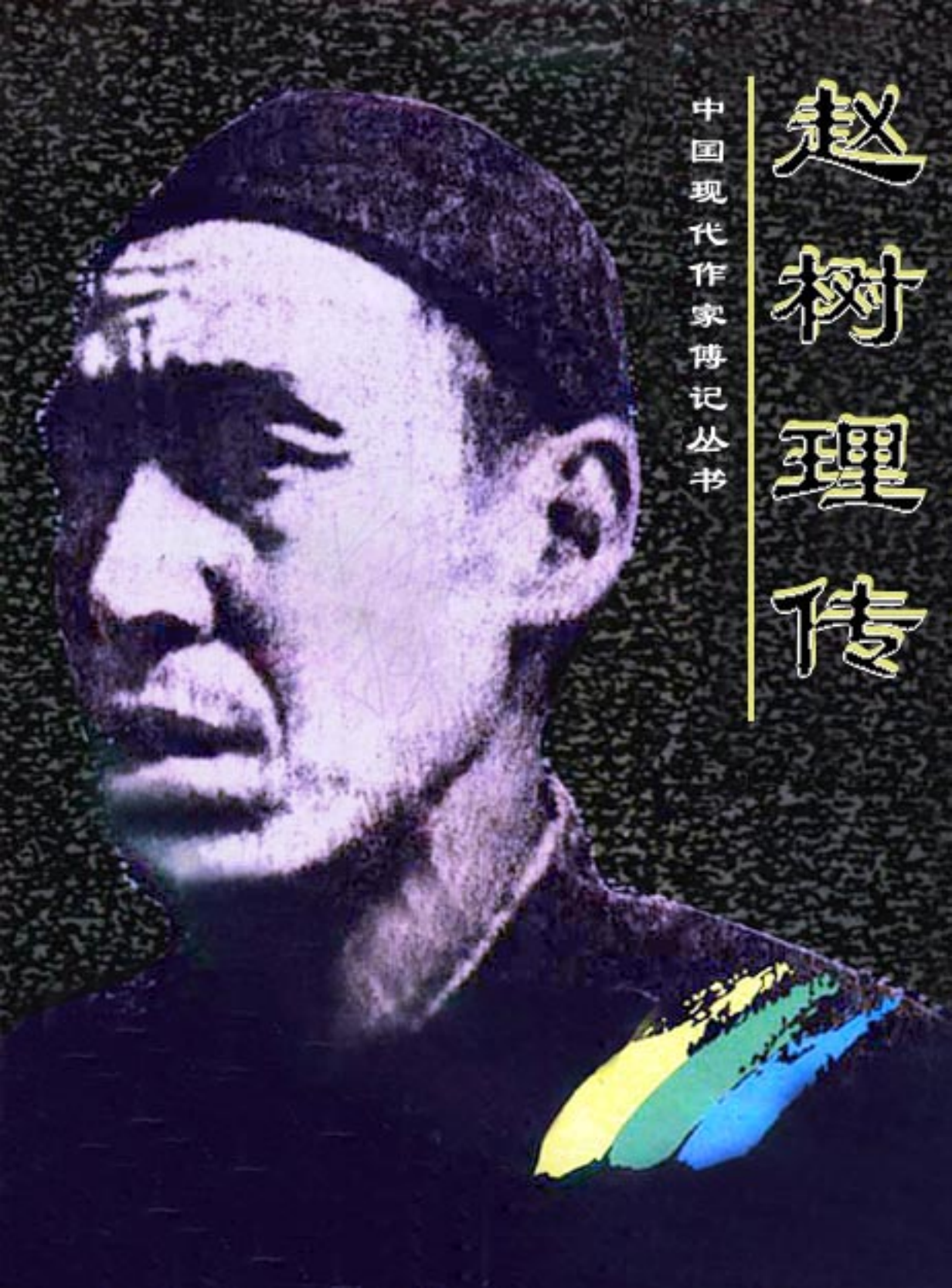

中国现代作家传记丛书
赵树理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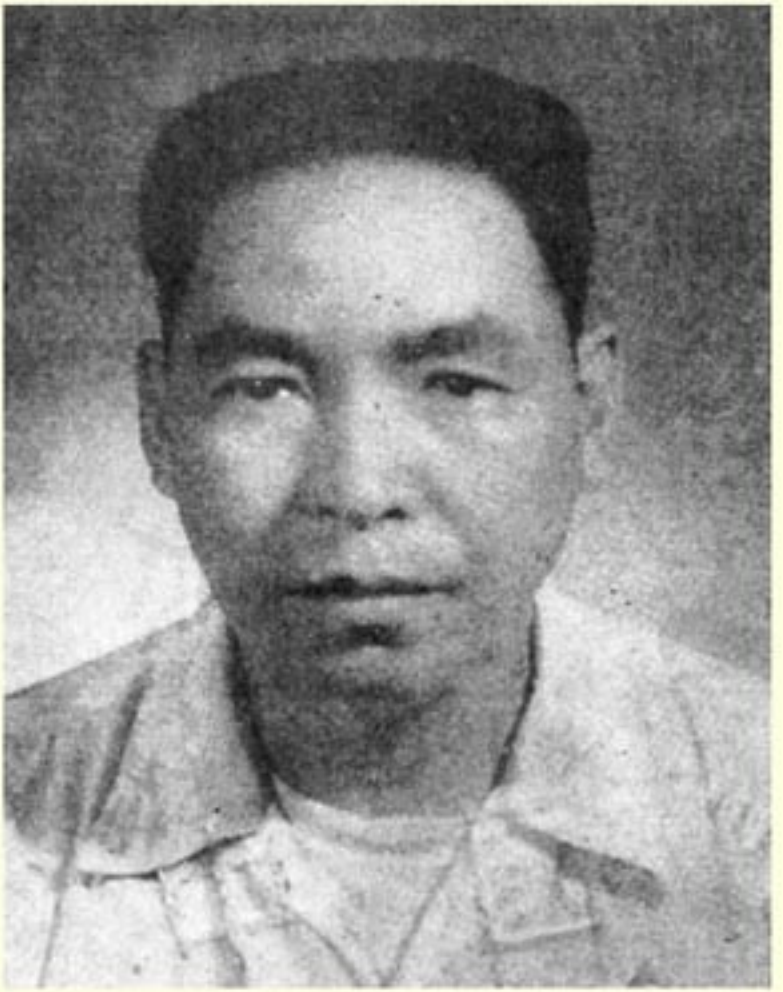
作 者 简 介

戴光中，浙江鄞县人，一九四九年生。一九六九年去北大荒插队劳动，一九七九年考取华东师大中文系研究生，从钱谷融教授攻读现代文学，一九八二年毕业，获硕士学位，现为宁波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与人合著《中国现代文学史指要》（华东师大出版社），选编《迟到的怀念与思考——关于巴人》（浙江文艺出版社），以及中国现当代文学方面的论文十余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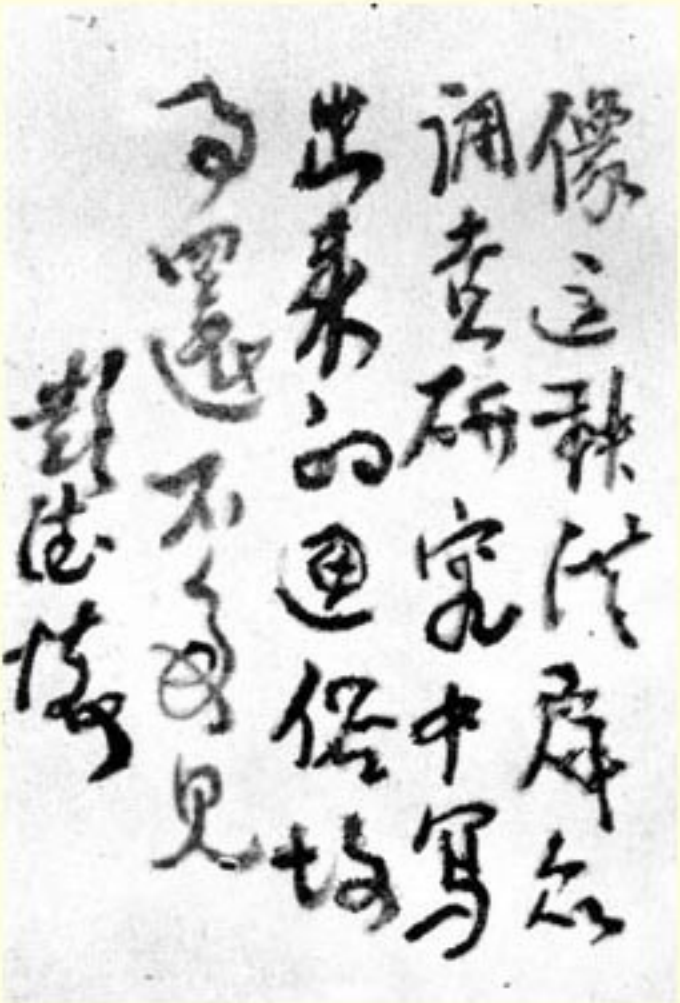
赵树理传

中国现代作家传记丛书

戴光中



赵树理像



彭德怀同志关于《小二黑结婚》的批示（1943年）

赵树理与长治四师同学合影
（前排左起第二人为赵树理）

赵树理　手迹

赵树理　故居

赵树理的家乡

艺术属于人民。它必须深深地扎根于广大劳动群众中间。它必须为广大群众所了解和爱好。它必须从群众的感情、思想和愿望方面把他们团结起来并使他们得到提高。它必须唤醒群众中的艺术家并使之发展。

——列　宁

目　　次

卷一　从树礼到树理
第 一 章　得意…… (2)
第 二 章　求学 …… (21)
第 三 章　抉择 …… (49)

卷二　从彷徨到呐喊
第 四 章　彷徨 …… (79)
第 五 章　转折…… (108)
第 六 章　呐喊…… (135)

卷三　时代的歌手
第 七 章　崭露头角…… (170)
第 八 章　根深叶茂…… (194)
第 九 章　独步文坛…… (225)
第 十 章　邪不压正…… (255)

卷四　生活的主人
第十一章　进京…… (279)
第十二章　回乡…… (310)

第十三章 青年问题…… (335)
第十四章 “神经病”…… (360)
第十五章 再认识…… (398)

卷五 在劫难逃
第十六章 “中间人物”…… (426)
第十七章 “死于《十里店》” …… (450)
第十八章 “社会自有公论”…… (471)

后记…… (499)

卷　一

从树礼到树理

(1906—1930)

太行横拥巨川回，
三晋由来产奇才。
—— 司马光

第一章 得 意

只消稍为仔细地检阅一下赵树理的家世，便可发现一个有趣的事实：这位以农民的代言人而著称于世的大作家，祖上并不是握锄头操犁杖的，至少，上溯七、八代，“仕宦之家”的称号是当之无愧的。

在苍茫太行山的主峰处，有一个人口不足十万的“蕞尔小县”—— 山西省沁水县。赵家就祖祖辈辈居住在该县东南方的武安城（即今之武安村）。关于这个地名的来历，有明代诗人李梦阳的《武安城》一诗可以说明：

孤城突如块，据山瞰流水。
谁敢经营之，无奈秦白起。
东北远长平，遥遥数十里。
想是击赵时，卜此御旌垒。
鸣鼓收降旗，一坑万人死。
……
进爵食武安，声名播青史。
迄今千百年，此城名尚尔。

沁水县七山二水一分地，人稀土瘠，地僻岩深，山无珍奇之产，水无鱼盐之利。但据县志记载，“沁因彬彬文物之邦也，山川秀气萃于斯文，鸣珂曳佩之士接踵相望，制科以来，甲第蝉联，后先辉映。”其中便有赵树理的高祖钟恩、钟勋兄弟。他俩一个弄文，一个习武，经过若干年的寒窗发奋，终于在那“乾隆盛世”分别挣得了太学生和武举人的花翎顶戴。可是，不知何故，这两个新贵却跑到与武安村隔河相望的尉迟村去大兴土木，各自建造了两进三层有数十间房屋的官宅，坐北朝南，黑漆大门，这在偏僻的山村里，俨然一家显赫的门庭了，人们尊敬地称之为“东院”、“西院”。

韶光流逝，斗转星移，……到了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赵树理的祖父忠方公长大时，这个家庭衰败中落了。他不独成了令人既珍重又忧虑的单丁，而且，尽管颇通文墨，却与功名无缘，屡次应试都名落孙山，连个秀才也没有捞到。

光绪初年，一场千古罕见的大旱灾，席卷了上党大地。红日当空，寸云不生，瞭望原野，遍地不毛。“金贱粟贵，土地器皿皆成无用之物，守物而饿死者不可胜数。市面粮价日夜增涨一至十倍，一切稗谷糠糁犹作奇货可居，虽玉米空棒子每斤亦索价六文。童男少女弃毙盈野，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不但房屋土地欲变卖餬口无买主，虽少女幼妇欲舍身为生者亦无敢领者。”“饿死人十分之五、六，活者割死人之肉而食之。”①

① 转引自《沁水县志》所收的《丁丑奇荒记》，《中村荒政碑》。

这场灾荒使赵家陷入了山穷水尽、忍饥挨饿的窘境。赵忠方时年二十三岁，已是个一表人材、满腹经纶的小主人了。但他毫无孔乙己式的自尊和懒惰，勇于改变自己的地位，他脱下长衫，穿上短衣，跟随同乡到河南商丘县的一家杂货铺当伙计去了。

在那里，这位被家人百般爱护的少爷，低三下四地向顾客献殷勤，晕头转向地同杂货打交道。好在文盲遍野的穷乡僻壤中，象他这样能断文识字的伙计毕竟如凤毛麟角，不可多得。他很快就被擢升为帐房先生。

山西人素来善做生意，在江湖上有个不大雅观然而颇为传神的外号——“牛皮灯笼”。意思是说，外面黑，心里亮。也是山西人的薄一波，曾不无自豪地向一个外国记者解释道：“从外表看来，他们胆小怕事，温顺腼腆。过去外地人都瞧不起他们，轻蔑地称他们为‘老西’。其实他们一点也不胆小，他们擅长经商，极有远见，遇事不是光图眼前一两年，而是为一辈子着想。自明朝以来，五百年间，山西帮控制了中国各地的钱庄银号。”[①]赵忠方正是这种“牛皮灯笼”，为时不久，他就薄有积蓄了，使一家老小在这大灾之年免于饿死。

从此，他就在这家杂货铺里安顿下来，每隔两年探亲一次，同时也成亲一次，因为公婆很乐于折磨儿媳妇，对没能怀孕的更有置之死地而后快的癖好，所以他每次回家，总是见不到思念中的妻子，还得在父母的安排下为他们再娶一个牺牲品，这样的悲喜剧，直到一八八四年，他的第四个妻子

① 杰克·贝尔登：《中国震撼世界》第59页。

生下了第一个儿子—— 也是唯一的一个—— 时才告结束。那一年，刚好是赵忠方的“而立之年”，三十得子，使他欣喜欲狂。但一事无成的悲哀却也悄悄地袭上了他的心头。在这位官宦之后的头脑中，“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观念是根深蒂固的，杂货铺终究不宜安身立命。于是他毅然结束了很过得下去的商贾生涯，回归家乡，买地置产，并把尘封的四书五经搬出来放在案头，一面逗孩子，一面做八股，企图重温旧梦，走科举仕进之途，以告慰赵家宗祖的在天之灵。

然而，十九世纪晚期的中国，整个地主阶级的封建王室已到了危如垒卵的境地，那个至高无上的西太后，却还在想方设法加速它的灭亡。她一边对如狼如虎的列强作阿Q 式的反抗，一边向忧国变法的“君子”无情地开刀，同时又不忘寻欢作乐，挪用建设海军的巨款去修造壮美的颐和园。等到这中国历史上最屈辱的一百年逝去之后，代表着封建王朝进身之阶的科举制度，终于寿终正寝了。因此，忠方公的美妙理想乃是一枕黄粱，而且家道也衰败到无法靠地租度日，必须由儿子赵和清亲自去耕种仅有的十六亩土地了。幸好沁水风尚，读书人一向是“居乡朴直，不予公事，不喜奔竞”，而赵忠方又笃信“万事由命不由人”的格言，所以对于科场失意和经济地位下降到自耕农的变迁，他都能泰然置之，随遇而安。

但是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赵忠方是独生子，儿子赵和清也是独生子，而第三代的第一个，竟然是个女孩子。气得这个乐善好施的赵忠方拼命虐待儿媳妇，他不能不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古训忧心忡忡。如果赵家从此绝后，他

将何颜去见九泉之下的列祖列宗啊！因此，一九〇六年九月二十四日那天，当赵树理用宏亮的哭声宣告自己降临人世时，一家老少的喜悦简直无可名状，唯有感谢救苦救难大慈大悲的上苍。神像前顿时红烛高燃，香烟缭绕。得意洋洋的祖父向跪着磕头谢恩的老伴和正在全神贯注地掐算生辰八字的儿子宣布：这新生婴儿的小名就叫“得意”。

僻远山村，大都象个小小家族，遇到了敬神的事，亲戚邻里往往大伙攒凑一份香火来陪祭，名曰“邀神”。其时又正值传统的中秋佳节，太行山上禾黍方登，瓜果皆熟。纯朴忠厚，慷慨豪放的乡亲们纷纷送来香烛和鸡蛋小米，西瓜月饼，欢庆新的生命。祝贺三代同堂，也许是这大团圆的欢乐气氛熏陶了尚在襁褓之中的赵树理吧，因而他终身热爱大团圆，认为团圆是中国人民的审美规律，甚至希望热中悲剧的外国人也来懂懂大团圆。

当赵树理成名后，他的家乡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在他生下一百天时，家里为他庆贺“百岁”，特地在他面前摆了十几样玩意儿，任他抓，其中还有向人借来的银元宝，专摆在孩子的小手最容易触到的地方。可是赵树理偏不碰它，张开两只小手，一手抓过一支笔，一手抓过一根赶毛驴的鞭子。他的爷爷见此情景，长长地叹口气说，这孩子长大以后本应“金榜题名”，可惜错投在咱们贫寒之家，只能做个“驴背上的状元”。

赵树理出生以后，继之而来的又是三个妹妹，她们有如奇妙的砝码，不断地增加着他在家庭天平中的重量，他成了名副其实的“得意”。全家老小对他施以过分精心的护理，竭

力抑止儿童好动的天性，不准他私自越出祖传的“西院”围墙一步，只能和姐妹们进行众星捧月式的游戏，唯恐男孩子打闹戏斗，踢飞尥脚的顽皮劲会危及他的健康。这样的好心其实是十分愚蠢的。它使童年时代的赵树理长得好象一株成熟了的谷子：细长的身材看起来颇为单薄，一颗大脑袋老是若有所思地低垂着。苍白而瘦削的脸上，生着一双古潭似的黑眼睛，好象失去了儿童天真顽皮的神采。

这种不自然的过分钟爱的境遇，造成了小得意含蓄而内向的性格。他显得过于胆小，文弱，但是，他又不象类似的独苗那样既骄且横，说一不二，而是羞怯的，谦逊的。这样的品性，应当归因于家庭中浓厚的迷信色彩。

赵树理在四十年代初期曾写过一个名为《神仙世界》的剧本。仅以三百份油印本发行于晋东南平顺县，具体内容连作者本人也记不清了。但他写作此剧的灵感与内容得之于家乡的生活，看来是毋庸置疑的。

在这山野地方，历来是“敬神信巫，有不平必质之于神。故乡多庙祀，醮赛纷举”。一个小小的沁水县城，光是由官方祭祀的庙坛，就有先农坛、风云雷雨坛、舜坛、城隍庙、河神庙、马神庙、黑虎庙等二十四个，其他民间的庙宇更是星罗棋布在群山众村，难以数计。迷信思想犹如郁结在深岭巨壑中的瘴气毒雾，污染着世世代代生息在这里的人民的心灵，他们在吃奶的时候，就吸入了“举头三尺有神灵”的信念。结果，“愚民恶俗，殊骇听闻”。有一位巡抚到此的大官，曾亲眼目击妖巫治病的情景：只见妖巫用一柄利刃对准病人的肚皮，一面念念有词，满口咒语，一面就将匕首刺进病人的肚

皮，不一会儿，病人流下一地的鲜血和肠子，抽搐着死了，而亲人仍还要酬谢这个杀人妖巫。更有甚者，与沁水相邻的翼城东山里，人们都相信有一个东山大王，是要享受初夜权的，所以在新婚之夜，新娘必须被叔叔哥哥等亲人按住，在众目睽睽之下让新郎畅所欲为，而“为”的时候，参观的人越多越好，因为人越多，东山大王就越害怕，新娘才能得以幸免……

赵树理在谈到家乡的迷信愚昧时曾沉痛地说过：“抗战期间，日本人把我们的人压在茅坑里，青年人往外救，还要先问问阴阳先生。”

这一带形形色色的宗教会道门多如牛毛。它们各自以其荒唐怪诞的迷信仪式和来世报应的预言蛊惑百姓，广收门徒，扩展自己的势力范围。这种情况，由赵家可见一斑，他们所奉的宗教，便呈三足鼎立之势。

祖父和祖母所信奉的，叫做“三圣教道会”。据说此会乃白莲教的一个遗支，曾组织农民暴动，遭到官府镇压，遂改了名称和宗旨。它的精义是一锅儒、释、道三教观念的大杂烩，认为“儒重忠恕，释重慈悲，道重感应”，主张合三为一，劝人行善。其仪式也十分古怪：教徒要在桌子上排列九宫，一天烧香四次，必须常年吃斋，不食荤酒，否则要犯咒语，受到惩罚。赵树理自小接受祖父的教育，是个非正式教徒，故而到二十岁尚不知肉味，体内的动物脂肪等于零，落下了一副单薄的体质。

母亲王金莲及其娘家则是“清茶教”的虔诚信徒。这个怪道门的渊源已无人知晓，但其蠢无比的教规，赵树理在半

个世纪之后还记得清清楚楚——“神在柜中，柜中放两半盒清水，清水上放筷，平时不开。教徒不用烟酒葱蒜。每天检查一次水缸，缸里若有什么东西，如蜘蛛等，认为是得罪了神。柜里的筷子受到震动开了叉，也认为是得罪了神”。

父亲赵和清，却是彻底迷信传统的阴阳卦术。这位“二诸葛”的原型人物能卜会算。抬手动脚都要论一论阴阳八卦，看一看黄道黑道。后来，赵树理在《小二黑结婚》中揭发过他的一件蠢事：

> “有一年春天大旱，直到阴历五月初三才下了四指雨。初四那天大家都抢着种地，二诸葛看了看历书，又掐算了一下说：‘今日不宜栽种。’初五是端午，他历年不在端午这天做什么，又不曾种；初六倒是个黄道吉日，可惜地干了，虽然勉强把他的四亩谷子种上了，却没有出够一半。后来直到十五才下雨，别人家都在地里锄苗，二诸葛却领着两个孩子在地里补空子。邻家有个后生，吃饭时候在街上碰上二诸葛，便问道：‘老汉！今天宜栽种不宜？’二诸葛翻了他一眼，扭转头返回去了，大家就嘻嘻哈哈传为笑谈。

这类宗教会道门大致分为两派，一派是带有政治色彩、反抗意味的秘密团体，另一派则是所谓“纯良”的“善教”，不牵涉政治，专门行善施福，助人为乐。赵家鼎足而立的三种教派所以能互不干扰。相安无事，大概就因为他们尽管各有教义戒律，但在“善”字上有着共同的语言，所以不必象洋教徒那样，一个家庭只容得下一种宗教。

在这种浓得化不开的迷信气氛中，赵树理不耳濡目染，深受陶冶便是怪事了。在他六岁时，祖父为他开蒙的读物，既

不是五经四书，也不是常识国语，而是不伦不类的“三圣教道会经”。接着，那位热中卦术的父亲也不甘落后，先向他传授天干、地支、五行、八卦、六十四卦名，进一步便要他学习《百中经》、《玉匣记》，《增删卜易》、《麻衣神相》、《奇门遁甲》、《阴阳宅》等算命先生的经典著作。父子俩拼命往这小小的脑门里填塞玄妙的奇谈怪论。但事实证明，两位长辈如此卖力的言传身教，反而促使他日后成了一个最坚决最彻底的反封建迷信的斗士，显然，这是两位长辈始料所万万不及的。不过，他俩似乎也应当感到欣慰，因为这种教育也决定性地培养了赵树理与人为善，助人为乐的品质。

在祖父的亲自指导下，童年时代的赵树理非常热心地用一种土办法来记录自己的善恶之行：做了好事就往一个罐子里放白豆，做了坏事放黑豆。比如，修桥补路放三颗白豆，掩埋尸体放两颗，敬惜字纸放一颗，坏事则除损人利己外，大都是封建迷信的不忠、不孝、不洗手就在祖宗牌位前上香之类。在赵树理的小罐中，白豆总是比黑豆多。

尽管此类规定把赵树理约束得胆小异常，见到蚂蚁都不敢碰，生怕犯了杀生罪，但我们还是应肯定那些可爱的黑白豆。它们使赵树理不知不觉地从溺爱中自拔出来，避免了骄娇二气，并且潜移默化着他的品性，使他得以终生保持乐善好施的习惯。他的儿子二湖记得，哪怕在倍受摧残，行动失去自由的晚年，他也忘不了做些力所能及的好事。比如，路上碰到一块绊脚的石头，定要设法搬走，以免别人再绊倒；遇见一个拖着鼻涕的小孩，便会掏出手绢替那个莫名其妙的孩子擦去鼻涕，有时还给素不相识的拉屎的孩子擦屁股，他的

身上总是带着空烟盒。

当然，对于六岁的儿童来说，这种教育史上没有先例的开蒙读物实在太深奥，太晦涩了。赵树理根本不理解文字的意义，只是机械地诵读："敬天地，礼神明，奉祖先，孝双亲，守王法，敬鬼神，……""不屡斜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于物。……"然而长辈们却从中获得了极大的乐趣。他们惊喜地发现，小得意在记忆能力方面有着早熟的特征。象大小流年或占卜口诀，他过目不忘，一念就会—— 这是他与那些因此而号称神童的孩子们的共通之点。于是，每当乡亲们端着饭碗在广场上吃饭时，父亲就常常把他带到人前亮相，故作严厉地让他显示才学。这时小得意便昂着头大声地背诵起来：

金鸡不遇狗，白马怕青牛；
虎与蛇两不合，鼠和羊不长久；
猪见猴，泪长流，龙兔相逢不到头。……

乡亲们也很乐意分享赵和清的喜悦，高兴地称赞赵家的小得意真是个"神童"。

然而，极有远见的祖父对于这种表演却不以为然。忠方公一直为自己不能有所作为，重振门庭而深感惶愧。现在，家门有幸，生此奇才，自己的遗憾很可能将由他来补偿哩！岂能让他把聪明才智浪费在占卜算命的雕虫小技上？他觉得，自己有责任对孙子加以教导，铸成大器。

赵树理开蒙那年，正值辛亥革命的风暴席卷全国。一九

一一年十月二十九日凌晨四时，山西的革命志士首先在太原举行武装起义，进攻巡抚衙门，击毙巡抚陆钟琦和协统谭振德，不到半天，便结束了战斗，太原宣告光复。接着，起义军在全省各地，尤其在雁北和河东跟清兵展开激战，历时半年，方才定局。可上党地区却是未放一枪，未伤一人，革命便告成功的。

太原起义后，上党一隅，因没有同盟会组织，仍在清朝官吏和巡防队的控制之下，起义军鞭长莫及，无力过问。不料在山西临时议会中，有个上党籍的议员竟自告奋勇，只身前来劝降。可能是大势所趋吧，他居然马到成功。“仅是通知知县一声，知县如要表示革命，然后把带去的告示贴上，向民众一宣布，革命就算成功了”①。而沁水的知县更加积极他联合绅士与翼城、阳城二县组成一个代表团，主动赴平阳府响应革命军。所以未及一月，上党所辖二府二州十九个县的上空，飘扬的已不是清朝的龙旗，而是民国的五色旗了。县衙门也改称县公署，知县改称知事，而工作人员则全数照旧。资产阶级革命给上党人民带来的变化，奸象与历来的改朝换代并无二致，人们仅仅在写契约、立帐簿时，将“宣统四年”改为“中华民国元年”而已。所以忠方公依旧恪守古训，认为纵然皇帝不坐龙庭了，科举制度也成了历史，读书知礼，学优而仕总还是千古不易的真理。他断然决定排除儿子的干扰，独揽教育孙子的大权，并且改换教材，开始讲授《大学》、《中庸》、《论语》和《孟子》，并且给小得意起了个旗帜

① 王家驹《潞安地区辛亥革命前后》，载《山西文史资料》第一辑。

鲜明的大名—— 树礼。

封建阶级的经典著作，同样和儿童的心情相去十万八千里。他只觉得，爷爷摇头晃脑地拉起腔来念书的时候，这音调倒是蛮好听的。不过，促使他甘心情愿地坐在冷板凳上死记硬背的主要动力，是爷爷的诺言：答应他在完成功课以后，可以领他到沁河边上去散步，一面眺望长川夹岸、岩壁峭立的奇异风光，一面给他讲述发生在这一带的历史传说。

赵树理诞生的地方，正好处于传说中的愚公决意铲平的太行山和王屋山的结合部，一道逶迤奔流九百里的沁河为这两座著名的大山划下了天然的分界线。全县被崇山峻岭所环抱，千峰万壑，层峦叠嶂，有位县令曾豪迈地写道：支分太行之秀气，联王屋之奇，龟蛇呈形，金水结聚，群山环拱，众壑潆洄，地险出于天成，胜概收其精气。”这个地方，最早是中华民族第一个贤君唐尧的国土。他在位时，住茅舍草棚，吃粗茶淡饭，穿的也是布衣旧袄，甚至“衣履不敝尽，不更为也”。另一位大圣人虞舜，在他尚未继承尧的帝位时，也曾耕田陶河于本县的历山，留下了古迹“舜王坪”。尧舜的俭约勤劳的传统千古不衰，沁水人民一向重农桑，多朴直，素有“质实勤俭之风，亲爱和乐之思，警戒忠告之情”。这些美好的传说和传统，如潺潺的沁河水，滋润着这个早熟的孩子的心田，影响了他的性格的发展。

这里又是民族英雄岳飞抗击金兵的著名场所。宋绍兴中，岳飞在太行山枪挑金兵首领拓拔乌耶，黑风大王之后，立即派大将梁兴会合太行忠义，两河豪杰，在沁水再次大败金兵，接着，又在朱仙镇打了一次决定性的胜仗。直捣黄龙府的宏

愿指日可待。这时，长期遭受异族蹂躏的沁水人民欢欣鼓舞，踊跃支援岳家军。他们头顶香盆，争运粮草，并且筑起了七个城堡来迎接岳家军的进驻——这些城堡的遗址，世称“岳将军砦”。当岳飞在十二道金牌的催逼之下不得不放弃唾手可得的丰功伟绩，班师回南时，老百姓哭声载道，许多人宁愿背井离乡跟随而去。人民对岳飞永志不忘，创作了岳家军连台本戏，使他的英名世代传颂。尉迟村还一直供着岳飞的神位，一块“鄂王忠武”的匾额至今犹存。后来，明代诗人何景明在凭吊“岳将军砦”时悲愤地写道：

挠枪弄茫天改色，汴京失守乘舆北。
鄂王唾手复中原，两河豪杰皆奋力。
刊山筑岩声裂空，和议误国堕成功。
千秋英魂或游此，森森草树生悲风。

岳飞抗金的历史故事和沁水人民壮怀激烈的爱国精神，深深地打动了幼小的赵树理。他的牢不可破的民族感情，可以说在童年时代就已经萌发了。

在这地僻岩深的山沟里，人们与世隔绝，过着简单而闭塞的生活，很少有人走出过二十里路。他们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几乎毫无文化生活可言，唯一能调剂人们精神的，只有村里举行敬神活动时，偶尔请来的上党梆子戏。

迷信成风的沁水县，每村都有个掌殿之神。但尉迟村与众不同，供奉的不是神，而是唐朝的开国大将尉迟恭。相传这位赫赫有名的军人秉性忠直，因不屑向残暴的李渊摧眉折

腰，甘愿抛弃高官厚禄，到这个荒僻的小村隐居，用漫山遍野的柳条编制簸箕，靠自己的双手来维持生计，并把这种手艺传授给村民们。[①] 他的“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品质，得到了村民的高度赞赏。人民为了纪念这位保国忠良，特地将原来的村名“吕窑”改为“尉迟”，并建立“尉迟庙”作为本村的神庙。毫无疑问，这种高尚的乡风也陶冶了赵树理的性格。

每当演出酬神戏的时候，村北尉迟庙的墙头上便会贴出如下告示：

> 兹以三时无害，万宝告成，皆赖神圣之灵，风雨之助，报恩崇德，人所应然。本村谨择于×月×日起，洁治樽俎，虔脩牲馔，兼督俳优，献戏三日，以酬圣泽，而明感戴……

这时，全村的百姓都要忙碌起来。因为他们的文化娱乐、精神生活委实太少、太贫乏了，所以其隆重性并不亚于过节，娶媳妇。当戏班子出现在村边大路上时，早就翘首以待的孩子们，首先呐喊着蜂拥而上，一路欢蹦乱跳地把他们引到尉迟庙里的官房去歇息。不一会儿，村里的社首接踵而至，热情地倒水递烟，恭敬地嘘寒问暖，紧接着，伙房里的风箱也“嗵哒嗵哒”响起来了，白面剔尖、拉面，葱花、姜末、酸咸辣麻五味俱全，给予山区小村的最高礼遇。平日冷冷清清的

① 尉迟村向有“敬德会，”凡想学编簸箕者，均要入会，并须宣誓不外传技术。每年农历十月十五，他们在尉迟庙烧香聚会一次，同时展销各种柳器，当地民谣道：“编簸箕，有指望，编上簸箕能换粮，没地不学编簸箕，全家大小受凄惶。”

尉迟庙，这时要挂起六七十个宫灯，于是孩子们的兴趣就又转移到这上头来。因为蜡烛的把子都很长，往灯里插时总要折下多半截，象一根筷子。这一钱不值的东西却成了他们的珍品，他们大呼小叫，连轰带抢，觉得其乐无穷。摆摊的小贩也都来了，什么当街垒霸王灶支油锅的，摆矮桌桌小杌子的，干鲜瓜果，熟食小吃，应有尽有。家家户户也碾米磨面，梳洗打扮，还要邀请外村的亲戚朋友来共同观赏。于是，山道上就会出现络绎不断的毛驴，上面坐个穿红着绿的小媳妇，一条汉子在旁边跟着。……全村上下，热闹非凡，一派欢乐的气氛。

这地区演戏的习惯是每日两场，而观众的习惯是一场不拉，但他们大都并不专心看戏。平素很难凑到一起的大人们，又忙着谈笑叙家常，又忙着吃零食水果，孩子们则象野马似的满地乱跑。可是小得意却不然。演戏，对这幼稚的心灵具有莫大的吸引力。他早早就扛上板凳，拉着妹妹，坐到厢楼上的栏杆前，不管小伙伴们闹得沸翻盈天，一心只盼着帷幕快快拉开。当那为镇压杂音而敲得震耳欲聋的锣鼓声一响，他就沉浸在这音乐世界了。高亢激越、粗犷豪放的上党梆子，给这个小男孩留下了强烈的印象，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因为看不懂戏的内容，小得意常在晚上缠着母亲，要她讲解。他的母亲是个典型的山区女子，温柔、善良、沉默，内心深处又不乏倔强刚硬之质。有一年春荒，她回娘家借粮。娘家很富，放在地窖里的粮食都霉烂成块了，却只借给她二十斤粮。从此以后，她就是饿死也不向娘家开口了。她一生中别无嗜好，唯爱念佛和看戏，尽管一字不识，却能整本整本

地背诵杨家将、岳家军的连台本戏，所以她很乐意满足宝贝儿子的要求，常常在繁星满天，万籁俱寂的夜晚，搂着心爱的得意，向他絮絮地讲述山西人引以自豪的杨家将抵御外侮的故事，杨令公一家英雄的业绩，鲜明的爱憎，象烙印一样打在童年赵树理的心头，使他终生难忘。而他母亲在讲述故事时的生动与喜悦，也不知不觉地传给了他。

然而，这样的好景并不久长。一九一五年冬，赵树理九岁的时候，祖母病故了。年过花甲的祖父因失去相依为命的老伴自然十分悲痛，不幸伤感过度，也是一病不起，虽然在病床上挣扎到了一九一六年，终因年事已高，犹如一盏耗尽了灯油的小油灯，生命之火行将熄灭。在弥留之际，忠方公把全家召集到床前，一双浑浊的眼睛深情地注视着小得意，一面断断续续地用迟缓然而坚定的声调嘱咐儿子：小得意才智过人，聪明非常，乃是赵家的千里驹，前途未可限量，一定要不惜任何代价，让他继续学习，知书识礼，将来靠他来重振门庭，光宗耀祖。待到儿子作了肯定的答复后，他向孙子投去混和着依恋和期望之情的最后一瞥，安静地溘然长逝了。

能够无憾地去世，固然是件幸事。但是生活的逻辑却往往嘲笑死者的美好设想。祖父的死，实际上正是赵家彻底没落的标志。

按照迷信的说法，家中接连死人是不祥之兆，定有鬼怪作祟，如不彻底清除，对于活人很为不利，再加上赵和清极端崇尚阴阳之学，所以他不惜代价，大办丧事，小殓、大殓、超度、出殡……一丝不苟地执行葬礼的繁文缛节。

这种怪诞的仪式是颇费钱财的，两次丧事使本来就不富

裕的家庭经济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可怕的赤字——四百元大洋的高利贷。上党民谣："借钱上利，不如卖房卖地。"从此，赵树理的家道遂由小康堕入困顿。但赵和清为了忠实执行死者的遗嘱，也为了死撑门面，不被别人看轻，还是决定把赵树理送到本村的私塾去深造。

爷爷在世时，赵树理连户外的阳光和空气都不能充分享受，更不准他接近年龄相仿的小朋友，"跟那些野孩子学不出好来！"他只能远远地站在一旁，羡慕地看着他们玩抓子、跳鞋、成方、捏泥人、摘酸枣、掏野雀、放垒石，……所以，赵树理是满怀喜悦，前往私塾拜见先生，结识同窗的。他自然不会明白，一个一向在家里单独地，纵然也是严格地教养的孩子，一旦突然插进一群粗野的孩子堆里，他肯定要遇到种种意料不到的恶劣、庸俗、甚至卑鄙的事情。

关于赵树理在私塾里的情形，我们从他的中篇小说《刘二和与王继圣》中可以猜测到，他在那里碰到了灾星。

小说描述了一个在十里之王的村长家长大的骄横跋扈的男孩小继圣，从小跟他爹学会了打耳光，说打谁就要打谁，而且谁也不敢还手。他"在学校衣裳穿得好，手脸也洗得白，小嘴又会说，先生跟他爹又是好几辈子以前的老姨亲（听说先生的曾祖奶奶是村长他奶奶的姑姑），因此继圣说一句，先生就听一句——比方他告先生说满土踢了他一脚，满土就得挨十板；说喜宝骂了先生一句，喜宝就得挨十五板，再往下象宿根、小记那些比他小一两岁的，更不在话下，说叫谁早上挨，谁就等不到晌午。先生是本村人，在家伺候老婆的时候多，到学校的时候少。先生不在学校的时候，就该继圣为王，

谁敢不顺他，小巴掌就打到谁脸上去，他那小巴掌虽说也很痛，可总比先生那块干巴巴的木头板打在手心上轻的多，同学们想少挨木头板，就得忍点气挨他的小巴掌。”不难想象，当赵树理走进私塾时，首先领教的便是这个小霸王的巴掌。

私塾里的其他学生，大都也是村里的小财主或小权贵的少爷，娇宠成性，品质恶劣而又非常傲慢，根本瞧不起家境贫寒的赵树理，更糟糕的是他身材清瘦，举止文雅，体质孱弱，这使他在那班小牛犊似的粗鲁同学眼里，身价进一步下降，一有机会就肆无忌惮地群起欺负他，要他当差，还要他进贡——送吃的零食，“哪一次不从他们的要求，他们便集体到先生面前告状，使我挨无辜的打骂“。赵树理后来悲愤地写道，“开始也曾反抗过几次，但先生反因此认为我是最顽皮的学生，一跟别人发生纠纷，处罚便无例外地落在我头上。”有一次，这帮折磨他的学生又想出了新花招。他们把一小篮炉灰放在半开半闭的门顶上，当先生推门进来时，它不偏不倚正好落在先生的头上，差点儿把他活活呛死，乐得他们拍手大笑。先生灰头灰脑，狼狈不堪，拍着桌子大骂：

“混蛋！哪个王八羔子干的？”

小霸王应声而起，指着赵树理诬陷道：“是他！先生！”

“对！是他！就是他”！其余的人随即同声附和。

怒不可遏的先生不由分说，将小得意一把揪出，按倒在凳，脱下裤子，用戒方“噼、噼、噼”一连打了好几十下。后来，赵树理在《登记》中描写了这顿毒打的感受：“屁股蛋疼得好象谁在用锥子剜，浑身的筋往一处抽，喘了半天才哭了一声就又压住了气，头上的汗，把头发湿得跟在热汤里捞出

来的一样。……”

金钱和暴力的淫威，象暴风雨一样倾泻在毫无思想准备的赵树理身上，他被打懵了。他奇怪，世上的人怎么这样不讲理，这样缺乏善良、正直和同情心？不但有钱的，力大的可以随意揍他，那些跟他差不多的同学竟然也帮着助纣为虐，甚至那个为人师表的先生，也是黑白颠倒，是非不分。他感到愤恨，感到耻辱，感到不得意。他第一次经受了社会世态的炎凉，第一次尝到阶级压迫的苦辣。中伤和凌辱使孩子变得阴沉、孤独，也损害了他的健康。

不过，小得意虽然瘦弱，温和，谦逊，但骨子里却是倔强的。他自来没有奴颜和媚骨，面对强暴，决不屈服。他在私塾里反抗失败，就要求离开这座可怕的小地狱。他后来说：“这种生活，虽只是短短一年，但我觉得一刻也不能再延长，来年便在父亲面前誓死抵抗再入学校，以死来威胁父亲。父亲也不再坚持他的意见，母亲是早就被我说动了的，也帮着我说话。父亲的意见打消了，我才被这小地狱释放。”但是，在这一年中所受的种种侮辱，却在他那纯洁幼稚的童心上刻下了不可磨灭的伤痕。他耿耿于怀，永远不会宽恕这些恶作剧的富家子弟。

赵树理的童年结束了。他的童年以喜剧始以悲剧终。然而这悲剧何尝可悲，它不仅为《刘二和与王继圣》及《灵泉洞》提供了创作素材，而且，对于赵树理的艺术生涯来说，它迫使他迈出了最重要的第一步——接近农民。

第二章 求 学

对于现代中国的革命史家和文学史家来说，一九一七年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它是东方的微光，冬末的萌芽，揭开了五千年文明古国的崭新一页。就在这一年，为中华之崛起而苦苦探索了数十年的先进分子，终于在彼得堡冬宫的炮火中，发现了救国救民的真理。李大钊放声欢呼："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①] 正陷入失望和苦闷中的鲁迅，也从那"用骨肉碰钝了锋刃，血液浇灭了烟焰"的十月革命中，"看出一种薄明的天色，便是新世纪曙光"。[②] 这些真的猛士，还向腐朽僵死的封建文化展开了毁灭性的进攻。陈独秀高揭"文学革命军"的大旗，誓死拥护"德先生"和"赛先生"，"一切政府的迫压，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③] 而在赵树理的生活史上，这一年也具有大致相似的意义。从此，他开始真正地接近、了解中国的农民，开始和他们一起经受生活中无穷的

① 李大钊：《Bolshevism的胜利》
② 鲁迅：《热风·圣武》
③ 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

屈辱和贫困，一起品尝所有的悲苦和辛酸，一起体验斗争的艰难和胜利的喜悦，最后，在中国农民最没有发言权的文学领域，成为他们最忠实的代言人。

一九一七年，十一岁的赵树理跳出私塾小地狱，进了“农业大学校”。在这里，他幸运地得到了一位优秀的教师。这位教师使他掌握了两门在尔后的生活中受益无穷的手艺——农民的技术与农民的艺术。这个优秀教师便是他的父亲赵和清。

赵和清的生活经历，似乎和儿子相仿，虽然是珍贵的独苗，也终因家道衰败、早早就辍学务农了。他时年三十三岁，身高一米七八，瘦削的长脸上，两眼细长有神，下巴却丰满结实，还有一双与众不同的手，手掌好象四方的，指头粗而短，而且每一根指头都不直，里外全是茧皮，圆圆的指头肚儿好象半个蚕茧上安了个指甲。他是个英俊而又精干的庄稼汉兼文化人。

从赵树理笔下的一些老人形象中，我们可以看出赵和清性格的基本特征：迷信透顶——“《小二黑结婚》中的二诸葛就是我父亲的缩影”。爱钱如命——《杨老太爷》中的主人公要儿子发财养家的心理举止跟他基本吻合。但他最突出的特征，则如那秉正老人，心灵手巧，勤劳能干。在《套不住的手》中，赵树理亲切地谈到了父亲的高超手艺：

“经他手垒过的石头地堰，从来也不会塌壑儿；经他手压的熏肥窖，从来也不会半路熄了火；至于犁、种、锄、收那些普通活计，更是没有一样会落在马下的。”

“他爱编织，常用荆条编成各色各样的生产用具，也会用

高粱杆子编成各色各样的儿童玩具。当他编生产用具的时候，破荆条不用那个牛角塞子，只用把荆条分成三股，把食指塞在中间当塞子，吱吱吱……就破开了，而他的手皮一点也磨不伤；可是他做起细活计来，细得真想不到是这两只手做成的。他用高粱杆子扎成的‘叫哥哥’笼子，是有门有窗又分楼上楼下的小楼房，二寸见方的小窗户上，窗格子还做成好多各种不同角度的图案，图案中间的小窟窿，连个蜜蜂也钻不过去。”

赵和清的技术是无师自通的，可在教儿子学艺时却有一整套严格的规定。比如锄二遍地，腰必须弯到一定的度数，身子一定要斜着侧步，不许乱动脚；两手要攥紧锄把，叫每一锄下去都有准，不许让锄头自己颤动，而且一定要锄到庄稼边，不许埋住生地皮；往庄稼根上拥土，还须尽可能做到整整齐齐，三锄拥一个堆，要平顶不要尖顶。他以身作则，示范时一丝不苟，边讲边做，往往要重复十几遍，然后才让儿子动手他跟着干，以便随时纠正。

这种对于事业的极端严谨认真的态度，赵树理直到专职文学创作时，方才真正体会到它的价值，但在当时却深以为苦。幸亏他继承了父亲的灵巧劲，很快就学了个八九不离十。两年以后，锄苗、犁地、摇耧、扬场……各种农活基本上拿得起，放得下了，而敬德将军传下来的编织手艺，他也干得有板有眼，剥柳皮，破荆条，编簸箕，织鸟笼，各处关节相当在行，所以他后来经常自诩出身于“编织世家”。

他的成绩使赵和清喜不自胜，又象当年炫耀儿子的记忆力那样，常常爱用悲观的调门向别人谈论：“这小东西心灵手

巧，眼里有活，学什么一看就会，干什么一做就对，倒是个好帮手。可惜身体单薄，有巧无力。”后来的事实固然表明赵树理并非他的好帮手。但他所传授的手艺倒不折不扣地成了赵树理接近群众的“好帮手”。王中青曾用富有诗意的笔调回忆过他在一九四六年见到赵树理的情景：“他一头扎在农民中间，到处能听到他诙谐的话语，到处便腾起了欢乐的笑声。开春以后，遍地的耕牛走动了，他常常掖起棉袍，一手抓住犁杖，一手扬起鞭子，看着脚下翻滚的土壤，闻着泥土诱人的芳香，扬声唱起了梆子戏。秋天，金色的场上，珍珠似的谷粒扬到空中，又沙沙地落在金山上。扬场的人群中照样能听到他略带沙哑的上党梆子声。他哪里象个文人、作家、他就是一个农民的心灵、农民的形象啊！”①

如果说，是母亲培养了他讲故事的兴趣，那么，他对上党梆子的无比热爱则是从父亲那里承继来的。赵和清其实是个“万宝全”，他不仅精通农活，又颇晓阴阳、善于测字算卦、也略通医道，常替人家号脉开方。此外，他还有音乐天才，拉得一手好巨琴，是当地农村的民乐组织“八音会”中不可或缺的人物。他在教授农艺的同时，以同样的认真和热心，把自己的这一特长传给了赵树理。

他带赵树理到“八音会”去，让他见识各种乐器，指导他演奏、唱戏。不久，人们便发现，这两人有时在地里也会自得其乐地父拉子唱，或同台合奏。后来，赵树理青胜于蓝，

① 王中青：《太行人民的儿子——忆赵树理同志》载 1978 年 10 月 15 日《山西日报》

不仅吹拉弹唱无所不会，而且练就一种绝技，能一个人打鼓、钹、锣、旋四样乐器，并且舌头打梆子，口带胡琴还不误唱。

赵和清的初衷，无非和天下的父母一样，总希望自己的子女也爱自己之所爱。他自然不会想到，这农民的艺术使赵树理获得了接触群众的又一个“好帮手”。三十年后，王春写道：“他能够接近群众，不只是他的感情和群众一致，也不只是懂得群众最多，这些艺能实在也帮助他不少。有一次，我曾经和他一路到过黎城的宋家庄，灾荒年间，简直找不上吃饭处，恰好磨盘上有人玩乐器，他去了。一个人敲动四、五样家伙，连说带唱，霎时聚下半村人，乘机把渡荒自救的道理讲演一番，居然说得垂头丧气的老百姓眉开眼笑，收下粮票，款了饭，都准备设法去生产”。①

不过，少年赵树理最感兴趣的，却要数家乡的地方戏上党梆子。

上党梆子为山西四大梆子之一，流行于晋东南地区，因这地方乃古之上党郡而得名，是个流传了数百年的古老剧种。据后来成了上党戏专家的赵树理研究，“这个剧种是综合了六个剧种（昆、梆、黄、罗、赚、乐）而成的。它的历史，已无明文可考，从保存的剧本风格看，它接受过秦腔（《天波楼》、《尤图案》等）、苏昆（《长生殿》、《东坡游湖》等）、汉剧（《打金枝》、《牧羊圈》、《佘塘关》）等的舞蹈、唱腔，而其中列国戏（如《二子沉舟》、《齐鲁界》、《东门会》等）纯朴洗炼，不知从何而来，可能是原剧种的创始剧本。‘上党’

① 王春：《赵树理是怎样成为作家的》，载1949年1月16日《人民日报》

虽是秦时的郡名，而这种戏的活动却只限于山西东南部十九个县。这个地方，因为是太行山的主峰所在，交通不便，不常与外界往来。但正因为如此，未受到城市影响，剧中将不合乎士大夫口胃的人民斗争性全都保留下来——所有的剧本中，不杀人的很少；有些戏，几乎同京戏的剧本完全一样（如《一捧雪》、《四郎探母》等），后来京戏在音乐、唱腔、作派方面都向柔和处发展了，而这种戏却还保存着它原有的强烈风度。”他又说：“我以为上党戏的好戏是激烈、痛快，我爱这种痛快的气氛。”

孩提时代，赵树理便是一个热心的小戏客。随着年龄的增长，知识的丰富，他对戏中人物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逐渐理解。又在父亲的悉心指导下，学会了各种乐器和曲调（八音会的乐器和上党梆子完全一样，上党梆子的曲调在八音会里大量存在）——特别是后来又掌握了打鼓板的艺术（鼓板是指挥其他乐器的，要掌握全剧的缓急节奏，因此打鼓板的往往要把唱白、台词全部背诵下来）——他对这一粗犷豪放、具有浓郁的山野风味的剧种的热爱与日俱增，最后到了心醉神迷的程度。“只要方圆十里、八里有戏，我总要跑去看得端了老鼓才罢休，趁天明回来上地劳动，一天到晚不觉得累人。”赵树理后来不只一次地回忆道，“白袍小将罗士信，是我最喜爱的人物。他凭着一百单八路艮枪，常常得胜。真厉害！我和邻居的小弟兄们，经常手拿圪档（高粱杆）学罗成打仗”。

这时，他们就跑到离村不远的沁河边上，那里有一块很大的沙滩，是他们游戏的乐园。他们找来一些长着红白小花的蔓草，披挂在身上当盔甲，又煞费苦心地用柳条制成“雉

尾”和“丝条”，插在头上，系在腰间。接着又为谁当罗成进行一番激烈的竞争，然后，由罗成率领号称十万精兵的四个放牛娃，不管时间和空间的荒谬，跟三国的莽张飞展开大战，嘴里“咚仓咚仓”地念着锣鼓点，互相用高粱杆乱打一气，把脚底下的草踏得横三竖四满地乱倒……

就在这样的游戏中，赵树理居然慢慢地成了上党梆子最彻底最虔诚的崇拜者。他的一个老战友到八十年代还清楚地记得：“在他看来，天下最好听的戏曲就是山西梆子了。山西梆子又以上党梆子最来劲儿，北路梆子、南路梆子、中路梆子都不行，就数上党梆子好听。你说上党梆子不够味儿，他能跟你拚命，非叫你服了不可。说着说着就哼哼起来，连唱带比划的，拿手指弹着装烟末的小铁盒当鼓点，嘴里响着锣鼓家什，一个人唱起一台戏来……”[①]他还养成了一个不可更改的习惯：两手一有空闲，就往任何能发出声响的东西上敲打上党梆子的鼓点。

在和农家孩子的快乐的游戏中，赵树理的思想感情也开始发生急剧的变化。有一次，他们正玩得兴浓，恰好赵树理的灾星——那个小霸王似的村长儿子路过这里，当他发现是欺负惯了的赵树理在扮演罗成时，他为罗成抱不平了，赶过来喊道：“小得意，你那个屌样子也能当罗成？把枪给我，老子来当罗成！”

慑于昔日的淫威，赵树理不得不停止战斗，但又实在舍不得交出这根宝贵的高粱杆。他迟疑着，别的孩子也大为扫

① 华山：《赵树理在华北新华日报社》载《瞭望》1982年11月号。

兴，围拢来愤怒地瞪视着这个小霸王。

“×你娘得意！你的耳朵聋实了？”小霸王见他竟敢抗命，一边骂着，一边劈头就向赵树理打去。不料赵树理早有预感，迅速地往旁边一躲，拳头就落在别人身上了。然而放牛娃们可不是好惹的，他们早就气得眼中冒火了，大家一拥而上，拖的拖、推的推，把他抓到沁河边，一个人死抱住他的腰，另一个抡起放牛棍呼—— 呼—— 把河里的水往他身上打，把他的小白脸和红花夹袄都涂成一色，活象破庙里被雨淋过的泥胎像。起先他还骂，后来一张开嘴，泥水就溅进嘴里去，这才不骂了。但是大家并没有就此饶了他。为了给赵树理在私塾中所受的气报仇，决定让他尝尝“老牛看瓜”的滋味。他们把他按倒在地，解去他自己的裤带把他的两手捆在一处，叫他两条胳膊抱住两个膝盖，又从膝腕下边穿了根核桃粗、三四尺长的木棍，然后把他一推叫他睡倒—— 这样捆起来的人，除了脊梁骨，头脚都不能着地，因为胳膊和腿连在一起，棍子又长，坐也坐不起来，横又横不过来，只有仰面躺着，好象朝天一张弓，美其名曰：“老牛看瓜”。

赵树理自幼接受“三圣教”精义，慈悲为怀，善良得连蚂蚁也不敢踩，因此，对这家伙虽然恨之入骨，这时倒又于心不忍了。

“给他解开吧，省得他回去到咱们家里找麻烦！”他说。

然而小伙伴们却不让：

“你就这会给他放开，谁能保他回去不找麻烦？刨一镢头也是动了一块土，仍是惹他一回，就叫他睡到天黑吧！”说罢，大家一哄而散，听凭这个小霸王象陀螺一样在地上徒然挣扎

……

放牛娃们爱憎分明的态度，强烈地震动了赵树理的心灵。过去，爷爷为了望孙成龙，亲自课读，管束很严，不准赵树理与别的农家孩子接触。他对他们有着某种陌生疏远之感。现在，“小字辈”肝胆相照的纯真友谊，温暖了他那受伤的心灵，感情丰富的赵树理不禁热泪盈眶，并为自己的懦弱感到羞愧。三十年后，他把这些可爱的人和事写进了小说《刘二和与王继圣》。

与“小字辈”们日益密切的过从，使本来胆小拘谨的赵树理很快恢复了男孩子应有的活泼。每逢下雨天或冬季的夜里，赵树理就跟他们一起来到村里的“东头院”——那里住着一户姓吕的农民，弟兄四个，都是民间音乐爱好者，保管着“八音会”的乐器。——操起乐器吹打起来。这种场面，赵树理后来在那部散佚的长篇小说《盘龙峪》中作过记录式的描写：

> 他们唱得最熟练的一本戏，是平话本精忠传里泥马渡康王的故事，安泰唱康王，小松唱金兀术。安泰不会敲乐器。小松连唱带敲梆子。得水能打大锣。鼓板本来是春生打，这一晚上和尚要试打一下，春生就让他打鼓，自己去拉胡琴。其余各人，也都拿起各人会奏的乐器，“铛铛锵锵”的打起来。才打了一段出场的锣鼓，和尚的鼓板跟不上——手太迟缓。小松说是“靠小姨坐的孩子，只能作‘姨夫’，靠和尚打鼓板连‘姨夫’也不能叫。”后来仍旧换过来了。
>
> 安泰的嗓子很宽，小松的嗓子很凶。小松唱外国公主，但没有几句戏。……

不打不唱的时候，他们就前朝五百年，后朝五百年，东家偷人，西家养汉地飞短流长，谈天说地。但更多的则是绘声绘色地嘲笑土财主的贪婪吝啬、惟妙惟肖地模仿狗腿子的奴才洋相。庄稼汉的土话俚语，未经斟酌脱口而出，生动、粗犷、铮铮作响，俏皮机灵得活象深山里的猴子，时时引起哄堂大笑。有时候还给对方起个恰如其分的外号，贴切得跑到天涯海角也摆脱不掉。

这样的漫谈，对于未来的语言艺术家是多么珍贵啊——“这就是我的初级的语言学校！”赵树理一字不漏地倾听着、观察着，铭记在心。他对于农民语言的异乎寻常的敏锐感觉，迅速地发达起来了，那种幽默诙谐的谈吐，也在这时开始形成了。还有那起外号所必需的明确的判断力和表现的才能，他也有所造就。

赵树理爱去的另一个地方，是“东头院”东北方的两孔古石窑。那窑洞破旧不堪，门窗俱毁，却是个熙来攘往的喧闹的住所，因为它没有主，吸引着许多背井离乡的外出逃荒的农民。他们缺衣少食，贫无立锥之地，能有这样一个可以暂避风雨的地方，真是上上大吉了。在窑外的空地上，还有一株根深叶茂的大核桃树。那些饱经风霜、见多识广的人们，便常常聚坐在核桃树下，或报告本村的最新消息、四乡的奇闻逸事，或交谈大致相似的灾难经历，各地奇异的苛捐杂税、或轮流讲述好象永远讲不完的民间传说、奇闻笑谈。

但在封建宗法制的中国农村，这些外来户是最为苦难的阶层。他们备受歧视，种最坏的土地，交最重的租税，而且

永远抬不起头来，比最穷的本地人还要低一等，象张铁锁那样为了一棵自己的桑树而被地头蛇逼得倾家荡产的事情时常发生。所以本村的在地户不论老小，没事绝不到核桃树底来闲坐，小孩们偶尔去那儿玩一玩，大人知道了骂道："下流东西！明天就要叫你到核桃树底去住啦！"可是赵树理却不怕这种恫吓、他万分喜爱这些有趣的故事，有味的语言，对于他们不幸的遭遇更是充满了同情。后来，在《李有才板话》中，他以这些人为模特儿，塑造了老槐树下的"老字辈"人，在《李家庄的变迁》中，通过张铁锁的冤屈，描写了外来户在封建宗法制农村的苦难。

就在这贫困的底层，少年赵树理吸取了对抱屈受苦的人们的热爱，对他们所遭受的残酷迫害的同情，以及对地主、对统治阶级的强烈憎恨，同时也熟悉了农民的思想和感情方式，他们的家庭和社会生活，他们的关系和风俗习惯。"他们每个人的环境、思想和那思想所支配的生活方式、前途打算，我无所不晓。当他们一个人刚要开口说话，我大体上能推测出他要说什么——有时候和他开玩笑，能预先替他说出后半句话"。

为了补助拮据的家庭开支，在天寒地冻的冬闲季节，赵树理常要赶着毛驴去驮炭（山西人把成块的煤叫做炭），他从尉迟村走到阳城煤窑，驮上炭，运到端氏镇，往返百里，挣几个脚钱买盐买布。

每天一早，他在母亲柔声的呼唤和轻轻的摇动中醒来，迷迷糊糊地摸索着穿上衣服，走到外屋的灶边，用冷水胡乱洗洗脸，用一块污秽的破手巾擦干，然后蹲在地下，扒几口小

米捞饭，喝一碗清水米汤，再揣上几个煮山药蛋。这时，父亲已把毛驴装备完毕，交给他一条小鞭子。

太行冬日，风狂路险。宋代的司马光在回家探亲时写过《苦寒行》一诗：

穷冬北上太行岭，霰雪虮结风峥嵘。
熊潜豹伏飞鸟绝，一径仅可通人行。

赵树理一出户外，就在砭人肌骨的寒风中颤抖起来。村庄还在黑暗中沉睡，远近望不见一点人影，只有自己的脚步在厚毯似的雪地上发出“喀吱，喀吱”的声音，还有那路旁的树，挺着强劲的秃枝在狂风中“呜呜”地鸣叫着挣扎。这景象不能不使一个尚未成年的孩子心惊胆怯，于是就轻轻地唱起了心爱的上党梆子，借以壮胆。他后来说：“记得我小时候常常赶着毛驴去驮炭，手里拿着一根小鞭子，唱着地方戏，走呀走的，只要心里一想到白袍小将罗成，就什么也不怕，走起路来劲头大得多了。”可惜无形的罗成终究抵挡不住凛冽的寒风，赵树理正在发育的身体因此而落下了怕冷的根子，使他受了一辈子的折磨。

山西是中国的“煤炭之乡”，储量、产量，品种均居全国之首。而沁水煤田，又是山西最大的煤田，盛产成块的优质无烟煤。当时，山高路险、交通不便，全靠畜力运输，所以驮炭的毛驴每每成群结队，只要一头嘶鸣，立刻会群起呼应，万山回响，颇有种别致的景观。赵树理还发现：赶驴的人们总是身背鞭子，脖领内插一根二尺来长的老蒿杆烟袋。毛驴

上坡时，离得远的就取下鞭子甩得“拍，拍”响，离得近的就用鞭杆打，正在吸烟的就顺手用烟袋磕起驴来。赵树理饶有兴趣地观摩察看这一奇特的生活现象，顺口就念出了一段小快板：

小灰驴，上南坡，
驮垛重，只倒坡，
鞭杆打，烟袋磕，
尾巴撅得象刷屹垛 （洗锅碗用的刷子）

这大概是他最早的口头创作，他十分珍爱，一直为没能用进作品中去而惋惜。

但是，真所谓“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正当赵树理在千古未变的太行山道上赶毛驴、唱小曲的时候，一件为中国历史划下分界线的大事在北京爆发了。

一九一九年一月，参加巴黎和会的列强们，对于中国人民的正当要求，不予理睬。这种极端耻辱的侮慢，终于激怒了东亚睡狮。五月四日，北京学生怀着满腔义愤，痛打了卖国贼，火烧了赵家楼。六月三日，大上海的工商学界起而响应，罢工、罢课、罢市，向帝国主义发出了山崩海啸般的抗议。一场反帝爱国、独立自强的政治浪潮，开始席卷神州。

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为现代中国的历史揭开了悲壮的一页，也使赵树理的生活史出现了新篇章。如果没有伟大的“五四”运动，可以肯定，赵树理必将成为他父亲的好帮手。他将循着父亲的足迹，在山沟里默默无闻地走完人生

的旅程，老死户牖。他的业绩，也许是一个小有名气的“八音会”乐队指挥，也许在“小字辈”中扮演李有才的角色，当他长眠地下的时候，谁也不会觉得有替他树碑立传的必要。

这时，一些在外地求学的青年纷纷回来，要把“五四”精神传播到这个“山高皇帝远”的家乡。他们发表了《告沁水同胞书》，奉劝父老兄弟推行新文化、改造旧风俗。结果在一九二〇年，沁水县破天荒第一次出现了非私塾形式的洋学堂。其中的县立第二高等小学，建立在离尉迟村二十里的端氏镇。

不过，纵然是“五四”产物，是富国强民的新式学校，敢于问津的学生也寥寥无几，因为沁水的老百姓委实太穷了，这里“山不产货财，水不通舟楫，人鲜盖藏，强半糊口于外”，谁还有读书识字的奢望呢！然而惯于强迫的当局，一见百姓如此“缺乏爱国心”，不禁勃然大怒，竟以行政命令向各村下达学生指标，实现拉伕式的招生。经济地位尚属小康的赵树理家，自然成了义不容辞的强征对象。于是，赵树理的人生道路发生了又一波折。他恋恋不舍地向亲爱的放牛娃、可爱的小毛驴和衷心喜爱的“八音会”告别，重新背起了阔别三年的书包。

县立第二高小设在端氏镇的榼山寺，因而又称榼山高小。榼山寺是沁水县最古老最著名的庙宇，魏征、王恽、李贽、于谦、李梦阳、何景昭等历史名人都曾到此游历。它初建于北魏时期，经过一千多年不断的修葺，成为一座宏伟壮丽的建筑，寺内飞阁凭空，清泉映玉，周围万柏参霄、千松蔽日，尤当天高云淡、月明星稀之际，登高远眺，但见四处绿荫萧森，流水如带，千山万壑尽沾银辉，百里景物皆收眼底，仿佛梦

游广寒。人们把这“榼山夜月”誉为沁水群秀之最，自然也是学习的理想环境。如明代兵部尚书、抗清英烈张铨和明代散曲家常伦都曾在此读过书。

但是，赵树理的小学生活并不愉快。他的同学，乃是私塾同窗的扩大，那些养尊处优，颐指气使的小地主或小富翁，习惯于用钱财的多少来评定一个人的价值。于是赵树理又倒了霉，在他们的眼角里，他的寒酸衣食真是课余饭后开心取乐的绝妙谈资。在上学的第一天晚上，同村的两个富家子弟就指着他的破旧被褥挖苦道：

“把你的‘尿布’铺上吧！”

“哈哈哈哈！”屋里充满了轻薄的嘻笑声。

这种轻蔑的态度和污辱人格的嘲笑，深深地刺痛了赵树理的自尊心。然而，他是倔强的，绝不愿低三下四，曲意奉迎，去讨取这些纨绔子弟的欢心。他以沉默来对抗侮辱，从来不和他们一起玩耍，常常独自一人在教室里温习功课，决意在学习上压倒这帮混蛋。这使他的性格更加内向，孤独，并且产生了一种以自傲来掩盖的深刻的自卑感。

榼山高小虽为“五四”产物，可是执教的先生们却依然独尊儒术，在课堂上唾沫乱飞地大说四书五经，只不过没有罢黜百家，点缀式地设立了一门新课——算术。孔孟的书，赵树理在所有的学生中读得最早、最熟，那些刻板的背书、听书、习字、对课，他易如翻掌、全无难色，所以这门新设的算术课，对他更有吸引力，他用心钻研、脑子里装满了陌生的阿拉伯数字。可是在所有的教师中，最糟糕的正是这个教算术的老兄。他的数学知识停留在模模糊糊的水平上，讲解

起来颠三倒四，引起了学生对他的普遍不满。

有一天，校长为了平复公愤，别出心裁地举行了一次师生共同参加的数学竞赛，出了一些县级难题。不料成绩揭晓时，赵树理高中魁首，战胜了那个教“模糊”数学的先生。为此，学校奖给他一元大洋。他的身价也骤然倍增。那帮脑满肠肥、以奚落和嘲弄他为乐事的同学，现在不得不刮目相待了。

此后，这位文学家对数学的兴趣一直不废。解放战争时期，教育家程今吾在华北新华书店办了个新华初习学校，当时已蜚声文坛的赵树理，自告奋勇地担任了数学教师。在他悲惨的晚年，他还拜儿子为师，认真地用筷子和碗来研究圆和切线的关系。

赵树理上学一年之后，他的终身大事就被父母亲列入了议事日程。沁水风俗，流行早婚。男子到了十五岁便可娶亲。现在赵树理年已十六，而且学有成就，前程想必是一片光明，不替他张罗婚事便有点于心不安了，更何况他是三代单传的独苗。

有一天，赵和清为一个远道而来的姑娘算命。他问了生辰八字，默默地掐算了半天，忽然发现她的命相恰好与赵树理般配，将来定是大富大贵，白头偕老。结果，这位姑娘就成了赵树理的未婚妻。她是阳城县牛家岭人，名叫马素英，比赵树理大一岁。

一九二二年一月二十三日（旧历腊月二十六），十六岁的赵树理尊奉父母之命，与素不相识的马素英了却终身大事。他昏头昏脑，在一连串繁缛的礼节中任人摆布，被人们笑嘻嘻

地推到熊熊高燃的龙凤喜烛前，一拜，再拜，三拜……

十六岁，这是一个产生愿望的年龄，是少男瞧不起少女，自己寻找伙伴的年龄。对于这位比他大的妻子，赵树理后来回忆道，他总是“强摆出丈夫的架子，要她服从，”以“维持纲纪”。放假回家时，听到她诉说些日常生活之苦，不但不体恤她，反以为无关“圣贤之道”而充耳不闻。毫无疑问，这对小夫妻虽然尚未体会到无爱的包办婚姻的全部痛苦，却也因为话不投机，没有共同语言而形同路人了。

第二年，赵树理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榆山高小，因为成绩优异，立即被聘为本县野鹿村的初小教员。于是他迈出了走向社会的第一步。

关于上任时的情景，他后来作过这样的描写：

“时间已是七月，太阳的光，仍是那么热。

“一辆马车，拖着我，拖着满腹的心事离了家，向着离家五十里的村庄走。

“离家，本算不了什么事，这次，却觉得心头烦烦的。

“这么小的年纪，还应该做做学生的，现在却是做学生的老师。老师，这尊称太有点威严，威严又有什么法子，父亲的愁容，母亲的眼泪，不得不把自己的希望，自己的幻想，掩藏在心底里，开步走，走向社会去。

……

“赵先生，才来，好好，我们盼望你好久了呢！”

面前站着三个穿长衫的人，直觉的知道了，这就是这学校里的老师。但哪位是校长，哪位是教员，第一次见面，有点弄不清楚，然而态度上还得沉得稳稳的，看着大家都在微微的笑，自己

也笑了。

“哪位是李校长？”

眼光射在三位脸上找答复。

“是兄弟，是兄弟，伯生兄来函早已介绍过阁下了。”

不知因了什么，只这几句话，看着这位校长真有些俗气，想着这就是将来的同事，心里更觉沉重重的。因为是初次，表面上总得应酬几句。

“兄弟是刚跳出学校门子，以后还得请诸位指教。”

就这样，我成了这校的老师。

显而易见，这是一个优柔寡断而又很自负、很孤单的年轻人，对生活的认识肤浅得近于无知。这种人一旦涉世，不跌跟头、吃苦头才是怪事哩！这篇颇为简单的小型文学作品，略略写出了这个十七岁青年的内心世界。

一年后，赵树理被那位“真有些俗气”的校长解聘了。改任掌板村的初级小学教员。这里风景宜人，“石径穿云曲又斜，苍松影里见仙家。一溪流水清如玉，送出山中自落花。”但赵树理却又不得久居，只是可叹地重演了一回野鹿村的悲剧。一九二四年底，这里的校长请他收拾行李，回家务农去。

但这迈向社会的坎坷的第一步，对于赵树理倒是一个可喜的变故，经过这场波折，赵树理再次深切地感受到农民兄弟的可亲可爱可敬佩。

他第一次真正体会到，中国的农民是那么纯朴，那么厚道，那么富有同情心。当你走运的时候，他们倒是离得远远的，但当你跌了跤的时候，众人却都伸出了粗壮的手来帮扶你，他们没有皮面的笑容，没有伪装的尊严，没有阴冷的倾

轧，没有毒辣的手腕，在他们中间，你可以随心所欲，任意使用俏皮话，尽情高唱上党戏，既不必顾虑一句废话的后果，也不必揣摩每个上司的脸色。他们粗鲁然而亲切的取笑打闹，质朴然而炽热的抚慰鼓励，犹如甘美的清泉，滋润着他那受伤的心灵。

他还发现，中国的农民给予的时候是那么慷慨，取得的时候却又非常的谦恭。那些曾经无私地帮助过他的人，每当需要他动笔时，总是用恳求的眼光和语调同他相商，令人感动得真想掉眼泪。因此，年关之前替他们写借据、卖契、春联，谁家有了红白大事写写请柬、谢帖、庚帖、灵牌，全村祈雨当社头，赛神唱戏写通知，诸如此类，事无大小，只要力所能及，他都有求必应，心甘情愿地当了全村的义务秘书。他在农村优游自在，自我感觉良好，“有点象抛上岸的鱼，又回到水里，活啦！”他说。

对未来的作家而言，这里有非常重要的一面：义务秘书的工作使备受奴役和摧残的人民对他更加亲近，自觉地向他充分展示农村生活的内部情景，有助于他更深地了解和热爱中国农民的心灵。

这时，赵树理有了第一个儿子。这个孩子的出世，使两位老人喜出望外，因为他们抱孙孙的心已经存了整整的三年。按照惯例，赵和清对孙子的生辰八字进行了一番神机妙算，结果发现孩子五行不全，命中缺水，于是这位神仙立刻补救，给孙子起了个“太湖”的大名——意在借浩淼的太湖来充实他命中缺少的水，这就绰绰有余了。

不过，赵和清对于儿子学成之后仍旧回来跟土坷垃打交

道感到烦恼，更不赞成他给村里当什么义务秘书。父子俩为此经常发生争吵。

“你这样穷忙乎有甚出息？又不能赚钱！”父亲骂道。

“替乡亲们出点力嘛！这也是读书人应尽的义务。”

“你的老师们、同学们，哪个不比你会弄钱？你就不能去拉拉关系，托他们帮衬帮衬？”

“这种事我不干！”赵树理一口拒绝。

“唉，前世不知道和我结下了什么怨仇！早知道你这么下贱，我连一天书也不教你念！”

但是说归说，做归做。赵和清很清楚儿子的秉性，见缝不会钻，见利不忘义，宁可饿死也不愿低头哈腰去乞求权贵。所以他只好越俎代庖，四处为儿子寻找出路。最后，他打听到长治有一所师范学校，那里的学生享受官费待遇，每月可领到三元八角的膳费津贴，毕业后能稳坐高小教员的椅子，不必再为失业发愁。当然，这个每况愈下的家庭，要担负起六年学习生活的开支确实够呛。但是赵和清正如中国的大多数农民，倘若立定自己的愿望，不达目的就决不罢休，他决定咬紧牙关，独立支撑这六口之家，不顾血本，让赵树理再次去求学。

一九二五年夏，赵树理以第四名的成绩考取了山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于是他第一次走出了生他养他的沁水县，去见识更大的世面，去学习更深的知识，去接受革命的真理。他开始了人生道路上一个崭新的历程，虽然其出发点不过是想谋取一个微不足道的小教饭碗。

晋东南的首府长治城，居天下之脊，当河朔之喉，是太行山中第一大城。历史上曾有两位皇帝——唐明皇和宋徽宗——做过这里的行政长官，明朝的十二代沈王也就藩于此，所以城市的气度颇为不凡。四围有周长二十四里的城墙，那至今犹存的古之上党门，门楼与太行山的山顶齐高，门的左右各有碉楼一座，一题“风动”，一题“云驰”，极尽威严壮丽之致，城里街道宽阔，建筑宏伟，庙宇多半象故宫一样用黄琉璃瓦盖顶。赵树理求学的山西四师，就设在原先的潞安府文庙内。他被编入初师第十九班。

赵树理进校的情景给同学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事隔半个世纪，他的同班同学史纪言还记忆犹新。他写道：“第四师范学校学生的家庭虽然比不上第四中学学生的家庭富裕，但绝大多数仍是地主富农家庭。新生入校带被褥，家里人都用车马送到学校。但赵树理的行李家里没有送，是他自己用扁担挑到学校的。”[1] 当时，从沁水到长治要走一天多山路，他的“扁担精神”不能不使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们产生各种各样的惊讶之感。

进校不久，赵树理结识了一个比他高两级但却小两岁的同学。这个人后来在他的生活中起了极大的作用，他的名字叫王春。

王春，阳城县固隆村人。他和赵树理一样，也是出身于清贫的农村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个乡村教师，兼务农业；他从小也有神童之称，天赋聪明，过目不忘。正月里跟着大人

① 史纪言：《赵树理同志生平纪略》，载《汾水》1980年1月号。

进城，在街上走一趟，就能把县署和众多商店的春联一一背诵出来。他的外形也和赵树理仿佛，身材高大，浓眉阔嘴，举手投足间处处流露出农民的特征。但在学校里，他是公认的才子。他读书很多，博闻强记，思路敏捷，见解卓异，又能文善辩，可以连谈四个小时不住口。

他俩的天性也有许多相似之处，都富有幽默感，乐观开朗，爱说笑话，同时也都容易冲动，心直口快，知无不言。不过不同之处也相当明显。赵树理沉默谦逊，不善交际，遇事优柔寡断，而王春则是个刚毅的红脸大汉，目光尖锐，办事果断，并有很强的活动能力。

在他们建立友谊的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是王春。这不仅因为他意志比较坚强，目标比较坚定，是个进攻型的人物，还因为他比赵树理进步，觉悟高。他很早就接受了新思想，新文化，平素最爱读《饮冰室文集》、《独秀文存》等著作。而赵树理自幼生活在“神仙世界”里，养成了一整套迷信习惯。他把这种迷信观念带进学校，大做“敬惜字纸”的好事；天天把同学随地乱扔的废纸收集起来，找个僻静的地方一火焚之，然后拜上几拜，把灰撒到河里去。崇尚科学的王春看不惯这种可笑的举动，不免要冷嘲热讽，把骗人的迷信规矩骂个狗血喷头。这在虔诚的赵树理看来，自然是大逆不道，况且神灵无所不在，随意诽谤定遭天谴。因此，尽管他的个性多么谦和，他还是毫不犹豫地起来捍卫，同王春激烈争辩。可是真奇怪，每次争论都以他的无言对答而告终。

学校里的膳食极其糟糕，能开荤吃肉的日子屈指可数，所以每当吃肉时，同学们个个目光炯炯，敏捷而又准确地捕捉

盘子里几块薄得如纸的肉片。然而赵树理却每每按筷不动，从未介入过这种“肉搏战”。起先，大家还以为是他谦让，经过盘问，才知道并非谦让，而是怕犯咒语，不敢吃。真相大白后，同学们乐不可支，大发一笑。王春照例又给以无情的奚落，并竭力劝他抛弃这种愚不可及的习惯，因为它直接影响身体健康。于是两人又争得面红耳赤。当然，迷信终究敌不过科学，赵树理于二十一岁正式开斋，第一次尝到了肉味。

就在这样的争论中，他俩越争越亲近，赵树理对王春心悦诚服，头脑中根深蒂固的迷信思想动摇了，开始被“赛先生”取而代之。

长治四师和榆山高小一样，也是在“五四”春雨的滋润下突然冒出来的一枝新笋。表面上生气勃勃，内里却空虚得很。校长姚用中，虽曾去日本镀过金，却不知教育为何物，他取舍教师的标准，不在于学识的高低，而是取决于个人的亲疏，结果，师资配备不足，许多课程，如英语、历史、物理、化学，无人讲授，长期停课。其余如国文课也没有新式课本，赵树理记得，老师选的讲义，是《古文辞类纂》上选下来的古文。讲的方法是老师先讲，讲懂了就念，念着念着就作起文章来了。这种古已有之的教学内容和方法，自然无法满足新青年的需要。王春就把赵树理领到图书馆去自学。这个相当寒伧的图书馆却使赵树理大吃一惊，以为发现了新大陆。过去，在荒僻的山野乡间，除了四书五经，他所能接触到的文学书籍几乎全是荒诞不经的低级趣味的廉价小唱本。在榆山高小时，他模糊地知道，世界上一定还有别的书，有更出色的更吸引人的书。但他不知道怎样才能弄到手。他连做梦也

不曾想到还有图书馆之类的设施，其中有成百上千的书报杂志，可以随意翻看借阅。他断定，这图书馆是四师最大的财富了。

他惊喜地在一排排的书架中走过，目不暇接地浏览着各种新奇的书名和陌生的作者，双手不由自主地伸了过去。……

王春看着他怀里不断增加的图书，会心地笑了。

“借这么多，你能读完吗？”他说。

“读不完我就不走了！”

“你想一口吃一个胖子？还是让我来帮你选吧。”

王春接过他抱着不放的书，一面挑，一面介绍道：“这本《呐喊》你要先看。它是鲁迅先生写的，里面全是最优秀的新小说。第一篇《狂人日记》深刻极了，一针见血地揭示出中国四五千年的文明史实际上就是吃人的历史。还有那篇《阿Q正传》，你非看不可。它是写农民的，你刚读时会笑起来，但后来就笑不出来了，你会悲愤得掉眼泪的。……郁达夫的《沉沦》，你也应该看看。他描写青年人要求个性解放，盼望祖国强大的心理，非常细腻，非常真实。……杂志方面你就先看看《小说月报》和前几年的《新青年》吧。……”

王春那忠实的友谊，火热的精神，透辟的文学批评，对赵树理的茫然无知、空空如也的头脑，起了很好的启蒙作用。他默默地接过这些宝贵的精神食粮，内心充满了喜悦之情。从这一天起，他就和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尽管他将因此而要经受许多挫折、磨难、痛苦。

他永远感激王春，永远记得这一天。当他回顾这段生活时，他深情地说道：“王春是我第一个启蒙老师。我之所以能

接触到一点四书五经之外的东西，都是由他替我从图书馆选来的书，并扼要地把大意介绍给我，让我读的。”

赵树理如饥似渴地读着他所羡慕的书。早晨醒来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读书，白天上课的主要工作是读书，同学们游玩的时候，他也在读书。他的炕上摊满了借来的各种书报，睡觉时就推开书本，腾出个卧身之地。同学们开玩笑，声称赵树理已被书“埋葬了”，并且赠他一个外号“赵子曰”，出自老舍先生的长篇小说《赵子曰》。

这段时期，赵树理带着一个初学者的贪婪吞食着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从诗经、汉赋、唐诗、宋词、元曲、直到明清的章回体小说，屈原、杜甫、白居易、韩愈、柳宗元、苏轼、辛弃疾、陆游、关汉卿、王实甫、冯梦龙、罗贯中、吴承恩、施耐庵等著名文学家的作品，我都比较系统地学习过”。此外，还有易卜生、屠格涅夫等外国作家的作品。赵树理学得正是时候，因为一个人过早地读古典文学作品，他会由于不理解它们而产生反感，但当一个人到了二十岁年纪，已能体验到作品中所描写的情感时，他就会格外地珍爱它们。

不过赵树理最迷恋的作品，却是产生不久的新文学。当他在一九二五年来到长治的时候，新文学已经征服了中国。鲁迅的《呐喊》响彻了文坛，郭沫若的《女神》也已降临人世，文研会和创造社如并峙的双峰，上面长满了异花佳木。这位土生土长的乡巴佬，陶然沉醉在这个陌生的新鲜的但又似曾相识的世界里。凭借自己活跃的想象力，为书中人物的忧乐而忧乐，时而跃上狂喜的高峰，时而陷入失望的深渊。不久，他的心头就产生了一种强烈然而模糊的冲动，似乎是在向往

什么，憧憬什么，但时时又有一种没有出路的哀愁和莫明的惆怅袭来。接着，他的创作欲燃烧起来了。他往练习本里抄写诗歌，创作小说——其实是模仿而已。那篇以何化鲁的笔名发表于一九三四年的小说《到任的第一天》，从内容和风格来看，显然正是赵树理在这一时期的得意之作。他写道：

> 第一眼看到的是这村庄，一个很大的村庄，周围是些田，青葱的，村里一条流水，微微的风，扬着悠悠的波，在太阳下，泛着流金，蜿蜒的象一条长蛇，流着，流到很远的地方去。
>
> 从前，马上想起，在学校时的一幕，看着书，想着农村生活的优美，当时是羡慕着，能生活在农村该多么好，鉴赏自然的图画，欣赏自然的诗意，与坚实而纯朴的农民谈话，同时把自己也打入了农民的生活里；现在这已不是想象，已不是羡慕，是已经站在自然的怀里了。按理有点喜悦，但仍是烦烦地，老激不起一点兴趣，自己对自己，变得也有些不明了了。

这种欧化的文字句法，细腻的心理刻画，以及清丽的风景描写，令人油然想起郁达夫的文笔。诚然，对于身处偏僻地区的文学青年来说，除了模仿他读到的东西，是别无途径的。赵树理跟当时许多朦胧觉醒的青年，狂热地崇拜创造社，一洗过去在“八音会”里培养出来的审美情趣，成了一个艺术至上论者，他愿意为艺术而生，为艺术而死。

但是，赵树理在《到任的第一天》中所表现的感情是真挚的。他的确渴望“生活在农村”。他并没有忘乎所以，飘飘然脱离了生养他的农村大地，更不是忘恩负义之徒，穿上了长衫就反过来鄙夷短衣帮的父老兄弟。

当赵树理含着眼泪看完了祥林嫂的悲剧，闰土的变化，阿Q的大团圆结局时，他情不自禁地想起了尉迟村的“老字辈”和“小字辈”，想起了他们相似的遭遇和命运，他们同等的麻木和不觉悟。他想，要是让家乡的父老兄弟也听到鲁迅讲述的故事，使他们从中看清自己的面影，自己的不幸，自己的愚昧，他们必定会和自己一样觉悟起来，为改变自己的命运而抗争。一九二六年的暑假，赵树理带着这样的理想和一大包书籍，兴冲冲回到家乡，准备实行他拯救农民的思想革命。

他先把一本《生理卫生》送给父亲看，打算用科学来革“二诸葛”的迷信命。不料老汉看完后，竟然把书扔在一边，对它下了个可怕的评语：“这书可以不用念，屁大点病都是延医诊治，或送医院，还‘卫’得个什么‘生’？”

赵树理见事不妙，转而向信奉清茶教的舅舅进攻，鼓动他改邪归正，退出这个荒诞教派。谁知舅舅也是出口不逊，一句话就使他语塞了。

“清茶教是劝人行善的，不管怎么说，我做好事总没错吧？”舅舅说。

赵树理这时还不会用阶级观点来分辨善恶之行及其欺骗性，他找不出有力的证据来说服舅舅，于是愚昧很快就打败了科学。

宣传新文学，也同样失败了。赵树理遇到了一个明摆着的困难：农民目不识丁，只有用讲故事的形式才能把新文学的内容介绍给大家。他知道，父亲是村里颇有声望的说书能手，有一肚子故事，在雨天冬夜，常被一大帮人围着，听他

道古论今，说鬼，说狐，说狼，说蛇……因此，他决定把小说念给父亲听，然后以点带面，一传十，十传百，新文学就能在农村广为传播了。可是，当他手捧《阿Q 正传》，刚念到阿Q 与小D 在钱府的照壁前展开“龙虎斗”，父亲就失去了恭听的兴趣。

“得了！得了！收起你那一套吧。我听不懂！”和清老汉摆摆手，把旱烟袋往腰里一别，扛上锄头下地去了，临走时顺手揣了一本《秦雪梅吊孝》。

一部描写农民生活的举世闻名的小说，居然在中国的农村中找不到知音，这情形大出赵树理的预料。他感到丧气，更感到纳闷：为什么农民不喜欢描写他们，替他们说话的新文学呢？

第三章 抉 择

赵树理在长治求学的阶段，正是山西的政治思想空前活跃，共产党开始积极活动的时期。

在所有的现代军阀中，也许要数阎锡山最有资格荣获“土皇帝”的称号了。他在辛亥革命中投机得手，一跃成为大都督。自此以后，他便觉得山西的一切都应姓阎。他推行一种严厉的家长制，不准任何外省人染指，也不许任何山西人有越轨的言行。他把学校视为自由思想的温床。为了净化以此为中心的知识界，他在“五四”前夕下令成立了一个名为“洗心社”的特别组织，专门用来对抗洪水猛兽般的新思想、新文化。其方法是强令学生每周举行“自省”集会；先作长达十分钟的忏悔或静默，然后由洗心社派来的“讲长”大谈孔孟尊君之道，或王阳明良能良知学说以清洗学生的心灵。为了知己知彼，这个武人还不辞辛劳、潜心钻研外来的新文化新思想，结果，他发现两千多年前的孔孟“最崇人道主义。如‘仁者爱人也’一语，即足以代表东亚先圣先哲对于人生之观念。”因此，他认为新思想大可不必进入山西。

但是历史证明，愈想把一切抒发思想见解的自由剥夺掉的地方，愈会有大胆的思想冒出来。一九二〇年，山西出现

了第一个共产主义者—— 高君宇。他是山西静乐县人，北京大学学生领袖、“五四”运动的先锋人物，中国共产党早期著名的青年活动家。这一年，他从北京来到太原，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两年之后，又回太原建立了山西省第一个党支部，从而在风雨如磐的故园点燃了革命的星星之火。可惜他的命运真如他在《自题小像》中所言：“我是宝剑，我是火花，我愿生如闪电之闪亮，我愿死如彗星之迅忽。”一九二五年，这位革命先驱未及“而立之年”就遽然去世了。他除了为党的创建和国共合作出过大力外，他与女作家石评梅生死不渝的爱情也至今传为佳话。他还是周恩来与邓颖超结成伉丽的“红娘”哩！

山西省党组织领导的第一次重大斗争，是“反房税运动。”一九二五年春，阎锡山生财有方，异想天开地命令各县强征房税：乡村中一切屋舍，无论窑洞、马棚、厕所，凡有个房子模样的，一律由县长逐户逐间评定登记，房主必须在三个月内交纳契税，逾期加成处罚。此令一出，山西全境鸡犬不宁，天怨人怒。共产党员傅懋功（即彭真）等人领导省学联，起而反抗。五月十一日，数千学生为民请命，在督军公署前同声高呼：“废除恶税！”呐喊之声，几乎全城撼动。土皇帝大惊失色，当场屈服，宣布取消房税征收。第二天还假惺惺地发布了“宽恕令”与“罪己令”。

紧接着，从上海传来了“五卅”惨案的噩耗。这使山西人民更为震惊。“青年的柔秀的颜色退隐了，换上了壮士的北地人的苍劲。他们的眼睛冒得出焚烧一切的火，吻紧的嘴唇里藏着咬得死生物的牙齿，鼻头不怕闻血腥与死人的尸臭，耳

朵不怕听火炮与猛兽的咆哮，而皮肤简直是百炼的铁甲。”在傅懋功、张叔平纪廷梓等共产党人的领导下，太原爆发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反帝示威大游行。罢工、罢课、罢市、抗议、演讲、募捐，街头巷尾，到处回荡着激昂的反帝呼声。

斗争的怒潮越过崇山峻岭，使闭塞的长治古城也沸腾起来了。这时，有个名叫周玉林的共产党员，奉命前来长治开展工作。他把《铁血》、《雪耻》、《沪案演讲录》等刊物送到四中和四师的学生手中，组织他们上街演讲，散发传单，并秘密地发展了长治的第一批共产党员，其中有赵树理的好友王春和常文郁。

赵树理进校后，除了与王春结成莫逆之交外，志趣相投的还有同期的常文郁、史纪言、杨蕉圃和下一期的王中青等同学。他们交换读物，切磋思想。上帝、真理、前途、人类和文学艺术是他们最感兴趣的话题，常常争论得面红耳赤，两眼迸射出热情的光芒。后来他们都投身革命事业了。

一九二六年秋，赵树理带着回乡革命失败的苦恼返回学校，继续探求救国救民的道路。那时，成立不久的国民党长治市党部正在公开宣传孙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义，他对“平均地权”，实行耕者有其田的民生主义颇感兴趣，便和史纪言他们一起成了国民党员。后来，王春暗地塞给他一本布哈林写的小册子《共产主义ABC》，嘱他仔细研究，而且要小心谨慎，不得外传。他读完后，觉得共产主义比三民主义更有道理，于是又由王春和常文郁介绍，约莫在一九二七年的春天，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不过，这仅仅表明赵树理在组织上入党而已，其实，他的思想正处于空前混乱、空前动荡的境地，远非百分之百地布尔什维克。

过去，他是个不折不扣的乡下读书人，不但坚信“举头三尺有神灵”，还是个虔诚的孔孟之徒。高小毕业那年，他买到了一本《四书白话新解》。作者是个名叫江希张的小孩子，人称“江神童”。他为了对抗“五四”新思潮而著此书，所以颇得阎锡山的赏识，销路甚畅。赵树理后来说：“其思想是儒佛相混的，这恰好合乎我从祖父那里接受来的那一套，于是视为神圣之言，每日早起，向着书面上的小孩子照片稽首为礼，然后正襟危坐来读，并且照他在《大学》一书中的指示，结合着那些道理来反省自己。”所谓《大学》中的指示，乃是“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云云。赵树理全盘接受，用心钻研达三年之久，满以为“得了这套资本，就能治国平天下”。

为了清除这种“江神童思想”，王春真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才用“德先生”和“赛先生”取代了他头脑中至高无上的鬼神和孔孟。可是面对汹涌而来的新思潮，赵树理又好比刘姥姥走进了大观园，左顾右盼，目不暇接，形形色色的主义似乎都闪耀着真理的光芒，根本分不清各种学说的真实价值。

固然，他在这时弄清了一个道理，就是父祖辈要他出来上学的意图。“他们要我‘出’是要我从受苦受难的劳动人民中走出来。要我‘上’是要我向造苦造难的压迫者那方面去

入伙。”因而不想继续完成父辈所赋予的任务，参加了共产党组织。但对共产主义的认识，委实也仅仅止于ABC，在二十一岁时，他还不曾清楚地决定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或者希望自己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物——一个教育家，文学家还是政治家。他意识到自己内心的革命要求，可是确不定应朝哪个方向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他说：“在这一阶段，我的思想虽然解放了些，但旧的体系才垮，新的体系未形成，主观上虽然抱有救国救民之愿，实际上没有一个明确的路线，其指导行动者有三个比较固定的概念：⑴ 教育救国（陶行知信徒），⑵ 共产主义革命，⑶ 为艺术而生，为艺术而死（艺术至上）。并且觉得此三者可以随时选择，互不冲突，只要在一方面有所建树，都足以安身立命。”

这时，北伐战争正节节胜利，国民革命眼看成功。惯于投机的阎锡山自然不愿错失良机。他摇身一变，自封为“北方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下令悬挂青天白日旗。表面上的大好形势鼓舞着这些血气方刚的进步学生，于是长治四师的“驱姚”学潮应运而生了。

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一日，长治城的大街上突然出现了一张《第四师校全体学生驱逐腐败校长姚用中宣言》。宣言写道：

> 姚用中，本一善于括钱之流氓，蝇营狗苟，获得第四师范校长之职。自其登台以来，处处以金钱为目的，压制为手段。学生为彼所恶，即以莫须有的“品学兼劣”四字通信开除。新生不知学校章程，津贴即任意扣除。各门功课，并无确定教员，任意敷

衍。教员既少，程度又浅，各班大半皆合堂上课，名曰合并教室。各种设备及学生一切经济待遇，皆多方减削，务期其囊满橐充而后已。且其为人又甚卑鄙。前有学生投身国民党者，伊竟开除其名额，今见党势扩张，伊自身又欲加入！以此无耻之人，岂可为师范生之师范？本校全体学生，所以同申愤慨，将姚用中驱逐出校外，誓不让此误青年、误学生之蟊贼存身于教育界。恐各界未能周知，谨此宣言。

山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全体学生印

被驱赶的校长姚用中，出身于沁源县的一个官僚地主家庭，倒是个阎锡山的好学生。他也去日本镀过金，也用家长式独裁手法治校，视学校为私产，一切校务、教务、财务，均得唯他之命是从，而且也是爱钱如命，不择手段地聚敛财富。他在筹建科学馆时，从中贪污，大饱私囊，把它盖成了一座空房子。同学们怒不可遏，动手查帐，结果，发现他在四年中竟贪污了四万八千多块大洋，气得他们咬牙切齿，怒发冲冠。当时，北京女师大学生在鲁迅的支持下，奋勇赶走反动校长杨荫榆的壮举，已在学界传为美谈。于是他们决议效法，把这个只知搜刮金钱、压迫学生的姚用中逐出校门。

这次学潮的领导人，就是共产党人常文郁、王春和赵树理。

上党地区的老百姓，素以出格的安分守己而闻名。所以这张史无前例的宣言，犹如一石击破水底天，震惊了全城的居民。在他们看来，驱逐官府任命的校长，真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一时间，城里流言四起，非议纷纷，社会舆论大不利

于学生，校内也人心浮动，一片混乱。

但是，险恶的局势没能吓倒年轻的共产党员，他们组织同学全面清算姚用中的劣迹，然后集中意见，再由王春执笔，起草了一份洋洋洒洒数千言的“第二次宣言”，历数姚用中十大罪状，略谓：

一、师范每月津贴，原为补助学生膳费缺乏起见。姚用中竟将此种款项任意扣除。新学制各班待遇，更不平等。多寡任意，毫无确数，每年所发，尚不及七、八个月之谱。……其搪塞狂素如是。

二、其开除学生，全不以过犯为根据，只凭一己好恶。果其所恶，虽无过亦必多方罗织。然既无确实罪状，故未能悬牌公布，乃异想天开，发明“通信开除”之法，其形式如下；“查某学生品学兼劣，着即开除名额。”……其私心自专如是。

三、所请教员，不惟程度多低，而且数目很少。全校新旧九班学生，教员不及二十之谱，各门功课如国文、英语、历史、理化等，竟有缺席经年，屡次请求视若罔闻者。……其敢于节省学款，藉充己囊，不恤误尽青年以肥己私，又如是。

四、每年所报修理学生斋舍费，不下数千元。而实际学生所居至为鄙陋，冬无火炉，夏无门障，所铺苇席，三年不换，破敝腐烂，不堪寝处。……其残处学生蒙蔽上峰，敢于翻手云雨，又如是。

五、自其任事以来，非在其本家，即寄居煤窑，（为其所吞学校公款设立之公司，在高平）与学生会面之时甚少，已为有负厥职，及偶一涉足校内，则厉色虎步，骇人观瞻。师生之间如同寇仇。

六、其每年所招新生，并不依其程度高低为准，专凭个人意见，非亲之子，即友之孙，所录清白学生，大约不及半数。每遇招考，学纯人正之教员皆摈在场外，将无耻之流氓式的教员，悉数收人场内，美其名曰监场，实际则与投考学生传递抱稿。……

七、其为人既卑琐不足道，故其居常所计较，专在男女饮食之间。其家小搬来时，寄居本校后院，伊乃将前后相通之门，用半金重铁锁隔断，且大书门上曰："学生不得到此。"无如后院非彼一家，各教员寄居其间，尚有多人，既内外隔绝，以致学生有所问难，无从见面。……

八、其生平所志，专在金钱。故虽微纤之资，亦必尽量搜括。学生手工、图画、作文、习字，算学演草等所用纸张，一律均归自备。校内隙地所长花木，亦一概卖为银元，携归私宅。……其视金钱为命脉，不恤自污于贾竖，又如是。

九、本校向有体育会，由全体学生集资办理，已属非是。而校内所应设之天桥浪桥、铁杆球门，亦一概付缺。操场荒芜连年，并不芟刈。蓬蒿没人，有同荆榛。致使学生运动无地，体格遂孱，终日伏案，有同病夫。……

十、学生灶上所用之器具，向例皆归校内发给。乃姚用中一概不发，强迫学生自备。饮食为人生之本，对伙食既如此，而茶炉则又刻减备至。本校向有茶炉三个，伊乃归并为一。茶夫则又减八名为三名，以致学生时患干渴，无从乞饮。……

十一、彼因要名上峰起见，乃设高级，增班次，然实际则学生之数，大减于昔。

宣言最后写道："如右所述，不惟为本校全体学生所不能忍受，即我各界同胞，当亦不胜发指。庆父不除，鲁难未已。不逐姚用中，第四师校无进步之一日。所以本校全体学生，衔苦忍痛，不得已而为最后之举，于本月二十一日，经全体会议议决，将卑劣无耻之校长姚用中驱逐出校，必不让其再作教育界之蟊贼，冒充买办式之校长，以流毒于上党，贻误了学事。各界同胞，其共鉴之。"

第二次宣言义正辞严，城内舆论为之一变，转而倾向四师学生。姚用中好象也慑于宣言的威力销声匿迹了。这群勇敢然而天真的年轻人信以为天下就此太平，无须再打落水狗了，高高兴兴地由自己维持着开始复课。结果，他们为自己的疏忽大意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十月二十八日午夜，天寒地冻，月黑风紧，四师院内万籁俱寂，唯有同学们的鼾声此起彼伏。在梦中，大家都不曾想到，他们昔日的校长还会干偷营劫寨的勾当，这时正率领着二百多个雇来的流氓和几个铁杆爪牙悄悄地包围了学校。

"大家听着，"这个堂堂留学生说道，"这次行动的目的我再说一遍，第一，要赶走办事人员，第二，要夺回四师大印，第三，给我使劲地打、狠狠地砸，把学校的一切都毁掉！事成之后我重重有赏！"

接着，他一声令下，歹徒们便手执枪刀、马鞭、木棍、麻绳、火筒等凶器，越墙而入，大打出手。学生会办公处首当其冲，门窗玻璃，飞舞碎落，睡在里面的同学惨遭毒打，被折磨得满地乱滚，锐声痛号。

住在宿舍的同学听到响动，赶紧起来援救。但匪徒们已

把住通道，一边挥舞凶器，一边狂喊大叫："不要命的就上来！"有位勇力过人的曹姓同学，奋不顾身，冲上去抢夺武器，不幸寡不敌众，暴徒们将他打倒在地，砍去手指。随即一声呼啸，冲进斋舍逢人就打，见物便砸，一直闹到东方破晓才扬长而去。经检点，受轻伤者不计其数，有七、八个同学已被打得不省人事。

殷红的鲜血、青肿的伤痕，反而坚定了同学们的斗志。常文郁当机立断，一面派赵树理马上向县署、警察局、陆军五十三团报案，请他们前来验伤、检查现场；一面让王春发表第三次宣言，把姚用中的罪行公之于世，呼吁各界同胞大力支持、协助捉拿行凶流氓，并悬出赏格：捕获姚用中送到者赏大洋三十元。随后，他亲率同学，前往姚用中经常出没的五胜木厂搜查，结果，搜出姚用中的老母、妻子、儿媳和闺女，便把她们作为逃犯人质，押送县署监狱。

这场风波提高了大家的警惕性。十一月四日那天，一伙同学到西街的翰墨林刻字局闲坐，无意中忽见一章，上面刻着"山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关防"的字样。这一发现非同小可，大家急忙追问掌柜牛瑞福："这是谁叫你刻的？私刻关防是犯法的！"

"这、这、这……我、我、我……"牛掌柜平时伶牙俐齿，这会儿却支支吾吾，不知所云了。

同学们自然不肯善罢干休，即刻报告商会，喊来警察，将牛掌柜和私刻的公章一同带到县署。第二天，牛掌柜不得不供认：伪山西第四师范关防，系体操教师史士俊托刻，代价是六十元大洋。史士俊是姚用中的得力走狗，曾参与捣毁校

园殴打学生的暴行。他这次私刻公章，无疑也是秉承主子的旨意。于是，四师学生又发表了“姚用中指使翰墨林私刻关防宣言。”结尾写道：“如此毒物不斩何待。万祈大家留意呀！！！！不能置姚用中于死地，我们上党人的血气何在???精神何在??? 人格何在???”

为了做到仁至义尽，赵树理以校学生会的名义，给姚用中本人写了两封信。十一月四日，他致函姚用中：

“敬启者，我校自君接办以来，已历四年，一切校务，进退兴废，谅君皆悉，勿待生等叨陈。唯是生等此次一时自奋，当仁不让于师，遂义成山河，赶君于校外，以致君饭碗碎落、神经颠乱，老母悲号，少妇泣血，儿妻弱女，破口骂怨。若此剧变，生等初未能料其至于斯也。而君犹不少豺虎之心，奋然为山贼啸聚之事，出之以暴，毁之也惨。君所寝馈四年之学校，已成齑粉，所捏空冒报之科学馆，已成粪土。所不共戴天之恶学生已成残废。而孰意所衾枕燕私之娇妻美妾，亦成凶犯家孥坐系黑狱耶。此固君所不及料，而旁观者早知之。顾君乃昏愚至是。当风潮之初起，生等雅不欲为过甚之举，以为君捆载而行，团团富翁，亦足以休矣。曾不料君之贪婪无底，恋栈心切，竟八日之久不肯出城。雇买流氓，自干下流。而后知君之果不足责数、难以理喻也。孟子曰：“人之与禽兽，相差几希。”几希之间，君竟逾之，人而禽兽，君自取焉，于生等何责，于上党人士又何责。生等悬赏购拿，上党各界行文名捕，赫然四师校长，一蹶而至于是。匪首之名，谅不怨人加之也。前者有值君于途者，闻君多所开示，念切校务，自诩为良心之主张。此言果出本心与否，生等固不得而知。然君果有良心者，当知饭碗事小，母妻事大。现老小系狱，粮食不继，寡

母弱媳，势成待死，君总无他爱，岂异其老年太婆于囚人之间，任蹂践也。为君计者，宜勿计生死，出面讨人，或勿惜多金，买人劫取。若能如此，君或尚可亲面见人，此亦生等良心之主张，君甚熟计之。又生等有欲正告君者，二十八夜之事，在君一口咬死任裕祖，然火把之下，众目共睹，持洋刀先登者，非君而谁？呼喊而上者非贾维。史士俊、宋轼而谁？任裕祖为君而死，死固其所，而君与贾贼史匪尚欲生耶？为今之计，有二途：一则杀人成仁，一死以谢天下，尚不失敢作敢应烈男子。一则走死万里，终触天网，亦一死耳。呜呼！因君一人，学校何辜，学生何辜，寡母弱媳又何辜。而乃毁伤残废，逃亡系狱，惨变若此。生等初不知君尚有所谓良心主张也。今者，幸调处有人，校务将渐复原状。生等破釜沉舟，辜获首全。而大祸之来，反及君身。生等念四年师生之谊，敬尽忠告。君若尚有他图，固属难知，生等浅薄，为君谋者，不过若是，君其自裁焉。此颂跑安！”

十一月六日，私刻公章案发后，赵树理又写了一信。

“校长姚君左右：前上一函，谅已阅悉。兹再启者，君作事但计功利。初不问及将来，故每有施反，动经蹶折，此在吾侪莫不尽悉。即君自审，当亦自承不误。然此非君长处，实足为高明累也。生等年浅识短，对神奸巨蠹所阴谋，贼徒狗跑所走报，实在不能略明一二，然区区小事，办颇有所获，谨再为君布之。自十一月二十八日夜来学校被君捣毁后，生等以为君计穷竭。此签孤注一掷，最后之举动，方谓从此老贼逃亡，可以渐息惊悸。孰意十一月四日，又伪关防之发现?!此案一出，骇人听闻，谁其料师范校长姚先生而能出此者?!君胆大如牛，刚愎自用，一往无前，

岂意破露。卒之翰墨林几遭封锁，牛瑞福坐系县狱，史士俊通省缉拿！而君亦负重大责任，岌岌有身家性命之虞！一旦史贼遭刑，实供君名，则一波方兴，一波继起。匪首之案未获，伪印之案又破。至此自艾，尚有及耶？而后知君果非能者，而君亦当知生等所品评者之不谬也。且君所汲汲然阴谋奔走，在生等视之，亦殊觉其不必。君果有此神智，何不防患机先免遭赶逐。既逐矣，何不携带关防行使自便，安用土匪为？安用私铸为？不此之图，而贸然为暴徒窃贼之举，用巧成拙，不特生等为君惜，即旁观者亦为君惜。稍有智虑者，且怜君之愚而好自用也。今生等念君一人作祟，合家无辜，太母病重，将濒旦夕，特向各处商酌，允其回籍。若下令其去，君必不来取，一旦死亡，不肖子游无定方，谁衣斩衰者？惟君宜清夜扪心，自维生平，诺所行事，安对天地？牛瑞福、史士俊杀身无论矣。乃使老年太婆备受囚人之苦！合家上下，皆成囚犯！对社会、对学校，死有余辜。对祖宗亡父，亦不知何面目见之于地下？呜呼姚君：天下之人谁不欲食君之肉而寝其皮？乃犹不肯即死，靦面见人，人之无耻，此其极矣！！！宜早自裁夺，或别出他途，幸勿徒劳也。此颂死安！！！”①

① 关于“驱姚宣言”的作者，历来众说纷纭有说王春执笔的，也有说王春和赵树理共同起草的，还有说王春起草、赵树理修改的。现在幸已发现《山西省立第四师范同学录》，不但使我们了解到“驱姚运动”的全部真相，并且可以断定，宣言应出自王春的手笔，那种剑拔弩张、锋芒毕露的气势，正反映了他的个性。而这两封信的笔调，一望而知，不同于“驱姚宣言”，其中隐约可见赵树理特有的明朗隽永时有幽默感的风格，虽然显得丰富华丽，不象他后来那么简练明净，但赵树理说过：“修辞固然好，但不要单纯以辞取胜。有时以排山倒海之势一下子写下去，句子长，气焰足，固然好，但必须落实（落实到内容）。过去我也喜欢这样写，后来年纪大了，渐渐的落实了。”所以，我认为这两封信是赵树理的作品，故加以全文引用。

虽说官官相护，自古皆然，但姚用中公然触犯刑法，罪证确凿，上峰也无从包庇。十一月十二日，省教育厅终于下令，撤掉姚用中校长职务，另委一个范姓校长前来接任。

十天以后，长治四师的全体师生在礼堂热烈欢迎新校长。在会上，欣喜万分的赵树理夸大其词地说道："我们的新校长，给我们带来三种幸福：一、当姚用中率领土匪来打我们同学之后，以至于昨日下午，是我们的恐怖时期。在这时期中，我们同学每夜不能安心！各持武器随处防守，虽然想着土匪不至于再来，毕竟不敢自信。昨晚我们的新校长才来，我们居然就能大胆睡了一夜，并不觉得恐怖，这是我们已得到的幸福！也是将来大幸福的象征。二，我们的新校长是在教育厅办过公的，将来一定能用全省教育界之长，来把我们的学校改良成我们梦想不到的乐园。三，我们的新校长是在中国文化中心点的北大毕业，将来必能把最新的文化传达到我们上党来，开上党文化之先河……这样的幸福，是很值得欢迎的，并且是我们每日渴望的。"

为了纪念这次团结奋战的学潮，他们编印了《山西省第四师范同学录》。序言写道："我们这本同学录和别人的同学录大有区别。他们的同学录是为的联络感情。我们的同学录，却是由联络而团结，而共同奋斗，以致得到最后目的纪念品。……我们同学是有精神、有血性的团结，是有主张，有能力的奋斗。我们的同学录是歌声哭声的结晶品，是成功失败的纪念品，是终身的伤痕，是一世之金鉴，是我们三百青年献身革命事业，为公道，为同胞肉搏奋斗的出发点。……"并在序言前赫然大书：

牺牲是家常便饭
流血为无上光荣

赵树理在学校里，原先是个不很起眼的人物。平时沉默寡言、埋头看书，象农村的老夫子。留给同学的突出印象，一是说话幽默，二是喜欢唱戏，但在这场斗争中，同学们终于受到他那清瘦文静的身子里也满蕴着年轻人所特有的充沛的活力和奔放的激情。他缺少组织能力和应变能力，遭到暴徒袭击时惊慌失措，但在宣传方面却显示出卓异的才能。他跟王春一起编印了《同学录》后，意犹未足，开始构思一篇题为《双生子》的小说，“想写弟兄两个，一个找个人出路——爬，撞；一个找到社会出路”。

可是，变幻的政治风云使这篇小说流产了。

也许是群山环抱的长治委实太高峻、太闭塞了，外面的消息总是姗姗来迟。就在赵树理和他的战友们高呼着“打倒帝国主义！解放中华民族！”的北伐口号驱逐姚用中的时候，滚滚的乌云早已遮住了祖国上空。在“四·一二”、“七·一五”这些罪恶的日子里，蒋介石挥舞屠刀，腰斩北伐，革命志士的头颅纷纷落地，鲜血染红了滚滚江水……随后，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通令全国，实行“清党”。他们诬蔑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全是篡窃国民党权，破坏国民革命，扰乱北伐后方的“跨党分子”，务要清除尽净，斩光杀绝。对于这件事，鲁迅曾这样告诉一位外国友人：“国民党把有为的青年推进了陷阱。最初他们说，共产党是火车头，国民党是列车；由于

共产党带着国民党，革命才会成功。还说共产党是革命的恩人，要学生们一起在鲍罗廷的面前行最敬礼。所以青年们都很感动，当了共产党。而现在又突然因为是共产党的缘故，把他们统统杀掉了。……打那以后，对于骗人做屠杀材料的国民党，我怎么也感到厌恶，总是觉得可恨。”①

阎锡山一向对国民党怀有成见，但这回却是闻风而动，立即成立清党委员会和党务改组委员会。他老谋深算，指令党羽：“今日的清党、清其人，尤须清其法”，要把农工政策一齐铲除。腥风血雨，顿时笼罩山西。

一九二八年春，这白色恐怖终于延及长治。省立四中的党组织首先遭到破坏，接着，已经离校的常文郁在家里被捕了。这对赵树理和王春来说，无疑是个危险的信号，因为他们一起领导了驱姚学潮，是校内引人注目的人物。幸亏有个名叫王璧的老师，是王春的同乡，平时很赏识王春的才华。他挺身而出，帮助他俩略为化装，逃离了长治。

经过几天的日夜奔波，赵树理和王春钻进了人迹罕至的安泽县境。

这对难兄难弟饥肠辘辘，有家难归，面临着生活的严峻考验。周围连亘的群山，好象一堵雄伟的城墙，保障着他俩的安全。但群山分外荒凉，一层红土掩不住那青色的斑石，连一棵小树也长不起来，光秃秃的山峰冷漠地兀立着，给人一种异样的刺激，似乎又回到了萧杀的冬天。然而，当灿烂的阳光冲破云围，普照大地的时候，群山却立刻显示出无限的

① 增田涉：《鲁迅传》，载《鲁迅研究资料》第二辑。

生机，变得春意盎然了。去年冬天被无数的羊群啃得精光的野草，这时正勇敢地顶破地皮钻了出来，在阳光下，泛出娇嫩的黄绿色。山下一垄垄碧绿的麦苗，在茫茫一片褐色的大地中自由自在地随风起伏。

山里迟来的春天气息，感染了这两个神情沮丧的革命青年。有点浪漫气质的王春，向着苍天大喊道：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我们的事业一定会胜利的”！

“是啊！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们要设法度过这难关”。比较现实的赵树理说。

他们振作起来，靠着赵树理从爷爷和父亲那里学来的一点中医知识，汤头歌诀，一路行医，开始了艰苦的流浪生活。这地方山高皇帝远，荒漠了几千年，沿途真是赵树理形容的那样：

抬起头只见那山高树小，
往下看又觉得人在山腰。
望远处只见那荆棘满道，
窑门口净是些烂草蓬蒿。
红日落西风起豺狼嚎叫，
崖头上落下了几只老雕。
山坡上灰溜溜一片烂草，
草后边黑洞洞几眼破窑。
看到此不由我伤心泪掉，
这一个鬼地方实在糟糕。

这样过了两月，他们终究放心不下山外的形势，商定由王春回去打听消息，一个月后在王春家会面。

王春走后，赵树理索兴自称“杨大夫”，采来草药炼制成一种健胃利脾，宽胸化实的丸药，身背药袋，手摇串铃，在大山深沟里四处转悠，俨然一个地道的江湖郎中。他后来在《打卦歌》中用浪漫主义的笔调描写过当时的生活：

少年挥剑千钧臂，
方今提得乞儿篮。
回忆当年诸父老，
授我家传千灵膏。
采药西登王屋巅，
归炼灵膏向市廛，
技击招将顾主至，
自是方得市米钱。

不过他的医道确实高明，当地有种常见的妇女病，被他手到病治，因而名声大噪。在他晚年，有个青年因为读书太多，得了目疾，看东西老是变形，特别是夜间醒来时，一根木棍就以为是一个人站在那儿，到处找医生看不好，但吃了赵树理开的三付中药，眼睛就再也不花了。

七月，赵树理来到阳城县固隆村王春的家里，恰好王春也从长治回来了。他告诉赵树理，常文郁已经牺牲，党组织也遭到破坏，而那个新任校长，实乃姚用中的一丘之貉，正在千方百计清除政治上不可靠的学生。他全赖王璧老师从中

翰旋，校方才勉强同意补考毕业，但对赵树理，则以久假不归为借口，把他除名了。

二十二岁的赵树理，就此永远结束了美好的学生时代，也暂时失去了同党的联系。他又一次被推到人生的十字路口，不知所向。今后怎么办呢？这急转直下的局势使年轻的赵树理感到迷惘，也感到疲倦。他不想再扮演“杨大夫”的角色，决定回家休息一段时间，或者干脆重入那“小字辈”的队伍。

归途中，赵树理突遇暴雨，浑身湿透，病倒在西山的大庙里。多亏慈悲为怀的和尚悉心护理才慢慢地好起来。他感激不尽，差点儿想身入空门了。结果是跟和尚学了一阵庙堂音乐……

九月，这个身心交瘁的流浪者回到了尉迟村。可是，等待着他的不是父母的安慰，妻子的温存，儿子绕膝的乐趣，而是更多更大的不幸。

在尉迟村，赵树理算是一个知名人士。按照当时流行的说法，高小毕业算是童生，中学毕业算是秀才，高等学校毕业算是举人，京师大学堂毕业则是进士。所以当他考取长治师范后，在一般人的眼里就是秀才一级的文化人了。乡亲们刮目相待，曾不着边际地设想过他的前程，常在外村人面前引以为荣。可是现在，他却丢掉学业，一无所成地回了家，看样子也得捏住锄把子，从地里搂扒吃喝啦。农民的狭隘性和对官府的惧怕，使他们产生了一种说不清楚的不舒服，开始交头接耳，切切嚓嚓：

“看这得意，念了一阵子书做了个什么？”

“命中没有莫强求！”

“那孩子落魄了！”

一心指望他学优而仕的和清老汉更是恼怒交加，指着他的鼻子骂道：“你还有脸进这个门？我把屎都努出来了供你读书，你教了两年书，叫人家撤职了。我盼你成龙成虎，赌气又借了十五块钱让你上师范。可你在学校里又不好好念书，闹什么革命，叫人家撵跑了。成天说共产，谁的东西就白白给你？”一气之下，老汉病倒了。

对于父亲的责备，赵树理一笑置之，但是群众的议论却使他大为震惊，时隔三十年还耿耿于怀。他后来说：“我当时听到这些讽言冷语，真有点恨他们不懂事。我想，我本来是个学种地的孩子，中间念了几年书，又回来种地，一点也没有降低了身份，怎么叫‘落魄’呢？难道真的要我入了压迫者之伙，回来压迫你们这些同难的父老，才是我的‘出路’吗？”

然而祸不单行，去年生的一个女儿不幸夭折，妻子本来就患有肺结核，她悲伤过度，一病不起，竟然跟着女儿也到另一个世界去了。当地有句俗话：“富人不死妻，还是运气低，穷人丧了妻，只有讨饭吃”。因为太行山区男多女少，娶房媳妇谈何容易。赵家为医治这三个病人，已经山穷水尽，现在停尸在地，更是非钱不可。赵树理不得不亲手写借约，用家中最好的三亩河滩地作押，借高利贷买了一副棺木。

一连串的变故，搞得赵树理焦头烂额，疲惫不堪。可父亲还不饶他，日夜唠叨，指责他一事无成，“这么大了要我养活你！”辜负了爷爷和他的一片心血。

赵树理秉性软弱、孝顺。他被父亲骂得心烦意乱，乃改变回乡务农的初衷，于翌年初去县城报考小学教师。揭榜时，

他在一百多个应试者中名列榜首，获得了县城西关模范小学的教席。

沁水县城位于群峰环抱的一个山凹里，左右是潺潺流淌着杏河与梅河，城墙建筑在一个小小的三角上，里面有两条一长一短十字架型的小街和几百户人家。赵树理在此倒也悠然自得，挣的工资比乡村教师多一倍，还时常能看到从未见过的蒲州梆子，但因他独尊上党戏，所以初看蒲剧时颇有不屑一顾之态，就象阿Q鄙夷城里人称“长凳”为“条凳”似的，故意找几个别扭的“地方字眼”骂一骂，讽刺一番，表现出文艺欣赏上十足的农民心理。

不过，这样的好日子并不久长。四月二十八日那天，一群警察突然来校，不由分说，一把抓走了正在上课的赵树理。①

这消息传到尉迟村，立刻急坏了赵和清。山民谈官如谈虎，他赶忙取出三个制钱占了一卦，占出之后惊得他面色如土，连连摇头说：了不得呀了不得，丑土的父母动出午火的官鬼，火旺于夏，恐怕有些危险了”。于是他连夜赶了一百二十里山路，去县城营救儿子。不料上峰有令，亲属不得探亲，而且因案情重大，不日将押解太原。慌得和清老汉丧魂失魄，

① 关于赵树理被捕的原因，过去都认为他任教后遭人嫉妒，受到陷害，县城内出现黑帖，指控他是漏网共产党。现据当事人畅培元交待，情况并非如此。他当时是国民党沁水县党部常务执委，于四月间突然接省党部密电，指示：“立即负责扣捕沁水共产党嫌疑犯赵树礼，霍启高二人至县，会同转解省党部。”县长表示照电办理。他就带领两名警察，先去西关模范学校逮捕了正在上课的赵树理，旋又抓住霍启高，也没有长期关押他们，而是很快就押送太原。

团团乱转，好不容易才打听到押送人是个在太原教书的贾姓绅士。于是又向贾绅士叩头拜求，请他看在同乡人和读书人的面上“恩典恩典”，关照一下身陷囹圄的儿子。没想到此人很有同情心，慨然允诺，让赵和清每月寄上五元大洋，由他转交给赵树理。和清老汉千恩万谢，回家筹钱去了。他决料不到，后来他卖谷卖驴换来的五十多元钱，几乎全部进了这位绅士自己的腰包。

五月初，赵树理被捆上双手，徒步走向千里之外的太原。由于事出意外，被捕后又没审问，他不清楚敌人究竟掌握了多少情报，所以虽然是毕生第一次去省城，沿途风光却视若无睹，一路上不断盘算着应付的对策。但当“清党”老爷们正式审讯时，他放心了。原来所谓的罪证，不过是两本普通的文学作品。一本描写俄国虚无党活动的小说《灰色马》和一册介绍俄国作家作品的《小说月报》专号——这说明他崇拜苏俄，图谋暗杀。此外还有几封同学的来信——信中没有直呼其名，而用“赵子曰”，“大面松”，“差不多先生”等古怪称呼，显然是共党暗号。他发现敌人并无真凭实据，便矢口否认自己是共产党。“清党”老爷们似乎也觉得证据不足，但既经抓来，就不好意思无罪开释，结果以“共党嫌疑犯”之罪把他投进了山西自新院。

山西自新院（后来改名为山西反省院）属于国民党C.C团系统，成立于一九二八年八月，是“清党”运动的罪恶产物。

国民党在土皇帝阎锡山统治的山西，处于不大得宠的妃子地位，一开始只能秘密地发展组织，直到一九二五年底才

公开成立山西省党部。但在“清党”运动中，他们都有了用武之地。狂捕滥杀，严刑拷打，无所不用其极。由于牵连扣押的人日益增多，又不便统统枪毙，于是在阎锡山的首肯下，成立了这个自新院，专门执行牧师的职责，管教所谓政治犯和涉嫌疑的人。

自新院设在太原市上马街五十四号，是个呈马蹄形的两层楼房，最多可以关押四十个犯人。规模虽然不大，却有一整套刻毒的训练和考察制度。

这里的囚犯均按文化程度的高低，分甲、乙两组上课。课程设有党史、国语、历史、地理、音乐等。内容一言以蔽之，是通过宣传三民主义诽谤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的国情，达到“革心”的目的。比如国语，规定甲组“以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党政府各部院，各级地方政府通常往来之各项文电为教材，使反省人从中明了国民党的实际政策和现实政况”，甚至连音乐课也专唱感化性歌曲，以期“潜移默化，洗心革面”。又规定人人都要写日记，看必读书，限期读完并作读书笔记。

关于赵树理一年左右的铁窗生活，我们所知甚少。但从他的难友的回忆文章中，是不难想见他在自新院里的表现的。

在院内党支部的领导下，这里的政治犯针锋相对，进行了不屈不挠、有理有节的斗争。他们的主要策略是装痴作呆，软顶死磨。比如，课堂提问时答以“不懂”、“不知道”、“理解不了！”在读者笔记中，大谈人生无常、世道可悲，表示不愿过问任何政治，平时睡大觉、磨洋工，倘若伙食太差，就全体拒食，逼着重做，饭不够吃也不走，非补做吃饱了不可。使得敌人想抓抓不住，想恼恼不了，曾经恨恨地写下这样一

段评语："喜吃懒做，敷衍苟且，几乎是现社会里很普遍的病态。尤其是受过法律制裁、住过监狱、精神上受过打击的青年，差不多都成了懒散敷衍、得过且过。"

自新院设有图书室，藏书一千五百余册（其中党义一类的书籍占五分之四强），由政治犯自己管理。他们便利用这个条件，想方设法，秘密充实马列主义著作和进步的文学作品。阅读时，仿效中学生上课偷看小说的方法，上面放一本《三民主义》、《五权宪法》或《建国大纲》之类规定的必读书，而且互相切磋、钻研提高。有一位姓王的同志，为赵树理讲解了日本河上肇的新经济学，使他眼界大开，从此对政治经济学发生了不衰的兴趣。他后来说："我认真和共产主义思想接触，是在这时候才开始的。"

在这里，赵树理的"艺术至上论"也受到了挑战。难友中有个高春生同志，主张革命的现实主义，认为文学应该积极地反映社会生活，表现并讨论有关人生的重大问题，从而惊醒人们，使他自觉地投入革命斗争，他非常奇怪赵树理居然愿为艺术而生、为艺术而死。他告诉赵树理，共产党员必须坚决抛弃这种资产阶级的文艺观点。

可是赵树理的个性，轻易不肯改变自己认准的观点，绝少随声附和别人的见解。于是，一场早已成为历史的人生派和艺术派的对立、颉颃，在这个反革命的监狱里重演了。结果，自然是以赵树理心悦诚服地认输而告终。他感谢高春生，"为了纠正我的文艺观点，也和王春纠正我的江神童思想一样，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三年后，他在报刊上公开批判艺术至上论者："他们死守着艺术至上的理论，想渐渐走入艺术之

宫、象牙之塔，使艺术与民众隔离起来，与社会隔离起来，而把艺术独占了，变成他们独有的少数人欣赏品，这不止把艺术的社会价值给否定了，就是艺术的本身价值，也必然的僵化，必然的凝固。因为艺术的本质，并不如他们所想的那样，可以脱离了社会的关联而存在。反之，艺术必然是社会的、民众的，才有发展的前途，才被称为艺术品。”这意味着，赵树理彻底清算了自己过去的文艺观。

赵树理愿为真理而改正错的，坚持对的，决不随风倒，也不死顽固。这是他极可宝贵的品格。

为了迫使政治犯发表反共言论，自新院还强行规定，由政治犯自写自编（不过须经院方最后审查）一份《自新月刊》。但是，“只有叛徒孙斌给敌人写了《从内忧外患说到反日与清赤》的反共文章以及个别人曾写文章表示悔改，渴望出去。”一位最后离开反省院的同志写道：“绝大多数被迫写稿的同志，都以含蓄隐晦的笔法，用诗歌、散文等表达内心的爱憎，或者写一些关于科学研究等不涉及政治的文章。”①

作为长治四师的高材生、沁水县的“尖子教师”，赵树理根本无法隐瞒自己的学历，不能不被编入甲组上课，自然也不能不给《自新月刊》写稿。他先后发表了四篇文章——小说《悔》、《白马的故事》和《赠出院自新人词并序》、《读书·做人·革命》——以应付敌人的逼迫。其中的两篇小说，很值得我们注意。这是迄今为止所能见到的赵树理最早的文学作品，虽然是发表在范围极小的反动的内部刊物上。它最鲜

① 李志敏：《山西反省院政治犯的斗争》，载《山西文史资料》第17辑。

明地体现了赵树理当时的文艺思想和艺术技巧。

《悔》是赵树理的处女作，发表于《自新月刊》第五期。这篇小说的内容，似乎颇合院方的要求。它描写一个聪明而又顽皮的小学生，遭到了开除的处分，他愤怒地冒雪回家，却发现父亲正在向别人表扬自己品学兼优、志向高远，他不禁悔恨交加，昏倒在雪地里。……

但是我们稍一玩味，便可发现小说的用意完全在于揭露教育界的腐败和校长的专横。陈锦文年仅十三，就决心自立。他能写善画，被大家公认为“天资颖敏、实堪造就。”却由于一些十足孩子气的小事——例如用纸画成一只狗，写上先生的名字——竟被校长扣上“以身自傲遂致言行失检”这种大人都吃不消的罪名，还振振有词地致书陈父道：“仆既负斯校全责，势不敢自欺而欺人，故不得已而除令郎之名额，万乞先生想仆训导无术，致取斯举。”读来令人啼笑皆非，唯有佩服校长加罪有术、并对陈氏父子表示深切的同情。

显而易见，这篇小说的素材来自作者自己在长治四师的经历，隐隐地流露出对姚用中“通信开除法”的强烈憎恨和对父亲千辛万苦培养自己的歉疚之意。它与三年前写的《到任的第一天》相同，分明受到创造社“自我表现”说的影响，心理刻画相当细腻，文章更为圆熟，也更为欧化了，但人物的对话依然毫无个性、三人一腔。

刊登在《自新月刊》第七期上的《白马的故事》，却是一篇寓言小说。它叙述一匹白马正在安详地接受洗刷，突然天上阴云密布，电闪雷鸣。白马受惊，脱缰而去，在山洪惊雷中盲目地狂奔乱窜，差点儿掉进万丈深渊。最后，它精疲力

尽，走投无路，重又折回原地。当它见到马倌时，“它对他立正，两耳尖向前直指着，粗胖而柔软的嘴唇‘哺哺……’的振动，两颗大而晶莹的眼珠并向正中，表现出无限的亲爱——好象失路的孤儿，中途遇到了母亲。”

看起来，这篇小说更含“自新”之意。不过，小说所运用的是象征手法。这暴风雨意味着什么？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们的眼光当然不能与审查官老爷一致。它很容易使人联想到晴空霹雳般的“清党”运动，以及赵树理在深山野沟里的流浪生活。其中隐寓着他脱离党组织的惭愧之情和在狱中学到马列主义的喜悦。

寓言体，象征手法，在赵树理的全部作品中是绝无仅有的。这不仅仅出于斗争的实际需要，还显示了赵树理刻意学习新文学的成绩。此外，小说中出色的风景描写，也着实令人惊讶，因为他后来最反对单独描写自然景色。在这里，他却能熟稔地用大自然恬静与狂暴的美来渲染环境：

> 松枝筛下的花荫，地柏笼罩着绿草，虽是赤日当空的夏午，林间的草上尚留着星星的残露。而香蕈也从地柏之网里强伸了秃头——一颗，又一颗，嘎！又两颗——好象给绿草添上黄色的眼睛。
>
> 狂风从高的天空奔近了地面，把松林吹得潮一般的哗哗作响，再加上不断的雷声，奏成了这暴烈不和谐的音乐。大卷的黑云，又遮住了红灰色的天空，把大地变做了夜一般的黑暗，时时闪恍，然而不能继续的电光，只送给地面上更多的恐怖，大雨滴夹着冰雹，打在松干上，石崖上，放爆竹似的把这暴烈不和谐的音乐调子更行提高，松枝不时被风折断，发出“呵呵”、“呵呵”的音响，免去暴烈的声音的单调。

自新院规定以六个月为一期，表现“恶劣”者需再受反省处分，出院时还须写出院宣言。

如何写出院宣言，是一场严峻的斗争。院内党支部决定，政治犯在出院宣言上绝对不写“反共”的词句，即使不得出院也在所不惜。但是在不丧失原则立场的前提下，只要不写“反共”，在词句上可以有一定的灵活性。“出院宣言一般都写‘出院后当一个好国民，拥护三民主义，不参加任何反动组织。’的含糊词句，这是在敌人逼得没有办法时才写，一般都写了三次，第三次才这样写的。所谓反动组织，就是指国民党。除此之外，敌人再逼也不多写一个字了。每人写的出院宣言，都要经过政治犯中斗争坚决并较有经验的同志传阅后才交给敌人。”①

一九三〇年五月，被迫反省了两期的赵树理获释出院了。但当天就受到了考验：有关方面告诉他，长治四师又发生了驱逐校长的学潮，领导者是他的好友杨蕉圃等人，要他去破坏这次学潮。他当场拒绝道：“负不了这样大责。”随即火速动身，回长治通知杨蕉圃他们早作准备。

六月二日，参加学潮的十八位同学，与赶来报信的赵树理在母校的花园里合影。这大概是他有生以来的第一张照片，为我们保留了青年赵树理的形象：光头、长脸、浓眉、大眼，端正的鼻子下，两片大嘴唇微微地张开着。他神色泰然，安详地抱膝坐在前排的草地上。而别人却不知是气氛还是心情

① 李志敏：《山西反省院政治犯的斗争》。

的缘故，全都面无表情，木然地凝视着前方。他们知道，前途凶多吉少，很可能被校方永远开除，难免各奔东西，所以请赵树理在照片上题词留念。他略一思索，便挥笔写道：

萍草一样的漂泊，或许是我们前程。此间一度的欢聚，不知何时再会。朋友们，我们的归宿，让我们分头去找。

一九三〇、六、二、潞安

题词恰合大家的心理，似乎渗透着淡淡的伤感之情，其实正是赵树理思想上老练的表现。一年的监禁，使他变得更加坚强，同时也更加深沉了。他知道，革命的道路是漫长的、曲折的、艰难的，需要我们坚韧不拔地努力去找；他也知道，在敌强我弱的白色恐怖中，一些不必要的过激言词，都会招来无谓的牺牲。

临别时，赵树理告诉史纪言，他已决定将自己原来的名字“赵树礼”改为“赵树理”。

这一字之易，标志着二十四岁的赵树理对于人生道路终于作出了抉择：坚决摒弃父辈为他苦心安排的“读书识礼、学优而仕”的封建主义道路，他要为树立共产主义的真理而奋斗终生，纵然象萍草一样的四处漂泊，也要去寻找革命的归宿。

卷　二

从彷徨到呐喊

(1931—1942)

逆境是达到真理的一条通路

——拜伦

第四章 彷 徨

赵树理出狱前后，山西局势正如白云苍狗，变幻莫测。一场规模空前的反蒋大战，在阎锡山的指挥下猛然爆发了。

蒋介石定都南京时，国内军阀林立、派系纵横，各自称雄一方、互相争霸。因此，他在残酷屠杀共产党人的同时，蓄意双管齐下，把枪口部分地转向异派军阀，企图各个击破，以期集权中央、造成一家天下。

一九二九年，桂系、冯系、唐系军阀都相继遭到蒋介石的致命打击。唯有阎锡山一直象游蛇一样，回旋于各派势力之间，使晋系得到了保存和发展。但蒋介石并没有轻放过他。一面派他亲自率兵到河南灭唐，一面在郑州设下圈套，使阎险遭活捉。随后又北调大批军队，虎视西北。这种咄咄逼人的架势，迫使阎锡山不得不下对抗的决心。

一九三〇年春，以阎锡山、冯玉祥为首的全国各路军阀和以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内反蒋派，派出五十多名代表，麇集太原，决议倒蒋。五月，七十万反蒋大军三路出击，在豫东、鲁西，皖北的中原大地上，同蒋介石的军队展开激烈的厮杀，双方投入的兵力，创民元以来军阀混战的最高纪录。与此同时，国民党内的反蒋派与南京方面分庭抗礼，在北平举

行“扩大会议”，另立中央党部、另组国民政府。于是，实力最强的阎锡山便一跃登上了“国民政府主席兼陆海空军总司令”的宝座。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山西的鸡鸣狗盗之徒便趁扩军之机，拉旗号、称大王，投到阎锡山麾下去弄个师长旅长干了。土豪劣绅们也不甘落后，拼命钻省府秘书长贾景德的狗洞，想捞取县长科长等文职官位。

这位秘书长是赵树理货真价实的同乡人。他出生于沁水端氏镇，父亲和叔叔都是进士及第、跻身官场。自己也是清朝的末科进士，二十几岁就当上了县太爷，所以自称“小市无华族，高门数我家”。不过，他的乡亲们可没沾上什么光。他衣锦还乡，在端氏大兴土木，修建起规模宏大的“荣国府”，几乎占去了这个沁水第一大镇的近半面积。惯于趋炎附势的中小地主，全都争先恐后地来同贾家攀亲，遂使沁水县的封建势力中心自然而然地从县城移到了端氏，而“荣国府”中的贾家爷们也自然而然地在乡里横行起来，为所欲为、无恶不作。比如，贾景德的堂叔六太爷，是个穷凶极恶的高利贷者。“文书上写一百元，实际上只给八十元。八当十，三分利，三个月一期，到期本利还清，想再使又是八当十，还不了钱由承还保人变卖产业”。在无数的受害者中，就有赵树理的堂叔及其本人。他后来说，“经我手写给债主的借约（有自己的，也有代人写的），在当时，每年平均总有百余张，其中滋味有非今日青年所能领会者”。又如贾景德的堂弟三爷，专爱包揽讼事，有徇私枉法、草菅人命的能力，结果，“凡是县政府管不了的事，差不多都找到三爷那里去了。”

贾景德科班出身，博学多才，又在宦海浮沉多年，深谙治民之术，助纣为虐时很有两下子——天怨人怒的“征收房税令”，就是他出的鬼主意，所以深得阎锡山的赏识，是山西军阀集团中一个决策性人物。中原大战时，他权倾朝野。那些钻他门子的无耻之徒曾公开扬言：“这会正是用人的时候，只要找着秘书长，就是扫帚把子戴上顶帽，也照样当县长”！他的堂兄弟们当然更成了政府急需的人才。这个爱打官司的三爷当上了怀仁县的父母官，另一个胸无点墨的五爷，也到省民政厅某科视事去了。随之而去的还有一大批沾亲带故的当地人。

这股乱哄哄的浊流，不料把刚回乡的赵树理也卷了进去。和清老汉虽然庆幸儿子平安归来，但他眼看着许多无能而会钻营的人飞黄腾达，不禁又要大骂赵树理没出息，不会巴结人，反倒连累父母高筑债台，时常催他借此机会也去太原谋个一官半职。

赵树理不胜其烦，又没有勇气天天面对愁肠百结的母亲。恰巧那些合影留念的同学果真被学校开除了，来信约他去太原相会，然后同赴北平。于是赵树理佯遵父命，在九月间重返省城，可惜因盘费短缺，迟到几天，同学们已经离去，他只好暂寓客栈、四出谋职。甚至向王璧先生也去了一信求援。信中写道：“违教以来，匆匆二载，不知设席何所，故疏侯起居，敬希见谅。生也不才，致罹法网，近今生活方式，千折万变，不可臆测，夫子闻之，得勿怜其愚乎？今虽已复自由，而家庭经济势不允生以求学。家父促生来并餬口，奈迟到数日，三五友人，已赴北平，故暂留太原作客，倘蒙夫子不弃，

辱惠德教，来示乞寄万字巷同庆客栈秦掌柜转。……”①

万字巷位于省政府的对面，绥靖公署中不带家眷的小公务员常住这里。有一天，赵树理忽然遇见了一个昔日在榆山高小时的同学，此人今非昔比，一身戎装、趾高气扬，据说已是四十八师上尉参谋。他正缺一名勤务兵，就看在同乡加同学的面上，硬把赵树理拉到设在泽州会馆的“四十八师留守处”，替他打水，倒茶点烟，间或还得上街买“料子”。

这个所谓的四十八师，正是在阎锡山的扩军浪潮中冒出来的新编番号，徒有虚名，并无兵丁。所以赵树理只当了两星期的勤务兵，便因战事失利，上面一道命令取消了这个空头师。那个上尉同学另有高就，但总算没把赵树理撇下不管，将他荐入山西绥靖公署当个录事。赵树理短暂屈辱的军人生涯就此结束。后来，他把这段经历放在张铁锁的身上，写进了《李家庄的变迁》。

在太原绥靖公署，赵树理的待遇有所改变。他担任了录事的职务，不必再东跑西颠，可以坐在办公桌前舞文弄墨了。不过工作的实质与勤务兵差不多。他那抄得工工整整的文件，在上司眼里不值分文，往往拿眼一扫，就放进了文件夹。接着，或上呈长官，或下行机关，照例是一晃而过，最后编号入档，放进库房，淹没在文件的海洋中，等待着老鼠光顾。这

① 王璧即帮助他和王春逃离长治的那位老师，当时已改住榆社县中学的教师。他把赵树理的来信抄录在自己的日记中，得以保存下来。这封信说明了赵树理重返太原的缘故和他当时的心情处境，也证明了他刚去时并非住在“满洲坟”或“泽州会馆”。

种毫无价值的公文，给赵树理带来的唯一好处，是练就了一手漂亮的毛笔字，赵孟俯体，圆润遒劲、柔中有刚。不过，他的眼睛和耳朵在捕捉着大官小吏的种种特征，做作的姿态和卑鄙的言行。这为他未来小说的篇章，在脑海里积攒了不少财富。

这时，中原大战的形势急转直下。阎锡山的“国民政府主席”的宝座尚未坐热，那位被他封为“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的张学良却通电入关，宣布支持蒋介石。张学良在这场战争中举足轻重，他的决定使倒蒋军腹背受敌，遭到致命的打击。本来就飘飘摇摇的“四九”小朝廷（意指成立于民国十九年九月九日上午九时）遂告夭折。阎锡山悄然下野，逃往大连，扔下了一大堆灭顶般的灾难让山西人民去承担。

倒蒋军失败后，几十万军队退驻山西。驻扎在沁水附近的就是军纪最坏的孙殿英部。这些溃兵强取豪夺，奸淫掳掠、无所不为，还制造吗啡金丹等毒品，勒令当地县长代为推销。他们的粮秣及一切用品，都向当地老百姓摊派，稍有怠慢，便诉诸武力，连地方官也难以幸免。在《李家庄的变迁》中，赵树理约略地描写过当时老百姓的惨景。

“阎锡山每隔两个月便给他们收一次粮秣借款，每次一两粮银收七元五。铁锁是外来户，外来户买下的地当然粮银很重，虽然只剩下五亩沙板地，却纳的是上地粮，银数是五钱七分六，每次粮秣借款该出现洋四元三毛二，合成山西票就得出八十六元四。

自从派出粮秣借款后，不止铁锁出不起，除了李如珍、喜财等几家财主以外，差不多都出不起。小毛是闾长，因为过

了期收不起款来偷跑了。不断有散兵到村找闾长，谁也不想当，本地户一捏弄，就把铁锁选成了闾长。铁锁自戴上这顶愁帽子之后，地也顾不上种、匠人也顾不上当，连明带夜忙着给人家收款。……”

与溃兵一起涌进山西的，还有阎锡山扩军时乱印滥发的巨额晋钞。它如洪水猛兽，洗劫山西，市面上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实力雄厚的豪绅巨贾，趁机用晋钞囤积物资，连木店的棺材也抢购一空，自然，最倒霉的又是小民百姓。

赵树理的录事工资仅只六元一月，靠它来支付日常用度，无异于杯水车薪。虽然在这绥靖公署的大衙门里，上上下下有着无数的生财之道，但这个农民的儿子生性正直，他憎恨这类卑鄙勾当，宁愿外出寻找机会，用自己的双手去挣钱。他曾替某教师代改语文卷；又为某学校刻过讲义，每张八分，每天三张；还给某邮局印信纸、糊信封……用这些七零八碎的微薄收入聊补无米之炊。

但是，物质的贫富往往与精神的贫富成反比。食不果腹的赵树理，精神生活却是丰富的，文思异常敏捷，一九三〇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深夜，他奋笔写下了一首长达八十四行的七言旧诗《打卦歌》。半月之后，这首诗在北平《晨报》副刊“北晨艺圃”上发表了，署名“野小”。关于这个笔名，赵树理解释说：“野小者，野老之子也。”意谓自己永远是乡野父老的忠实儿子。

《打卦歌》是赵树理公开发表的第一篇作品，其形式也空前绝后，是用旧体格写成的长篇叙事诗，又有强烈的抒情色彩。诗中描写倒蒋失败后的太原城里，有个形容憔悴的游人

前来问卜。打卦的金钱铃铃作响，一掷再掷、卜士便敬问他占的是升官还是发财？不料游人微微摇首，连声否定，却郑重其事地向算命先生倾诉起自己的身世和遭遇来：他祖籍河南，年轻时练就一身武气，曾仗剑走江宁，结交天下豪侠，过着歌风啸月的快乐生活。可是：

归去躬逢直皖战，
划将田舍作防线，
冲击声中起哀号，
硝烟阵里墟庭院，
夜半檐前舞流弹，
阶次“砰砰”落瓦片，
龙泉不敌弹纵横，
空使英雄恨懑懑，
俄尔窗前大炮作，
一声霹雳半屋仆，
可怜家父葬颓垣，
背母惊驰幸得脱。

他听说山西太平，便携囊扶母，翻越太行，将母亲安顿在上党，自己浪迹奔驰，靠炼药卖艺来养活老母，总算平安地度过了六七个春秋。谁知今年风云突变，军阀重又开战：

迩来溃兵潜晋南，
狂涛击破武陵源，

泽州一带匪扰遍，
一日报端三五见，
仓皇迭访南来人，
询叩十人九称“乱”！
村庄男妇走相逃，
枪声震处裂人胆，
鸡鸣藩篱屋宇空，
尘封旅道行人断。

他得此消息，顿起归思；“遥念阿母年七十，如何耐得军火惊？!”可是眼前身无余资，难以成行，所以“虚祈先生启蒙昧，神占阿母安未也？”

原先已经很不耐烦的卜未，听到这里不觉俯首沉吟了。他对游人的遭遇充满同情，但又爱莫能助，只能给以虚幻的精神安慰，告诉他“太老夫人得安宁！”

这是当时社会一幅真实、客观的生活画面。无论老军阀的直皖战争，还是新军阀的中原角逐，洒向人间都是怨。家破人亡，流离失所的悲剧司空见惯，其中就不无诗人自己的生活写照。“采药西登王屋巅，归炼灵膏向市廛”，令人油然想起“杨大夫”的流浪生活。“日营晋钞五六角，餬口之外无余资，千里川粮一无凭，愁肠牵断不成行？”也正是赵树理当时的切肤之痛。不过，这并非艺术派所标榜的“自我表现”，而是感时忧国、热爱人民的现实主义传统的鲜明体现。这首诗表明，赵树理接受了高春生的劝说，开始由为艺术而艺术转向为人生的艺术。他把目光投向了广阔的社会，有意识地

表现人民大众的苦难生活，整首诗的构思是现实主义的。从此以后，赵树理与艺术至上主义分道扬镳，越来越执着地追求现实主义，乃至愿为真实而生，为真实而死。

《打卦歌》的结尾有一附言："这段故事，我所以要拿旧体格来写，不过是想试试难易，并没有缩回中世纪去的野心：特此声明。"这个多此一举的声明，暗示着赵树理这时还不敢理直气壮地宣布旧瓶可以装新酒。其实，他的试验是成功的。这篇叙事诗的艺术手法明显地借鉴了白居易的《琵琶行》，也是用人物的对话，自白来构成故事、开展情节。当然，两者的艺术成就相去天壤，"憔悴游人"的形象远远不如琵琶女那么楚楚动人，甚至也比不上那个着墨不多的卜士，但他的身世所反映出来的社会生活面，却无疑比琵琶女要广阔得多，他的悲剧性遭遇，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被猖獗一时的新旧军阀闹得乌烟瘴气的二十年代旧中国。

然而，诗人在最后却唱出了一曲听天由命的悲歌：

占者致资稽首去，
蹒跚步下暂时慰。
阔大战场九万里，
同胞南北东西徙，
世外桃源觅无津，
妻失夫兮母弃子，
安得卜士千万位，
招来组作卜士队，
遍行各地慰流人，

胜他多少十字会。

这个不久前认真学过马克思主义，决心弃“礼”树“理”的革命者，竟然向封建迷信高唱赞歌，要受尽苦难的人们安贫知命，接受精神麻醉，真是不可思议。不过，年轻人的情绪是易于变化的，况且一个正直的青年，长期接触不到进步思想，耳濡目染的是死尸般的腐败的官僚气息，要做到不徬徨不消沉谈何容易。

不久，赵树理又创作了中篇小说《铁牛的复职》，在山西的《大风报》上连载，署名也是“野小”。

《大风报》真象一阵大风，三月之后便吹得无影无踪，已出的报纸现在也荡然无存了。所以铁牛如何复职，详情不得而知。据说：“内容叙一乞儿铁牛给地主放牛，因遍身生疮，被地主辞退，回到家里，看到他在墙上挂着的打莲花落的板子断了绳子，掉了下来，他又把它穿起，重新拿去讨饭。所谓复职，意指恢复了讨饭生活，略含幽默意味。”① 假使联系到赵树理当时的处境，小说的意味恐怕就不止于幽默，而是有着象征的含义了。它预示着赵树理宁可回去讨饭、打莲花落，也不愿再为六元钱而摧眉折腰事权贵了，他渴望归去乡野，重入纯朴健康的“小字辈”队伍。

果不其然，由于山西票的信用直线下跌，原来一元晋钞还可顶五毛，最后竟贬值到二十元抵一元，形同废纸，月薪

① 转引自刘泮溪：《赵树理的创作在文学史上的意义》、载《山东大学学报》1963年第1期。

六元的赵树理显然是难以活命了。一九三一年初冬的一天，他把那些摊在桌上尘封的文件整个地弃捐不顾，甘冒被散兵游勇打劫的风险，翻山越岭，回归沁水去了。

然而赵树理为时已晚，一年多卑微的衙门生活，甚至比监狱还要厉害地侵蚀着他的思想。绥靖公署好比一口浓血污秽的染缸，就是把金刚石的宝刀也会生锈。他在这里呼吸不到一丝悲观厌世的情绪便在不知不觉中袭淹了他的心灵。

自从赵树理在太原谋得了职业，家中就为他的续弦问题操心开了。跟他的第一次婚事一样，和清老汉又是大包大揽，根据他的阴阳卦术，一手为儿子选定了赵家祖居武安村的富户关志宏的女儿关连中。

武安村距离尉迟村仅有三里之遥，中隔一条潺潺的沁河。关志宏膝下无子，抱养了一子一女。他虽然富裕，却颇为仁义，乐善好施，又很爱才，非常赏识赵树理的学问——他的儿子是赵树理在榼山高小时的同窗好友，两人时有往还——认为上自端氏，下至润城（阳城县境内一个村庄），沁河两岸五十里间，无人能及。所以他不嫌赵家贫穷，很痛快地答允了这门亲事。他的女儿关连中是个十九岁的大闺女，长得娇小玲珑，十分秀气，圆圆的脸蛋上，一对不大的眼睛流泻着少女特有的神采。虽说是父母作主，她对赵树理其实并不陌生。当她还是个女孩子的时候，就见过赵树理高大的身影，也经常听到父兄谈论他的过人才华和坎坷经历。也许是男女间的事从来就是不合逻辑的，这个一字不识的少女，心中早就满蕴着对他的柔情。所以她不嫌赵树理还有个七岁的太湖，甘

愿去做填房。①

奇怪的是赵树理也很痛快的应允了这门亲事。他明明已经尝够了无爱的夫妻生活的苦果，“五四”新文学又使他倾心于恋爱自由，婚姻自主。可事到临头，他却毫无反抗地接受了命运的安排，与一个不熟悉、无文化、没有共同语言的女子结成夫妻。这种不合逻辑的行动，据他后来自述，是因为当时“我对于个人的生活已毫无兴趣了，这样也好，那样也好，我都不在乎。可是家里需要个干家务活的。我自己并不操心这件事，就听任父母张罗说亲。这种态度大概是听天由命吧！”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八日，和清老汉押出四亩土地，举债为儿子再娶。在沸天震地的锣鼓鞭炮声中，赵树理又一次拜天地、入洞房。他面对娇羞脉脉的新娘，感到无话可说。从此，他俩过着“相敬如宾”的夫妻生活。解放后，赵树理曾在一次讨论会上发过一通所谓中国人“先结婚，后恋爱”的高论，当时有人打趣道：

“老赵和老关就是个榜样！”

“榜样谈不上，我们老俩口，确是有了孩子以后才恋爱的。”他一本正经的答道。

第二年春天，为了解决生计问题，赵树理去向另一个同

① 关于关连中的身世，有的说她“幼年父母双亡，不知姓名，因给富人关家当使女，后来便以关为姓。”有的说她在关家“完全过着粗使丫头的日子。”但据关氏亲口对笔者说，上述说法全都不确。她本姓魏，并非孤儿，也知道亲人的下落，但她没有去认，也没有受过关家的虐待，在关家过着女儿的生活。

窗好友、换帖弟王广铎求援。此人生性豁达大方，任侠尚义，当时正在家乡附近新建的洞庵高小任校长。他豪爽地答应了赵树理的要求，自己另去谋事，腾出个空位让赵树理来代课，并把自己每月十六元的工资分出一半给他。

洞庵高小设在固县村西边里许的长山上。它因洞而得名。在悬崖绝壁的山头下，有一个似要坠落的天然山洞，相传战国时代，秦国为了进攻赵国，假意跟燕国和好，太子丹乃作为人质入秦，后来他识破诡计，乔装燕回，避居在这个山洞里，屯兵另图，所以世称滋丹砦玄天洞。洞下有个一进两院的古老庵堂，便是高小的校舍。周围翠柏丛生，山脚溪水淙淙，环境极其幽美。

这个远离尘嚣的处所，真是太合赵树理的心意了。他在那里无所不教，语文、算学、音乐、图画、体育，样样课都能上。他的丰富的学识和全面发展的才艺，博得了同学们的爱戴，俨然象个真正的“孩子王”。每天课余，总有一大串学生跟着他，到山后读书、朗诵、唱歌、画画，还从溪边拣回来一种可以镌刻的青石，在他的指导下学习治印。

宁静的校园生活和孩子们清泉般纯洁活泼的童心，滋润着这个憔悴游人的心田。赵树理天真地以为找到了武陵源，于是童心复萌，打算在这里实践他所信仰的陶行知的理论，把自己的精力贡献给乡村教育。

陶行知，现代中国最有影响的进步教育家，最早提倡乡村教育，为乡村学校的先行者。一九二六年，正当赵树理去长治接受师范教育的时候，他起草了《改造全国乡村教育宣言书》，提出“要筹集一百万元基金，征集一百万位同志，提

倡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决心要把乡村学校办成改造农村生活的中心。这一主张，对于农民儿子赵树理来说，真如黄钟大吕，传世福音，自然比其他同学更愿意接受，更衷心拥护。

结果，他在加入共产党的同时，也成了陶行知的信徒，还以为这革命和改良“互不冲突，只要在一方面有所建树，都是以安身立命”。现在，他觉得这个绝大的机会终于来了，可以在教育救国上有所建树，在乡村学校安身立命了。他真愿意在这个世外桃源中，“以宇宙为学校，举万物作宗师”，兢兢业业地培养农家孩子。

有一次，他为一个行将毕业的学生题了一幅扇面，上面写道：

九曲风清何处险？
人道有篇，
我道无篇。
我较你长几年，
人世甘苦，我已尝遍。
唯学校是真正乐园，
胜似西方极乐天。
在这里不管它春风怒孔，
……
只要每日应着铃声转，
哪怕它群魔翻劫古佛殿。
祝尔青年，

不逢太平世，
切莫向人间。

这是目前我们能见到的赵树理最早的白话诗。它值得重视的唯一之处，在于鲜明地反映了作者当时的精神面貌。通篇流露着强烈的消极避世思想和教育救国观念，表明赵树理由苦闷徬徨进而动摇颓丧了。他想远离尘嚣，遁迹乡野，并且规劝学生也不要去过问世事，逃避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

不幸的是，生活偏要跟赵树理开玩笑。题扇不久，他再次莫明其妙地鎯铛入狱了。好在王广铎兼任着国民党区分部书记，极力担保，得以释放。但是显而易见，这里决非胜似西方极乐天的‘真正乐园”,沁水的封建势力正对他心怀叵测，远走高飞才是上策。恰在这时，杨蕉圃好象有先见之明似的来信相邀，请赵树理到他那里代课，因为他要去太原继续求学。

一九三三年夏，赵树理转赴太谷县北洸小学任教。从此以后，他再也没有在沁水县谋过职业。

北洸小学设在一座汤帝庙里，冬天在厢房里上课，夏天常把课桌搬到正殿对面三丈见方的戏台上。“这座戏台，每年只是秋收以后唱一次戏，除以之外，冬天有些大户借它存干草，到夏天一方面作课堂用，另一方面有些住家离庙近的农民在后台和角落上铺着席子，在午饭后和晚饭后到上边乘凉休息。” 这使赵树理重新得到了接触农民的机会。

当地农民发现，这个新来的教书先生有点与众不同。在他们的印象中，凡是念过书的人，对庄稼汉总是跟掌柜对待

伙计一样，一说话就是教训，好的方面是夸张，坏的方面是责备，从未见过人家把自己当成朋友。可赵树理却不然，他毫无架子，专爱结交穷哥们，乘凉时谈天说地，打闹取笑，无所不来，十分随和。

赵树理和农民的关系真象鱼水一般，刚一接触，他就活了，力量和勇气源源而来，消极颓唐的感情一扫而光。不久，他创作了一篇富有反抗性的小说《金字》。

它是一篇不足三千字的小小说，但批判的锋芒直指时弊，弥漫着火药味。与那首题在扇面上的诗相比，前后判若两人。

《金字》所揭露的是当时流行山西的倒蒋战争后遗症：省府向一个极穷的地区连派了三次粮秣借款，老百姓当然出不起，区长也因此被撤职。但新来的区长却深谙为官之道在于联络当地豪绅。他勾结镇长兼全区首富王静仁，规定凡交不出粮秣借款的人，填了字据将地押给王镇长，由他代缴。此法果然奏效，不到两月就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区长因功升迁，镇长更是获利非浅，但这个贪得无厌、一毛不拔的家伙还要巧立名目，搜刮农民的钱来为区长送行。而老百姓直到那位教书先生往往“闪电缎”上写金字的时候才明白真相，气得他们破口大骂，兴师问罪：

“真他妈的，又叫人家把咱们装鼓里头了！”

“执问镇长去！”

“执问王静仁去！”

“执问忘八蛋去！”

大家说着跳下台，冲突庙门。

“过了一阵，街上的人声就哇啦哇啦，越吼越大了。”

这是一篇小巧玲珑的作品，构思颇具匠心，它把强征粮秣的经过全部推到背后，仅仅横截了这场肮脏交易的小小尾声——为高升的区长写“帐子”（即歌功颂德的幛子），就深刻真切地揭示出阎锡山给山西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以及他们的愤怒情绪。

就赵树理的创作道路而言，《金字》又是个小小的里程碑，具有转折的意义。这是他第一篇反映农民生活的小说，虽然主人公仍以赵树理自己为模特儿，而农民还是个模糊的集体群像，但从此以后，农民的形象就永远没有在他的小说中消失过。

然而奇怪的是，当赵树理把这篇得意之作念给乘凉的农民朋友听时，却不受欢迎。因为小说是用第一人称写的，他们闹不清小说中的“我”和念的人是什么关系，老是合二为一，对于倒叙和插叙也感到很别扭。①

赵树理不甘心，又向他们宣读了一些新文学的优秀作品，但是同样遭到冷遇。无论他怎样吹嘘，农民就是听不进去，却拿来《七侠五义》、《笑林广记》之类的书请他念，一个个听得茶饭不思，兴趣盎然。

这件事引起了赵树理的深思。他想起了上学时回乡革命的失败，开始意识到：新文学的内容固然是进步的，但形式却不为劳动人民所喜闻乐见。新文学的圈子小得可怜、高得

① 《金字》的原稿已经遗失，过了四分之一世纪，赵树理凭着记忆重新写出，发表于《收获》第三期，可见他对《金字》很下功夫，自鸣得意，他完全有可能念给农民听过，否则就很难理解他紧接着便改变了自己的文风。

难攀，它们似乎是一种只在知识分子和文艺爱好者、写作者之间交换传阅的“交换文学”，跟老百姓是无缘的。他们所喜欢的还是那些千古流传的民间故事，以及饱含封建毒素的唱本读物、通俗小说。农民的态度动摇了他对“欧化句法”的崇拜，他决定进行一种新的尝试，另辟蹊径，运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传统形式来创作正在构思的长篇小说《盘龙峪》。

可惜这种鱼水和谐的生活又没能持久。一九三四年元旦，赵树理指导北洸小学的五年级学生，在这座古老的戏台上表演了四出新戏。其中三出都是他自己编的。一出描写某地主看中了一个女学生，软硬兼施，强娶为妾，但在新婚之夜，女学生杀死了这个地主，逃出去找自己的心上人去了；另一出写某农民在大年夜被债主逼得走投无路，祈求菩萨保佑，可是老天爷很势利，不采他，这个走投无路的农民便在庙里上吊了；还有一出，则是借灶君上天奏事的传说，讽刺了政府内无官不受贿的腐败现象。

这次演出轰动全村，盛况空前。但是赵树理得到的却是逐客令。因为它不可避免地得罪了当地王静仁式的土豪劣绅，是年春天，学校突然辞退了赵树理，理由是“思想进步”，于是，他遭到了第四次失业的打击。

赵树理途穷路末，生计无着，只得步爷爷的后尘，弃文从商下河南，在开封市一个同乡办的书店里当伙计。

“开封古城，十朝都会”，这里有名杨四海的宋代铁塔、龙亭、相国寺、禹王台等古迹和盛名天下的汴京书画，可惜他来不及一饱眼福，便又要卷起行李开路了。原来，书店所在的新市区，是近几十年来大量农民破产后流入形成的，建筑

密集，交通混乱，住宅商店混杂，街道布局毫无规则。就在赵树理来后半年左右，不知是哪一位青天大老爷忽然顾及，马上以雷厉风行的措施，下令展宽街道，那书店恰好就成了牺牲品。就这样，赵树理赖以为生的职业被第五次漫不经心地夺走了。

这突然的打击使赵树理惊呆了，一种极度失望的痛苦攫住了他。他觉得生活对他实在太不公平了。他不远千里来求一个混饭的职业，可得到的却是沦落他乡的苦闷和衣食无着的困境。偌大世界，竟容不下一个小小的人物。他走到哪里，压迫就追逐到哪里，几乎没有片刻的安宁。坎坷多蹇的命运残酷地刺激着赵树理的神经，使这个天性乐观、随遇而安的人，也跟鲁迅的表兄弟阮久孙一样，不幸患上了“迫害狂”，神经过敏、多疑多虑。

他在开封孑然一身，举目无亲，手头仅有四块银元，不能作久留之计，倘回沁水，前景显然是暗谈渺茫，所以他决定投奔正在太原上大学的老同学史纪言和王中青。

他出不起路费，就打扮成江湖上算命先生的模样向太原流浪。一路上给人占卜、看病，写中堂，混点钱勉强维生。他觉得，往日雄伟壮阔的太行群峰，此刻就象大海里层层叠叠的巨浪，吼叫着压过来，劈头盖脸，势不可挡，令人感到一种喘不过气来的窒息。

有一天，他经过一座大桥时，发生了这样一件怪事：“警察拦住他搜查行李卷，那里面包了一条毛巾，一只脸盆，一块肥皂和四块银元。通过了搜查之后，他继续赶路，在一个村店里停脚过夜。他躺下睡觉的时候，听见窗外有四个人在

说只有会门中才用的黑话。这引起了他的好奇心，仔细一听，大吃一惊，只听一个人说，从开封来了个汉子，身上有四块大洋。他断定这帮人是土匪，一定是从警察那里得了他的情报。他怕被绑票，于是在床上躺了三天，抽着劣等的大烟，想显出穷酸的样子，免得土匪注意。”①

可是当他动身时，却恍惚觉得并没有甩掉那四个可疑的人。他们始终不即不离地尾随着他，直到他走进了山西教育学院的大门，这四个人好象还在大门外徘徊……

土匪盯梢的意念，紧紧地纠缠着患有“迫害狂”的赵树理。他两眼通红，神情异乎寻常，一见到史纪言和王中青，就反常地高喊道：“老赵投奔你们来啦！”

晚间，阔别数年的老同学聚集一堂，畅谈别后的情况。然而，当赵树理刚要诉说路途上的遭遇时，他突然发觉有人在隔壁猛烈地敲墙，好象是警告他不准多嘴，顿时，他面色如土，噤若寒蝉，闹得别人面面相嘘，莫明其妙，因为谁也没有听到什么敲墙声。

尔后，他感到只要一开始想说，墙上就会响起严厉的敲击声。他断定，准是那帮土匪跟踪进来，潜伏在隔壁，伺机要他的性命。

这种想法日日夜夜折磨着他，使他食不甘味、寝不安席，本来就很脆弱的神经终于紧张得超过了限度。一天凌晨，赵树理悄悄地离开了宿舍，一个人在街上乱走，不觉来到了一片积水的“海子边”（即文瀛湖、现为儿童公园）。这时，东

① 杰克·贝尔登：《中国震撼世界》第112页。

方欲晓，黑沉沉的水面上反射出淡淡的微光，好象是一片平坦的大道。神经错乱的赵树理便径直走了过去。……

早上，起床不久的史纪言和王中青突然接到警察局的电话，才知道赵树理投水遇救。他们急忙赶去，把他领回学校照料。不知是温暖的友情抚慰了他的悲伤的心灵，还是那冰凉的湖水把错乱的神经刺激得正常了，赵树理的身心逐渐地恢复了健康。

这一时期，中国文坛上正在对文艺大众化问题进行第三次大规模的讨论。

早在一九三〇年，由于中国共产党点燃的革命之火，正以燎原之势在广大农村蔓延，文艺大众化的问题就受到了革命作家越来越密切的关注。然而实际情况却令人失望。革命文学始终跑不进革命的主力工农大众堆里去，几乎一本也没人买。畅销的倒是封建迷信、荒唐反动的通俗文艺。于是鲁迅首先号召道："应该多有为大众设想的作家，竭力来作浅显易解的作品，使大家能懂、爱看，以挤掉一些陈腐的劳什子。"① 但遗憾的是，绝大多数左翼作家把"大众化"误解成了"化大众"。结果，第一次讨论仅仅使左翼作家们对文艺大众化的必要性有所明确而已。

"九一八"事变后，大敌当前，第二次讨论应运而起，领头人是我党一位卓越的政治活动家，当时正受王明等人的打击，被解除了一切领导职务，乃转而从事革命文化活动。他

① 鲁迅《文艺的大众化》

就是被鲁迅引为“知己”“同怀”的瞿秋白。

这次讨论的中心议题，已由上次的该不该写大众文艺深化到怎样去写的形式问题。瞿秋白指出：“我们应当做到两点：第一，是依照着旧式体裁而加以改革；第二，运用旧式体裁的各种成分，而创造出新的形式。关于第一点，一切故事、小说、小唱、说书、剧本、连环图画，都可以逐渐地加进新式的描写叙述方法。关于第二点，举几个例来讲：可以创造新的短篇说书话本，不必要开头是‘却说’，末了是‘且听下回分解’，而是通俗的短篇小说；可以输入欧美的歌曲谱子，要接近于中国群众的音乐习惯的，而填进真正俗话的诗歌；又可以创造一种新的俗话诗，不一定要谱才可以唱，而是可以朗诵、可以宣读的，在声调节奏韵脚里面能够很动人很有趣的；可以模仿文明戏而加入群众自己的参加演戏、可以创造新式的通俗歌剧，譬如说用‘五更调’‘无锡景春调’等等凑合的歌剧，穿插着说白，配合上各种乐器。”①

瞿秋白多才多艺，说到做到。他冒着生命危险，化了装到上海城隍庙等地去听艺人们说书，演唱，学习群众语言，深入了解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并且亲自动手，尝试着创作富于宣传鼓动内容的通俗诗歌和革命小调。但在白色恐怖浓雾密布的十里洋场，要左翼作家们普遍地这样做起来，显然比在马路上来一次飞行集会远为困难。

受历史条件的限制，第二次讨论的结果，对于怎样去做也不能不停留在口头上。

① 瞿秋白《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

一九三四年二月，从来不知道德为何物的蒋介石，忽然要立地成佛了。他提倡尊孔读经，强迫人们把封建的“四维”(礼义廉耻)“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 作为生活准则。五月，有国民党教育部汪懋祖者，迎合这“新生活运动”的需要，撰文鼓吹复兴文言。这股“沉滓的泛起”，使报刊上展开了又一场‘文白之争’,也导致了文艺大众化的第三次讨论。左翼文化界由此而觉悟到提倡大众语的必要。“从前为了要补救文言的许多缺陷，不能不提倡白话，现在为了要纠正白话文学的许多缺点，不能不提倡大众语。”① 后来还发展成要求文字改革的拉丁化运动。

前两次讨论时，赵树理虽然怀有浓厚的兴趣，却苦于饥饿的威胁，正为温饱而奋斗，无暇也无力参与。② 这次讨论，他恰巧既有时间又有独特的见解。他“赋闲”在朋友处，肚子里又装满了从农村底层带来的想法。更有利的是，他的那几位老同学正负责编辑《山西党讯》的副刊《最后一页》，为他提供了发表文章的园地。

《山西党讯》是国民党山西通讯处的机关报，大约创办于一九三三年初。两年前，国民党山西省党部悍然镇压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毒打爱国学生，枪杀烈士穆光政，制造了轰

① 陈子展：《文言—— 白话—— 大众语》

② 从赵树理的《欧化与大众语》一文中可以看出，他一直关心着文艺大众化的讨论。他写道“：这问题在中国文坛上提出来讨论，本非始于今日，远在一九三〇年，就很热烈地讨论过，接连着直到现在，可以说无不在被人注意，被人研究，然而在这很长的时间，仍没有得出一个相当的结论。”文章还化用了鲁迅和瞿秋白的观点，说明他早就很熟悉他们的理论。

动全省的“一二·一八惨案”。惨案发生后的第二天，太原市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学生罢课，愤怒声讨国民党的血腥罪行。当时还在台下的阎锡山，便利用这个形势，借学生运动的力量，查封了省党部及其机关报《国民日报》，排除了蒋介石在山西的势力（山西的国民党各级党部随后也全部关闭，停止活动）。他上台后，又玩弄花招，虚设了一个“山西党员通讯处”来应付蒋介石，又办了这份《山西党讯》，以表示山西的国民党还在活动。史纪言、王中青、杨蕉圃等进步学生便掌握了这份名实不符的报纸的副刊。一九三三年六月，鲁迅在写给太原榴花社的信中说：“新文艺之在太原，还在开拓时代，作品似以浅显为宜，也不要激烈，这是必须察看环境和时候的。别处不明情况，或者要评为灰色也难说，但可以置之不理，万勿贪一种虚名，而反致不能出版。战斗当首先守住营垒，若专一冲锋，而反遭覆灭，乃无谋之勇，非真勇也。”史纪言他们虽非榴花社成员，在编辑过程中倒是切实地执行着鲁迅的指示，使《最后一页》成了一个比较牢固的营垒。

一九三四年八月，赵树理用“何化鲁”的笔名，在《山西党讯》上连续发表了五篇有关文艺大众化的文章，其中一篇题为《欧化与大众语》的文章最值得重视。

当时，“有些论者简直是狗才，借大众语以打击白话的，因为他们知道大众语的起来还不在目前，所以要趁机会先将为害显然的白话打倒。”[①]八月十四日的《申报·自由谈》上有一篇龙贡公写的《文学用语欧化有必要》，便是一笔抹煞白话

① 《鲁迅全集》第12卷第496页

的作用，断定："中国目前的文学作品，大多数是一种含混模糊的概念底游戏，很少能具体化地描写出一把椅子，精微地刻划出一个动作，几乎完全没有用语言创造形象的能力"。于是就指着这白话责问道："中国能希望有伟大的作品产生吗？"

赵树理针对龙贡公的"故意胡闹"，在《欧化与大众语》一文中写道："描写的手法好不好，并不在欧化不欧化，只在文字的运用如何而定；如果你没有表达的能力和技术，就是欧化也一样的不能描写到好处。如果自己有这种能力，能运用适当的文字，写出适当的情景，就是不欧化也同样能写得绝妙。"他还指出，关键实在于作家生活的大众化。"只要你能实地参加在大众的生活里，体验了大众的心情和体态，用大众的语言，是可以产生大众的作品的。……假若只住在租界的三层楼上，而主张大众语的文学，无论赞成或反对，都是幻想，都是欺骗"。他同时又指出，讨论文艺大众化的首要问题在于出发点。"须知道这问题的提出是为大众，不但是想让文学渐渐地接近大众，有欣赏能力，并且有创造的可能和机会，使文学变成社会的东西，变成为大众，由大众的东西。如果仍然固执着对文人学士说话的态度，我敢武断地说，无论讨论到什么时候，也不能把握准问题的重心，得出个确当的结论。"他说："中国文化在过去数千年所以成为独占的，非社会的，便是这方块字被特殊阶级独占了"，"现在既然要建立大众文学，首先就得创造大众语文，那么中国文的拉丁化，实是必要的"。

赵树理的这些观点，即使在左翼文坛中无疑也不失为精辟的见解。这篇文章刚刚发表，赵树理就欣喜地看到了华圉

(鲁迅) 写的《门外文谈》。[①] 这是一部简明通俗的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起源史和发展史,也是这次讨论中一篇结论性文献。他主张:"倘要中国文化一同向上,就必须提倡大众语,大众文,而且书法更必须拉丁化。"鲁迅写道:

> 由历史所指示,凡有改革,最初,总是觉悟的知识者的任务。但这些知识者,却必须有研究,能思索,有决断,而且有毅力。他也用权,却不是骗人,他利导,却并非迎合。他不看轻自己,以为是大家的戏子,也不看轻别人,当作自己的喽罗。他只是大众中的一个人,我想,这才可以做大众的事业。

这段结论高瞻远瞩,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肯定了知识分子在社会性的文学革命中的先导作用及其自我改造的必要性,赵树理读后,胸中豁然开朗,终于认清了自己所应当奋斗的具体目标及其途径。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赵树理立下宏誓大愿,要为百分之九十的群众而写作,做一名大众文艺的改革者。他郑重宣布:"我不想上文坛,不想做文坛文学家。我只想上'文摊',写些小本子夹在卖小唱本的摊子里去赶庙会,三两个铜板可以买一本,这样一步一步地去夺取那些封建小唱本的阵地,做这样一个文摊文学家,就是我的志愿。"

---

① 《欧化与大众语》是为了驳斥龙贡公的文章而写的,这说明赵树理是《申报·自由谈》的热心读者。它发表在1934年8月22——24日的《山西党讯》上,而《门外文谈》恰好自8月24日开始在《自由谈》上连载,因此可以断定,赵树理必然研究过《门外文谈》必然深受它的影响。

怀着这样的宏愿，赵树理动笔续写《盘龙峪》。这是一部未完成的长篇小说，约有十万字，大都散佚无存，目前只见到发表在《中国文化建设协会山西分会月刊》上的第一章。据说，《盘龙峪》是描写农民和封建势力作斗争的故事。但第一章的内容尚未触及主题，似乎是这部长篇小说的“引子”，它所表现的生活并无惊人之处，仅使我们看到了少年赵树理与“小字辈”们在八音会里纵情打闹，随意漫谈的情景。然而，表现这个内容的形式，却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它犹如全豹之一斑，显示了赵树理独特的艺术风格的雏形。比如，小说的开头写道：

> “没有进过山的人，不知道山里的风俗。盘龙峪这个地方，真算是个好地方了：合四十多个庄落算一里，名叫盘龙里，民国以来，改为一个联合村。北岩是这一里中的最大村—— 虽不过有三百余户人家，但在这山中就不可多得了。
>
> “西坪上离北岩最近—— 说五里，其实只三里多路。西坪上的人家也不少，但比起北岩来要差一半还多；村子里没有卖东西的，想买什么还得上北岩。
>
> “这一天是阴历八月十五，西坪上有个名叫兴旺的，提了个酒葫芦上北岩来。……”

即便光看这么一段，也足以令人耳目一新了。赵树理曾“着实学过欧化句法”，现在他毅然决然地一刀斩断，干净利索，不带丝毫的学生腔。

接着，小说通过兴旺与有发的对话，把十二个结拜兄弟的身世一一作了介绍。遂使小说一开始就把故事发生的地点、

时间和有关人物的情况交代得清清楚楚。叙述的角度也由惯用的第一人称改为全知全能的说书人口吻，娓娓道来，连绵不断。同时，赵树理的起外号和保留关节的特色也可以在这里见到端倪。那个人称“木头刀”的高利贷者，无疑正是这十二个农民兄弟将来斗争的主要目标，在这里埋下了伏笔。《盘龙峪》意味着赵树理终于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然而，“改革向来没有一帆风顺的，冷笑家的赞成是在见了成效之后”。因此在那尚属拓荒阶段的太原文艺界，赵树理深为知音难觅而苦恼。除了患难朋友和当时也住在教育学院的共产党员李延年等人在道义上的支持，传进他耳朵的几乎没有一句赞语。可怕的舆论，使这个年轻人产生了那种文学新人往往难以避免的内在的犹豫。他对自己的才能，自己全力以赴的作品感到困惑——深怕自己不是这份天才，此路也许不通。他还伤心地发现，既找不到愿意承接此书的出版商，也拿不出价格昂贵的出版押金。于是他心灰意懒，只写了一半就搁笔了。

孤军奋斗向来胜少败多，更何况赵树理脱离了实际的革命斗争，把文学大众化看作是自己个人的事业。《盘龙峪》的流产，不能不使他又一次产生了苦闷彷徨的精神危机。一九三五年春，他写下了一首题为《耳畔》的短诗，慨叹自己壮志难酬的情怀：

你自以为你有大志，
你的大志只能“抱”，
抱到东又抱到西，

抱得来又抱得去，
是不是要一直抱到死为止？

你会锄地挑粪，
你以为足以自豪，
须知锄地挑粪的角色，
比你高明不少！
他们问你找办法，
而你的办法是和他们同锄同挑。
……

第五章 转 折

“九一八事变”震惊中外，却对蒋介石的反共政策毫无影响，他将民族利益轻蔑地置之度外，一心只想夷平井岗山。五次“围剿”的规模越来越大，手段也越来越辣。遂使日寇鲸吞中国的野心也越来越大，步子越来越快。侵略的战火迅速地由东北向华北延烧，偌大的华北竟连一张平静的书桌也安放不下了。但南京政府的官员们仍然恪守“攘外必先安内”的委员长训令，绝望地同抗日救亡的志士进行搏斗。结果，红军北上抗日，“一二·九”运动爆发，举国上下万众一心地呼喊：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新的长城，
……

一九三六年春，延安发出《东征宣言》，宣布红军将取道山西，东出河北与日本侵略军直接作战。然而，昧于大义的阎锡山却把共产党抗日的一片诚意看作是端他老窝的阴谋，一面利用黄河天险，妄想阻挡红军东渡，一面在全省展开杀人竞赛，“多杀者有奖，少杀者必罚；并令各县逐日向他报告、评定优劣；还通令各县捕杀共产党或红军侦探一人者，赏银

洋一百元，侦察不力者撤职查办。于是各县为了邀功领赏，纷纷捕杀来往行人及外籍商贩。”[①]报纸上随处可见如下一类大同小异的新闻：

> 昨日下午，有一小贩、行经南门大街、形色张皇，经巡行之警士检查，于帽沿内得铜元一小枚、查系匪探标记，乃送军法会审处严惩云。

为了便于识别，阎锡山还煞费苦心地把太原市民象鉴别货物似的分门别类，发给形状不同的“好人证”，人手一个，佩在胸前，不得须臾离开，否则，便会随时遇到一枝对准脑袋的枪杆子。[②]

在教育学院“赋闲”的赵树理，无职无业，仅有两位乡友担保，自然被列入最末一等，只配别三角形的“好人证”，这种身份，在当局眼里无异于危险分子，所以他不敢轻举妄动，成天百无聊赖地蜗居在寝室里。有人替赵树理写出了当时的心情：

> 春被关在城外了。

---

① 《阎锡山统治山西史实》第193页

② “好人证”用布质制成、盖有省政府的公章，机关干部由主官负责担保，发给正方形证：市民和学生、能找到两家殷实铺保的发给圆形证，一家铺保的发给椭圆形证，两个人保的发给三角形证，均佩带于左面胸侧。街上行人未带者即被扣审讯，沿街军警林立，戒备森严，熟人相遇，不敢顾视，偶有所语，便被岗难。（《阎锡山统治山西史实》）

只有时候，从野外吹来的风，使你嗅到一点春的气息，很细微，很新鲜，很温暖，并且很有生气。在这种感觉中，你可以想到，河许已解冰了，草已发芽了，桃花也在吐蕊了吧！

但我却出不了城。

一整天，我所看见的，是灰色的墙，灰色的土，和穿着灰色衣裳在街头守望的兵。

我气闷而且窒息，连行动也被强度的限制着了。出城，要通行证；到街上去，要好人证，并且七点钟已经开始戒严了。为了免掉那些灰色同志对你取攻击式，端起枪来，并且对准你的脑袋，我只好一个人关在屋子里。

但在这座白色恐怖的“死城”中，纵然是如此小心，也难免得咎。三月初，赵树理被捕入狱了。

事情起因于教育学院的邻居山西国民师范，它当时是太原学生运动的中心，因而反动当局极为注意。二月下旬，有两个便衣特务潜入国师，刺探学生的爱国救亡活动。谁知偷鸡不着蚀把米，反被学生发现，吊在蓝球架上挨了一顿痛打，最后抱头鼠窜而去。因为这件大快人心的事发生在土皇帝的眼皮底下，阎锡山肝火大动，决意进行残酷的报复，三月初的一个清晨，大批军警突然包围了国民师范，不分青红皂白，大肆搜查捕人。教育学院的宿舍和国民师范的宿舍仅有一墙之隔，于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住在那里的赵树理也被稀里糊涂地抓了进去。

被捕的一百多名学生，全被关进山西警备司令部的监狱，一间牢房挤三十多人，里面一无所有，只能席地而坐，外面是凶神恶煞般的宪兵，来回巡视，不准他们随便动弹，连照

例的放风也取消了。当天晚上，就有人受到严刑拷打，还上了脚镣手铐，然而，志士们喜笑自若，不以为苦，这种不屈不挠，藐视敌人的大无畏精神、强烈地打动了赵树理，虽然处境险恶，长期郁结在心头的彷徨情绪却反而烟消云散了。

次日，赵树理被带去过堂。他经过拐弯抹角的黑暗通道，走进摆满刑具的审讯室，这种阴森恐怖的环境，对他来说并不陌生、也知道怎样应付，况且他确非国民师范的学生，所以很快就过了关，由王中青具保、获释出狱。

出狱后、赵树理对太原失去了所有好感，决计回乡了。

他在狱中目击比他年轻的学生们慷慨激昂，视死如归的爱国热情，自愧弗如，良心受到深深的自责。他记得，当“九一八”事变爆发时，自己正在太原绥靖公署里捧着六元一月的饭碗，谨小慎微，埋首文牍，当冀，察二省变为“满洲国”第二时，自己又在一部流产电影中混饭吃，扮演冬烘先生的小角色。眼看着祖国的大好江山，整块整块地在日本鬼子们的铁蹄下呻吟，喘息、颤抖、挣扎、愤怒，森林房舍被焚毁，牛羊鸡犬被杀光，没有成年的姑娘，被鬼子蹂躏。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可自己却苟延残喘般地活着。几乎丧失了起码的爱国心。他发觉，在这死气沉沉的太原，他的热血在慢慢地冻结，斗志在暗暗地消蚀，滞留下去有害无益，不如换个环境也许会重新振作起来。

但是，当赵树理终于离城而去时，山西的局势却发生了戏剧性的转折、太原变成了全国的热血青年神往的地方。

二月二十日，由毛泽东亲任政委的抗日先锋队，强行东渡、一举突破黄河天险，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

雄师进逼太原市，
军阀阎贼胆颤悸。
晋南晋北齐告捷，
气壮山河大军行。
红旗飘扬同蒲路，
箪食壶浆夹道行。
青年踊跃争入伍，
抗日军民结长城。①

接着，阎锡山也突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变反共为联共，联络进步青年，容纳爱国力量，邀请薄一波回山西“共策保晋大业”，并且通电全国，率先提出“守土抗战”的口号，当然这是土皇帝仔细权衡切身利害的结果，因为他同时面临着三个无力对付的大敌：共产党、蒋介石、日本人。他必须“在三个鸡蛋上跳舞，踩破哪一个都不行”。而且至少要与一方联盟，否则就难免灭顶之灾。三者相比，无疑是联系共产党最为有利，所以遂有上述转变。但在客观上，这个转变使山西顿时成为全国的抗日前哨、爱国军民追求的先进地区。

九月十八日，“牺牲救国同盟会”在太原成立，提出“不分党派，不分男女，不分职业，只要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一齐动员起来、积极参加一切救亡运动”的总纲领。十月，共

① 肖华：《黄河颂歌》

产党人薄一波和杨献珍、韩钧、董天知、周仲英等同志受命来晋，从事统战。他们掌握了牺盟会的实权，使之成为党领导下的抗日群众组织。

薄一波，山西定襄人，是那种所谓西洋美的英俊青年。面孔白皙、鼻梁高挺，络腮胡子。他蹲了六年监狱，却依然朝气蓬勃，精明强干，说起话来口若悬河，号称“铁嘴”，可以连续不停地讲上大半天，听众还觉得津津有味，乃是山西统战工作的支柱。他一到山西、即向阎锡山提出三个条件：一，宣传共产党抗日救亡主张，不应受到限制；二，对抗日救亡有利的事都做，不利的事不做；三，在用人方面应给予方便，并保障人身安全。随后，他主持牺盟会的实际工作，举办各类军政训练班，培养了近万名中级和基层的干部，会员也在数月内发展到八十九万，组成了真正动员山西群众参加抗日的团体。

与此同时，晋绥军中有血气的爱国将士，对抗日的要求也越来越迫切。十一月二十四日，傅作义的部队毅然发动“绥东战役”，杀死杀伤敌人近千名、俘虏四百余人，收复了军事要地百灵宙。

这一小小的胜利和牺盟会的实绩，在全国激起了巨大的反响，无数的进步青年，高呼着“到太原去！”的口号，风聚云涌般地奔向山西。

曾怀着磅礴的民族气节山西著名爱国志士续范亭在中山陵上剖腹自杀，以激发全国人民反蒋抗日，这时也不顾阎锡山对他的刻骨仇恨，回到太原来推动抗日救亡运动。他说：“山西以一隅之地，进行了守土抗战，收罗了进步青年，成立

牺牲救国同盟会，表现了思想自由，允许开设《生活书店》，我看见山西有了光明，虽然仅仅点出了一支蜡烛来，光明不大，但我却和许多爱国青年一样，象扑灯蛾似的，围着这一点儿光明，不肯他去了。”[①] 太原城里热火朝天，到处可以听到一曲悲壮而激昂的歌声：

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
鲜花掩盖着志士的鲜血！
为了挽救这垂危的民族，
我们曾顽强的抗战不歇！
……

赵树理想不到政治风云会变幻到这般地步，爱国激情煎熬着他，使他坐立不安，跃跃欲动。这时，史纪言和王中青已从教育学院毕业，回到长治，接办上党简易乡村师范，特邀赵树理去协助工作。他欣然从命，立即动身，打算投入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运动。

上党乡师是由上党地区十九县的乡绅集资兴办的，顾名思义，大概是想实践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救国论”，但是校务一经史、王二人主持，“乡师”的指导思想便改为“抗日救国论”了，它很快就成为长治牺盟会的一支生力军和进步学生活动的重要场所。后来，八路军工作团来到长治时，教导主

① 续范亭《寄山西土皇帝阎锡山的一封五千言书》，载一九四四年八月二十四日《解放日报》。

任王中青率领一大批学生参加了抗日游击队。

在这里，赵树理重新拿起荒疏有年的笔，写下了一篇对话体小说《打倒汉奸》，奉献给不平常的一九三七年。它刊登在高沐鸿主编的《太原日报》副刊上。高沐鸿，山西文艺界前辈人物，曾是狂飙社成员，高长虹的至交，以诗歌著称，一九二六年冬，他受党的指派，回山西领导文艺工作，在《太原日报》上辟《开展》专刊，组织抗日文艺。他颇具慧眼，立刻采用了署名“常哉”的《打倒汉奸》（小说写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连载于一九三七年一月十四日、二十一日。）

小说的内容显然是从构思于学生时代的《双生子》脱胎而来的，不过赋予了时代的新意。它描写从一个村子里出去的两个大学生——黑蛋与保官。前者安于清贫，国而忘家，一心在省城忙于抗日救亡；后者则是个唯利是图的卖国贼。他把乡亲们骗到天津，卖给日本鬼子修机场，而不明内情的群众还分外羡慕他财大路粗，争相请他介绍职业，直到黑蛋回来，揭穿了他的真面目，蒙在鼓里的群众才恍然大悟，愤怒地处决了这个罪恶的汉奸。

《打倒汉奸》的特色是密切配合形势和通过对比来揭示主题。

以此为开端，这个特色几乎贯穿于赵树理的全部小说创作。

此外，这篇小说还有另一个独特之处；通篇以对话为主，中间偶尔夹进作者的叙述，但无论对话还是叙述，都合辙押韵，读来朗朗上口，悦耳动听，适合于演出。因此，赵树理在标题下面特意注明：“相声底本也能演成独幕剧。”据他回

忆，当时确实作为小剧“在农村演过一个时期。后来抗战开始，那地方成了抗日根据地，除奸成了合法的了，这戏就失去现实意义，我连稿也没有存。”一九四四年，在华北根据地太行山区的群英会上，阳南剧团重演了这个小剧，还赢得了行家们的一致掌声。“不只本县人说好，就连这次大会的多数戏剧工作者，都很注意，认为这是新东西。”[①]另一位同志在总结时又特地指出：“这次大会，出来两种新东西，一种是分区的《全家福》，一种是阳南剧团的‘押韵话剧’，很好听。我们农村的文艺工作者，我们编戏的老把式，应该顺着这条路子，大胆创新，用心研究”。一九五〇年，赵树理又在别人的鼓动下，把它一口气背出来重新发表了。

毫无疑问，小说中的黑蛋一家，正是赵家当时的缩影。从那些精彩的对话中，我们依稀可见赵树理由太原回来时跟和清老汉争执的场面，以及他的母亲与妻子的心情：

（黑蛋父亲骂儿子）“人家遭了大难，难道你是做了大官？”

“你就认得做官！”

“好，好，你去讨饭！”

“还说讨饭，你忘记了逼得人家媳妇差点寻了短见？”老婆对老汉仍有点不满。

“寻什么短见？”黑蛋看了媳妇一眼。

“亏你还有脸问俺！你在外边住得那么安然，别人的死活你哪里还管？”

“谁能不上外边？难道要我一天看你几眼？”

① 《阳南剧团的来历》载《工农兵》第一卷第4期

“谁要你看?人家的男人都会弄钱,你偏不给人争脸,让人家一个‘下贱’,两个‘讨饭’,天天对着人揭短!”

“那算什么短?谁愿意讨饭?真讨了饭,又有什么下贱?如果外国人把咱这地方一占,我看谁也得讨饭!”

“自己不会弄钱,还要扯那么远!”老汉眨了眨眼,“你看人家保官,一年几万,成天穿绸摆缎,谁象你大冬天穿一件破袍,一件烂衫,看看多么体面?”

“象他那事我任凭死了也不干!”

“我说你只能讨饭,你媳妇还说我是揭短!人家当了委员,你却只能闲住在会馆!”

“什么委员?也不过当个汉奸,仗着鬼子们的气焰招摇撞骗!我虽然忍点饥寒,总不至于有他那么凶残、下贱!”

“什么汉奸不汉奸,能弄来白花花的银元就算!”

“我不能出卖同伴,卖着乡亲去干!”

看了这些对话,真好象目睹了说话的一家人,虽然不免也有做作之感。若和《盘龙峪》相比,赵树理驾驭人物个性和语言的能力,显然不可同日而话了。

小说的结尾,跟《打卦歌》一样,也有一段附言:“为了使更多的读者直接接受内容起见,故不负丝毫‘文字’教育之责。本此,不分‘的’、‘底’、‘地’。不以拉丁化代写不来的字。不用一个‘新’词及‘雅’词。不去掉也不纠正‘不关重要的旧意识,——如‘王法’之类。这表明,赵树理向着“文艺大众化”的目标又迈出了坚实的一大步,正在努力创造老百姓爱听易懂的文学语言。

正月十五,是传统的元宵佳节,也是晋东南劳动人民一

年中最感兴趣的节日。在农村，人们兴致勃勃地表演民间艺术：踩高跷、跑旱船、推花车、玩竹马、顶杠桩、耍龙舞狮，有的还扮演各种历史故事：“赶船杀舟”、“过江杀督”、“刘备招亲”、“张飞卖肉”……在城市，各商号张灯结彩，街道上和住家门前也悬挂起各式各样的灯笼，竞彩斗妍，与日争辉。

这天，尽管到处流传着日本鬼子烧杀淫掠的骇人消息，成千上万的乡下人还是涌进长治古城来欣赏一年一度的灯会。长治有三宽：马路宽、厕所宽、女人的裤脚宽。可是今天的马路却变得狭窄了。两旁卖吃食的小摊，摆成两条长长的闹市，油炸馃子在锅里嗞嗞地翻滚着，著名的长治三宝“潞酒、驴肉、小火烧”正发出诱人的香味，还有挑担子的小贩们叫卖着从外地运来的日本货、煤油、火柴、洋烛、电池……

正当街心逐渐充塞了拥挤混乱的人群时，忽然从北门外传来一阵喧天的锣鼓声。接着，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喊着口号走过北街。这是上党乡师的抗日宣传队，顿时吸引了许多闲逛好事的人们，他们争先恐后地尾随着，象一股巨大的潮流涌向城中心的火神庙，转眼间就形成了一个密密层层的大圈子。

锣鼓方定，只见一个瘦高个的卖艺老汉，用沙哑的嗓子大声说道：“现在咱们大中华民国给东洋小子欺侮得可怜，老百姓又被逼得连一句气话都不敢讲，咱们虽是走江湖的，可总也有一点儿爱国的心眼儿，除非他奶奶的小舅子昧了天良去当汉奸。所以我就把亲眼看见的事情编支小调来唱，叫做“九一八”小调，听得懂，容易学，希望老爷先生小哥儿小娘儿们，把这些小调儿放在嘴边上，没事就拿出来唱唱，也算

咱们把东洋鬼子欺侮我们的种种事记在心头上的。”说罢，他拉起胡琴，站在旁边的一个女孩子便随着悠扬的琴声唱起来了：

高粱叶子青又青，
九月十八来了东洋兵，
先占火药库，
后占北大营，
杀人放火真是凶，
杀人放火真是凶，
中国军队有好几十万，
恭恭敬敬让出了沈阳城！

广场上一片寂静，只有那时而凄婉时而高昂的歌声在周围清冷的空气中回荡，撞击着人民火热的胸膛，他们情不自禁地发出轻轻的唏嘘声。……

扮演这个卖艺老汉的，就是赵树理。他本来最爱在正月里闹红火，今年却因国难当头，过罢春节便带着儿子太湖回到学校，组织学生排演了这个广场剧《放下你的鞭子》。同时演出的还有他自编自导的独幕话剧《打倒汉奸》和《打灶王爷》。

然而，战争的局势却日益恶化。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芦沟桥日军夜半演习，借故进攻中国驻军。中国的二十九军忍无可忍，奋起反抗。激战的枪声划破夜空，宣告中华民族开始了全面的浴血抗战。

中共中央通电全国：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

红军将领致电南京，请求改编，在统一指挥下，为抗日先锋！

报纸！号外！大个的字！红色的字！刺人心目。消息一天比一天紧张：

“关东军十列车源源入关！”

“天津被炸，车站已被日寇占领！”

“日军炮轰南苑，北平四门告急！”

“天津失陷！二十万日军直逼太原！”

“……”

大敌当前，乡师停办。赵树理热血沸腾，决意献身抗战。他立刻参加牺盟会上党中心区的宣传队。不久，又调任阳城县第四区的牺盟会特派员。十月，由阳城县牺盟会特派员要崇德和训练自卫队的八路军团长桂承志介绍，在国难当头的严重时刻重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这时，赵树理已过“而立之年”，他比十年前第一次入党时深沉多了，成熟多了。往事历历在目，他的心潮急剧起伏，感到既难过又欣慰。难过的是在那流逝的岁月中，自己未能为党多做工作，但这十年也并不虚度，严峻的生活教育了他，使他从心底里认识到唯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才能救自己。离开了党，他便一事无成，彷徨无主，他为自己重新回到党的怀抱而欣喜若狂。他万分珍惜这第二次获得的政治生命，决心在这场血与火的考验中，用加倍的努力来忠于国家，孝于民族，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

伟大的抗日战争，以无比强大的创造力，改变了赵树理的前途、命运，铸定了赵树理的政治生命、艺术道路。

山西的共产党和爱国力量所以能在短时期内蓬勃发展，似乎倒应归功于阎锡山的兵痞官僚。

晋绥旧军畏敌如虎，几十万大兵在敌寇的进攻之前一触即溃，尽管阎锡山三令五申守土抗战，甚至下狠心枪毙了他的军长李服膺，也挽回不了这既倒的狂澜。

十一月八日，太原失守，败退的军队更如雪山崩溃，不可收拾。数不清有多少番号的部队，枪上挑着包裹、小鸡、撵着驮有箱笼的牲口，边跑边叫："厉害啊！鬼子厉害！"一窝蜂地逃入上党一带的大山深处。他们还在一种绝望的情绪支配下，把人类意识中最野蛮最无耻的兽性尽量地发泄出来，肆无忌惮地吞噬着一切，破坏着一切，不自觉地为日寇灭亡中国创造有利条件。许多无辜的百姓，连鬼子的人影还没看到，就已经丧生在这些中国军人的枪口之下了。

溃军的"恐日病"也传染给了平时作威作福的地方官，简直成了他们的不治之症。阎锡山曾命令各县县长必须与县城共存亡。可是当敌军进逼山西时，雁门关外的众多县长中，只有一人遵令死守，接着，处于关内第一线的崞县县长，竟在日寇攻城最烈之际，弃城潜逃了。真是"尘海苍茫沉百感，金风萧瑟走千官。"

阎锡山无法可施，乃电讯关内各县长："愿当游击县长的留任，不愿者即另派人接替。"结果仅有三人愿意留任。于是牺盟会乘虚而入，利用阎锡山拼命保晋的心理，向他推荐了

大批积极抗日的进步人士，使爱国力量轻而易举地掌握了许多地方政权。全省七个行政区的领导，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就占了七分之五，一百零五个县中，有七十个县长是共产党员。

在这场大换班的动乱中，赵树理也平生第一次当了官，被任命为阳城县第八区区长。他走马上任，对八区人民发表了一篇坚定、现实的就职宣言：

“老乡们！同志们！现在敌人已经到我们这里来了，我们的县城和交通大道已经被敌人占领了，我们这里已经成了敌后抗战的形势了。敌人虽然占领了我们的城市和交通要道，可是广大的乡村还在我们手里。我们以后就要凭着这广大的乡村来和敌人长期斗争，熬着打，打着熬，最后把敌人熬得没了劲，才能收复失地。可惜旧日的行政人员不争气，平常时候跟老百姓呈威风倒可以，遇上这非常时期就没了本事了。前半个月，消息一吃紧，各路军队一往这里退，县长吓病了，各区区长、各村村长吓跑了，扔下各地的老百姓，任敌人欺侮，任溃兵糟蹋，没人管。打电话给阎司令长官，阎司令长官才从临汾退出来，连自己也顾不住，他手下的‘孝子’们都紧紧跟着他只怕掉了队，派谁谁也不敢来，后来才由咱们牺盟会推荐了个县长。这新县长上任才三天，敌人就打来了。县政府转移出来后，地方上毫无秩序，区村长没有一个，没有办法才由咱们县的特派员举荐了几个牺盟会的工作员当区长，咱这一区就派的是我。咱这一区也和别的区一样，受过训的‘孝子’村长们，跑得一个也没有了。我这次到各村来，先要作两件事：第一是补选抗日干部，第二是布置眼前工作。

……”

这是日本侵略者所谓九路围攻晋东南的时候。

一九三八年二月，敌军攻克太行要道东阳关，长驱直入，兵临长治城下。但长治是个具有抗击外族的光荣传统的城市。宋朝陆登守潞州，曾与来犯的金兀术大战，当金兵攻破城池时，这位将军拔剑自刎，尸立不倒，一直等到金兀术来拜了三拜。传说那府衙门前的石板底下还埋着陆登的盔甲哩！他的儿子就是《说岳传》里的英雄，双枪陆文龙。真是无独有偶，这时的长治守将也是一位自杀的民族英雄。四十七军的旅长李克源，带领一营战士，发誓与城偕亡。城里的老百姓深受感动，也不出去。后来，北城的门楼被大炮打穿了，就进行壮烈的巷战，兵士在被解决之前，把枪枝毁了，或投到井里。敌兵进来后，留在城里的老百姓被杀死了三千多，但长治人民没有一句怨言，却异口同声地称赞：“四川军打得好！”

由于太行山地势险要，高山连绵，西有吕梁山，北有五台山，南临滔滔黄河，东接冀鲁平原，是华北最重要的战略要地，所以毛主席高瞻远瞩，抗战一开始就选定它为下棋的“眼位”，派遣八路军一二九师来这里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

一九三八年三月十六日，在“天才战略家”刘伯承的指挥下，一二九师袭击黎城、设伏神头，杀敌一千五百余人。三十一日，又在响堂铺布下伏兵，烧毁敌人汽车一百八十辆。随后连克长治、沁县等十八座县城，彻底粉碎了九路围攻，将敌人赶出晋东南。

八路军抗战的神速胜利，使赵树理只当了四十天的区长，便又升任阳城县的公道团长。

公道团又称“好人团”，也是阎锡山独创的山西特产。这个土皇帝似乎很喜欢别出心裁，连反共也要自搞一套。他说：“共产党号称有主义、有组织，其目的在推翻现社会。他们的组织很严密，所以与官军对抗时十分顽强。我们要剿除共党，不能和剿除流寇一样。他有主义，我们也要有主义，我们的主义是‘公道主义’，他有组织，我们也要有组织，我们的组织是好人团体。”①

这种纯粹反共的团体，在抗日统一战线建立后，理应取缔，可是阎锡山又来了个别出心裁，非但不予解散，反而硬要牺盟会和公道团这两个主张与性质绝然不同的团体联合起来，称为“牺公总部会”，并且明文规定公道团长和牺盟会特派员分任县长的左右手。他的用意，阳城县的那个公道团长倒是心领神会的。他对部下指示说道：“阎司令长官说过：‘我只要孝子不要忠臣！’就是说谁能给阎司令长官办事，阎司令长官才用谁。对共产党自然也是这样，要能利用了共产党又不被共产党利用。既然容纳了共产党，又留着我们公道团，就是一方面利用他们办事，一方面叫我们来监视他们，看他们是不是真正为阎司令长官办事，见哪个共产党员作起事来仍然是为的共产党，并不是为阎司令长官，就可以撤他职。”

显而易见，这个团长既不“公道”也非“好人”，对阳城县的抗日工作危害不小。所以党组织设计逐走了他，调赵树

① 《阎锡山统治山西史实》第 200 页

理来接任公道团长。可惜他缺乏领导艺术，不善于耐心地、有节制地同顽固派作斗争。他是个嫉恶如仇的人，一向看不惯阎锡山的孝子贤孙，再加年轻气盛，心直口快，一发现问题就气得两眼冒火，恨不得立时解决，结果却往往事与愿违。象《李家庄的变迁》中关于小喜春喜的地产归属之类的纠纷，也许碰到过不止一次。他自知不是公道团长的料，在这里发挥不了自己的作用，但又不能不服从组织上的安排，因此内心十分烦恼。幸而上级又来调令，让他去长治担任第五专署民宣科科长。

一九三九年初，赵树理回到了阔别一年半的长治城。战争改变了长治的模样，周围二十四里的城垣已被完全拆除。一进城门，便是这样一张告示：

> 值此非常时期，凡我军政民等，均宜黎明早起，振刷精神，加强抗战力量。乃近有因天气严寒，日上山岗，尚拥衾而眠者，殊属非是。……兹将午炮改为每日早六时施放，作为醒炮……一律闻炮起床。

此时，朱德总司令也亲率八路军总部转战到了长治。他在这里挥笔写下了一首气壮山河的《太行春感》：

远望春光镇日阴，太行高耸气森森。
忠肝不洒中原泪，壮志坚持北伐心。
百战新师惊贼胆，三年苦斗献吾身。
从来燕赵多豪杰，驱逐倭儿共一樽。

到了民宣科，赵树理才算第一次找到了真正的用武之地。由于他对民间艺术具有特殊的爱好，又熟悉农民的口头语言，所以无论是写通俗的小传单，还是搞口头宣传，无不得心应手，效果良好。那些从城市来的青年同事望尘莫及，唯有钦佩的份儿。

有一次；别人画了一张猴子模样的汪精卫被日本人牵着走的漫画，赵树理便在上面题了一首小快板：

做了日本官，
好象猴爬杆，
一时不听话，
就要挨皮鞭，
再说不干吧，
人家用绳拴，
抗战胜利后，
怎么到人前？

这是他自鸣得意的杰作，“散到哪里，哪里的群众就念，有的人还把它从电线杆上揭下来，往口袋里装哩。”他后来说。

在此期间，赵树理还开始与上党梆子发生直接的密切关系。

上党梆子之类的地方戏剧，原先并没有被纳入民宣工作的范围，大都游离于救亡运动之外。因为在洋学生出身的文化干部眼里，它们跟莎士比亚、易卜生、曹禺的戏剧简直有天壤之别，况且格调低下，俗不可耐，岂能鼓舞抗战激情？然

而，敌人却“利用一切文艺的形式而灌注了无穷的毒素，借以麻醉欺骗我们的人民！”[①] 而我们的人民，对旧剧也真是爱得要命，哪怕在朝不保夕的战乱中，也愿意从腰包里掏出钱来接旧戏班子唱戏，或者扭秧歌、闹红火。当时的一位作家曾这样描写当地演戏的盛况：“半里外就听见锣鼓喧天的声音了。踏着那素朴雄壮的音乐，走近去，是拥挤的男女在看抬黄扛、踩高跷。男的白布巾裹头，女的红喷喷的面庞挑一握发髻。看来他们都是健壮的、快乐的。—— 你们可相信去年今天这里是战场？你们可相信，二百里外战争正打得激烈紧张？几个扮唱的小孩子，手里拿了彩纸扇，高跷上响蹦蹦地跳动着，都是一副聪明俊俏样子。左边是一座席扎的戏台，说的是有名的襄垣秧歌，但尚未开场。……庙里一台‘闹子’正在演唱，一个唱旦角的，仪态服装都古香古色。从拥挤的人群，袅绕的烟头，和毕毕剥剥的爆竹声里，断断续续荡漾过来了唱声：

三月里，桃杏花，满树照红；
刘关张，在桃园，结拜宾朋。
……
十月里，雪白花，飘来飘去；
孟姜女，携寒衣，哭断长城。

①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战协会晋东南分会成立宣言》，载 1939 年 12 月 7 日《新华日报》（华北版）。

“但嗓音悠扬处，举止婉转处，还是博得台下不少彩声。”①

毫无疑问，这是一场严重的剧运斗争。一九三九年一月，在晋东南戏剧界的一次集会上，朱总司令亲临会场，明确指出：戏剧是宣传民众最有力的武器，应针对敌人的欺骗宣传进行教育民众与动员民众的工作。应善于运用旧形式，特别是为大众所爱好的地方的形式，动员民众参加抗战。②所以，赵树理一上任就着手进行改组旧戏班子，团结民间艺人的工作。

民间艺人王聪文，太行山上第一个打破旧戏规律，用旧形式演新内容的戏剧改革者，这时正领着一个落子剧团在潞城的合室演出《八路军大战平型关》。固然，演出的方式令人失笑：在锣鼓声中，只见一员身穿绿靠，背插八面令旗的大将起霸登场，通名报姓道：

“俺，朱德总司令是也。”……

说得观众乐不可支，嘻嘻哈哈，指指点点，差点儿笑疼了肚子。但是人们万分喜爱。“在潞城合室跟两个旧戏班子唱了三天对台戏，”王聪文说，“看的人真多，把庙都挤破了。那两个戏台冷冷清清的没啦人瞧，这是新戏和旧戏的第一次交锋，我胜利了。”③

他们的演出引起了赵树理的注意，认为这是个新事物，预

① 吴伯箫：《潞安风物·神头岭》

② 《晋东南剧运走向统一》载 1939 年 1 月 11 日《新华日报》华北版

③ 《一等模范戏剧工作者王聪文》载《小西文艺史料》第一辑。

示着今后剧运的方向。他主动拜访王聪文，表示支持，并希望能携起手来，共同进行戏剧改革。

但是，随着旧戏班子的改造，又产生了剧作的恐慌。当时在晋东南负责宣传工作的李伯钊说："检查一下旧剧作的内容，就可以知道大多数剧作的内容都是差不多一样的性质，如象才子佳人后花园私订终身，然后经过照例的波折，才子点状元，佳人落难，忽而巧合团圆，或者是屈死鬼尸还魂，重新发迹；还有的便是城隍爷显灵，打救穷书生；暴发户作恶受神的谴责；世上恶霸游十殿，死后受苦刑等等。总之，凡事有定数，无所谓反抗和斗争，一切均是'天意'。所有这一类有毒素的旧剧本，同敌人新民会的宣传纲领没有什么大的差别，这样便严重的在敌后的戏剧工作面前提出利用旧形式、改造旧剧作的问题。……然而对旧剧作的改造上，研究旧形式的规律等等仍然缺乏领导人才，一般的都缺乏对旧剧作的了解和研究，自然对其发展规律也说不上了解，这种专门的学识，按现有我们主观的能力及注意都是落于客观要求之后的。"①

革命的需要就是赵树理的工作。他立即转向改编旧剧的研究，不久便拿出了两个紧密结合现实需要，激励人民抗日斗志的新编历史剧——《邺宫图》和《韩玉娘》。

山西是历史上民族斗争十分激烈的地方，"屡沦夷狄空形胜"，曾有许多少数民族统治的王朝建立在这里。南北朝的后赵天王石虎（季龙）便是上党武乡的羯族人，在位时穷奢极

① 李伯剑：《敌后文艺运动概况》，载《中国文化》第3卷第2期。

欲，“猎车千乘，养兽万里，夺人妻女，十万盈宫”。据《晋书》记载：“沙门吴进，言于季龙曰：胡运将衰、晋当复兴，宜苦役晋人，以压其气。季龙于是使尚书张群，发近郡男女十六万，车十万乘，运土筑华林苑及长墙于邺北，广长数十里，……以烛夜作，死者数万。”

这一史实构成了《邺宫图》的主要内容。剧中主角李宏悲愤地说：“自从晋朝群臣逃往江南避难，长江以北一概都成了胡人的天下，哪里还有一片净土？只恨胡人闹中原，黎民百姓受熬煎。”

但作者的用心并不完全在于借过去的历史来暴露现实的黑暗。在他的笔下，李宏是个敢于反抗异族压迫的农民起义英雄。他不甘忍受家破人亡的境遇，振臂高呼道：“各家兄弟，你我都中华百姓，落在胡人手里，人人受他欺压，愿报仇的，跟我李宏来！”于是，十万民工齐声响应，跟着他冲向皇宫。……

“丘貉古今同一概”，这个剧本获得了鼓舞观众奋起抗战的强烈的戏剧效果。

《韩玉娘》是描写南宋时一个被金兵掳去的女子，深明大义、忍辱负重，动员丈夫逃出虎口，投奔岳家军杀敌报国的故事，有人考证：《韩玉娘》是根据京剧《生死恨》改编的，而《生死恨》又是来自话本小说《白玉娘忍苦成夫》。三者的基本情节，都如上述，无甚出入，不过结尾却截然不同。

《白玉娘忍苦成夫》是个俗不可耐的大团圆的喜剧，意在表彰“义夫节妇”的封建伦常。《生死恨》则以悲剧结束：韩玉娘含恨去世，陈鹏举也万念俱灰、身入空门，从而点明题

目，宣扬一种无法排遣的生死之恨，而赵树理却反其意而用之，让韩玉娘临终时亲眼看到丈夫抗击金兵，不胜欣喜，并且嘱咐道："为妻死后，你要好好尽忠报国，杀退金兵，收复大好江江，也不枉为妻想你几年。"陈鹏举也化悲痛为力量，决心遵照玉娘遗言，继续杀敌报仇。这一改动，大大提高了人物的精神境界和爱国力量，变悲剧为正剧，化怨恨为壮烈，对于太行山上"母亲叫儿杀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的局面，无疑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是年春天，日寇卷土重来，对太行山发动了第二次"九路围攻"，妄图控制这雄峙华北的兵家必争之地。

七月，长治吃紧，五区专署决定撤离。赵树理这时兼任着烽火剧团的团长，便带领剧团到大山深处去巡回演出。

这次演出，使赵树理的爱戏之心愈益强烈，坚定。

烽火剧团每到一处，无不受到隆重的欢迎。晚上，当开戏前的锣鼓敲破安谧的太行夏夜，顺着静静的山坳传向远方，方圆十里八里的山民们，便会满村空巷，扶老携幼，循山间小径而来，随身带着战乱中难得的水果、麻糖，甚至揣了锦旗担着酒，准备送给素不相识的演员们。戏台前，老人妇女们搬来小杌子、树墩子、砖头、石块，黑压压坐下一片，青年人爬上了屋顶、墙头、草垛，小孩子则猴上了树叉，只见远近高低，人头挤挤，喜气洋洋。……

农民们如饥似渴，竭诚欢迎戏剧演出的态度，给赵树理留下了永难磨灭的印象，对于他此后极端重视戏剧，影响是非同小可的。过了四分之一世纪，他在一次和戏剧工作者的

讲话中还说："我们应该把自己的工作做好，不要辜负农民对我们的要求。有的村一年只能演一次戏，人们象过节日一样，邀请亲戚朋友来看戏，碾粮食、换新衣，非常隆重地迎接剧团的到来。我们在这短短的三四天中给人家一些什么呢？我们必须郑重地考虑这个问题，也就是向农民群众负责的问题。"

在演出时，这个团长常常亲自上场，来一段"独角戏"。这时，人们会看到一个浑身土气的人物悄然登场，好象就是从人堆里冒出来的，黑瘦的脸上挂着憨厚的微笑，一个人手脚并用，敲打着几样乐器，扬声唱起老百姓听惯了的民间小调，而内容则全是当时当地的好人好事、新闻喜讯。自然，再没有比自己熟悉的事情更令人感兴趣的文艺作品了，人群中顿时笑语四起、欢声雷动。一种无形的力量，把观众和演员融化为一个整体。赵树理最不愿意表白自己，可是对此，他却自豪地说过："因为我出生于农村，对民间的戏剧、秧歌、小调等流行的简单艺术形式及农民的口头语言颇熟悉，所以在口头宣传方面，有一定的吸引群众的能力，也颇为工作接近的同志们所称许。"

正当晋东南的军民全力以赴粉碎敌寇第二次"九路围攻"时，退居陕西秋林镇的阎锡山却阴谋决定公开走向妥协投降的罪恶道路。为了清除障碍，以绝后患，他积极响应蒋介石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丧心病狂地在山西制造了空前残酷的"十二月政变"。有一份史料揭露了他在晋东南的滔天罪行："十二月四日，阳城新生报社被暴力摧毁，石印机与收

音机被暴徒抢走，编辑王良被绑去活埋了。接着阳城十五日，晋城、沁水于十八日，先后发生同样事变，方式也是一样的。十二月三十日，壶关县第三区区长及牺盟会干部十六人被番号不明之军队两营包围绑去，至今生死不明。长治有二十几个干部被一次活埋了。十二月二十三日，决死三纵队第八总队一部分叛变，全部政工人员被俘虏。同时，《黄河日报》被独八旅武装解决，报馆被投手榴弹三百余枚，编辑人员全部失踪，公款财物损失万余元，机器全部被捣毁。二十六日，独八旅在尹家沟袭击第五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及牺盟会长治中心区，抢去公款物价值数十万元，公务人员及牺盟会干部被屠杀十余人。该部并捣毁了五区专署修械所，抢去枪七百六十余枝，机件全部抢走。在这一连串事件中，青年干部被屠者在五百人以上，被捕者在千人以上，尤以阳城为最残酷。《新生报》编辑王良，系一热情忠诚的记者，竟被活埋了。单是阳城一县，区村干部被杀者在三百人以上。杀头、挖眼、挖心、挖脑、割乳、割生殖器、割耳、剁手、活埋，什么惨无人道的手段都有，妇女干部被俘者，强奸以后杀死。”①

实际上，在这场惨绝人寰的政变中，丧生的人远远不止这些。忠于现实的赵树理在《李家庄的变迁》中写道，光是这个小小的山村，就“捉了一百多人，说都是共产党，剁手的剁手，剜眼的剜眼，要钱的要钱……龙王庙里满地血，走路也在血水里走。”真是“风云突变，土皇背盟，亿民唾弃，千秋孽罪！忍痛还击歼顽兵，腥风血雨洒太行。”

① 杨献珍：《论山西十二月政变》，连载于1940年2月《新华日报》华北版。

有幸的是，赵树理恰巧在一月之前调往壶关芳岱村，那里有严阵以待的八路军一二九师，阎匪不敢轻举妄动，他才逃过此劫。但这无数的死难烈士中，有不少是他在阳城、长治工作时患难与共的战友。战友们流淌成河的鲜血，使赵树理悲痛不已，同时也彻底净化了他的灵魂。这一个连蚂蚁也不敢踩的怯懦孩子，终于成长为坚强无畏的共产党人。

他在以后血与火的战争中，发出震惊文坛的呐喊。

第六章 呐 喊

动乱的三十年代在血肉与炮火中消逝，抗日战争进入了最为艰难的相持阶段。

巍巍太行，华北屏障。陈毅将军路过太行时，曾豪迈地高歌道："万年民族发祥地，抗战精英又此间。山西在怀抱，河北置左肩，山东收眼底，河南系鼻端。长城大漠作后殿，提携捧负依陕甘。更有人和胜天时，地利攻守相攸关。创业不拔赖基地，我过太行梦魂安。"① 但是，正因为如此，乱人寝食不安，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日本鬼子在反复的扫荡中，实行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企图彻底摧毁这中华民族的发祥地。而老天爷好象也喜欢助纣为虐，连续三年使这里遭受特大自然灾害。太行山中，就有三十五万人在饥饿中挣扎，还要接纳从敌占区逃过来的二十五万绝望的灾民。

这一时期，赵树理致力于新闻事业，先后担任过三份小报的编辑。

上党地区山高路险，历来闭塞。战前连一份报纸也没有。抗战爆发后，长治城里才出现了一种由商人把无线电广播的

① 陈毅：《太行山书怀》。

新闻抄在纸上卖钱的事。但到八路军克复晋东南，报纸却如雨后春笋，一下子就办起了三十几份。赵树理参与工作的第一份小报，便是牺盟会上党中心区于一九三九年一月创办的《黄河日报》。

是年七月，五区专署将人马分为两路，以白晋公路为界各奔东西。《黄河日报》随着专员戎子和转移到路西的阳城、沁水一带。领导路东工作的杨献珍便决定创办《黄河日报》路东版，并把正在巡回演出的赵树理调来，负责编辑该报的副刊《山地》，因为他十分赏识赵树理写通俗小传单的才能。

这位理论家，于一九三六年随薄一波到山西，先在民族革命大学四分校主持工作，后因该校“太革命了”而被阎锡山取缔，他才由临汾来长治出任五区专署的秘书主任，遂使赵树理终于碰上了伯乐。杨献珍对他后来的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

在《黄河日报》社，赵树理遇见了阔别十年的患难之交王春，他是报社的主编。

大革命失败后，这对好友中断了联系。起先，王春凭着那张省立四师文凭，回到阳城担任悠闲自在的联合校长，成天“游山、玩景、骑驴、吃面”。但是，“九一八事变”震惊了这个热血青年，他毅然放弃安全优裕的生活，到抗日义务学校去担任教员。然而在政府眼里，抗日有罪，结果，他流落太原，卖文餬口，直到“七七事变”爆发，才得以实现报国宿愿。以后，他的经历与赵树理如出一辙，相似得令人惊奇。他俩几乎同时—— 但是异地—— 参加牺盟会，恢复了组织关系。当赵树理在阳城担任八区区长、县公道团长时，王

春也先后担任了阳城县二区区长和晋城县的公道团长。最后他俩为了创办《黄河日报》路东版而终于走到一起了。伟大的抗日战争，使这对分离十年的战友殊途同归，久别重逢。从此以后，他俩始终在一起工作，如影随形，直到死神降临。

这次重逢，对赵树理影响十分大。王春不仅是赵树理的第一个启蒙老师，引导他走上了革命的征途，更重要的，他又是赵树理在文学主张上的唯一知音，无条件、无保留地支持赵树理搞“文摊文学”。高山流水，知音难觅。有这样一位志同道合、亲如手足的战友长期共事，实在是赵树理的一大幸运，这极大地鼓舞着赵树理不动摇、不气馁，坚持走自己独辟的蹊径。

有了这块可以随意种植的《山地》，“我便把多年的理想化为现实—— 其中形式上鼓词、快板、童谣、故事等无所不包，而总的政治内容以发动人民抗日，揭穿阎锡山反共反民主的阴谋为范围”。赵树理说，“那时的小报与任何报纸的面貌都不一样，贴在各县城的街道上，凡认得字的都愿看看，往往弄得路为之塞。”

这种场面，给杨献珍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回忆道，“每逢《黄河日报》（路东版）发到各县，贴到城门洞，往来行人抢着看《山地》；交通常常为之堵塞。我也是从《山地》副刊上，加深了对赵树理创作大众文艺本事的了解。他的文章浅显生动、干净利索，连‘啊、了、吗’之类的虚词都不随便用，文风朴实幽默，措词严谨，老实讲我很佩服和赞赏。”①

① 杨献珍：《暮色苍茫念手足》，载《中国通俗文艺》1982 年第 11 期。

大约在一九四〇年的二月，报社内部忽然起了一场小小的风波：牺盟会上党中心区派了几个同志来《黄河日报》工作，他们自恃是上级机关所派，言行有失检点，一来就和王春冲突起来，并且扣押了这位主编。

赵树理目睹其事，不禁勃然大怒，他极重友情，富于正义感，又是那种轻易不发火，但一旦发火却很厉害的人。他立刻愤而辞职，以示抗议。可惜他的义举无补于事。风波很快就在双方的自我批评中平息，他却因此白白失掉了自己的“山地”。一位新来的同志接管了副刊，此君上任后的第一件大事，便是把土气盎然的刊名《山地》改成洋味十足的《晨钟》——钟声中充满了“起来呀！”、“战斗吧”之类的学生腔。

赵树理无事可干，乃屈任报社的“司务长”。报社设在平顺县杏岭村，是该县最高峰处，真象当地群众所言，“爬上杏岭坡，离天不太远。”再加上新来乍到，没有群众基础，所以吃饭成了大问题，“给司务长赵树理带来的困难是难以用语言形容的”。报社的党支部书记何微回忆道，“蔬菜只有萝卜，山药蛋，买了要从山下背上来，高山小路很不容易。赵树理同志虽然对他们把群众欢迎的《山地》改为《晨钟》，刊登一些空洞无物的作品表示愤慨，但他一直注意团结这批新来的同志，积极把伙食搞好。他言行一致，克服种种困难，做到了这一点。”① 此外，这位司务长还塞翁失马似的学会了一套做饭的手艺。其中以烙饼最为拿手，曾使一个见多识广的著名记者惊讶不已。他说：“我看着他生火、和面、烙饼，一顿饭

① 何微：《对赵树理的几点回忆》，载《山西文学》1983年9月号。

也只不过化了刻把钟功夫。那动作之熟练使我十分惊异，我在解放区寄居的时间和地点都不算少，从来没有见过哪一家农民，做饭的动作有这样爽利。”①

“十二月政变”发生后，阎锡山悍然下令解散了牺盟会，公开撕裂了统一战线。《黄河日报》也接着宣告停刊。赵树理在这里工作了约莫五个月，而编副刊的时间和管伙食的时间大致相等。

四月中旬，赵树理来到平顺县北面石城附近的源头村，参与中共太南区委的机关报《人民报》的筹备工作。它是赵树理编过的第二份报纸。

五月一日，《人民报》正式发行，他仍然担任副刊编辑，文章风格也继续保持《山地》的特色。不过，他在这里工作的时间更加短暂，未及一月，中共中央北方局发来调令，要他去华北新华日报社报到。

在此之前，杨献珍已于一九四〇年二月调任北方局秘书长。他向新华日报社张磐石推荐了赵树理。这时，延安文艺界正在热烈讨论文艺的民族形式与大众化的问题，各级领导也越来越重视文艺的大众化通俗化。朱德总司令在对鲁艺学生讲话时指出：“我们的艺术作品不是给少数人看的，而是给中国广大民清对象，便提出一个问题—— 艺术的民族形式和民间形式的问题，也就是大众化和通俗化的问题。”②因此，赵树理立刻被新华日报社看中，调他到这个华北抗日根据地中

① 李普：《赵树理印象记》。

② 朱德：《三年来华北宣传战中的艺术工作》。

最大最主要的报馆工作。

赵树理去新华日报社报到的情景，在同事们的记忆中是个喜剧性的场面。著名的新闻记者、报告文学家华山，最先遇到赵树理。他对那次见面曾作过详尽的、妙趣横生的叙述：

“是一九四〇年的春天吧。当时华北新华日报馆驻在太行山脉下一个千山万壑里的小山村，叫做圪隆岭，又叫安乐庄，属山西省武乡县管。我在‘木刻工作室’给报社刻插画。门口站着个人忽然说话了：‘同志，问个话行吗？’”

“真讲礼貌！我回过头去，只见门框傍着个过路打扮的瘦高个儿，且喘着气，披着件罩住小背包的旧棉大衣。我见他独自一人，汗水淋漓，关心地说：‘你上哪儿？’

“‘请问’，他凑到跟前，把声音压在嗓门眼里，悄悄问道：‘这是新华日报馆吗？’

“我一怔，这人是谁，跑来打听报馆！

“在敌后方，是个战士都知道，部队番号是保密的。圪隆岭的老百姓只知道村里来了一个‘平凉’部，是个后方机关。什么机关就说不来了，也不问。报社内部也都以代号称呼，或者直呼名字。可这人……你见人就问，我还会装糊涂哩！

“‘新华肥皂厂？’我冲他一打量，摇了摇头，‘这一带，没有肥皂厂。你到西井看看？离这里四十里。翻大山过去，紧走两步，搭黑能赶到啊。’

“说着，我转过身，又画起实。心里可默画着一眼记下来的轮廓。三十多岁，满脸皱纹，那么大年纪还背个背包行军真少见啊。在八路军里，当时二十多岁就算年龄很大很大了

……他的脸色和旧棉大衣满象是同锅台烟火常年打交道，但身架腿脚可不象背着行军铁锅走长途啊。正揣不透，他又说了：‘同志，我可以进来歇歇吗？’

“我回过头去，他还是傍门站着，怕挡了光线。我赶忙说：‘可以！’同时冲着光板土炕一扬脸，‘刚打扫过，累了随便歇会儿。’

“那时候，对待生人，既要提高警惕，又要热情关怀，先定性后考查是不允许的，可也怕说漏了嘴。见他倚坐炕沿，我又转身画画了，只是尖着耳朵听着。

“‘同志，”歇歇他又说了，‘我有点几嗜好—— 可以抽烟吗？’

“我一愣，还抽大烟？在八路军的概念里，抽大烟不是旧军队，就是地主官僚，社会渣滓，我立刻想到前不久阎锡山发动的‘十二月政变’，好多友军都跟了过来，免不了有人又想进步，又急忙去不掉这点嗜好，给一点特殊照顾也是应该的吧。不由得看他一眼：果然牙齿黑黄，面有菜色。便同情地说：‘可以吧……就是没有炕席。’

“他放下大衣，卸下背包，没有上炕，却蹲在炕脚地上，背靠炕沿，掏出三寸长一支小旱烟袋。我差点没笑出声来：什么外国小说里学来的洋规矩，抽袋旱烟还征求同意！可看他那拘谨样子，真不象到过什么十里洋场的新派知识分子啊。还会打火镰！只听得嚓的一声，腕子一摔怪优美的。可是他为什么跑到圪隆峧来，打听报馆，我还是揣不透。他可站了起来，背上背包，披上大衣，冲我和悦地说声谢谢，出门走了。

“我凑近窗口，看他已拐进一家院门，正是我们社长何云

同志住的那个院子。赶紧跟踪上去，找到支干会的民运干事，叫她快去看看。天晌午了，正是开饭的时候，我回家拿上碗筷到了通联科院里。编辑部秘书笑咪咪地挽着个背包进来了，领着那人，跟等着饭菜的同志们说：‘大家欢迎！又来了新战友：赵树理同志，通俗文艺专家。’赵树理见我在，点头笑笑。我也点头笑了。从此，‘新华肥皂厂’成了报社一个小典故。以后熟了，有天我说：‘那天你来，就不打听代号？’

“‘该没有哩！’他一本正经地说，‘那天我到“巴黎”（就是北方局），转了关系，拿了介绍信，人家还专门开了路条，让我反复背诵，记住了，当场烧掉。一路上我背得烂熟。站在门口看你画画，还背着哩。见你炕沿放着三瓶颜色，都是新打开的，心想真是大机关啊。一紧张，把个代号都忘了，越急越想不起来。有心拿出介绍信，又怕你不是报社的人，再不敢问，真怕你送我到锄奸部去’。”①

赵树理到达这个高度保密的单位时，适逢《抗战生活》复刊。它是当时唯一的一份综合性半月刊，主要反映我党领导下军民的斗争生活，编委会由太行山上最著名的文化人何云、张磐石、韩进、李伯剑、林火、杨献珍、孙泱、王玉堂、陈默君等同志组成，辟有时事述评、经验教训、信箱词典和文艺等专栏，面对全体军民、读者层次极为广泛，因而亟需象赵树理这样的“通俗文艺专家”。革命工作的需要照例便是他自己的需要。赵树理二话没说，放下背包就编起《抗战生活》来。他协助实际负责人张磐石，承担了编辑部的具体事

① 华山：《赵树理在华北新华日报社》。

务，戏称自己是《抗战生活》的秘书。[1]

与此同时，王春也到了新华日报社，担任编辑科长。

八月，赵树理用“王甲土”的笔名在《抗战生活》三卷一期上发表了一篇不足三千字的小说《变了》。它的语言通俗、幽默，已经鲜明地显示出赵树理独特的口头性语言风格。例如：

> “媳妇回来照例做成了午饭。老旺和得山照例回来吃饭。老旺老婆只要生一点小气照例不吃饭。得山吃了饭照例回小房里去睡午觉，可是这回不能照例了，才睡下就听得妈在隔壁叫：‘得山！来！”虽不知道去做甚，总得去。得山过去，见爹睡在床上，妈在床边坐着向他点手，他走到眼前，妈悄悄说：“得山，庙里不知道来了个区上的什么人……”得山打断了他的话说：‘是区妇救会的李同志，昨天我们在庙里开各救联席会议，我已经见过了。”妈又生气了：“偏你知道得多！你听我说：那人给你媳妇写了条子叫他到庙里去谈话，你爹叫她去了，误了半天才回来。”得山说：“她们是熟人，从前在集上常在一处做工作。”妈更生气了，把嘴一歪说：“对，只用替你媳妇说话，不用听我的！”得山赶紧说：“听听听！这有什么。你说呀！”妈鼓住了嘴，停了一会才又说：“我不管你！新媳妇家那么随便你也说对，你以后只用听她的话，看你惯得她胆子大了以后还怎么拿得住她？”得山说：“妈，你也不要生气，人家又不是专来和咱作对，咱拿人家做什么？我也不是只

① 目前有关赵树理生平的各种资料，都说他到新华日报社后，先做校对工作。但据一些和他共事过的老同志回忆，并无此事。此说大概来自杨俊的文章，显然不太可靠，因为他俩不在一起工作，保密制度也不允许互相打听具体工作，况且报社领导对赵树理十分器重，不可能让他去当校对。

听她的话，不过只要她说得对，我也不因为是她说就不听，难道对也不该听吗？妈你说对不对？”妈仍然把脸扭到墙上了：“随你的便！你们的本领都大！”老婆唠唠叨叨吵得老旺睡不着，他坐起来从墙上顶住她半个脸问：“他们的本领大把你的什么事坏了？”问了两遍，问得老婆再没话说。

倘从《变了》的内容来看，似乎是另一篇小说《传家宝》的雏形。这篇小说也是通过婆媳之间的矛盾，来反映解放区人民生活的变化的。它描写牛老旺的妻子对识字的儿媳妇深为不满。“她以为能听话就是好媳妇，自己的媳妇最大的毛病就是有时候还要讲道理，不能说甚听甚——她以为这都是认识了字的过。”而且，根据“老规矩”，女人家见不得人，年轻人主不得事，可自己的媳妇常常自作主张，走出家门满世界跑，所以她老是感叹世道“变坏了”。不料有一天，一个区上的干部——儿媳的朋友——来串门，一顿话就把这个死脑筋说得心悦诚服：“咱再不敢说人家是疯婆子！人家真行！粗的细的、家里的事外边的事都通达！”又对媳妇说：“我老了，你们年青人应该跟人家学点本领。”

显而易见，《变了》的主题思想适应着《抗战生活》的编辑方针，形象地说明解放区的家庭关系和人民心理都在发生蓬勃向上的变化。但也显而易见，它还不是“问题小说”，也不是成功之作。作者固然十分注意语言的口头性，难能可贵地把大道理化为道地的老百姓的对话，但小说缺乏老百姓所喜爱的故事性。几乎没有什么故事情节、矛盾冲突，因此，这篇小说未能引人入胜。

一九四〇年七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北方局宣传部发出《关于出版敌占区报纸〈中国人〉的通知》，内称："为了开展对敌占区的宣传工作，特决定自八月一日起，由新华日报华北分馆出版对敌占区宣传刊物——《中国人》周刊。"要求运用通俗化的语言和老百姓喜欢看的形式，执行下列政治任务：一，向敌占区人民宣传我党的政治主张，进行抗战教育。二，向敌占区人民揭露敌寇汉奸的一切欺骗宣传。三，介绍敌后抗日根据地，鼓舞敌占区人民的斗争情绪，动员敌占区人民参加抗战并发动敌占区人民的斗争。这个艰巨的任务，自然也落到"通俗文艺专家"赵树理头上。领导上信赖地赋予他办报的全权，于是《中国人》就成了赵树理编辑的第三份小报。

《中国人》报的"编辑部"设在一个又黑又小的土屋里。那是赵树理和另外两位同志的办公室兼寝室，里面拥挤不堪：土炕和一个泥土砌成的煤火台占去了大部分面积，煤火台上零乱地摆满了他们的碗、筷、洗脸盆、麻油灯和一只用半个洋铁桶做的打菜桶。赵树理无法在地下工作，只好升级，把一张单桌放到炕上去，演戏似地坐着，编报时，原来适中的窗户就显得太低了。倘若他站起来时稍不经意的话，射进来的光线嘲弄似地照着他的腿肚子。那黝黑的、挂满了灰尘的房顶，也时时碰他的脑袋。

不过，赵树理的能力发挥得非常好。他拿出自己全部的看家本领，把《中国人》办得通俗生动、活泼犀利。这份八开四版、仅能容纳五千多字的小小周报，竟放上了二、三十篇文章（提要），形式之多样简直令人眼花缭乱。

在专发社论及要闻的第一版上，他开辟了“老实话”和“鬼话正解”等专栏，或从正面阐述抗日救国的道理，或从反面将日伪的反动言论如“经济提携”、“王道乐土”、“同种同文”等加以尖锐而又晓畅的批驳，让敌占区人民认清其灭我国土、毁我种族的罪恶阴谋。在第四版的副刊《大家看》上，花色品种更为惊人：小说、诗歌、话剧、唱剧、鼓词、快板、寓言、相声、杂文、语录、讽刺笑话、民间歌谣……真可谓琳琅满目，美不胜收。常是《中国人》的第一个读者的华山曾由衷地说道：“对他运用通俗文字的才能佩服极了，总共几千字一期的小报，居然能搭配出那么多栏目，抗日根据地的新事物和新的政治概念都要宣传出去，还要明白易懂，引人入胜，真了不起。”

赵树理深知通俗化的秘诀，并不仅仅在于文字浅显，还要力求句子合辙押韵，以便读起来朗朗上口，因为纵然是最乏味的韵脚，也比最深刻的含义更能印入人们的脑海而牢记不忘。《中国人》的新闻消息主要来自《新华日报》（华北版），他加以缩编改写，尽力韵文化。譬如，《新华日报》（华北版）刊登了一则《神枪手刘二堂》的消息：

（去年）十月二十八日的拂晓，当敌寇逼近辽县五区从镇时，刘二堂离开镇公所和他的同伴们一溜烟奔向窑门寨。

一队黄色的野兽，象赛跑似的窜进窑门口，接着，一团黑烟在窑门口堆谷场上冒了起来。“该是送你们回老家的时候了。”刘二堂喃喃地说着，把子弹送上枪膛。

“砰！砰！”随着清脆的枪声，两个鬼子扑倒了。敌人象惊弓

之鸟，慌忙转了方向。

第二天，天还没有明，刘二堂早已等候在烟子岭上。不大一会儿，敌人的大队人马，果然来到了山下，一个穿黑衣的人影，慢慢地走上岭来。

“砰！”刘二堂的一颗子弹又射穿了他的胸膛。这时候，敌人虽然拼命拿机枪向山上射击，但是已经晚了——刘二堂早把一枝发亮的三八式步枪、革皮大衣等等礼物，搬移到另外一个山沟里去了。

反“扫荡”后，在全区民兵的检阅大会上，刘二堂得了一面奖旗：“神枪手”。而更值得夸耀的，是他还得到了第十八集团军彭副总司令的光荣奖状及联办杨、薄、戎正副主席奖赏的步枪和子弹。从此，神枪手刘二堂的名字，便传遍了整个辽县。刘二堂本来是个青抗先小队长，因此，全县的民兵便提出“个个学习刘二堂”的口号。

当这则消息在《中国人》上出现时，便成了一段活泼顺口的快板：

辽县老百姓，都学刘二堂。
去年十月初，鬼子来扫荡，
进到窑门口，遇见刘二堂，
砰砰两子弹，一对敌人亡。
到了第二天，鬼子又逞强，
进攻烟子岭，自寻苦恼尝；
二堂早等候，子弹装满膛，
对准黑影子，一击中胸膛；

收拾胜利品，步枪大衣裳。
从此根据地，都知刘二堂，
民兵大检阅，奖旗空中扬，
上写“神枪手，辽县刘二堂。”

甚至是纯粹的理论文章，他也要想法改为能“说”的“有韵话”。例如，为宣传刚公布的陕甘宁边区的施政纲领，赵树理写了篇《比一比看》的短文：

“想要知道谁是真正为国为民，最好看看他行的是什么政令。你若看了陕甘宁边区的施政纲领，敌寇汉奸的鬼话，哪里还能哄人？

“你若是五十岁以上的老人，一定见过各色各样的政令：从满清、袁世凯、段执政……直到冀察政委会退出北平，曾有哪件事情是真正为了全体人民？他们的法令深而又深，听起来好象驾雾腾云，只能叫人头疼，哪肯牙清齿白定出个施政纲领？他们那些政令，为了骗人，也许有几条念出来也还好听，可是念来念去，永远也不敢执行——例如实施宪政。

……

不过，最能反映出这方面特色的，还得数他独创的对话体微型小说：

上月二十七日，罗斯福发表了炉边谈话，二十八日早晨七点钟，李二嫂的炉边谈话也接着发表了。原文如下：

问：二嫂！锅里蒸的是馍？

答：馍？一年来谁见过馍？自从把粮食交给鬼子封锁，每日休想

多领一颗，二和不能挨饿，我才给他蒸些糠窝窝！

问：大家都是这样生活？我也正想蒸些糠窝窝，你的驴要是闲着，借给我推一会磨！

答：自从鬼子来了，驴还会闲着？前天运粮回来，二和他爹坐的盘儿还没有暖热，就又给拉去驮货。如今的日子哪里还能过？我老婆活了四十多，哪知道老来还要加这一层鬼子公婆？去年百团大战，多亏八路军抄过他的龟窝！

问：二和还在学校上学？

答：维持会叫上，咱也没法推脱。能学些什么？一课一课，不是讲“新政府”，就是唱“防共歌”，骂人家八路军“杀人放火”。我常说：“二和！再休唱那鬼歌！前年八路军不是在咱家住过？你看人家对老百姓那么谦和？跟着鬼子血口喷人，都是罪过！”我看人家八路军满不错！只有鬼子才“杀人放火”，将来总要叫八路军打得他没法逃躲！

《李二嫂的炉边闲谈》

这种小巧别致的韵文很化了他不少心血，他说过：“我是不会写诗的，可是有时候也写一些韵文，类似诗的东西，这类东西文短字少，几句话就要见高低，这就需要嚼字，不断地改，往往改得一塌糊涂、面目皆非。”因此，一本《五元方音》几乎是他须臾不可离开的工具书。当他外出时，在那极其简单的行囊中总可见到这本书。

为了让《中国人》广为流传，赵树理真是绞尽脑汁，他伸手拿来佛家宣传迷信的惯用广告，在二三版的中缝上，用大字印道：“中国人爱中国，请来阅读书刊，读后讲给别人听，传给别人看，一传十，十传百，功德无量！”当时，抗日根据

地还没有邮局，但建立了极有效的短距离运输线，沿途设站。报纸出来后，不分昼夜地接力传送，然后由交通员挑担分送。赵树理曾经回忆道："一张小报，拿给别人看得懂，起到宣传作用，就是我们的目的。过去，没有邮差，脚夫挑出一担去，卖多少算多少。我们的希望是这个小报纸'不翼而飞'，飞到敌后去，结果达到了目的。"他的一个战友又补充道："不仅敌占区的同胞喜欢有这个报，印刷工友们也常常一面印，一面朗读着他的作品。和他在一起工作过好几年的一位缮写员，曾背诵过一段他在三四年前写的嘲笑日汪的'新相声'给我们听，逗得大家笑了一场。"①

赵树理是独力主编这份有趣有劲的通俗小报的，形形色色的文章基本上全部出自他的手笔，里里外外的编务，也由他一人包办。他亲自查字数，排版样，在石印药纸上写出各种字体的标题，还要配上插画、连环画和活跃版面的装饰画，并且从头到尾地进行校对。为此，他曾作打油诗一首以自嘲：

《中国人》报，《中国人》报，
一个编辑姓赵；
他编，他写，他校，
别看报纸小，作用可得了；
写篇小鼓词，快板句句妙，
小评论，小报道，
大半作品老赵包。

① 杨俊：《我所见到的赵树理》。

一九四〇年八月，我八路军在彭德怀副总司令的亲自指挥下，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百团大战。这是抗战期间华北敌后一次规模最大的战役，它给侵华日军以沉重的打击，粉碎了围困敌后军民的“囚笼政策”，为世界战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损失惨重的敌人恼羞成怒，疯狂报复。其扫荡我根据地的战术，从“分散配置”、“灵活进剿”、“牛刀子战术”到“铁壁合围”、“反转电击”、“扶剔扫荡”等等，不断变换、日益凶残。而华北新华日报社，正是敌人“扫荡”的重点目标，因为《新华日报》（华北版）好比根据地的一个窗口，使全世界都知道了中国人民艰苦卓绝、英勇杀敌的实况。所以日军恨之入骨，说它比十万精兵还厉害。

每逢敌人扫荡，报社就得行军转移，或者分散隐蔽。这时，赵树理虽然不过三十五六岁，正当壮年，但与生龙活虎般的同事们相比，无疑是老弱之辈，再加他生性胆怯，行动起来便有诸多不便。

太行山径，崎岖陡峭，连劣性的畜牲也得低下头试探着前进。在一次夜间的紧急转移中，赵树理心慌气促，一脚踩空，从悬崖上飞落下去，幸亏那件飞扬起来的大衣刚好被伸在半腰的树枝挂住，大衣自下而上撕成两半，减缓了下降的速度，才使赵树理得免粉身碎骨的灾难。他醒来时，发现自己滚落在酸枣树丛中，浑身上下无处不痛。他挣扎着爬出山谷，去追赶队伍。途中，一个老大娘为他挑出了几百根枣树刺。

后来，每遇行动，战友们总是尽力保护他，他自己也不

得不承认是个“包袱”。可他又说：“我真是个包袱倒好：你找一洞洞，把我‘坚壁’起来，就不用管了，敌人走了再取出来。偏偏我是活的，是个活包袱，我有思想，要判断，你说保险，我还不放心，要亲自看看，不出来看看真憋得慌啊。”其实他的思想和判断往往是多余的，反而给自己添了不少笑话。

有一次，敌人搜山，小组长把他藏好，再三叮咛：不要暴露目标，路口都有人放哨，有变化会来找他，带他转移，不来人千万别动。谁知半晌工夫，他就跑出来足足三趟，每回都是不声不响就爬到身边，压着嗓门唤道：“敌人来了没有？”“你别睡着了吧？”气得小组长恨恨地说：“快回去，天不黑，不能出来！”正好敌人撤围，后晌来了通知，马上回村待命，抓紧弄顿饭吃。然而集合时偏偏不见了赵树理，几个人转圈好找，就是叫他不应。急得小组长心烦意乱、浑身冒汗，可他猛一回头，却见赵树理依然趴在洞口，正从嗓门眼里悄声唤道：“我在这儿呐！”

大家一看，赵树理的确原地不动的躲在洞里。小组长怒不可遏，厉声责问：“怎么总是叫不应呢？”

他还是压着嗓门，认真地说：“我答应了啊！你们都听不见啊！”

“你就不能大声点？”

“我怕敌人听见啦！”

“都出来了，你就没看见？”小组长气得七窍生烟，而旁边的人则乐得笑疼了肚子。

敌人每次“扫荡”，都是不折不扣地执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真是鸡犬灭迹，牲畜绝种。当这人为的祸害达到极点时，自然灾难也开始默默地吞噬人们的生命了。

太行山自来缺水，十县九旱。据说山民们为了节约用水，全家人一早起来，站成一队，当家的含上口水，嗯—— 转圈一喷，就算洗完脸了。这时却又来了百年不遇的大旱。炎炎赤日如火悬空，经月不见一丝云彩。急得发狂的人们蜂拥到寺庙里，向神灵叩头求雨。这是赵树理从小就熟悉的行当。据他介绍，“求雨的组织，是把全村人家每八人编成一班，轮流跪祷。第一班焚上香之后，跪在地上等一灶香着完了，然后第二班接着焚香跪守……该不着上班的人，随便在一旁敲钟打鼓，希望引起龙王注意。这样周而复始地轮流着，直到下了雨为止。”倘若跪求毫不见效，就得举行可怖的“恶祈”：让一个所谓有罪的人，赤膊披挂粗长沉重的十字铁链，或是用铁钩勾住两锁骨，一边吊一把铡刀，然后鲜血淋漓地走向龙王庙，希冀用这种自甘受罚的惨状，来触动神祇的恻隐之心。

但这一切全都白费，求来的不是甘霖，而是吓死人的蝗虫。那蝗群飞来，有如黑云压城，遮天蔽日，经过的地方，庄稼片叶无存。随后便是恐怖的饥馑与瘟疫。而远在重庆的蒋介石，当然不愿错过这消灭共产党有生力量的大好机会，下令对解放区实行全面封锁，不准一粟一帛流入根据地。

在一九四二年的新年献辞中，彭德怀坚毅地说：“我们在物质方面，又是如何艰苦呢？两年半以来，后方没有一粒子弹的接济，一年以来没有一文钱的供给。然而不管弹药如何缺乏，饷粮医药如何艰难，我们牵制了在华五分之二的敌人

兵力，并未减少我们应得的胜利。民国三十年是敌后华北空前血战的一年，也是空前艰苦的一年，然而在我们铁的意志下，胜利地渡过去了。这是中华民族解放史上光辉灿烂的一页。”①

一九四一年腊月的一天，报社召开编委会，赵树理忽然泪汪汪地走了进来，紧裹着那件棉花掉蛋得精薄的破棉大衣，冷不丁地说：

“何社长，你派我到伙房去当伙夫吧！”

编委们相顾愕然，不知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何社长皱皱眉头，望着他笑笑说：“你怎么回事？”

他却一声不吭，光是满心委屈地看着社长，半天才可怜巴巴冒出两个字：“我冷！”——原来，赵树理自小就落下了怕冷的根子，长期的贫困生活和艰苦的革命斗争，又无情地损害着他的健康。每年秋天，人家正穿夹衣，他已经披上了棉袄，一到冬天，两手便离不了一盆木炭火。但是大家都知道，他从不因此搞特殊化，伸手要求比别人优裕的生活条件。怪只怪这年的冬天委实太冷，连钢笔水也写着写着就冻住了。烤火煤又供不上，再加每人的定量在减少一半的基础上，还要每天节约出二两去支援老百姓度荒，肚里肚外，简直找不到半分热量，赵树理实在挺不住了，这才产生到伙房做饭的想法。不过，说完之后他又赶紧补充道：“我会烧火，我保证做好饭，还不误编稿子。”……

① 彭德怀：《咬紧我们的牙关，克服接近胜利的困难》载1942年1月1日《新华日报》（华北版）。

奇怪的是，这个怕冷怕得掉眼泪的汉子，在这些山民百姓的眼里，却好比数九隆冬的一炉红火。他的身上似有一种电的素质，能发出透入人们心灵的热流，使他们一经接触，就会油然而生温暖触洽之感。因此，谁都想凑到他跟前唠唠家常，几乎无人同他合不来，说不到一块儿的。小俩口打架闹离婚，牛脾气儿子生老娘的气，他都有本事调解得服服帖帖，皆大欢喜。平时，只要在群众中一露面，周围的空气便立即会活跃起来。这边也叫："欢迎老赵唱一个！"那边也喊："老赵快来！来一段！"而他总是有求必应，张口就来，还会顺手扯下大衣上脏乎乎的棉花，往脸上一粘当胡子，手舞足蹈地一人唱起了一台戏。他的战友赞叹道："我喜欢他唱，虽然我不懂戏，他的演唱使我们的战斗生活增添了浓郁的气息，我更喜欢的是他那种在艰苦环境中的乐观主义精神。"①

有一次，他说了几分钟的一个小段："今天晚会我不唱戏，也不讲故事，讲讲文化娱乐吧。咱们这个晚会，叫做文化娱乐晚会。为啥打日本、闹革命，还要文化娱乐呢？我们做工作，好比毛驴拉碾拉磨，驮炭驮水，一天半晌过来，干活累了，让毛驴喘喘气，歇歇劲儿，卸了驮子，卸了驮架，套包笼头毡都卸了，牵着驴儿在太阳地里转上几圈，转着转着，毛驴就懒洋洋地，跪下两条前腿，躺倒在干土地上，美美地打个滚儿，裹上一身浮土，又滚过来、滚过去，滚得四脚朝天，好舒服啊！歇上会儿，浑身上下一抖擞，抖掉满身浮土，蹦跶起来，喷喷鼻子，翻翻嘴唇，扬起脖子，放开嗓门，鼓着

① 何微：《对赵树理的几点回忆》，载《山西文学》1983年9月号。

肚皮‘胡呵胡呵’一叫唤，又精神了，干起活来又是一身劲了。文化娱乐就象驴打滚，没点文化娱乐不行。可是光打驴滚，不干活，就不是只好驴子了。所以做工作，闹革命，都要学驴会打滚，可千万别做打滚驴……”

人们顿时哄地欢笑起来。

然而笑过之后，真正赞同他的人却寥寥无几。

新华日报社集中了太行山上最优秀的知识分子，他们大多是在外国文学或新文学的指引下踏进文学殿堂的，从未听说过艺术之宫中还有什么“驴打滚”的场所，更讨厌把高雅的文艺女神同俗不可耐的“打滚驴”搅在一起。因此，他们常常忍不住要揶揄一番浑身冒土气的赵树理，给他送上“庙会作家”“快板诗人”的外号，或者编派他的“战场轶事”“晚会趣闻”。

抗战期间，同志之间充满了以诚相待，亲如手足的团结融洽气氛。这些善意的玩笑本来算不了什么，但它似乎触动了赵树理根深蒂固的自卑感。他敏感，好发脾气，间或也反唇相讥，称他们模仿马雅可夫斯基的新诗是有点 (省略号)、带杠 (破折号)、长短不齐的“楼梯式”、“妈呀体”，可以用来做笔记本 (上面有许多空白)。

这种笑谑式的互嘲，后来在“晋冀豫文化人座谈会”上，变成了公开的争论。

事实上，文化宣传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不实行大众化通俗化，乃当时整个抗日根据地的普遍现象。传道授业的教师，其知识也贫乏到惊人的程度。小学生问机械化部队吃饭不吃饭，先生答不出来；中学生看报载破坏铁路、抬回铁轨

若干条，便问："铁路上的铁轨只有两条，怎么抬回这么多条？"堂堂的中学教师只会挠挠头顾左右而言他。然而，这一切无人过问，文化人愿意写一篇不着边际的《谈自然科学的重要性》，而不愿写一篇文章说明地球是方的还是圆的。

可是，敌人却没有忽视群众的愚昧，落后，日寇的所谓"治安强化运动"便是"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对根据地双管齐下，一面残酷"扫荡"，一面大肆进行文化侵略、文化渗透，指使汉奸利用群众的无知来蛊惑他们闹事。

过去，太行山上封建迷信的会道门多如牛毛，抗战以来一如既往，未能消除，人们依然笃信"举头三尺有神灵"。这种愚蠢之极的封建迷信，便成了敌人推行"七分政治"的有力工具。

一九四一年，太行腹地黎城县出现了一个由汉奸操纵的迷信组织"离卦道"，其头目宣称："服用本道的符，可以有隐身法，使敌人看不见，"竟有不少农民深信不疑，道徒很快就发展到近两千人，并秘密地建立了武装组织，男称"铁罗汉"，女称"铁女兵"。

十月十二日，离卦道头目召集信徒，妖言惑众，胡说抗日政府里妖精作乱，那县长是丧门神下凡，公务员全是鬼怪转世，不把他们杀了，黎城百姓就难逃刀兵水火大劫。于是，五六百名无知道徒吞下灵符，高举刀棍，在汉奸的指挥下呐喊着杀向县政府。……

这场暴乱，引起了领导上对群众的愚昧无知、迷信的高度重视。朱总司令沉痛地指出：在军事上我们的武器比敌人差，但我们却打了胜仗；在政治上，我们掌握着真理，但我

们却打败仗。为此，八路军一二九师政治部和中共太北区党委决定联合邀请太行山区的文化界人士，召开一个大型的座谈会，讨论这个迫在眉睫的问题。

一九四二年一月十六日，四百多名文化人云集清漳河畔的曲园村。参加座谈会的有根据地二十二个文化团体和附近敌占区的开明士绅，以及八路军总司令部、一二九师师部、太行军分区、冀南军分区、边区政府、太行区六个专署、二十八个县、新华日报社、华北新华社、太行抗战学院、鲁迅艺术学院等机关的代表，真是群贤毕至，形成抗战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文化人聚会。

开幕式上，在雷鸣的掌声中，一二九师政委邓小平起立致词。他指出，在文化战线上，比起敌人，我们是占了下风。因此，他提出五点希望：㈠文化工作者应该服从每一个具体的政治任务，应该是今后文化运动的指针。过去本区的文化工作，缺乏和政治任务取得密切联系，常常赶不上政治任务的需要，有时甚至发生脱离现象。㈡广泛发挥文化工作的批判性，过去某些作品，往往颂扬多于批判，没有成为有力的战斗武器。㈢认真动员根据地和敌占区一切新旧老少文化人、知识分子到抗日文化战线上来，过去这种工作，注意很差，一方面固然因为各有成见，但有很多是被关门主义的错误所挡住了。㈣要为广大群众服务，必须了解群众，了解群众的生活和要求，要接近群众，才能够提高群众，过去有很多脱离群众的现象，作品还不能够普遍的为群众欢迎。最后，他希望每个文化工作者，要作一个村的调查工作，来

丰富作品的内容。①

这五点希望，对于赵树理的创作道路，特别是他后来提出的“问题小说”论，无疑有着直接而又巨大的影响。

然而，不幸它未能引起其他同志的充分注意。在尔后的三天座谈会的讨论中，话题的中心不是集中在对敌文化工作的实际任务和具体措施上，却对文艺形式的新旧之争纠缠不清。会后有人指出：“关于内容与形式的问题，是这次大会争执最大的一个问题。”“提高与普及是几天来大家所争执的一个重要问题。”② 会议讨论的情形，据《新华日报》（华北版）报道，第二天，“发言者异常踊跃，”“意见殊多分歧，辩论热烈。”第三天，“会议继昨日之争论，会场空气异常紧张。”③

制造紧张空气的主要人物之一，便是赵树理。

他其实是个不喜欢也并不善于抛头露面的人，说起话来很慢很轻，又是一口很浓重的山西腔，因此很少在公众场合高谈阔论，但这次却一反常态，在会上慷慨激昂地舌战起群儒来。他知道哪怕是最小的事实，也会使夸夸其谈者哑口无言。于是他带了一大叠破烂的线装书：《太阳经》、《玉匣记》、《老母家书》、《增删卜易》、《洞房归山》、《秦雪梅吊孝》，……那天，人们记得，只见他穿一身不伦不类的服装——家做棉袄，破毡壳帽，腿上却打着齐齐整整的绑腿——背一个怪模

① 《文化人座谈会热烈举行，四百文化战士大聚会》，载1942年1月18日《新华日报》（华北版。）

② 李雪峰：《关于文化战线上的几个问题》载《华北文艺》第三期。

③ 《四二年晋冀豫区文化人座谈会议纪要》。

怪样的自制挎包，走上台去，一言不发，先从挎包里掏出那堆破烂书，随手拿起一册，就高声朗读起来：

观音老母坐莲台，
一朵祥云降下来，
杨柳枝儿洒甘露，
拯救世人免祸灾。
……

顿时，全场哗然大笑，又夹杂着大声指责。可是赵树理一概不理，板着脸扬着手说道："这才是在群众中占压倒优势的'华北文化'！其所以是压倒的，是因为它深入普遍，无孔不入，俯拾皆是，而且其思想久已深入人心。"

他喘了口气，又说："请你们回去看看跟着来的马伕，勤务员的手上，拿着是你们写的1——2000册呢，还是这种小本本。老实说，这些书就是从他们那里随便找来的，因为家家都有，他们一到住地就能借到。它象敌人的'挺进'队一样，沿着太行上爬上来了，毒害着我们的人民。可惜我们却一向不干预这些事，甚至以为新文化运动应该不涉及这些'低级'的事情。这种态度是错误的！我们应当起而应战，挤进它的阵地，打垮它，消灭它。但在形式上，还要向它学习，因为它是老百姓喜闻乐见的。"

最后，他建议成立"通俗文艺社"，要把文学从左翼作家的亭子间里取出来，放到劳动人民的炕头上去。他说："一篇文艺作品，无论小说，戏剧、诗歌，以及其它等等，如果千

百万人民看不懂，不愿看，听不懂，不愿听，一句话就是不为人民所接受，那文艺还有什么社会效果呢？文艺的宣传和教育作用又在哪里呢？作家创作岂不是浪费笔墨和纸张吗？对人民又有什么用处和好处呢？你是白吃了人民的小米饭！”

在这场争论中，旗帜鲜明而有力地支持赵树理的，又是那位最早发现他的伯乐杨献珍。在座谈会的最后一天，一月十九日，他代表地方和军队的党组织作了总结性发言。他认为：

“检讨过去文化工作，率皆脱离现实，脱离群众，有许多实际例子，证明文化工作者尚不虚心，好高务远，个人主义，不注意研究社会问题。希望在一九四二年彻底转变以上态度。并提出以下三点意见：一、发扬为群众服务的精神。二、掌握辩证唯物论的思维方法。三、充分准备文艺创作上的工具。关于创作新民主主义形式问题，要吸收民族文化的传统精神，与外国文化的精华，因而要：1．反对不照顾群众的倾向；2．反对为艺术而艺术的倾向；3．要客观地衡量群众的水平；4．加强批判性，着重深入农村之调查工作。”①

不料杨献珍的发言刚刚结束，立即有人站起来表示反对。他就是和赵树理一起在新华日报馆工作的记者高咏同志。

高咏是个二十来岁的青年诗人，才华横溢，思想进步。抗战初期，他已发表了两部长篇小说，《随粮代征》与《春天》，一九三八年，他在武汉参加青年记者学会，任总会学术部干

① 《四二年晋冀豫文化人座谈会纪要》，载1942年1月21日，《新华日报》（华北版）。

事，致力于新闻工作，活跃在重庆、桂林一带。但国民党的投降、分裂、倒退的政策，使他深恶痛绝。他唱道：

这里太冷，
留不住人，
我要走了，
去找北方的春……

于是在一九四一年的夏秋之间，他以国际新闻社记者的身份，来到抗日脊梁太行山。在这里，他曾数度深入前线，给大后方发出了好多通讯、报告、散文、随笔，并开始创作长篇叙事诗《漳河牧歌》，描写敌后苦难的乡村，怎样在革命的政党和军队的领导下成长壮大，成为坚强的斗争堡垒。全诗一万余行，写在一本用红线系上蝴蝶结的手抄本上。然而，就是这位热衷于描写农村生活的作家，偏偏断言用群众语言写不出伟大作品。他针对杨献珍的发言，提出了一个令人吃惊的观点—— 群众虽然是大多数，但却是落后的。先进群众是主要的，不能以数量的多少为标准。

这种公然宣称不愿为广大群众服务的文艺观点，在大打人民战争的根据地，不言而喻，势必要受到反驳。“文艺座谈会上情绪非常热烈。”① 但是遗撼得很，许多反驳者也不过是在理智上赞同“大众化”而已，很少有亲切实在的感受可言，因而虽然是滔滔不绝地慷慨陈词，却失之空调浮泛，热情有

① 《四二年晋冀豫文化人座谈会纪要》。

余而说服力不足。高咏笑嘻嘻地环视着他们，好不得意。

这时，赵树理站了起来。他谁也不看，两眼只望着人头上面的墙壁，不慌不忙，很慢很轻地说道："我搞通俗文艺，还没想过伟大不伟大，我只是想用群众语言、写出群众生活，让老百姓看得懂，喜欢看，受到教育。因为（他把话锋一转，提出一个针锋相对的观点）群众再落后，总是大多数，离了大多数就没有伟大的抗战也没有伟大的文艺！"

他用通俗的语言揭示了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反驳者齐声喝彩，欢呼声把房顶都快掀起来了。

这天，《新华日报》也发表了题为《文化战线上的一个紧急任务》的社论，它写道：

"一个带着迷信伪装的迷途，正在敌人特务机关的摆布下，诱惑我根据地的同胞迷失方向，葬送自己。我们要加强对敌政治斗争，就必须给参加会门的同胞，做一番艰苦的'指路'工作。

"很多地方会门与特务机关结合，造谣破坏。他们用'不管兴邦和丧邦，不管前王与后王'来败坏我民族气节，他们用'日本打中国，是中国人遭劫数'来转移我们的斗争目标，沦丧我抗战意志，他们用'二十八宿落漳河两岸''保宣统，真龙天子出现'来反对抗日政府，反对政府的政策法令，他们用'今生修得来世福'，来削弱斗争情绪……这些事例无一处不表现出它的破坏作用，也证明了教育群众、克服落后，是每个文化战士的当务之急。

"现在，适逢文化人大集合，我们要求大家都来注意这一严重的实际问题。

“这就要求我们具体了解落后群众，他们有些什么问题，他们的生活状况、他们的要求、他们的想法，都要经常的关心和细密的了解，在一些组织形式和工作形式上都应该有所改善，而文化战士则应与工作上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以尖锐的批判，把文化与实际斗争结合，把文化与广大群众结合。

“这就要求我们努力推行科学的文化的教育，进行大众的启蒙运动，回答群众不能解释只好委之于神的各种问题。例如我们不能从思想上改变对天旱无雨的认识，只是不准给龙王爷唱戏，结果除了增加群众不满之外，别无实效。大众的问题必须从面向大众中发掘出来，而面向群众的基本方式，应该是到群众中去，服务大众，认识大众。这里首先要有打破陈套的勇气，不为过去“大众化运动”所拘限，要深入农村，了解农民，打破形式主义和局限于机关文化的机关主义，要使文化成为大众—— 首先是农民大众自己的文化。”

会后不久，敌寇就发动了抗战以来规模最大的“五月大扫荡”。有人曾给高咏起过一个不无贬意的绰号—— 美缔克，暗示这个凭感情冲动来到敌后的美少年，一旦遇到空前残酷的战斗，难免会变成《毁灭》中那个临阵脱逃的知识分子。然而事实恰恰相反。“扫荡”开始，他就背着那部《漳河牧歌》未定稿投入战斗，不幸在敌人合击漳河时陷入重围。他面对直通到胸前的刺刀，徒手肉搏，英勇殉国。这位不愿用群众语言描写抗战的知识青年，却用自己的青春热血写下了一首壮丽的爱国诗篇。

在这次反“扫荡”中牺牲的文化人还有新华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何云，太行文联执委蒋弼、陈默君、刘雅灵，鲁艺

戏剧系主任严熹、音乐系主任朱杰良等同志，真是“文章浩荡卫神州，血溅太行志亦酬。”[1]

经过这场严峻的生死搏斗，太行文艺界几乎忘却了那次隆重的座谈会。唯有赵树理牢记着会议精神和党的号召。他冲出重围后，立即动笔写下了一部反迷信的现代上党戏《万象楼》。

创作反迷信的剧本，可以说是赵树理的夙愿。他自幼生长在“神仙家族”中，祖父母、外祖父母、亲父母、岳父母、舅父母……都是封建会道门的虔诚信徒，自己也曾与前妻一道加入“太阳教”，敬过神，上过坊口。后来在王春的帮助下，他变成一个无神论者，曾劲头十足地想去造“神仙家族”的反，结果却碰了一鼻子灰，并因不明内情和旧性荡涤未尽，反觉得舅舅的“行善说”不无道理。

“到了抗战开始，我又遇上了王春”赵树理说，“有一次我和王春谈起舅舅在教的事，说不管迷信不迷信，人家还是行善的。他说你还不了解清茶教的底，我给你露露。王春在固隆教书，掌柜的在楼上，王春去打过牌。他描写那个楼说，佛前有方桌，有条几。打牌时，把方桌往前移，几桌下，放个尿盆，大家在那盆里尿尿（就在佛祖位下）。在那楼上，有里外间，里间可以过瘾，可以腐化，可以打牌，佛座前可以尿尿。他们的弟子在河南、湖北都有。远路弟子来了，大敬神，就不让打牌尿尿，收拾干净，徒弟走了，再干。听罢这事，我想写戏，但因抗战开始，没时间。”座谈会结束后，领

① 邓拓：《哭何云同志》，载《现代咏晋诗词选》。

导上要他以黎城“离卦道”暴动为背景，写一个反迷信的剧本，这个任务恰合他的心愿，思想上早有准备，所以《万象楼》很快就问世了。

《万象楼》直接取材于那起叛乱事件。它描写太行山某县的统税局长何有德，抗战爆发后丢官回乡，对共产党切齿痛恨，组织古佛道愚弄乡民，又勾结汉奸吴二，趁中秋节“古佛临坛”之机，欺骗煽动无知的道徒攻打抗日县政府。看起来，剧本好象不合赵树理的创作原则，因为他一向坚持：“要写自己见过的，类似的生活可以嫁接，没有见过的就不行，真正虚构的没有，不是借这块就是借那块。”但是，他在这里巧妙地扬长避短，不去正面描写自己没见过的“离卦道”暴动及其平息过程，而是着力刻画一个幡然醒悟，反戈一击的小头目李积善，把原来的外部镇压改成了内部揭发。这样一来，赵树理对于剧中人物的生活与性格便了如指掌，可以驾轻就熟了。因为李积善这个形象早在他的心中孕育成熟了，他曾无数次地碰到过这种老实巴脚，一辈子受人欺骗的农民（他的舅舅便是个典型），也知道他们一旦觉醒，又会不顾一切地进行报复。

这种兼具善良性和报复性的农民的双重性格，便合理地构成了《万象楼》的戏剧冲突。而王春所提供的情况——腐化、过瘾、打牌，则被嫁接到这里，成了剧情发展的必要细节：吴二在楼上强奸李月桂，促使李积善反戈一击，留下满街香，证明敌人的阴谋。更妙的是，这个改动还使《万象楼》的主题有了广泛的教育意义。诚如赵树理所说，“反迷信，最好从内部揭发，现身说法，比八路军揭发说服力更大。”许

多农民从李积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面影。

《万象楼》是赵树理运用他心爱的上党梆子形式创作现代戏的第一次尝试，也是他运用文艺形式为政治服务、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具体问题的第一次尝试。他十分珍惜，自谓“生于《万象楼》”，过了二十年尚能如数家珍地大谈它的形成过程及优缺点。

这一年，他还创作了另外两个剧本《清债》和《神仙世界》。它们均已不存，据说，《清债》表现一个地主在旧社会怎样剥削农民，减租减息时农民又如何同他算剥削帐。《神仙世界》是反对迷信的，里边出现了“三仙姑”“二诸葛”两个人物。

是年秋天，经杨献珍建议，北方局书记彭德怀亲自将赵树理调到北方局调查研究室，让他专心致志地深入群众，创作通俗的文艺作品。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各中央局均须设置调查研究机关，任务是“收集有关该地敌友我政治、军事、文化及社会阶级关系各方面资料，加以研究。”可是北方局调研室的干部在五月反“扫荡”中全部牺牲了。研究室便由主管党校的杨献珍兼管，他决定把调查研究与群众教育结合起来，自然想到了在这方面有绝技的赵树理。同时前往的还有他的莫逆之交王春。于是，赵树理的报人生涯基本结束，即将进入文学创作的黄金时期。

在他的一生中，编辑报刊的年代（1939——1942）是一个决定性的时期：新闻工作的作用，是党的宣传者、鼓动者和组织者的作用，它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和明确的针对性，要

传播真理，传播事实，要解决人民生活中的实际问题。这种特点，就成了赵树理艺术生命的血液，不可抗拒地左右着他的文学创作，从根本上注定了他那独特的现实主义功利主义创作原则——老百姓喜欢看，政治上起作用。他说过："我的所谓'问题小说'，是从编小报副刊时形成的，却是在写这几个剧本时巩固下来的。"

卷　三

时代的歌手

(1943—1948)

我希望从大人到小孩，
人人都能读懂我的诗歌。
—— 普希金

第七章 崭露头角

一九四三年，是赵树理有生以来未曾有过的幸福之年。他在十年前立下的洪誓大愿终于在这时实现，而且是出乎意料的成功。他自己也满意地说道："这一年可以说是我创作上丰收的一年。"

不过，当他刚刚步入这个幸福的年头时，情绪并不很佳。自太行文化人座谈会召开以来，一年过去了，他的文学主张虽然受到领导上的高度重视，但始终得不到文艺界多数同行的首肯，相反却遇到了不少难堪的冷嘲热讽。徐懋庸记得，"不久以后，我带了一个抗大的参观团经过文联，文联的同志们同我一起漫谈，大家说了很多对赵树理不满的话。"[①] 但在原则问题上，赵树理向来是寸步不让、针锋相对的。

在《新华日报》社，他是大家最爱逗乐的对象。尽管他成了地地道道的知识分子，可那身土气却依然如故，时时处处会流露出来。有一次过春节，他奋然提议吃金针海带，惹得同伴大笑一番。他生性宽容温和，这种打闹玩笑是无所不可的。然而，要是同伴们鄙夷农民吃的南瓜汤、臭酸菜，指

① 《徐懋庸回忆录》第 145 页。

责他们长年累月不洗脸、不剃头，他却不能忍受。他把这种态度称为“平凡的残忍，”愤愤地指出：“目前正在我们抗日根据地吃南瓜喝酸汤的同伴们，正是建设新中国的支柱。”又说：“贫穷和愚昧的深窟中，沉陷着的正是我们亲爱的同伴，要不是为了拯救这些同伴们出苦海，那还要革什么命？把金针海带当作山珍海味，并非万古不变的土包子；吃南瓜喝酸汤，也不是娘胎里带来的贱骨头。作革命工作的同志们，遇上这些现象，应该引起的是同情而不是嘲笑—— 熟视无睹已够得上说个‘麻痹’，若再超然一笑，你想想该呀不该？”“我们的工作越深入，所发现的愚昧和贫苦的现象，在一定时间内将越多 (即久已存在而未被我们注意的事将要提到我们注意范围内)，希望我们的同志，哀矜勿喜，诱导落后的人们走向文明，万勿以文明自傲，弄得稍不文明一点的人们坐也不是站也不是也！”

显而易见，这两篇文章中流露着压抑不住的怒火。这对赵树理来说，是一种反常的情绪。但它并不是不可理解的。太行文联在总结一九四二年的工作时指出：“去年文联工作的主要缺点，也可以说最大的失败，是具体工作脱离群众，根本没有领导起群众性的文化运动来。去年是群众的政治经济军事斗争蓬勃开展的一年，相形之下，文化斗争是非常消沉的。”究其原因，最主要的便是“许多同志对文化工作大众化认识得不充分、不具体，口头上承认大众化，在实际工作中，却只以少数文化人为对象。办刊物，只要求少数人的阅读便以为满足，写作品，只博少数人的欣赏便以为成功。真正努力于供给大众的精神食粮的工作的人，是极少的。’同时，“文

联的工作同志，一般的对于敌后农村社会的实际情形，是了解很少的，不知道农村中存在着什么样的问题，不知道群众是怎样生活怎样斗争的。”而且，“在本区的一部分文化人中间，显著的存在着许多宗派主义自由主义的歪风，如介绍和发表的稿子欠慎重，因而引起纠纷。或互相讥讪，或无端生事，挑拨某人对其人的恶感，或任意摘取某人作品中的一两句话，当作笑谈而传播……这些现象，严重地妨害了文艺界的团结，也就妨害了文化运动的开展。但是作为文化界领导机关的文联，没有负起责任来，判明是非、消除误会，解除纠纷，以保证和促进团结，即在文联机关内部，某些时期内，某些同志之间，也很不团结。”①

面对这样的局面，时时刻刻为群众着想的赵树理怎能不忧心如焚呢？当然，赵树理也很清楚，发火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处于这种境地，重要的是自己千万不能悲观失望，不能在精神上退缩。实际上，在每一个真正的艺术家身上，都有一颗勇敢的种子。更何况这个太行山的儿子，继承了中国农民的整个血统，天生成百折不回的倔强个性。所以他不曾因同行的轻视冷遇而动摇或自馁，对创作、对自己本人，对自己在人世的使命，依然抱着坚定不移的信心，决心头也不回地走自己的路。“我自己宁可不在文艺界立案，也不改变我的写法。只要群众看得懂、爱读，这就达到了我的目的。”

四月的太行，春回地暖，光秃秃的群山才略略显出象征

① 徐懋庸：《文联一九四二年的工作总结及一九四三年的工作计划》，载1943年3月15日《华北文化》第九期。

着春天的绿色，敌人的炮火便又“扫荡”过来了。赵树理所在的调查研究室已归北方局党校管理。他随着机关转移到左权县抗日县政府驻地。左权县原名辽县，前一年五月反“扫荡”中，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将军壮烈牺牲在这里的十字岭下，为了纪念这位身经百战、英名卓著的杰出将领，故将辽县改名左权县。

因战争而分散，是知识分子接触实际，调查研究的大好机会。然而，许多同志下去时却以客人自居。成天不是在桌上动着水笔“办公”，就是躺在炕上捧着本老厚的书“用功，”闲着寂寞时，也不去找房东聊天，却爱溜到村外独自“哼洋歌”。可是赵树理却不然。再陌生的地方，他也能水乳交融般地打成一片屋里总是“高朋满座”。这种特色固然主要来自他的气质，但他那火热的心肠也是个重要的因素。事无巨细，凡是找到他头上的，或是他自己听说的，务必尽力而为，设法解决。所以人们都把他当作亲人看待，村里的大小秘密，他不需调查就能知根知底、了如指掌。

他在村里住下不久，房东家里忽然来了个不速之客。那是一位上了岁数的老汉，皱纹纵横的脸上密布着愁云，常常一出去就是半天，回来后也免不了唉声叹气。他的行踪引起了赵树理的同情心和好奇心，便主动上去搭话。两人一起盘膝坐在炕上，交换着烟袋吸了两袋烟，奇迹便出现了。这个老汉一下子就消除了对陌生人的戒备心理，推心置腹地向素不相识的赵树理吐露了自己的隐衷：他是到这里的县政府来告状的，因为他的侄儿被人暗害了。

这个惊人的消息，更激起了赵树理的同情心和好奇心。他

知道，这种老实农民，一般说来是逆来顺受，安贫知命的，倘没有天大的冤屈，决不会豁出来告状打官司。于是，他请老汉把这起人命案子的经过原原本本地介绍一下。

原来，老汉的侄儿名叫岳冬至，年方十九，积极勇敢，曾在一次反“扫荡”中击毙过两个鬼子，荣获特等射手的称号，是村里的民兵小队长。约莫在半月前的一个晚上，他被村干部叫去开会，可是到天亮还没回来，老汉心里就有了不祥的预感，起来后，又发现牛棚的门关得很别扭—— 用铁搭子扣着，并且插了根小棍子，—— 便进去查看。他刚一进门，就吓得他大叫起来，只见侄儿直挺挺地吊在梁上。但再仔细一看，又发现吊得非常离奇：因为牛棚太低，岳冬至的身体没有离地，半条腿跪在牛粪里，人却已经断了气。一家人哭哭啼啼地放下尸体，顿时又发现死者身上伤痕累累。毋庸置疑，他是被打死以后再吊上去的。

岳家被这意外的横祸惊呆了。他们赶忙去找村干部，询问昨天晚上的情况。但几个村干部异口同声地说，岳冬至开完会就回去了，他们也各自回家，根本不知道他是怎么吊死的。这种“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声明，倒使岳家的头脑冷静下来了。他们意识到，岳冬至的死肯定跟昨晚上开会的那些村干部有关，想要他们来破案，无异与虎谋皮。因此，老汉下了很大的决心越级到县政府来告状。

毫无疑问，这是一起手段拙劣的凶杀案。可是为什么要打死岳冬至呢？赵树理觉得这是症结之所在。他在同情之余，决定下一番调查研究的功夫。

看起来，谋财害命或敌人暗杀的可能性都不大，最大的

可能性是农村中常见的仇杀。他问老汉，岳冬至在村里有没有仇人？老汉便提供了一条重要的线索：他们村有一个名叫智英祥的姑娘。她容貌出众，宛如一朵娇艳鲜丽的山花，而且性格开朗，爱唱爱笑，活泼奔放，惹得村里的小伙子们象着了魔似的，老是身不由己地围着她转，有事没事，总爱找她说句话。在这些追求者中，有未婚的岳冬至，还有已婚的村长和青救会的秘书，因为智英祥只对岳冬至报以青睐，村长他们就把他当成了情敌。

这时，根据地正在贯彻落实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在一月份公布的《妨害婚姻治罪法》，赵树理认为这个案子恰好可以配合这项群众工作，便特地和县里的公安人员一起去那个村子作进一步的调查研究。为核实老汉提供的线索，他找来了智英祥。真是高山出俊鸟，这个少女虽然穿得破破烂烂，却掩不住她那天生丽质，遇见她的男子无例外地都要转过脸来看看她。然而她的内心却是痛苦不堪，她哭着向赵树理倾诉了自己不幸的恋爱史。

她曾经有个安定舒适的家庭环境，父母亲和两个哥哥都把她视为掌上明珠，宠爱备至。没想到几年前，母亲忽然鬼迷心窍，加入了“三圣教道会”。该会规定男女不得同居，她的父亲被迫外出流浪，安定舒适的家庭从此破裂。但她母亲虽然撵走了丈夫，却不希望女儿也抱独身主义。她自作主张，把一个偶然路遇的阔商人认作乘龙快婿。此人已经四十多岁，满可以当智英详的父亲。她自然坚决反对，把送来的聘礼扔了一地，并且宣布：“谁拿人家的东西，谁就跟人家去！”她的两个哥哥也对母亲的作为十分反感，不予支持。一意孤行

的老婆子眼看着众叛亲离，生活失夫了趣味，便郁郁地上吊自杀了。

这样一来，反倒给智英祥创造了自由恋爱的有利条件：父亲仍然在外流浪，两个哥哥成天忙于农活，追求她的青年可以随意出入，同她接近了。她在众多的崇拜者中，选中了岳冬至。因为他不但武艺高强，还是个美男子。每年正月扮故事，不论走到哪一村，妇女的眼睛都跟着他转。固然，岳冬至的父亲已经给他养了个九岁的童养媳，但他一开始就断然拒绝，因此不会成为他俩恋爱的障碍。两人很快就热恋得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了。然而，早已结婚的村长却是个流氓恶霸，千方百计地企图玷污她，屡遭碰壁后，便迁怒于岳冬至，常找他的岔子。那个青救会秘书也有同样的邪念，也得到了同样的待遇，因此也同样地怀恨岳冬至。而他俩的妻子，不去管束自己的丈夫，反而妒火中烧，也常常找智英祥的岔子。所以她断定，害死岳冬至的罪魁祸首，定是这两个坏蛋。

经过几次审讯，案情终于查清。果然不出众人所料，岳冬至正是被村长他们打死的。就在那天晚上，他们在村公所私设公堂。逼迫岳冬至承认腐化的罪名，要他和智英祥一刀两断。岳冬至当然拒不承认，理直气壮地声称自己的恋爱是正当的、合法的，并且反问他们：私自斗争干部犯法不犯？这伙禽兽理屈词穷、恼羞成怒，便拳脚交加，诉诸武力，没想到心狠手辣，不大一会就把岳冬至置于死地了。人命关天，凶手们也惊慌起来，临时想出一个“自杀”的花招，可惜匆忙之中，伪装得破绽百出，既没有把人吊离了地，又把门从外面关上了。

但对赵树理来说，问题却出在案子了结之后。这时，他再次来到那个村子，听取岳、智两家的反应。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两家竟象商量好了似的，一致对岳冬至和智英祥的“自由恋爱”不表同情，认为把他打死固然不该，但教训教训他则是应当的，而村里其他人的舆论，居然也是同一个调门。

这种反应犹如迎头一棒，使赵树理终于痛心地发现，尽管边区政府早在一年之前就分布了《婚姻暂行条例》，规定订婚、结婚都必须“男女双方自愿，任何人不得强迫”，“禁止重婚、早婚、纳妾、蓄婢、童养媳、买卖婚姻、租妻及伙同娶妻。”尽管今年初又分布了《妨碍婚姻治罪法》明令“如有买卖婚姻者，勒索财物损害他人婚姻者，强迫不到结婚或订婚年龄之男女结婚或订婚者，不经本人同意而强迫其结婚或订婚者，妨害成年男女自愿结婚或订婚者，凡有以上行为之一者，处以一年以下徒刑或三百元以下之罚金。”可是，根据地的人们置若罔闻，依然恪守封建包办婚姻的传统习惯。他们不但不觉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何等的不人道，不合理，反而视若经典，奉为法规，神圣得连些微小怀疑都是大逆不道。现在，岳冬至竟敢公然向这种不成文的社会法规挑战，自作主张地、光明正大地同智英祥谈情说爱，这当然要使他们——包括岳冬至和智英祥的骨肉亲人——感到无法容忍。相反，却能够容忍村长之流的罪恶行径，因为这是司空见惯的。

看到这样的调查结果，赵树理不禁为岳冬至扼腕痛惜，同时也对群众的愚昧不胜感慨，胸中充满了愤激之情和恻隐之心。为了解决这个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提高人民群众的思

想觉悟，他决心以岳冬至为原型进行创作，来刺激人们被传统习惯愚弄得麻木不仁、是非不分的神经，把他们从血腥的社会偏见中拯救出来。于是，一篇在现代中国的文学史上没有先例地轰动农村的小说，在赵树理的心中酝酿成熟了。

《小二黑结婚》基本上是以岳冬至事件为创作素材的。它描写刘家峧的青抗先队长小二黑，热烈地与纯洁美丽的小芹姑娘自由恋爱，却遭到了双方家长的反对和掌握村政权的地头蛇的迫害。不过赵树理改变了事实上的悲剧结局，让这对有情人终于在民主政府的支持下结成眷属。据他自己回忆，因为当时想不出更好的办法，才由区长、村长支持着搞了个大团圆。但以我们的眼光看来，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个非理智的改动恰恰是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法。它表现了时代的理想主义和乐观主义。它使小说赢得了巨大的声誉。

事实上，两代人之间这种永久性的冲突，在四十年代的解放区确乎出现了有利的转机。这里的阶级关系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根据地普遍实行减租减息后，农民，特别是青年农民，不再是农奴或佃农了。人身自由促进了思想解放，他们开始怀疑和否定旧有的文化传统、信仰价值，开始思索并且要求把握自己的命运，再也不愿向过去的权威盲目地顶礼膜拜、唯命是从了，以前被迫放弃或自愿交给神仙和皇帝的合法权利，现在也要求并且争取收回了。而小二黑，正是这种新型农民的代表人物。自古以来，理想的婚姻，自由的恋爱，对于农民来说简直是一种非分之想，有多少情人抱恨终身、或者象岳冬至似的以死相殉呵！但是现在，小二黑要一

往无前地追求自由恋爱的正当幸福了。他坚决反抗父亲之命，拒绝二诸葛强加于他的童养媳，他也蔑视封建恶霸的淫威，无所畏惧地同金旺兄弟据理力争。他对小芹说："我打听边区上的同志，人家说只要本人愿意，就能到区上登记，别人谁也作不了主。"

这句话，体现了旷古未有，最具时代气息的思想意识。它使那些也在婚姻问题上痛苦呻吟的男女同胞豁然开朗，好象从暗无天日的洞穴里突然发现了一片投射到眼前的阳光，一条到达理想境界的坦途。

赵树理的目的达到了。《小二黑结婚》真的为岳冬至那样的青年找到了出路。他的一位老战友写道："实际上，'小二黑'已经成了太行山农民反对封建思想、追求自由幸福婚姻的化身了。我曾亲眼看到：当时涉县河南店村的一个姓熊的姑娘和一个部队的干部恋爱，遭到了她父亲和村里的一切落后势力的讽刺和压迫，她的父亲强迫她嫁给别人了。可是不久，'小二黑'在太行山出现了；她听了'小二黑'的故事和看了'小二黑'的戏，在'小二黑'的感召鼓励下，终于走上了'小二黑'的道路，冲破了封建的枷锁，跟她父亲包办的婆家离了婚，然后又跟她真心相爱的对象结了婚。现在这位姑娘已经是一位共产党员，有了好几个孩子，跟她的爱人一起在北京的一个机关里工作，他们生活得很幸福。两年前我还碰见她，并且到她的家中作过客呢。我还时常想起：在涉县胡峪村，我房东家里那个名叫'好闺女'的粗壮姑娘。这真是一个勤劳勇敢，熟悉农村一切生产、名符其实的好闺女。她的幼年遭遇很不幸，生下来，连话还不会说，亲生爹娘就

因为赶上荒旱歉收，活活地饿死了。从此，她就被我的房东抱过来，姓了我房东的姓。我的房东收养她，是为了让她做童养媳，预备给他们那个叫老疙瘩的儿子做媳妇。他们当然想不到：这个笼子里养的小鸟，当她长硬了翅膀，懂得了爱情，她偏偏不爱那个老疙瘩，而偷偷爱上了离胡峪村八里路、南庄村上的一个小裁缝。这件大胆的恋爱行动，轰动了附近的乡村，胡峪村的落后势力曾向小裁缝威胁说：‘不准你再到我们村上来找好闺女。你再来，就砸折你的腿！’可是这时候太行山有了‘小二黑’，于是小裁缝的腰杆挺直了，他没怕砸折腿，反而和好闺女两个暗地一商量，趁着动员人民参军的机会，双双地报名参加了八路军。在欢送参军人员的光荣大会上，好闺女和小裁缝并排地骑着高头大马，带着碗口那么大的红花，欢天喜地的向人们不断地说着，他们所以这样大胆，是因为有了‘小二黑’在前边走，他们在后边跟着，胆子就大啦。”①

为了教育落后群众，赵树理还需要刻画这一阶层的典型人物。但要恰如其分地描绘人物，他是离不了模特儿的。而岳冬至和智英祥的家长，显然又不够典型，他们只是一般性地维护包办婚姻。于是，他把两个烂熟于心的人物——二诸葛与三仙姑——放进了小说。

这两个人物，在他去年创作的、随后因写了《万象楼》而弃置一边的剧本《神仙世界》中已经出现了。群众的愚昧落后，往往导致他们的封建迷信。赵树理决定让这两个神仙来

① 苗培时：《〈小二黑结婚〉在太行山》，载1957年5月23日《北京日报》

分别充当小二黑的父亲和小芹的母亲。二诸葛的原型人物便是他自己最熟悉的父亲。三仙姑虽然是杂取种种人化合而成的，但也早已孕育在他的心中了。

赵树理清楚地记得，小时候，他有一个本家寡婶，招了个窝囊废的倒插门女婿，光知道爬在地里死受，似乎连人类天生的嫉妒心也没有，听任她与别人鬼混。这个四十多岁的女人天天打扮得花枝招展，穿着绣花的小鞋，镶边的裤子，脑门上还顶着一块黑手帕，用来遮盖脱光了的头发。这个“老来俏”的形象便不可磨灭地印入了赵树理的脑海。后来，他又碰到过一对跟智家仿佛的母女。母亲也曾横加阻拦女儿的正当恋爱，她很会享受生活的“乐趣”。她是个顶着红布摇摇摆摆装扮天神的巫婆，善于利用职业方便，勾引一些善男信徒拜倒在她的裙下，使他们连吃饭时也要端上碗跑半里路来坐一会。—— 太行山穷，妮子女人象山水般地向平川流逝，或消失在地主老财的高门深宅中，留下穷汉们在性饥渴中煎熬，于是就产生了这种混乱丑恶的两性关系。这三个女性的种种特征，经过赵树理“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艺术加工，三仙姑的形象便跃然纸上了。

倘就人物性格的生动性而言，这两位神仙胜过了他们的儿女，因为在赵树理心目中，早就存在着他俩的模样。他能仅用对话就显示出人物的个性来。当他俩去见区长时，二诸葛再三恳求：“千万请区长恩典恩典，命相不对！”一句话就活画出了这个迷信透顶的迂执的农民。而三仙姑则是趴下就磕头，连声叫道：“区长老爷，你可要给我作主！”淋漓尽致地发挥了她的妖妇本色。

这两个人物的典型意义也不亚于二黑和小芹，在现实生活中起到了很好的教育作用。有人回忆道："我故乡的小镇上，三仙姑式的人物也颇有几个，她们打扮得妖里妖气，到处跳大神，不知骗过多少穷人。自从看了《小二黑结婚》的戏，就一头扎在自家的窝窝里，再也不露面，闷热的伏天，也紧闭着窗户，不然，调皮的孩子老是踮着脚尖趴在窗口，喊着'三仙姑，米烂了！'把'三仙姑'气得手拿烧火棍，蹚着羊蹄子似的小脚，登登登追了出来，尖声骂着'小猴崽子'！'①

这篇切合时宜的小说完稿于五月间。赵树理先把它交给最器重自己的北方局党校校长杨献珍，随后又到了北方局妇救会的负责人浦安修的手里，得到了他们的高度赞赏，并把它推荐给彭德怀副总司令。彭总认真地审阅了小说，还了解了小说的创作过程，乃亲笔为《小二黑结婚》题词道：

象这种从群众调查研究中写出来的通俗故事还不多见。

一九四三年九月，赵树理的成名之作《小二黑结婚》问世了。他时年三十七岁，恰好与鲁迅发表《狂人日记》时的岁数相同。这两篇小说在现代文学史上的意义，或许，也多少有点相同之处。

《小二黑结婚》出版后的盛况，大大地出乎所有人——无论是作者，支持者还是反对者——的意料。自"五四"以来，

① 丁宁：《大树必将成林——回忆赵树理同志》，载《新港》1980年9月号。

还没有过一本新小说能在农村引起这么大的轰动。它在穷乡僻壤不胫而走，被农夫村妇交相传阅，在地头，炕头，饭场上，到处可以看到阅读《小二黑结婚》的热烈场面。过去，新华书店出版的文艺书籍以两千册为极限，可是这本其貌不扬、封面特意标上“通俗故事”字样的小书，却连续印了两万册还是供不应求。翌年三月，新华书店决定重新排印、再版两万册，并加以说明道：“这本为老少爱读爱听的自由结婚的通俗故事，自去年九月出版以来，风行一时，不日就卖完了，本店为满足各地读者的需要，特再版发行。这次是用大号字排印，并附有趣的插图。”

与此同时，由武乡光明剧团带头，数以百计的剧团用形形色色的地方剧种——武乡秧歌、襄垣秧歌、中路梆子、上党落子……将《小二黑结婚》搬上舞台。这使一字不识而有欣赏戏剧传统的老百姓喜出望外，如醉如痴地总也看不够，甚至一、二十里远的老太太、大闺女和抱着孩子的小媳妇，也会举着火把，翻山越岭来一睹小二黑的丰彩。这本薄薄的小书，奇妙地打破了新文学与农民之间一直存在的隔膜。

同人民群众的狂热反响比起来，文艺界同行的冷淡，似乎有点超出寻常。在《华北文艺》十月号上，有一个刚从外地来太行文联工作的同志，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毫无成见地为《小二黑结婚》写了一篇充分肯定的书评；不料，《新华日报》（华北版）上很快出现了一篇针锋相对的刻薄文章，道貌岸然批评道：当前的中心任务是抗日，写男女恋爱没有什么意义。从此以后，太行区众多的报刊杂志一律保持古怪的沉默。好象盖棺论定了似的。直到一九四六年，才有一位独

具慧眼的权威人士指出："作者在这里讴歌自由恋爱的胜利吗？不是的！他是在讴歌新社会的胜利，（他们开始掌握自己的命运，懂得为更好的命运斗争），讴歌农民中开明、进步的因素对愚昧、落后、迷信等等因素的胜利，最后也最关重要，讴歌农民对封建势力的胜利。"①

赵树理对这种不公平的待遇坦然置之，既没有惶恐不安，也没有愤世嫉俗。在他的心目中，农民就是上帝。老百姓喜欢看，政治上起作用，这就是一切。因此，他在小说发表不久，便又重新下乡，开始构造另一篇杰作《李有才板话》。

这时，太行山区正在掀起规模最大的第三次减租减息高潮。② 抗战期间，民族矛盾重于阶级矛盾，农民和地主这对从来就是势不两立的阶级也必须联合起来，一致御外。所以党中央因时制宜，规定了特殊的土地政策；实行扶助农民，减轻地主封建剥削的减租减息，而不从根本上动摇不合理的土地制度。不过，由于农民和地主都把土地视为命根，土地是他们与生俱来的矛盾冲突的焦点，再加同生死存亡之民族矛盾相交织，处理得好坏直接影响着战争的成败，因此，减租减息的斗争是十分微妙而又复杂的。

"但是这一政策，在许多根据地间还没有普遍的认真的彻

① 周扬：《论赵树理的创作》

② 在抗日战争期间，解放区农民曾经三次要求耕者有其田。第一次在一九三七年秋至一九三八年初，第二次在一九三九年下半年至一九四〇年上半年，第三次由一九四二年冬一直到一九四四年春，各解放区普遍深入地实行减租减息、交租交息。

底的实行。”党中央在抗战进行了五年之后不得不作出这个结论。“在有些根据地内，还只在一部分地方，或则还只把减租减息当作一种宣传口号，既未发布命令，更未动手实行；或则虽已由政府发布法令，形式上减了租息，实际上并未去做，发生了明减暗不减的现象。在这些地方，群众的积极性不能发扬，也就不能真正将群众组织起来、造成热烈抗日的基础。在这些地方，抗日根据地就无法巩固，经不起敌人的扫荡，变成软弱无力的地区。……而其原因，不是地主抗不实行，就是党与政府的工作人员采取漠不关心与官僚主义的态度。因此，各根据地内党与政府的工作人员必须对自己工作加以严格的检查，派员下乡分途巡视各地实行的程度，加以周密的调查研究，全盘地总结各地的经验，发扬正确实行的例子，批评官僚主义的例子。”①

赵树理这次下乡，便负有检查减租减息进度的使命。结果，他发觉党中央果真英明。地方上不少同志——尤其是来自城市的小青年——空有满腔热情而无工作经验，既不了解农村的实际情况，又不愿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光知道召开马拉松式的大会，不着边际地奢谈什么重要性及其意义或价值，甚至会从太行山一直扯到太平洋，讲得满脑袋高粱花的农民昏昏入睡。具体落实时，又往往操之过急或失于简单，动不动就不耐烦了，大喝一声：“有没有意见？再限一分钟！”吓得不善言辞的农民望而生畏，敬而远之。

然而更可怕的是有些村子仍旧控制在反动地主手

① 《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

中。——赵树理了解到，那个害死岳冬至的流氓村长，其实是他父亲的傀儡，他父亲是该村原来的统治者，故而所作所为与过去无异。——这些家伙遥控村政权，利用青年干部不谙农事，急于求成的官僚作风，包办代替，瞒上欺下。当面一盆火，把你喜孜孜地蒙在鼓里，背后一把刀，竭力阻挠破坏，致使工作流于形式，名存实亡。有的地方年年减租息，年年不彻底。“不彻底到连村干部——副村长、武委会主任，都怕夺地没有减租；问题严重到佃户王石黯，减租后土地被夺，老婆也离了婚。”而“其主要原因正是在领导上，工作方法上，某些问题的解决上。”

调查回来，他感到，假使党的工作人员看不清农村复杂的阶级斗争和普遍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并坚决克服之，彻底减租将仍是一句空话。为了解决这个至关重要又迫在眉睫的问题，他的第二篇杰作应运而生了。《李有才板话》在十月脱稿，年底问世。

出现在小说里的阎家山，是宗法制山西农村中一个典型的角落。在那里，村长阎恒元大权独揽，一手遮天，顺我者倡，逆我者亡。然而抗战的炮声终于惊破了“土皇帝”的千古美梦，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觉醒的农民开始要求民主政权和减租减息，于是双方展开了激烈的矛盾冲突。

当然，再没有比对照比较更能说明问题的了。因此，他刻意描写了两个领导农民斗争的共产党人形象及其截然不同的工作方法。一个是脱离群众、专尚空谈的章工作员，无师自通地推行一套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工作方法，被阎恒元牵着鼻子愚弄而不自知，还主动为之请功，送来一张“模范

村”的通令嘉奖。另一个是县农会主席老杨同志，自觉发扬深入群众，放手发动群众，事事为群众着想的作风。在他的工作领导下，阎家山才得以彻底减租，抗日政权才真正掌握在人民的手中。冯牧写道：“对于这两种不同的工作作风和人物，作者充分地表现了他的艺术力量，借助非常生动的形象，给予后者以热烈的赞美，给予前者以有力的鞭挞。这便不能不留给读者一个极其深刻的印象：脱离群众，形式主义的作风只能得到一事无成的结果，而只有时时刻刻和群众在一起，才会成功。在这里，艺术和革命的现实政策‘工作方法’，达到了极可赞许的高度的结合。”① 在后来的整风学习、减租减息以至土地改革中，《李有才板话》成了干部必读的参考材料。他们不但自己学习，还把它象文件似的念给农民听。结果反响异常热烈，收到的实效超过了《小二黑结婚》。农民一边听得乐不可支，哄堂大笑，一边就联系实际，“对号入座”，自动模仿小说中的工作方法来解决本村的问题。

赵树理说过：“我们的工作有些地方不深入，特别对于狡猾地主还发现不够，章工作员式的人多，老杨式的人少，应该提倡老杨式的作法，于是，我就写了这篇小说。”实践证明，他的创作目的实现了。

据说，这部中篇是以好几个真实的例子为依据的。特别是天才歌手李有才的模特儿，一说真有那么个名叫李有才的农民，家住左权县紫城编村李家岩，为人也是诙谐乐观，出口成章，赵树理曾亲耳听过他编的快板，从中获悉了这一带

① 冯牧：《人民文艺的杰出成果——推荐李有才板话》。

减租减息的第一手资料——于是该村大地主阎小珠就成了阎恒元的原型人物，阎家山那种东高西低一道斜坡的古怪外貌，也是该村的逼真临摹。另有一说则是赵树理儿时的好友张树才，他父母双亡，没有妻儿，一个人种着二三亩薄地，住着两孔没门窗的石窑洞，成年在外流浪，能说一口好快板，见什么编什么，深得尉迟村的人心。[①] 但是后来又有一说，据传还是赵树理本人提供的："一九三八年他在阳城工作时，曾到李泉岭上的阎家村做过较长时间的社会调查。这个村有个姓阎的乡绅是恶霸，多年把持村政，鱼肉乡里。乡绅的家里有位类似李有才那样的长工，和赵树理交上了朋友。赵树理晚上就常到长工的住处，在小煤油灯下听他讲故事、说快板。他以诙谐的语言揭露乡绅一家的劣迹，既深刻又感人。这是《板话》素材的重要来源，采用快板完全是那长工给的启发。"[②]

但也不难断定，小说家还运用了自己的亲身经历。所谓"板人"，不妨看作是赵树理的外号，"快板诗人"的简称。李有才热中民间文艺的秉赋，好象也是赵树理移赠的。而农会主席老杨同志，则显然是他的自我写照。从土里土气的外貌打扮到联系群众的卓异本领，无不闪烁着赵树理的个性特征。他又说过："《李有才板话》中老字和小字辈的人物就是我的邻里，而且好多是朋友。"

这本书出来受到人们的欢迎，"《李有才板话》在沪连出

① 参见高捷等人著的《赵树理传》。

② 何微：《对赵树理的几点回忆》，载《山西文学》1983年9月号。

三版都已销售一空，买不到的人到处寻找借阅，青年群众中争相传诵，并给文艺界注射进了新的血清，大家对于解放区生活的幸福和写作的自由也因此更为向往。”① 当它在延安《解放日报》上转载后，也有读者去信诉说：“许多人想买，但书店没卖的。我想象这样优秀的文艺作品，如果能广泛散发，深入农村，将起更伟大的作用。因此，我建议：出版部门将它连插图印成小型单行本（便利携带）。”

《小二黑结婚》和《李有才板话》的相继出版，使赵树理终于在现代中国的文坛上崭露头角，从默默无闻的地位一跃而成了家喻户晓的名人，边区的人们都在谈论赵树理。一个来访的外国记者十分惊奇地发现，赵树理“可能是共产党地区中除了毛泽东、朱德之外最出名的人了。”②

大约就在赵树理创作《李有才板话》的时候，他又和王春一起离开了北方局调查研究室，到刚刚独立门户的华北新华书店担任编辑。

华北新华书店是边区最高出版发行机构，直属晋冀鲁豫中央局领导，负责指导太岳、冀南、冀鲁豫及太行各区新华书店的业务。它虽然成立于一九四二年元旦，人马却全属华北新华日报馆，两块牌子、一套班子。直到这年的九月底才与报社分家，正式成立编辑部。林火任总编辑，编辑有王春、赵树理、章容、冯诗云、浦一之、彭庆昭等人。从此，赵树理的职务固定下来了，直到全国解放。

① 《沪文化界热烈欢迎解放区作品》，载1946年8月29日《解放日报》。

② 〔美〕杰克·贝尔登：《中国震撼世界》第109页。

正在这时，中国文坛发生了一件影响深远的大事：《解放日报》在鲁迅忌辰，十月十九日，正式发表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第二天，中央总学委发出通知，称它“是中国共产党在思想建设理论建设的事业上最重要的文献之一，是毛泽东同志用通俗语言所写成的马列主义中国化的教科书。”要求“各地党收到这一文章后，必须当作整风必读的文件，找出适当的时间，在干部和党员中进行深刻地学习和研究。”十一月十七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又发出“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

㈠、十月十九日《解放日报》发表的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规定了党对于现阶段中国文艺运动的基本方针。全党都应研究这个文件，以便对于文艺的理论与实际问题获得一致的正确的认识，纠正过去各种错误的认识，全党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研究和实行这个文件的指示，克服过去思想工作中作品中存在的各种偏向，以便把党的方针贯彻到一切文艺部门中去，使文艺更好地服务于民族与人民的解放事业，并使文艺事业本身得到更好的发展。

㈡……各根据地党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把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问题，看成是有普遍原则性的，而非仅适用于某一特殊地区或若干特殊个人的问题。无论是在前方后方，也无论已否参加工作，都应该找到适当和充分的时间，召集一定的会议，讨论毛泽东同志的指示，联系各地区各个人的实际，展开严格的批评与自我批评。

……

这是新时代的要求，文艺界的号角。

抗日战争爆发后，共产党建立起巩固的革命根据地，亿万工农作为一支最重要的政治力量和军事力量迅速地崛起在历史舞台上。在解放区，李有才们推翻了阎恒元之流的豪绅地主封建统治，成为社会的主人，他们不但使根据地的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氛围、心理情绪各方面都呈现出新的因素和景象，还强烈地表现出精神上的翻身要求，对于文学艺术不再自卑地望而却步或采取漠然置之的无视态度，而是产生了大踏步闯进这大雅之堂发号施令的勃勃雄心，对于表现他们自己的思想、情感、意愿、追求的文学艺术更显示出空前的兴趣和热忱，这意味着三十年代提出的文艺大众化终于成为人民发自内心的精神要求，社会也提供了理想的创作环境。人民的愿望左右着时代的潮流，伟大的人物因势利导，推波助澜。于是，和人民脉息相通的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首先提出：新文化“应为全民族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一九四二年，他又听取了许多同志的意见，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集众人之智慧，应时代之要求，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文学艺术如何为人民大众服务的问题，从理论上作了全面的、精辟的阐述，并规定了具体的方针和路线，从而为现代文学创作中重要阶段的更替划下了一条历史性的分界线。

这是赵树理多年来竭力反对却又苦于讲不清说不服的问题，现在，毛主席高瞻远瞩，在遥远的延安就把一切问题给看透了，解决了，真使他佩服得五体投地，他一遍又一遍地

学习《讲话》，就好象腊月天遇上了米酒油馍木炭火，心里亮堂堂的、暖融融的，荡漾着一丝甜蜜的醉意。他后来说："毛主席的《讲话》传到太行山区之后，我象翻了身的农民一样感到高兴。我那时虽然还没有见过毛主席，可是我觉得毛主席是那么了解我，说出了我心里想要说的话。十几年来，我和爱好文艺的熟人们争论的、但始终没有得到人们同意的问题，在《讲话》中成了提倡的、合法的东西了。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高兴。因为这是关系到中国几亿读者的大问题，要满足这样广大的读者的要求，不是一两个，几十个，几百个作家能包下来的事。这是必须动员全体文艺界一起来干的伟大的革命事业。毛主席在《讲话》中给文艺工作者指出了革命文艺的发展方向，给了我很大的鼓舞。"

赵树理谈着谈着，兴奋得手舞足蹈，哼着心爱的上党梆子，在地上跑起圆场来。但这还抒发不尽心头的喜悦，他又冲出屋子，奔向山巅放声高唱。这时，千里太行，白雪皑皑，就象大海的雪浪花，重重叠叠，起起伏伏，正以不可遏制的气势向云天苍茫处奔涌。夕阳西下了，那浑圆的落日，给这银铸玉雕的太行山涂上了一层辉煌的暖色，村舍和田野，森林和牧场，山和水，天和地，全都和谐地浸浴在红彤彤的光彩之中……

此时此景，将永远珍藏在赵树理的记忆中。

他对《讲话》爱不释手，反复研究，最后，凭他惊人的记忆力，竟能一字不拉地背下这篇二万字的著作。有些论断，成了他日后创作的座右铭，比如：

一切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只有联系群众、表现群众，把自己当作群众忠实的代言人，他们的工作才有意义。

由于长期的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统治，工农群众不识字、无文化，所以他们迫切要求一个普遍的启蒙运动，迫切要求得到他们所急需的和容易接受的文化知识和文艺作品，……对于他们，第一步需要还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所以在目前条件下，普及工作的任务更为重要。

任何一种东西，必须能使人民群众得到真实的利益，才是好的东西。

从此以后，《讲话》精神就成了赵树理艺术生命的灵魂。他是第一个成功地实践、并且自始至终坚持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作家。

第八章 根深叶茂

赵树理完成《李有才板话》后，并没有再接再励，继续进行小说创作，却出人意料地把注意力重又转向农村剧运。这倒不是出于一个戏迷的癖好，或是他生性喜变。实乃一个革命者自觉服从斗争的需要——这是赵树理性格中最本质的特征。

一九四三年三月，中央文委曾专门讨论过戏剧运动的方针问题，认为戏剧向来是艺术与群众直接结合的最主要方式，应当大力发展，使之更好地为战争、生产和教育服务。

可惜农村剧运恰恰是太行区文艺工作的薄弱环节。不少戏剧界的同志，虽然置身于硝烟弥漫的战争环境中，并由农民供养着，灵魂却还在艺术的象牙之塔里安睡。他们以为用戏剧来表现根据地的对敌斗争、生产自救、普及教育等社会政治问题，便会流于庸俗化，失去戏剧的艺术价值和艺术生命力，成为卑下的宣传品、政治的奴仆。因此，他们过份地强调艺术的特殊性，过分地迷信“大”和“洋”，却无意从事富有战斗性的、短小精悍的、适合形势需要的戏剧创作，或对根据地数以百计的农村剧团及秧歌队加以技术上的指导。有段时期大演《日出》，由于物质条件的限制，从晚上十来点

钟开始，一直演到第二天真的“日出”，即便是曹禺的崇拜者，也看得呵欠连天、昏昏欲睡。所以徐懋庸批评道：“几年来，许多剧团一味的喜欢演‘大戏’给干部看，对于老百姓、部队和工厂的‘几年没有戏看了’的呼声，则置若罔闻”。①

作为新华书店的编辑，赵树理同农村剧运倒确乎是不相干的，满可以安心从事小说创作。但他对革命工作持有一种独特的见解：凡是干群众于革命有利的，无论关己不关己，他都怀着最大的热心，名利得失则在所不计。因而当中央宣传部的文件传达后，他宁愿放弃必将获得更大声誉的小说创作，自告奋勇地“不务正业”，转向农村的戏剧运动。

是年年底，赵树理唯一的多幕话剧《两个世界》完稿了。这是一部直接为战争和生产服务的宣传品。它密切配合当时正热烈开展的拥军活动，运用赵树理最拿手的对比手法，描写了太行山某村由敌占区变为解放区的迥然不同的两个世界，从而鲜明地揭示出一条抗日真理：“民族救星共产党，国家长城八路军”。

剧本的素材来自山西陵川县，那里原是顽固派庞炳勋部队的驻地。他们实行毁灭性的“备战备荒”，将老百姓赖以为生的牛马驴羊搜括一空，杀死、烤干，然后装进子弹箱，一旦日军来犯，便逃之夭夭，躲在深山，大嚼美味的牛肉干，还要下令方圆四十里内不准举火，以免敌人发现他们的行踪。当地群众竟有两月之久不能烧火做饭，饿死病死者不计其数。

幸而八路军赶来，打跑了敌军和顽军，并且劝告人们：

① 徐懋庸：《太行文艺界歪风一斑》

“大家再不要打死的盘，要打活的盘。我们既然要活，第一先要把各家的死人埋了。人死的太多，连抬的人也没有了！我们军队驻的地方，都是军队帮着老百姓抬了，没有驻军的地方，大家就要组织些互助队，这家给那家抬，那家给这家抬。第二还要吃东西：敌人跟顽固军队搅得老百姓没有种上地，后来又遭了旱灾蝗灾，大家都没有吃的，怎么能活到明年夏天呢？边区政府跟八路军总部号召大家——不论军队，不论政府，不论老百姓——都趁这秋天，赶紧一律打野菜，采树叶，准备渡明年春天的灾荒！”一席话说得人们欢欣鼓舞，赞叹道：“这又成了咱们的世界了！”

不过剧本在艺术上是完全失败的。赵树理对于大型话剧的创作规律和技巧好象所知甚少。《两个世界》与其说是剧本，还不如看作对话体小说。全剧既没有戏剧性情节，也没有必要的矛盾冲突，整个结构松松跨跨，头重脚轻，还充斥着上述那样的渡荒、拥军的说教。“一切文艺固然是宣传，而一切宣传却并非全是文艺。”[①] 今天看来，这个剧本的主要价值在于让我们见到了《灵泉洞》的雏形。

他似乎很有自知之明，此后再也不碰话剧了。然而对农村剧运的热心依然如故，毫不因创作方面的失败而有所冷却，但是改变了方式方法。

不久，他便为太行剧运和上党梆子立下一功，动员了太南名角段二淼出山。

段二淼以扮演小生、须生而名闻遐迩，唱腔优美生动，做

① 鲁迅：《三闲集·文艺与革命》

功洒脱俊逸，在晋东南一带享有盛誉，号称“活罗成”。民主政府早就想团结他，以便推动旧艺人为抗战服务。然而虽经胜利剧团的王聪文多次邀请，他却总是顾虑重重，下不了决心。因为旧艺人吃饭穿衣，凭的就是那一套本领，所以他们相当保守，轻易不肯传人，也不肯打破老一套，而当时的许多剧团为了便于宣传，常由须生、净角唱上党梆子，旦角、丑角、小生唱襄垣秧歌，俗称“风搅雪”。

这年腊月，王聪文遇见赵树理，不无遗憾地说起此事。赵树理也是段二淼的崇拜者，最看重他的罗成戏，而且也知道他之出山将对晋东南的剧运和抗战产生一定影响。因此，他甘冒丢脸的危险，在数九寒天和王聪文一起去平顺县寺头村劝说段二淼。同行的还有一个初出茅庐的戏剧工作者程联考。

赵树理不急不躁，跟段二淼高谈阔论上党戏的渊源、流派、唱法、做功，随带着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向他宣传根据地的形势，听他倾诉名艺人在旧社会的苦楚。结果，段二淼心悦诚服，高兴地说：“你看，你有那么多文化，满肚子都是文章，现在为了打日本鬼子，特地来劝我，咱一个旧戏子，还能不把那绿豆大点本领拿出来，为抗日救国出点力？”接着，他们又讨论了大戏与闹戏合作的可能性和前途。赵树理说：“过了年，正月要开展拥军爱民活动。为了配合这个运动，咱们就干脆用这种形式编一个表现军民鱼水情的剧本吧。”于是这四个人就扯谈起这方面的好人好事来。

“当我们把自己了解的情况他一言我一语穿插着说了以后”，年青的程联考回忆道，“赵树理就说：‘在剧作上这叫搜集素材。咱们有了这么多素材，再研究研究哪些有用。’于是

我们又扯了一阵子，舍去了无用的，留下了有用的。赵树理又说：‘这在创作上叫剪裁。现在咱们再看看什么样的人物放在一起会产生矛盾。’接着他就把剧本和结构布局、故事情节、人物关系的组合以及通过其矛盾冲突的产生、发展、高潮、解决，来表现剧中人物的思想情感和不同性格，以达到塑造人物的目的等等，一一进行了讲解。他说：‘这些都有了，下一步就得让故事中的人物说话了，就是说得用语言来表达了。在写的时候，一定要用群众能够接受了的，通俗易懂的话来写。’最后，他让我执笔，我说我写不了，他说我有这方面的底子，能行。

“以往虽然我没有写过剧本，但在他的鼓励下，我就大着胆子第一次拿起了编写剧本的笔杆子。我在前面写，他在后面改，不能用的他都重写了。”① 这个剧本，就是后来流传甚广的《双回头》，又称《双转意》。

“寺头村位于平顺县城正东四十多里的山顶上，那儿气候本来就比较冷，又适在腊月里，真是冷得滴水不流，打马不走。这四个人钻在一间简陋的小屋子里编写，一无煤，二无炭，手脚冻得发麻发僵。为了取暖，他们找了些棍棒来烧火。赵树理最怕冷，因而对火有特殊的感情，并有一套高超的烧火技巧，他自称“火神爷”，无论在何时何地，都要包干这烧火的活儿。这次自然也不例外，不准别人动一下。可惜棍棒太湿，他空有绝技，也不能不让它冒烟，呛得四人的脸上时常挂着两行清泪。

① 程联考：《和赵树理同志在一起的日子里》

“剧本《双回头》写成出版以后，边区各地特别是许多农村剧团，进行了上演，对配合拥军爱民活动的开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程联考又说：“这个剧本所以能写出来，主要是由于赵树理的指导帮助，可是在署作者姓名时，他却不让把自己的名字写上去，只让落下我和段二淼、王聪文三个人的名字。”

随后，赵树理又应襄垣农村剧团的邀请，放下工作跟着他们去各地巡回演出，度过一九四四年的整个夏天。

襄垣剧团成立于一九三八年，是太行区最负盛名的农村剧团，彭德怀曾亲笔为他们书写了一块：“抗日农村剧团的模范”的匾额。它的成长，有着赵树理的一份功劳。

这个剧团的前身是旧戏班子“富乐意”，① 生活腐化，名声很差。演员吸金丹、逛破鞋、耍大钱，唱戏时横吃烂喝，住房时乱屙乱尿乱糟塌，……改为剧团后，他们积习难改，依然堕落，但最糟糕的是没有新戏可演，唱的仍是老一套。群众不欢迎，便借口抗日，硬给各村下帖子，闹得关系十分紧张。这时赵树理正任专署民宣科长，他象及时雨似的送去了自己新编的历史剧《韩玉娘》，又敦促县政府加强领导，进行整顿。从此《韩玉娘》就成了他们最叫座的传统节目。演员张木和还因成功地扮演韩玉娘而被尊为“太行第一旦。”每当他唱到“担水”一段（这一情节不见于话本《白玉娘忍苦成

① 上党梆子分“潞府派”与“州底派”。“潞府派”由乐意班和三义班互相争雄、盛极一时，许多班社就投机取巧，借招牌打门市。这个俗不可耐的“富得意”便是其中之一。

夫》和京剧《生死恨》，无疑是赵树理创作的），总能博得富有爱国心与同情心的群众的喝彩。后来，他们又把“小二黑”请上舞台，效果更加显著，被人评为“深入的帮助了劳苦农民去解脱加在自己身上的封建锁链”。①

由于尝到过赵树理的甜头，所以《李有才板话》刚一出版，他们就决定把它改编成秧歌戏，并且特邀赵树理光临指导。于是，剧团的局面也由此打开。

秧歌戏，是每年正月晋陕民间举办“社火”时的表演节目。大都是一男一女互相对唱对扭，内容多少带点男女调情的意味。但它深入人心，老小皆喜，而且形式灵活自由，擅于反映现实生活。赵树理对它的喜爱和熟悉，仅次于上党梆子，因而欣然前往。剧本编成后，为了广泛听取群众的反映，作进一步的修改，他干脆放下自己在新华书店的工作，跟着剧团几乎跑遍了太行山所有的重要村镇，等他回到书店时，随身带去的两双新鞋——当地的家做硬鞋，结实得象皮鞋，足有二斤半重，即使走山路一般也能穿上五六个月——已经穿烂了。好在皇天不负有心人，这个秧歌剧的修订本，在一九四六年边区政府教育厅举办的文教作品评奖中荣获甲等奖。

赵树理回来后，新华书店在继续整风，业务大部停业，主要工作是向敌占区发行图书，这是一项极其重要而又艰巨的任务。他们将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和抗日救国思想的著作，按照敌占区当时流行的装帧设计，外面冠以伪装的书名和出版

① 泽然：《农村剧团的旗帜》，载1947年5月3日《人民日报》（晋冀鲁豫）。

单位，然后躲过敌人严密的文化封锁，流通到敌占区去。比如，他们曾将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和《论新阶段》伪装成《虞初新志》、《文史通义》向敌占区发行。伪装的《文史通义》的封面上，标明为“上海广益书局印行”。书内扉页上有赵树理的题字，右首写着“甲申年重梓文史通义”，中间是“文史通义”四个大字，左边是“古愚署斋”四个小字。扉页背面，有王春以“山阴旧史氏”名义撰述的题词：

> 章实斋氏《文史通义》一书，史德、史才、史识三者具备，乾隆间巨制也。近士夫溺于西说，对吾国历史学，视为土苴，心忧之爰，出旧匣所藏付梓，庶学者读之，有所趋向耳。
>
> 山阴旧史氏题

这种书籍伪装得维妙维肖，足可以假乱真。他们大摇大摆地从敌人的鼻子底下通过，向乱占区的人民宣传抗日和革命思想。

与此同时，新华书店还在开展普遍的大生产运动，每人要上交五百斤南瓜和二百斤土豆。因为赵树理经常外出，再加上体质弱劳力差，许多习惯于看表面现象的同志便不愿和他合作。赵树理不声不响，自己找老乡要了一块地把庄稼种上了。秋后，他的南瓜、豆荚、西红柿、山药蛋、都令人眼红地结得又大又好，轻轻松松就实现了党的号召：“一个好党员必须同时是一个生产能手。”

这年秋天，连续三年的特大自然灾害终于被人民战胜，日寇的“扫荡”也不如以前那么猖獗了。抗日战争由战略相持

转入战略进攻，边区军民开始向日军据点发起一系列局部反击，全面大反攻也业已着手准备。

十一月，太行区召开了第一届群英大会和生产战绩展览会。这是历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盛会，各路英雄劳模欢聚一堂，遂使前来采访的赵树理又获丰收。会后，他创作了脍炙人口的报告文学《孟祥英翻身》，以及鼓词《战斗与生产相结合——一等英雄庞如林》。

孟祥英是太行山上“半边天”的一面旗帜。过去，这一带见到下地干活的妇女，就象现在看到游手好闲不工作的女人一样奇怪，在人们的印象中，媳妇的天职就是关在屋里伺候全家，沏茶做饭、碾米磨面、端汤端水、扫地抹桌，……从早起倒尿壶到晚上铺被子、时刻不离，唤着就到；见个生人，马上躲开，自己不宣传，外人一辈子也不知道家里还有个媳妇。但孟祥英以极大的勇气，首先打破了这个不平等的陈规陋习。她走出家门，担水打柴。接着，在生产渡荒中又表现出非凡的组织才能和模范作用。领导全村妇女，春天锄麦子二百九十三亩，刨平地十二亩，坡地四十六亩。夏天打蝗虫，光割烧蝗虫的草，妇女就割了一万八千斤。其余采野菜，打白草，剥楮条，割麦子。种种农活无不胜任愉快，从而带动了各方面的工作，使得全村人民奇迹般地没有一个人饿死的。

党中央早就指出：“在日益接近胜利而又日益艰苦的各抗日根据地、战斗、生产、教育是当前的三大任务，而广大的农村妇女能够和应该特别努力参加的就是生产，与壮士上前线同样是战斗的光荣的任务。而提高妇女的政治地位、文化

水平，改善生活，以达到解放的道路，亦须从经济丰裕与经济独立入手。……这不仅对根据地的经济建设起重大的作用，而且依此物质条件，她们也就能逐渐挣脱封建的压迫了，这就是在整个群众工作中广大农村妇女的特殊利益的中心所在，也就是各抗日根据地妇女工作的新方向。”① 所以，孟祥英很自然地引起了最关心妇女命运的赵树理的注意，他打算为她立传。

但要写好这篇报告文学，仅靠会上的采访显然不行。于是赵树理跋山涉水，由山西黎城县的南委泉走到了河北省的涉县西岭口，去找熟悉孟祥英的乡亲，作一番实地深入的调查研究。

人们告诉他，孟祥英是个苦命的孤儿。九岁就失去了爹妈，十七岁出嫁时，还是自己打发自己上的轿。可是婚后更加倒霉，反而增添了两个凶狠的冤家对头。这里的风俗还和前清光绪年间差不多，婆媳们的老规矩是当媳妇时候挨打受骂，一当了婆婆就得会打骂媳妇，不然的话，就不象个婆婆派头；男人对付女人的老规矩也是“娶到的媳妇买到的马，由人骑来由人打。”谁没有打过老婆就证明谁怕老婆。而她摊上的又是一个非同一般的婆婆，年轻时广有姘头，练就了一张刀子般的铁嘴，不是当面百般辱骂媳妇，就是背后唆使儿子毒打媳妇，以此作为她晚年生活中的最大乐事。

孟祥英由于父母早亡，自小当家，养成了独立思考，主

① 《中共中央关于各抗日根据地目前妇女工作方针的决定》，载 1943 年 2 月 26 日《解放日报》。

持公道的性格。这使她的境遇愈益难堪，常常是婆婆下令丈夫执行，动不动就得挨打挨饿，完了连个哭诉的地方都找不到，也没人给说句公道话。她是个桀傲不驯的烈性女子，不甘忍受这无穷无尽的虐待。她痛恨家庭，痛恨社会、痛恨生活本身，走投无路之下，便想用死来抗议。她自杀过两次，一次吞鸦片烟，一次上吊，都因及时发现而保全了性命。

两年前，这个“山高政府远”的村庄来了共产党的工作员，委她以村妇救会主任的职务，英雄这才出了头，她觉得自己失去的只有锁链，因而无所顾忌，一脚踢开夫权和大男子主义，敢说、敢干、敢斗，很快就显示出英雄本色。昔日威风凛凛的婆婆和丈夫，再也不敢打、不敢骂，只能无可奈何地坐在一起，各人吸各人的嘴唇。

孟祥英翻身的经过，引起了赵树理深沉的思索，在封建宗法制的农村，尤其在这极端落后的山区，象她这样受尽非人待遇的妇女，真可谓比比皆是。直到那时，七、八岁的小姑娘，已经成了小脚，连走路都十分艰难。而她们的头脑，也和她们的脚一样，被包裹得紧紧的，除了丈夫的命令，根本不知道还有自己的自由意志。“线穿针、夫管妻”，“女人好比小推车，三天不打用不得”，便是当地农民世代相传的口头禅。尽管他们为了挣得自身的权利，曾猛烈地反抗封建剥削制度，却从未意识到这种口头禅正是应当打倒的封建主义、夫权观念。甚至当自己已经翻身作了主人，头脑中也仍然没有“男女平等”的概念。

一九四三年八月十八日，《新华日报》（太行版），报道了一则触目惊心的消息：左权县在两个月内连续发生了六起残

害妇女案。一个被勒死，一个被饿死，一个被逼上吊，两个不堪折磨而亡，还有一个，竟然是干部们集体打死的。为此，左权县妇救会大声疾呼，要求政府保障女权、惩办凶手。但习惯势力坚如磐石，人们囿于封建夫权和大男子主义的传统观念，视这些可怜的女性之死，犹如一只蚂蚁在无意中被踩死，大都以为不值得大惊小怪。类似的悲剧继续不断地发生着。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五日，《新华日报》又刊登了一则消息：就在孟祥英的家乡涉县，虐杀妇女的案件一年中多达十六起，而他们致死的原因，却微不足道得简直令人不敢相信。“如小东李东元打死其妻冯巧爱，是因为女人借过邻家玩钱，两人在路上吵起来，便用石头，活活打死。又如赵不理，以婆母资格，替子行凶，因媳妇纳鞋底不好，逼媳妇曹水沙拆毁重做，并有毒打事情，媳妇出于无法，竟漏夜上吊而死。招岗村张金顺，因为吃一顿熬菜，打得老婆白天上了吊。其它如申浮鱼因坏了一把蒲扇，江景仙因打死一只小鸡，这样小的事，在男人的打骂下，白白丧命。”毫无疑问，在这块解放了的土地上，妇女翻身远远没有实现，这是个亟需解决的社会问题。

实际上，赵树理一直在用愤懑忧虑的目光注视着妇女的命运。他说过：“《孟祥英》里的事，虽不是我自己的生活，可是《孟祥英》中所写的事，普遍存在于当日的社会中，而是我所见惯了的。”他正苦于找不到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现在，孟祥英的身世使他茅塞顿开。他认识到，动员妇女参加生产劳动，的确是保护妇女切身利益的关键所在。假使这些挨打受骂的年轻媳妇，都能以孟祥英为榜样，勇敢地冲破家

庭牢笼，投身于社会斗争，参加生产劳动，丈夫和婆婆必将无奈她何。这样，将有多少宝贵的生命免于毁灭，她们又将为革命事业贡献出多少力量，创造出多少财富啊！很清楚，这比仅仅学习孟祥英怎样生产渡荒，意义不知要重大多少。于是他改变了原先的创作构思，决定着重描写孟祥英翻身的过程，来启发劳动妇女们解脱因袭的负担，挺起腰杆，一往无前地去争取自由平等的女权。

一九四五年三月三十日，《孟祥英翻身》以单行本问世。在正文前，赵树理写了一段小序：

“因为要写生产渡荒英雄孟祥英传，就得去找知道孟祥英的人。后来人也找到了，可是得到的材料，不是孟祥英怎样生产渡荒，而是孟祥英怎样从旧势力压迫下解放出来。我想一个人从不英雄怎样变成英雄，也是大家愿意知道的，因此写成这本小书，书名就叫《孟祥英翻身》。至于她生产渡荒的英雄事迹，报上登载得很多，我就不详谈了。”这本小书没有辜负作者的期望。孟祥英跟着小二黑与李有才，走进了千家万户的生活天地。据八月十三日的《新华日报》报道，“小说《孟祥英翻身》、大鼓《劳动英雄庞如林》等销路最畅”。

劳动英雄庞如林，也是这次大会上的风云人物。他因出色地领导家乡人民实行“劳武结合”而名扬太行。三年前，他从前线回到麦阳老家、组织乡亲搞互助变工，其工作方法颇象“咱们的牛百岁”，把别人不要的懒汉、特务、无粮户全部团结起来，队伍从四个人发展到四十一个。可惜地少人多，互助组有劲也使不上，“全庄不过四顷地，还是些荒坡野屹梁，好年景打下粮食都不够用，何况这连年遭灾荒”。但他的家乡

与敌占区接壤，那边却是地多人少，而且因受敌人骚扰，“小谷苗长成马鬃样，锄不出来干着慌，每一工小米二升半，想雇短工没人当”，聪明的庞如林便因地制宜，改“变工”为“卖工”，武装起十二条好汉，由他亲自带队，开赴敌占区，一面干活挣粮，一面打击敌人。这样，“赚来了小米不饿肚，又帮助了敌占区里众老乡。”结果，他的创举成绩裴然：

卖工队今日走到东，
东庄上学习互相大变工，
卖工队明日走到西，
西庄上学会打游击。
东庄上来了卖工队，
互助小组把他陪。
西庄上来了卖工队，
游击小组紧相随。
东也有人陪，西也有人随，
人人称赞有声威。
卖工队好比鱼在水
在敌占区里满天飞。
一共卖工二百六，
赚小了小米一大堆。
东岭山头一场戏，
给东岭老乡解了围。
向阳坡前打一仗，
打得鬼子血花飞。

这真是对己对人两方便，
生产战斗双占魁。

劳武结合，是解放区人民在战争环境中创造的最佳策略。《解放日报》曾以《敌占区军民的道路——战斗与生产结合起来》为题发表社论，认为它“会更加减少人民在敌寇‘三光政策’之下的生命财产的损失，并且相应增加生活资料的生产。反过来，敌寇的损失将因民兵的发展而增大，敌寇的掠夺将愈益感到困难。”

为了迅速推广庞如林的先进经验，赵树理改换手法，把他的事迹写成了鼓词。因为大鼓书最通俗、最简易，只消一副鼓板或一把三弦，便可在任何场合演唱宣传。这篇鼓词发表后，果然迅即流布游击区，边缘地带的人民如获至宝，有的整县地组织起卖工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抗日的胜利。

由于顺利地渡过连续三年的特大荒灾，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也由黎明前的黑暗转为红日喷薄欲出。于是，边区人民对文化娱乐，表现出空前的热忱和兴趣。春节前后，太行山人民掀起了一个自编、自演、自唱自己的生活斗争的文艺热潮。

临城西岭村的全体村民，倾村出动闹“大玩意”。男女老幼，各尽其才，每人都自由扮演自己所擅长的角色，自由选择自己所适合的场合，自编唱词，自导动作，减租、生产、打蝗、救灾……。爱怎样表演就怎样表演，一时闹得热火朝天，远近轰动。平東测渔村的孩子们，人小志气大，悄悄地在一个破房子里独自闹起“红火”。没有剧本自己编，没有乐器使

用铜盒木板代（这一带的襄［垣］武［乡］秧歌，不配管弦，只用锣鼓伴奏，因而又叫“干板秧歌”）。买不起炭火和灯油，就去拾煤渣当炭烧，捡大麻子换油来点。……

这股热潮席卷太行，边区政府好不高兴，乃决定予以总结奖励，特聘请赵树理与另一位同志来评选各地涌现出来的秧歌剧本。

评选工作是件意想不到的苦差。征选来的二百一十七个剧本，绝大多数出自非文化人之手，“他们用的稿纸，不但没有格子，而且也不分大小和新旧，有时候把那一面印的旧书拆开翻过来当作稿纸用。”赵树理诉苦道。通篇不分章节，不留边沿，黑墨笼统写成一片，把厉行节约的原则彻底地贯彻在稿纸上。上面的字有核桃大的，也有瓜子大的，还有除了作者谁也不懂的“象形文字”，看起来无异于读“天书”。

可是赵树理很乐意吃这苦头，并觉得其乐无穷，颇受教育和启发。他说：“群众写出来的具体生活，有许多是我们文艺工作者事先不易体会到的。看了他们的东西，使我感觉到接触的社会面太狭窄、肤浅。”

“这一年，太行山里流行的文艺作品，有《诉苦翻身》、《劝夫参军》、《杀敌英雄》、《劳动模范》等几个类型。这些自然都是值得写的，但只有这几面构不成个社会，可惜大家都不易跳出这个圈子，及至看了些群众写的剧本，我才又发现了些我们的笔墨还不曾走到的新世界。例如山西平顺县南庄沟村有个人叫王元，写了个剧本叫《秦春宝放牛》，里边写到放牛孩子过去的苦处，写到他们十二个村子的洋歌比赛，写了些本村人物小评。轻轻巧巧反映出减租减息后人民的欢乐。

又如山西辽县人写了个小剧叫《神虫》,写他那地方遭了蝗灾,大家正在打蝗虫,有个老头却在那里用符咒镇蝗虫,最后看见自己的符咒不顶事,就拿着画了符的木板参加到群众队伍里打起来,也是没费很大力气就写出一个老年人的思想转变。这些都足以说明群众各人有各人的社会生活圈子,合起来比我们的生活圈子大得多。”—— 后来经过赵树理精心修改,这两个剧本都被选入‘人民文艺丛书。’

群众创作的视野和才能,使这位专业作家万分激动。他在《秧歌剧本评选小结》中写道:“这中间并无什么作家或戏剧家,而都是群众的创造,可见历来工农群众是蕴藏着无限的智慧。由于长期受到封建统治的蒙蔽,使得聪明才干得不到发挥,正如农民自己的诗:‘屋漏锅破肚皮饥,债主逼债两泪啼,冬寒无衣又无被,哪有心思想别的。’一旦这黑暗统治被推翻,如拨云雾见青天,群众的惊人智慧,便被历史所发现。现在群众说:‘天上有北斗星,地下有毛泽东,他是指路的明灯,使咱由黑暗里看到光明。’正因为是如此,所以人民走上了自己的时代,而充分发挥着创作天才,现在正是这样一个开始。”

在评选中,赵树理还高兴地发现,自己在三九年首创的用本村事教育本村人的节目,已被许多村子所采用:一件工作不能开展,就研究一般人的糊涂观念,编成戏打通他的思想,如武乡广寒村,去年动员参军时,大家都不愿去,剧团就根据本村的人和事编了个拥军小戏,表演八路军的病号住在这里时,妇女任劳任怨,尽心竭力地照料他们。演出后立竿见影,当场就有五名青年报名参军,迅速有力地配合了中

心工作，不少地方的群众甚至习惯成自然，把戏剧视为解决实际问题的楷模。“在襄垣，当群众还不知道怎样订生产计划，就盼望剧团能演出剧本来好学，一到《李来成家庭》演出，普遍学会订安家计划，而且家庭不和的，看过戏后也和睦了。建立范模家庭广泛地开展着。”①

群众的态度，决定性地影响着赵树理的文艺思想。他在这里找到了创作“问题小说”的精神支柱，也对群众性的农村剧运愈益重视。

不久，他得到一次实践自己的主张的机会。

四月五日，太行区模范文教工作者暨文教展览会在涉县开幕。赵树理作为大会工作人员，负责开设“新华坊”——一种配合大会内容，活跃大会气氛的墙报宣传栏。让这位大名鼎鼎的作家，办报老手来编一个墙报，真好比杀鸡用上了牛刀。可他绝无一丝一毫的委屈或轻视的情绪，跟每次办报时一样，真诚地倾注上自己全部的心血，“不但亲自写，亲自编，还亲自一个字一个字的缕刻。”② 不过，他的工作方法与过去略有不同。他四出游说，请有文化的代表踊跃投稿，动员群众参加到“新华坊”里来。他还替不识字的招待员、理发员、炊事员代笔，口气模仿得维妙维肖。这样，既保证了稿源，又使墙报生动活泼，通俗易懂，每天，“新华坊”前人头攒动，代表们流连忘返，居然影响了会议的进程，致使大会不得不下令暂停两三天，好让代表们集中精力思考和讨论

① 赵树理、靳典谟：《秧歌剧本评选小结》

② 陈文《关于赵树理》，载《山西文艺史料》第3辑。

问题。当然，这样的命令是赵树理乐意接受的。

赵树理主办的“新华坊”，给代表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闭会时，他们反映道：“书店应出版一个通俗杂志，象‘新华坊’一样，大家写，大家看。”[①] 于是在一九四五年六月一日，一份面向工农兵的普及性读物应运而生，新华书店和韬奋书店联合创办了《新大众》半月刊。它的投稿方法，便是赵树理文艺主张的具体化：

> 一、《新大众》是个大众杂志，为大众来办，办给大众来看，因此，我们要求各地小学教员、农村剧团、区村干部、妇女、青年、儿童……凡是能识一千字左右的，都来共同参加这个杂志。
>
> 二、怎样共同来办？就是给杂志经常写稿。你做的什么事情，便写什么事情，只要这件事同大家有关系。
>
> 三、不能写怎么办？话怎样说，稿就怎么写。写别字，写的不通顺，都不怕，写几次就通了。快板、秧歌、戏剧、小调、故事、鼓词、民谣、连环图画……都欢迎。劳动、杀敌英雄，模范工作者做的事，说的工作经验，照样记下来，就是好稿子。

赵树理照例担任了这个刊物的编辑，也照例工作得非常出色。有一次，编辑部收到一篇平顺县北头村集体创作的鼓词，内容很有意思，说的是村干部设下妙计，神婆子上当露底，揭穿了她借迷信骗钱财的故事。可它写得却词不达意，句不通顺，音不押韵，本领再大的艺人也无法演唱它。于是，对“三仙姑”颇有研究的赵树理就当仁不让地改写起来，第二天

① 冯诗云：《办一个通俗杂志的经验》，载《北方杂志》第一卷第3期。

就交给编辑部一篇焕然一新，极富喜剧味的幽默小鼓词。他又告诉主编，这虽然是另起灶炉，面目俱非了，但内容和主题都是人家提供的，要用来稿者的名字发表。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整整八年的浴血抗战终于胜利了。消息传来，太行山上一片欢腾，人们高兴得疯了一样。青年人连蹦带跳，狂呼大笑，简直不知道怎样才能表达内心的激动。老汉们比较安静些，都拈着自己的白胡须说："哈哈！咱们没死，就把鬼子熬败了！"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具有顽强生命力的中国农民开始重整家园。"垒小了的大门又都拆开了，埋藏着的东西又都刨出来了。砖瓦窑又都动了工，被敌人烧坏了的门楼屋顶都动手修理着。各家又都挂起中堂字画，摆上方桌，太师椅，箱笼、橱、柜、蜡台、镜屏……当媳妇的也都穿起了才从地窖里刨出来的衣服到娘家去走走。"

可是，战争的火焰并未熄灭。八年来龟缩在晋西一隅的阎锡山，这时却伸出魔爪，气势汹汹地前来抢夺人民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胜利果实。

阎锡山不愧为山西的土皇帝，深知上党地区的战略意义。抗战伊始，他就要薄一波带领新军去晋东南，他说：自古都说山西是形胜之地、表里山河，其实上党才是表里山河的表里山河呢。历代都把那里看作是兵家必争之地，因为得了上党，跨过黄河就是洛阳，就可以得天下。不料新军的领导权掌握在共产党的手中，他白白地陪了夫人又折兵。此后，他无时无刻不想重新控制上党地区。一九三九年，他在这里制

造了血腥的“十二月政变”，但终究未能到手。一九四一年，又和日军达成协议，派兵驻扎在汾东浮山县一带，作为窥视上党的基地。日本投降前夕，他洋洋得意地以为时机已到，不顾部下反对，把上党与太原，大同并列为首先接管的目标，命令第十九军军长史泽波在浮山县集结万余兵力，于八月十七日奔袭上党重镇长沼城，企图一举夺取晋东南军民用血汗建立起来的革命根据地。他想得很美：一方面，利用尚未撤退的日军里应外合，上党唾手可得；另一方面，上党到手，能从根本上打击共产党，八路军在山西的力量，他就可再度登上山西土皇帝的宝座。

然而，阎锡山的算盘打得太如意了。他所占据的不过是人民战争汪洋大海中的几个孤岛而已，同时也短促得令人可笑。一月之后，在刘伯承、邓小平的亲自指挥下，长治敌军就陷入了重重包围，孤立无援地应付着八路军的猛烈攻击。这种闪电般的凌厉攻势，打得阎锡山惊慌失措。他一面电告守军：“上党必争，潞安必守，援军必到，叛军必败！”一面增派两万多军队前去接应。但是一切都无济于事。十月上旬，守军和援军全部覆灭，敌酋史泽波也在赵树理的家乡沁水端氏镇被俘。上党战役是阎锡山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绝妙写照。他苦心培植的精锐部队有一半在这里灰飞烟灭，而他痴心妄想的上党地区却永远属于人民了。所以有人为上党战役赋诗道：

八年浴血望和平，望断峨眉走罴熊。
阎部奉先犯上党，卫果我自劲角弓。
寒鼓初惊黄粱梦，秋风奏报凯歌声。

此役歼敌三万五，解放战史第一功。

上党战役解放了赵树理的家乡。过不几天，他获得了八年来第一次回家探亲的机会。

在那逝去的岁月中，赵树理跟处于敌占区的亲人失去了一切联系，音信全无。好在他的脑海中时时刻刻充满了危难存亡的国家命运，艰巨繁重的工作任务，家乡似乎是个轻淡而久远的记忆，即使偶尔想起，也是瞬息即逝。但现在放下了所有的工作，专程回去探亲，那些轻淡而久远的记忆就一下子变的清晰而沉重了。阔别八年的村庄和家庭，父母、妻子、妹妹、孩子，还有那些可亲可爱的老、小字辈们，全都错杂纷乱地在脑子里浮现出来了。他突然强烈地意识到，自己原来是无时无刻不在思念他们，渴望知道他们在这动乱的年头是怎样生活的。他毕竟是农民的儿子，骨子里有着中国农民固有的乡土观念。一种迫不及待的冲动不知不觉地袭上了他的心头。

金秋季节，太行山上万木萧疏，百草萎黄。劲风吹来，丛生在崖际的细草，就会翻起一层象湖水一样柔静的金浪，但山腰上的黄栌林和一块块未收割的高粱地。却红艳艳的，燃烧得有如熊熊烈火。赵树理一路走着，心情恰如那熊熊烈火。有人说过："从离石的鸦儿崖到沁水的马邑，走了半个多月。在这八百里路的旅程中，我们目击村庄都成了废墟。而在这些废墟之上，死了多少的人啊！如果所有被屠杀者的血汇流

到沁河，一定会使沁河涨水吧？”[①]

晌午时分，他到达尉迟村。街上也是杂草丛生，各家的房子塌的塌，倒的倒，门窗差不多都没有了。但村子里的面貌仍是八年前的原样。熟悉的道路，熟悉的沁河，熟悉的尉迟庙，熟悉的老槐树，这一切忽然勾起了他一种说不清是兴奋还是难过的激动，一颗心不由自主地蹦蹦直跳。

当他走进村子的时候，街上的妇女儿童相见不相识，光用惊奇的眼光注视着这个陌生人的去向。还是几个蹲在墙根的老汉认出了他。

“这不是赵家的得意吗？”

赵树理点头称是，笑着向老人们打招呼。街上的人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是出走多年书信没有的小芬的“大”回来了。人们一齐涌了过来，七嘴八舌地吵嚷着乱问：

“你走了有十来年了吧？”

“唉！你到底回来了，可把家里想苦啦！”

“听说你当了八路军的大官，咋不骑马回来？”

“咱村子里可真有风水，出了你这个人物！”

“这些年你在哪里打仗啊？”

“不对！听说是在大衙门里写文章哩！”

“……”

他在人们的簇拥下，一面回答一面走着，快到自己的家门时，看到母亲拄着根棍子也从屋子里走了出来。他赶紧迎上去，扶着她喊道：“娘！我回来了！”老母亲紧紧地抓住他

① 周立波：《从离石到沁水》

的手，一句话没说就哭起来。赵树理从小就心软，这几年虽然磨炼得硬了一点，可是八年多没见一个亲人，眼看着母亲泣不成声，怎能不动情？他的两眼也涩辣辣的有些湿润。

周围的喧闹声霎时静寂下来，饱经忧患的乡亲们同情地走散了。他们明白，久别的母子该有多少话要讲啊！

赵树理挽着母亲走进屋里，娘用袄襟擦干了眼泪，先细细地摸索，打量了一番儿子，然后夹叙夹问，一边询问他在外边的情况，一边倾诉家中这几年的变化。

赵树理直到这时才知道，父亲已在两年前被日本鬼子杀害了，而且死得非常悲惨。

抗战爆发后，和清老汉挑起了全家的生活重担，千方百计弄钱餬口，他本来是个不能吃苦的人，上地得随带太湖，替他端水壶，捧《红楼梦》，一累了就跑到树下去纳凉，喝茶看书。这时却须没命地干活方能勉强度日，农忙时种地，农闲时编簸箕，时常还要外出算卦，以补家中无米之炊—— 荒灾年头，全家用玉米棒加榆树皮充饥，连糠也吃不上。这些年，他一面骂儿子“不争气，不养家，我还得给他养活二三口人”，一面又成天求神拜佛，打听儿子在外的安危，请求菩萨多多保佑。

这一带原来驻扎着蒋介石的第三十三军团、后来这部队被人打散了，遍地都成了溃兵，跟日军一起骚扰老百姓。一九四一年，来了八路军的地方工作队，把周围的土匪溃兵肃清以后，这里就成了和日军相持的边缘，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那天，和清老汉提了几斤自制的蜂蜜去跟人家换红薯。他原定头天出门，只因照老规矩翻看历书，那天“不宜

出行”，所以推迟了一天。殊不知神仙可恶，捉弄了这个最虔诚的信徒。这天，他一出门就碰上了“清乡”的日本鬼子。沁水当时是敌我拉锯的游击地区，敌人经常下来狂捕滥杀，这一次就无辜地抓走了三十多个百姓，其中有赵和清与他的一个堂弟。

敌人把他们押到离尉迟村五里远的望川村村口，先用枪托皮带轮番毒打，然后用刺刀捅倒，分批塞进村口的茅坑。[①] 每塞进一层人，就铺上一层高粱杆用火烧，接着再扔下一层石头。……

鬼子走后，乡亲们赶紧打捞。这些人已被烧得焦头烂额，连模样也看不清了，身上的皮一扯就掉。赵树理的母亲是凭着裤带上拴的钥匙才认出和清老汉的。当年，他还不满六十岁。而他日夜思念的儿子正在这时崭露头角，蜚声太行。可惜他至死没有听到这一喜讯，也永远见不到自己苦心培养，引以自豪的赵树理了。

赵树理的儿子太湖，正当十六岁，小伙子血气方刚，目睹爷爷的惨死，一跺脚投奔了抗日政府，剩下的一老一少两个女流，全赖赵树理妻子关连中抚养，陀螺似的忙里忙外，种地做饭。而赵树理又音信杳然。几次请神求卦，也总是凶多吉少，一会儿说他在外做官纳妾，一会儿又说他死于非命了，……但她毫无怨言，默默地用自己瘦弱的身体支撑着这个飘摇破落的家庭。……

① 上党地区山高土脊，农民视粪为宝，茅坑挖的特别大，深度要超过一间房，上面用石板或木板盖住，板上开有小口。

说到这里，人们忽然又涌了进来，把浑身泥土的关连中推到跟前。在众目睽睽之下，赵树理空有千万句感激的话语，也只能化为淡淡的一笑，互相问一声："你回来了！"

接着，在村后的小山沟里挖野菜的女儿也被叫回来了，这个九岁的女孩还没有父亲的印象，她记得："一进村，就看见我家院外挤满了人。大家见我回来了，就闪开一条路，妈妈指着被围在中间的一个又高又瘦穿着一身灰衣服的陌生人让我叫大，我羞怯地嗫嚅着。那个陌生人笑着从阶上下来，一把将我抱在怀里。"

这天傍晚，一家四人聚坐在院里吃晚饭，小石桌上摆着两碗粉丝调豆角之类的凉菜，端着的大海碗里是小米、南瓜、山药蛋熬成的合子饭，调了醋，烹着野韭花，热腾腾，香喷喷……整整的八年之久，赵树理没有享受过这种无可言喻的天伦之乐。但他没有陶然沉醉在小家庭中而忘了工作。回家半月，倒有一大半时间在外调查研究。其时正值中秋佳节，人们有生以来第一个象样的充满了胜利和幸福的大团圆的节日，村子里飘散着炮制月饼和煮鲜玉米、毛豆角的特有香味。他在如水一般的月光下串门走户，拜访那些老年人，那些受苦最深的妇女们，那些走在斗争前列的积极分子，了解战争中家乡的人事变迁。

在一九四五年余下不多的日子里，赵树理几乎倾全部精力来写作长篇小说《李家庄的变迁》。它当时的题目叫《李家庄的演变》。

大约在抗战胜利之前，领导上就希望他写一部揭发阎锡山罪恶历史的小说。这个任务正中他的下怀。他土生土长于

山西省，前半生的足迹很少出晋，目击了阎锡山的全部独裁统治，而且深受其害，那些混和着血泪的记忆一直折磨着作家敏感的神经，如骨鲠喉，不吐不快。所以日本鬼子刚一投降，他就发表了快板《汉奸阎锡山》，历数土皇帝的发迹史与滔天罪行。这首快板通晓畅达，切中要害，表明他已经搜集了大量资料，但是小说却迟迟不见动笔，直至上党战役爆发才得以促成。为了动员群众积极投入上党保卫战，赵树理开始赶写这部暴露阎锡山黑暗统治的小说。然而，他的写作速度跟不上八路军进攻的速度，小说创作未能随着战争的结束而结束。自然更谈不上配合中心任务、直接为战争服务了。

赵树理有个特别的写作习惯：喜欢一气呵成、不愿中途搁浅，否则，往往就失去了写作的兴趣，半途而废——这样的半成品据说为数不少。当他回家探亲时，这项工作便令人担忧地中断了，但这次却万幸没有出现夭折的征兆。看得出来，他对此行十分满意，不仅使他得到了罕见的快乐，而且家乡的见闻丰富了小说后半部分的内容。回到新华书店后，他决定集中所有的精力和时间来完成自己的第一部长篇。

赵树理的创作过程也很特别。这些通俗小说的提纲和人物小传——恐怕谁也意料不到——是用文言写的。——据云取它的言简意赅，没有废话。他说："我的提纲只有自己能懂，我的人物小传，也只有几百字，有时对人物十分熟悉连几百字也不要，只要几个字。"然后，他要拿着这奇妙的提纲去同王春商量——这位亲密战友对赵树理的小说影响颇大，常常是言听计从——并在最后动笔时，还要反复思考，反复修改尤其是刻画人物性格的情节、经常更换，尽力探索最有代表

性的故事。

显然，这是一个相当艰苦的创作过程。可是为这种精神生产所必需的物质条件似乎更加苛刻。赵树理的一个战友曾作过生动而感人的描写：

“日本宣布投降的那一年冬天，我从外面工作回来，天晚了，没有房子住，便搬到赵树理同志的房里去。他房里没有桌子，窗口放一张小炕桌，一个破瓦盆，上面架着两块木炭火，一个墨水瓶，一支钢笔，一卷稿子，再加上装烟末用的油墨盒子和三四寸长的小烟袋，这便是他的全部设备。

“黑夜，我先睡了，他盘膝坐在炕上写小说，什么时候睡觉，我不知道。

“天快亮了，我忽然听到‘嗬……嗬……嗬……’的打抖擞的声音，睁开眼，房顶反射着一点暗红色的火光，我伸手去一摸，他的被子空着，这使我吃了一惊！

“我问：‘赵同志！你病了么？’

‘不是！’

‘那是怎么呢？’

“‘没事！你睡吧，我每天这样，鸡叫前后冷得不能睡了，我就烤火。”

“这件意外的事，使我不能再安睡了，穿起衣服来，一看，地上生着一堆小火，他就蹲在那里三四块木炭火上烤着！“原来，供给部发的被，又短又窄，他个子长，所以常是顾得头来顾不得脚，他把放脚的那一头，用绳子捆起来，可是有时就被蹬开了。下面没有褥子，腿一打弯，身子便溜在光席子

上，这些情形，别人没有注意到，他也从来没说。”①

也许，正是这种任劳任怨的革命精神和炽烈的创作欲望，使这个最怕冷的人奇迹般地经受住了严冬的考验。他在冰窖一样的屋子里日以继夜地工作着。一连三十天，既辛苦，又愉快，在稿纸上描绘着他未来曾有过的气势和范围。

当人们迎来抗战胜利后第一个元旦的时候，这部十万字的长篇终于脱稿了。华北新华书店立即付印，随后，太岳新华书店，山东新华书店，大连新华书店，辽东建国书店、上海知识出版社，香港新民主出版社，……各地出版界竞相翻印，销路甚佳，其初版的范围和速度超过了《小二黑结婚》与《李有才板话》。

评论界的反响，似乎也比那两篇杰作来得迅速。很快，从遥远的上海传来了文坛权威的大声赞扬。爱抒情的郭沫若兴奋地道：“这是一株在原野里成长起来的大树。它根扎得深，抽长得那么条畅，吐纳着大气和养料那么不动声色地自然自在。”而“作者本身也象一株树一样，在欣欣向荣地，不断地成长。赵树理　毫无疑问，已经是一株大树了，这样的大树在自由的天地里面，一定会更加长大，更加添多，再隔些年辰会成为参天拔地的大树林子的。”② 茅盾则严肃恳切地指出：“这部书的技巧用一句话来品评：“就是已经做到了大众化。没有浮泛的堆砌，没有纤巧的雕琢，朴质而醇厚是这部书技巧方面最值得称道的成功。这是走向民族形式的一个里

① 杨俊：《我所看到的赵树理》。

② 郭沫若：《读了〈李家庄的变迁〉》。

程碑，解放区以外的作者足资借镜。”①

这部小说的背景，被作者安置在自己最熟悉的家乡上。熟知赵树理的人一看便知，李家庄酷似尉迟村，龙王庙等于尉迟庙。曾和赵树理朝夕相处的老、小字辈，在这里名叫铁锁、冷元、白狗，……而作品所描写的主要内容，也就是他们觉醒的过程：象铁锁这样一个忠厚、愚昧、朴直的庄稼汉，怎样从屡次遭受地主的欺弄、迫害以及破产的命运中获得现实的教训；怎样从疑问而引导到对小常及其所信仰的共产主义的模糊认识；又怎样在继续斗争的教训中澄清了模糊的认识，进而变成自己执着地追求；最后在更残酷的抗日战争中终于找到了自己的道路，成为一名农民领导者。

在这中间，小说家也化入了自己所亲身经历的生活。他把自己一分为三，先是在太原当差的铁锁，抗战时变成了特派员小常，小常牺牲后又转化为王工作员（区长）。这三个人的所作所为与赵树理的生平大致吻合。

为了揭露阎锡山的罪恶历史，作家还以现实主义者特有的智慧，把普遍的社会意义渗透到李家庄的变迁中去。作品远远地从一九二七年开始叙述，描写了近二十年间发生在山西的一些历史事件，一九三〇年的蒋阎战争，一九三六年红军东征，一九三七年抗战爆发，阎锡山与八路军合作，组织牺盟会，“十二月政变”，建立人民政权。……对此，有人予以高度评价：“这些历史的波澜都激荡到一个小小的村庄，使一些穷乡僻壤的农民，终于在这个时代的波涛中，觉悟起来，

① 茅盾：《论赵树理的创作》。

强大起来，最后翻身了。虽然是以一个村庄的变迁为小说的背景，然而实际上却是一幅中国农村的缩影，从这幅图画中我们看到了民族和社会斗争的姿态”。① 然而周扬却委婉地指出：小说固然“涉及了抗战期间山西发生的许多重要事件，包含了历史和现实的政治内容，可以看出作者在这里有很大的企图。可是和作者的企图相比，这篇作品就还没有达到它所应有的完成的程度，还不及《小二黑结婚》与《李有才板话》在它们各自范围内所完成的那样成功。它们似乎更完整、更精炼。”②

诚然，赵树理缺乏那种驾驭庞大复杂的生活场面，揭示历史政治的社会内涵的气魄的笔力，所以，他力不从心，无法实现预想的意图。书中的历史事件未能融化在人物的言行举止中，两者缺少内在的必然联系，结果，不仅很难促进人物性格的发展，甚至是适得其反，通篇找不出一个性格鲜明，高度典型的完整的人物。但实际上，小说的标题已经注定了这个缺陷。它意味着作品的中心不是张铁锁而是李家庄。赵树理正是要通过它的变迁，来揭示阎锡山统治之黑暗，共产党之光明。书中的人物，全是为此而设置，根据这个需要的与否来描写的。因此，作者可以把铁锁抛在八路军里不管，却不得不让二妞代替他回来，继续反映李家庄的变化。

《李家庄变迁》决非一部杰作，但终于奠定了赵树理在现代文学界的历史地位。

① 荃麟、葛琴：《李家庄的变迁》载《文学作品选读》三联书店 1949 年版。
② 周扬：《论赵树理的创作》。

第九章 独步文坛

再没有比成果更有说服力的东西了。接二连三的份量越来越重的作品和范围越来越广的读者，迫使每一个曾经轻视甚至无视赵树理的人不得不刮目相看了。一九四六年四月一日出版的《文艺杂志》上，刊登了赵树理的短篇小说《地板》，这是他在太行文联编的文艺杂志上第一次发表作品，这意味着对于赵树理的默认。

《地板》作于两年之前，是一篇把劳动创造财富的真理形象化，通俗化的演讲。赵树理曾详细地介绍过小说的成因："那时我们正进行反奸、反霸、减租、退租运动，和地主进行说理斗争。在一次说理会上，某地主说他收的租是拿地板（即土地面积）换的。当时在场的佃户们对劳动产生价值的道理是刚学来的，虽然也说出没有我们的劳动、地板什么东西也不会产生。可是当地主又问道：'没有我的地板，你的劳动能从空中生产出粮食来的，'便迟迟回答不出。当时，我们协助工作的干部插话说，'地板不过是被你霸占了的，难道是你造出来的'？这样一来，群众也跟着喊，才把一个冷下来的场面重新扭向热潮。散会之后，仍有一些群众窃窃私议，以为地主拿出土地来，出租也不纯是剥削。为了纠正旧制度给人

们造成的种种错误观念，我才写了这篇很短的小说。故事是借一个因灾荒饿死了佃户而破了产的地主之口来说明土地不能产生东西的道理。”

不过，太行文联独独选中了赵树理的《地板》似乎也可以看作是在含蓄地坚持己见，因为这篇小说与他的一贯风格大相径庭，表现出较多的“洋味”。其中的道理不象惯常那样，来自问题的圆满解决，而是由人物的心理变化显现出来的。结构上也采取了以主人公为线索，将其表现人物思想性格有关的事件，经历和心理活动串连起来的技巧，还绝无仅有地运用了外来的第一人称的手法，让早已自食其力的王老三现身说法，证明“粮食确确实实是劳力换的，地板什么也不能换，”来教育那个“一千年也不能跟你们思想打通”的地主王老四。通篇娓娓道来，情真意深，迥然不同于过去那种全知全能的说书人口吻。

但不管刊物发表它的动机如何，小说的社会效果却一如既往，是赵树理又一篇切合时宜、脍炙人口的佳作。

抗战胜利后，在这块解放了的土地上，减租减息已同反奸，复仇、清算的斗争结合起来。这是一场伟大变革的前奏，将要摧毁宗法制农村的封建土地制度，挖尽斩绝造成农民贫穷的根子。可是，经营土地多多益善、交租纳粮天经地义的封建剥削观念、毕竟具有数以千年的历史、在农民的头脑中根深蒂固。虽然经过八年抗战，他们的觉悟已空前提高，但认为出租土地不纯属剥削者，却依然大有人在。他们面对“没有我的土地，你的劳动能从空中打出粮食来”?的诘难，往往感到问心有愧、无言以对。所以在发表两月之后，延安

《解放日报》就转载了《地板》，并加上一个“编者前记”：

> 这篇作品，粉碎了象王老四这样的地主以为土地可以产生财富的剥削阶级的反动思想，它极其深刻地揭露了封建剥削的本质，同时，又深刻的说明了一切都是由人—— 由劳动者创造这个千古不易的真理。
>
> 象这样有深刻的思想性，同时又有相当高度的艺术性的作品，是很难得的，因此我们发表它。这在现时对我们是有教育意义的。

这时，各解放区正开始贯彻党中央的“五四”指示，《地板》和《李有才板话》一起被列为干部学习的参考资料。

这两篇小说还有一个相同之处：由于作者对人物的生活和个性了如指掌，且能驾轻就熟，这就避免了此类小说常犯的为了观念而忘掉真实的通病。书中人物跃然纸上，呼之欲出，使《地板》获得了久远的生命力。王老三似乎是赵树理独创的一个典型人物。他的自愿而非强迫的劳动改造，在劳动中令人信服地脱胎换骨，从四体不勤的寄生虫变为自食其力的小学教师的经历，在那社会生活激烈动荡，阶级关系急剧转化的战争年代中，无疑是并不少见的，但在迄今为止的文学作品中，这样的人物却又并不多见。

四月六日，边区政府在临参会大礼堂召开了为期六天的文化座谈会，回顾总结了八年抗战中文教工作的经验得失，在这里，赵树理遇见了从延安来的文艺理论家陈荒煤。

“一九四六年春天，我被调到晋冀鲁豫中央局准备筹建晋冀鲁豫边区文联，我在太行山的一个小村庄第一次会见了赵树理同志。”陈荒煤写道，“他完全是一个山西的普通农民模样：上身穿一件黑布对襟的小棉袄，下身是农村常见的棉裤，戴一顶棕色的小毡帽，脸色有些苍黄，丝毫没有一点知识分子的样子，甚至也不象一个普通的农村干部。

“他向我介绍太行农村戏剧运动的情况。开始谈的时候，我觉得他似乎还有些拘谨，可是谈到后来，说起上党戏来，他就禁不住谈笑风生，手舞足蹈起来。坐在炕头上吃晚饭的时候，边谈边吃，甚至拿起筷子来，嘴里咂咂有声，打起锣鼓点子，兴致很高地唱了一段上党梆子。

“我们的第一次会见，他有两个观点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一个是他对农村开展戏剧运动的重视，一个是他建议我抓通俗文艺的创作。他认为，现在还有广大农民不识字，但他们从小看地方戏，通过地区的地方戏进行宣传，老老少少的农民都能看，听得懂，又喜欢看。”

“深夜告别时，我送他到村口，在月色朦胧中，我看着他向山头走去，偶尔还传来一两句上党梆子的唱腔……我似乎感觉到，在这春天的夜晚里，有一股浓郁的温润的泥土气和野草的芳香浸润着我的心灵。”①

四月十三日，晋冀鲁豫边区文联宣告成立。在常务理事的名单中，也出现了赵树理的名字。与之并列的，全是边区文化界的知名人士、范文澜、陈荒煤、张磐石、张香山、朱

① 陈荒煤：《向赵树理的创作方向迈进》载 1983 年 8 月 23 日《人民日报》。

穆之、任白戈、王春—— 他在抗战胜利后便担任了华北新华书店总编辑。

这次选举，标志着太行文艺界第一次对赵树理表示公开的承认和推崇、标志着现代文学的欧化殿堂终于同中国的庙会文摊相融合，恭让粗俗的泥腿子大踏步闯进来，端坐在金色的交椅上。

四月十五日，赵树理辞别同事，重返家乡，只身前往阳城一带调查采访。未及三月，便创作了一篇精采的小说《催粮差》。

阳城是他战斗过的地方，熟人本来就不少，现在又以名扬太行的大作家归来，所以访客盈门，络绎不绝。赵树理最怕应酬、更听不进半句奉承话。而来访者中偏多这类人，尤其是旧日衙门的狗腿子，居然也钻营觅缝来套近乎，奉承话说得叫你插不上嘴；小殷勤也做得叫你帮不上手，一有机会就赌咒发誓要洗心革面，然后嘻皮笑脸地请你给找个事干。赵树理平素最厌恶这种奴才相，更知道他们“得志便猖狂”的本质，自然不为所动。但他怕有些同志认不清“中山狼”的真实嘴脸，误当好人，加以重用，使革命事业受到损失，因而决定写这篇《催粮差》，揭示那些旧日衙门狗腿子的卑劣本质。

小说描写一个名叫崔九孩的司法警察，下乡催粮时上拍下压的两副面孔和两种手段。在这里，作者又用上了他最拿手的对比手法，让崔九孩向两个身份悬殊的人—— 财政局长的弟弟和贫苦农民孙甲午—— 去催粮，传神地画出了他在统治者面前低三下四，拍马溜须的奴颜媚骨，和对老百姓蛮不

讲理，敲诈勒索的暴君相。于是，一个栩栩如生的走狗形象便出现在读者的眼里。它为赵树理赢得了一九四六年度太行区文化奖会甲等奖。

写完《催粮差》，赵树理决定顺路去尉迟村探望老母小女。

只隔了十来个月，家乡的情景就大变样了。当他走到离村半里的地方，“早看见好多人在河滩一块地里割麦，数了一数，共是七个人，除了一个穿土色衣服的，其余的六个，都穿的是雪亮的小衫，戴的是崭新的大草帽。麦子长得有胸脯高。这些人都割得飞快，好象在地里跳舞，嘴里还不知道唱些什么，割着割着，一会儿就打起来了，一会就又笑起来了。”

赵树理喜上眉梢，知道家乡的人民翻身了。

第二天，他来到打麦场。因为麦子丰收，场地不够，乡亲们发明了一个互助法子：一个组（五六个人，一犋牲畜）同时用两个场子，每个场子一上午打两场（平常同样的人只能打一场），牵牲口的碾了这边碾那边，使叉子的挑了这边挑那边，拿扫帚的扫了这边扫那边。只见人忙马跑，木锨飞扬，好一派热闹景象，看得赵树理心动手痒，也跟着嘻嘻哈哈干了起来。

休息时，人们围着赵树理蹲成一圈，喝水，吃干粮，问长问短。老朋友们就要他来一段。他很痛快地站起来，嘴里拉着过门，响着鼓点、扬起他那沙哑嗓子唱起来：

糠和米本来是相依倚，
簸箕扬作两处飞，
一贱与一贵，好似奴家与夫婿，

终无见期……

但这次回家，他听说了一个儿时同伴的悲惨遭遇。此人名叫冯福归，是他在村里自乐班的戏友，从小跑龙套，由于聪明伶俐，长大了成为唱正生的台柱。但他家地无一垄，靠给人住长工，当佃户勉强度日，不幸又借了点高利贷，从此好象两腿插进沙窝里，越圪弹越深，似乎永无自拔之时。他为了顾住肚皮，只好不顾脸皮，谁家死了小孩，他去送送，死了大人，他去穿衣服，抬棺材；秋头夏季饿得没了法，偷谁个萝卜找谁个南瓜，有人碰上了，骂几句板着脸受，打几下抱着头挨，不管脸不脸，能吃上就算。遂使他声名狼籍，连亲戚朋友也避之唯恐不及，遇上红白大事，都不愿同他同桌共餐。

沁水解放后，村里开展轰轰烈烈的减租，清算运动。可是村干部好象遗忘了这个赤贫者似的，从不叫他去参加斗争会，清算会，也不把他列入翻身户。而他也自轻自贱，悄悄地溜到嘉峰村去了，直到一病不起，才由哥哥接回。就在赵树理到家前不几天，他默默地死了，尸体装在一只破水缸里，草草埋葬了事。

冯福归的悲剧，勾起赵树理的一个夙愿。

二十年前，村里的“南院门口”住着一户赵树理的本家。三个族兄，要数老二各轮最为能干，精通各路庄稼活，一人能抵一个半，并有一套垒堰的绝技（沁水县山多地隘，岩深谷邃，要在山上造出几尺宽的平地，也非垒上一丈多高的石堰不可），谁家的地堰塌了大壑，任凭出双工钱，也要请他去

领几天工，因为经他补过的壑，很不容易再塌了。可他自己却种不上好地，坏地又受死也不出粮，他无以为生，改学梁上君子，于是声誉一落千丈，在村里比狗屎还臭，他走到谁家院里，院里的人总要眼巴巴看着他走出大门才放心，他打谁地里走过，地里的人就得注意一下地头堰边放的烟袋衣服；谁家丢了东西，总要到他家里闲转一趟；谁家丢了牲口，总要先看看他在家不在……不料后来臭名远播四方，外村也天天有人来找他算账，这就触怒了族长老爷，认为有损赵家的脸面，竟然一声令下，把他捆起来打了个半死，然后拉到河滩边上活埋了。

这一悲剧发生在一九二六年的夏天，赵树理正在家里度暑假，刚刚读过鲁迅先生的小说，不禁对吃人的家族制度切齿痛恨。他觉得各轮哥的遭遇跟阿Q 颇为相似；都是穷光蛋、都得靠出卖劳动力过日子；在饥饿的逼迫下，又一样的不得以采用偷窃的方法来谋生，便打算写一部《各轮正传》，揭露这残暴的封建家族制度。然而此后他自顾不暇，这个愿望一直未能实现。

现在，冯福归的悲剧勾起了他对各轮哥的记忆。他俩都是被迫破产，万般无奈才流入歧途的，没有任何理由可以不去同情他们，关心他们。帮助他们重新做人。但他却痛心地发现："我们有些基层干部，尚有残存的封建观念，对一些过去极端贫穷的、作过一些被地主阶级认为是下等事的人（如送过死孩子、当过吹鼓手、抬过轿子），不但不尊重，而且有点怕玷污了自己的身份"。结果，冯福归明明已盼到了幸福归来的新社会，却仍是未经翻身就去世；不必要地作了封建主

义的又一个牺牲品。于是，他想为之立传的愿望愈益强烈。不过，创作的意图跟二十年前有所不同，是为了打通那些基层干部的思想，解决无数活着的“福归”们的实际问题。

但是，现实生活不曾向他提供解决问题的范例，一般的大团圆结局也未必有多大的说服力。赵树理迟迟不能动笔，陷入苦苦的思索。最后却意外地从“刨穷根会”中得到了创作灵感。

当时，“农民对平分土地很拥护，但雇农、贫农为什么穷得没米下锅？为什么在旧社会把受苦人逼得变成“鬼”？农民自己却说不清楚。他在沁水多次参加过贫苦农民的刨穷根会，使他领悟到这是进行阶级教育的好形式，可以提高农民的政治觉悟。”赵树理的一个老战友写道：“那时我刚从晋南参加土改回到阳城，我们又碰到一块，他把创作《福贵》的想法告诉了我。他说，农民的穷根、就是地主的剥削。农民的觉悟低时觉察不到。我是热爱福贵这样农民的，要从思想变化中最终肯定福贵身上的弱点是旧社会造成的。”①

八月三十一日，这篇小说顺利完稿。书中的福贵杨眉吐气，指着族长王老万的鼻子，义正词严地说道：“我赌博因为饿肚，我做贼也是因为饿肚，我当忘八还是因为饿肚！我饿肚是为什么啦？因为我娘使了你一口棺材，十来块钱杂货，怕还不了你。给你当了五年长工，没有抵得了这笔账，结果把四亩地交给你，我才饿起肚来！我从二十几岁坏起，坏了六年，挨的打、受的气、流的泪，饿的肚，谁数得清呀？直到

① 何微：《对赵树理的几点回忆》。

今年，大家还说我是坏人，躲着我走，叫我的孩子是‘忘八羔子’，这都是你老人家的恩典呀！因此我想请你老人家向大家解释解释，看我究竟算一种什么人！看这个坏蛋责任应该谁负？”

《福贵》发表后，引起了惊人的反响。赵树理的乡亲们——连同他的母亲——全都大为反感，叽叽咕咕地埋怨道：家丑不可外扬，还写成本书满世界散哩！但在遥远的东北，鏖战正酣的辽沈战场上，却产生了感人肺腑的效果。

在东北野战军某部，有名叫杨有国的战士，听人念了《福贵》后，居然激动得嚎淘大哭。在紧接着的战斗中，他表现得异常勇敢，飞身炸毁了敌人设在要道口的核心地堡，为连队的进攻打开了缺口，自己却身负重伤，奄奄一息。战斗结束时，部队授予他一等功。在立功受奖大会上，首长说道：“杨有国同志在旧社会被人看不起，说他是二流子，到部队后也有人奚落他。他平时不吱声，作风有点稀啦。他听了报上的文章（即转载在《东北日报》上的《福贵》）竟大哭了一场，说自己的遭遇和文章里谈的那个人差不多。同志们，旧社会的二流子，不是天生的，是被逼的。”说着，他翻开报纸，一边念，一边讲福贵自小是个好孩子，后来被逼走上邪路，赌博，偷窃，当吹鼓手，怕地主活埋，连夜逃跑了。……他讲到这里，战士们群情激奋，喊起了，“为阶级弟兄报仇”的口号，立功受奖大会，变成了请战大会，各连干部纷纷要求在新的战斗中担任主攻的突击队任务。①

① 彦克：《赵树理同志的作品在部队》载《山西文学》1982年12月号

十月三日，赵树理结束了对家乡的采访，带上妻子和女儿，搭乘一辆拉木炭的汽车，返回驻地河北武安县冶陶村。书店同事喜设茶话会，为他洗尘。《人民日报》也作专题报道，说他“畅谈了采访经过与许多新奇故事。据称稍事休息后，即将着手写作。”①

这篇构想中的小说，便是《刘二和与王继圣》。它是赵树理唯一的一篇富有自传性而又不解决问题的小说，从十一月开始，在《新大众》半月刊上连载。

这时，解放区出现了第一篇研究赵树理的专论——周扬撰写的《论赵树理的创作》。一九四六年七月，它首先在张家口出版的《长城》杂志上发表，然后，八月二十六日的延安《解放日报》、《北京杂志》九月号和《东北文化》十月号相继予以转载，从此流布全国以至全世界，成为至今仍有权威的赵树理专论。

抗战胜利后，一直在延安工作的周扬出任晋察冀中央局宣传部长。六月间，他在刚解放的西北重镇张家口编印了《李有才板话》和《解放区短篇创作选》，准备带往上海，作为送给文化界朋友的礼物。这使他有机会巡视了赵树理的全部创作，读后，“对他作品的新颖题材和独特风格以及作者的卓越才能感到惊异。”②恰巧杨献珍也在张家口，他尽其所知，热心地向周扬介绍了赵树理的生平，于是，这位很有眼光，善

① 《农村作家赵树理集采归来将有创作》，载1946年10月28日《人民日报》。

② 周扬：《赵树理文集序》。

于掌握文艺界气候的理论家，在临行前的繁忙中写下了《论赵树理的创作》。

周扬说："赵树理，他是一个新人，他是一个在创作，思想、生活各方面都有准备的作者，一位在成名之前已经相当成熟了的作家，一位具有新颖独创的大众风格的人民艺术家。""他竭力使自己的作品写得为大众所懂得。他不满意于新文艺和群众脱离的状态。他在创作上有自己的路线和主张。同时他对于群众的生活是熟悉的。因此他的成功并不是偶然的。正是他实践了毛泽东同志的文艺方向的结果。文艺座谈会以后，艺术各部门都得到了重要的收获，开创了新的局面，赵树理同志的作品是文学创作上一个重要收获；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在创作上实践的一个胜利。我欢迎这个胜利，拥护这个胜利！"

这是迄今没有争议，为世所公认的评语。

周扬是三十年代"左联"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对上海有特殊的感情，那里有许多阔别十年的战友。但他显然不曾料到，带去的这份礼物甚至比他本人更受欢迎。文艺界人士和进步青年爱不释手，《李有才板话》连出三版还供不应求。当他返回张家口时，郭沫若特地送来一信，请他带到北京去。信中写道：

> 我费了一天工夫，一口气把《解放区短篇创作选》第一辑和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读了一遍，这是我平生的一大快事。我从不大喜欢读小说，这一次是破例。这是一个新的时代，新的天地，新的创世纪。这样可歌可泣的事实，在解放区必然很丰富，我

希望有笔在手的朋友们尽力把它们记录下来，即使是素材，已经就是杰作，将来集来结成巨制时，便是划时代的伟大作品。

这封信发表在八月二十五日的延安《解放日报》上。它和周扬的论文一道，真诚地，正确地向世人揭示了赵树理的价值。凡夫俗子总是迷信权威。史纪言不胜感慨地说道："赵树理同志的《小二黑结婚》和《李有才板话》，虽然经过彭副司令和李大章同志的介绍，然而几年以来，并未引起解放区应有的重视。记得我曾和一个同志说过《小二黑结婚》还不错，然而对方的回答，却是'赵树理对解放区的了解也很有限'。今年，先经过周扬同志的推荐，后又经过郭沫若先生的评价，大家的观感才似乎为之一变。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其实又何尝只识马如此！"①

一九四七年一月，赵树理平生第一次接受了外国记者的采访。

杰克·贝尔登是一位进步的美国记者，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早在三十年代，他就靠一路当水手，远涉重洋，访问中国。他不畏艰苦，深入到中国的底层社会，如实报道人民的悲惨生活和抗战初期国民党军队的大溃败。在美国人民的心目中，他是个传奇式的人物。

一九四六年底，贝尔登重返中国，受命报道蒋介石同共产党之间的最后一场内战。"当时最关键的战区是华北。这里是一片广大的平原，人口九千万，位于蒋介石的首都南京和

① 史纪言：《文艺随笔》，载1947年1月《文艺杂志》。

满洲之间。蒋介石据守平、津和华北一些地方，但除非他能在这个平原上打开一条道路，使他的孤处华北的部队同他的首都连成一气，否则便休想统一中国。”这位优秀的战地记者老练地写道，“横亘在蒋介石南北两军之间，挡住蒋介石北上道路的，是共军陈毅和刘伯承两部。陈毅将军的总部设在上海以北、北平以南的滨海省份山东，独眼将军刘伯承驰骋于晋冀鲁豫边缘的广大地区，时而横扫平原，时而向西退入高据平原的山西丛山之中。于是我决定进山去探访这位名将。”

贝尔登独自一人，穿越数百里大平原，来到万山丛中的冶陶镇。晋冀鲁豫军区总部的所在地，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大发议论道：“凡是在大战期间居住巴黎的人，都记得星形广场附近的几个街区如何被用绳子圈起来，圈内的房屋全部被盟军司令部征用了。整个区域四面用带刺的铁丝网围了起来，警卫森严，没有特许证件，任何人也不准通行。而当我来到只有二千人口的冶陶这个小山村时，几乎看不出任何迹象，表明指挥三十万正规军和一百万游击队的首脑机关就设在这个小小的石头城内。这使我感到很惊奇。除了架在房屋顶上的无线电天线之外，你根本看不出这座小村镇就是司令部的驻地，因为村镇里没有设任何禁区，各军事机关的大门外，也不见有人站岗放哨。”在这里，他首先采访了军区副政委薄一波和边区政府主席杨秀峰。然后，他提出要见见赵树理，因为他时时听到人们在谈论这位作家，几乎可说家喻户晓。这挑起了美国人的好奇心。

赵树理给人的第一面印象，似乎总是有点拘谨之感。“这天清早就下雪，我坐在我那石板地的屋子里，感到有些郁闷

和孤独。”贝尔登说，“这时，他从外面走进来……一位幽灵似的人，身穿棉袍，头戴小帽。他象私塾先生似的鞠了个躬，就在我的炭火盆前找了个凳子坐下，贪婪地烤着手。他一边打着寒战，一边仰头看了我一眼，然后又重新垂下眼皮，从我的桌上拣起一颗瓜子，熟练地嗑起来。他怯生生地看了我一会，不自然地笑了笑。一个很腼腆的人！我想。”

但在尔后两天的相处中，他俩的关系是很融洽的。赵树理向贝尔登披露了自己的全部经历。他的身世使贝尔登终于明白“乡村知识分子为什么抛弃蒋介石而投向共产党。”后来，他们谈到了赵树理作品的畅销情况，贝尔登问道：

“你的作品出过多少版？”

赵树理沉默片刻，轻轻地说：“我不知道，反正哪儿都出。”

“那你得了多少版税？”

“没有版税，也不给稿费。”

贝尔登惊讶地看看他那营养明显不良的脸色和寒伧的衣着，高声喊道：“这不是剥削你吗？”

赵树理笑了，眉宇间柔情洋溢，诚恳地对他说：“你知道在中国‘文丐’是什么意思吗？抗战前，出书得先付押金，没钱就别想出书。关于群众运动的书就更不能出了。而现在，我想写的东西，政府都帮助出版。再说，在这种时候，我赚钱干什么？有志愿战士，就有志愿文化人。我甘心无偿地为人民创作。”

“况且我的物质生活还是比以前好多了。除了写作，我还在新华书店当编辑。我们有自己的生产组织，能纺纱织布、能种地。大家共同劳动、共同分享劳动果实。出版社每天发我

一斤半小米，半斤菜；还给我一些医药费，因为我身体不好。我每年领一套棉衣、一套单衣。抗战前，我只有一条薄毯子，几件单衣，所以我总是受冻。过去我从来没有烤过火，现在我有炭烧。出版社还给我钱，供我女儿上学。我老婆能种菜，每个星期还能做一双鞋。她用五百块钱买做鞋的材料，做成鞋可卖得两千块钱。我现在简直没有什么负担了，可以更自由地从事写作了。”

“但是我不想做大作家，大富翁，我只想让老百姓喜欢看，买得起，我常去书店走走，了解买我的书都是些什么样的人，以便知道多少人爱看我的书。我还写能为群众演出的剧本，因为成千上万的农民都不识字，这样，从前只有少数知识分子垄断的文艺作品，现在连穷人都普遍能看到了。”

然而，贝尔登却不喜欢赵树理的作品。他在翻译了赵树理的三篇名作后批评道：“他对乡村生活的描写是生动的，讽刺是辛辣的。他写出的诗歌是独具一格的，笔下的某些人物也颇有风趣。可是，他对于故事情节只是进行白描，人物常常是贴上姓名标签的苍白模型。不具特色，性格得不到充分的展开。最大的缺点是，作品中所描写的都是些事件的梗概，而不是实在的感受。我亲身看到，整个中国为激情所震撼，而赵树理的作品中却没有反映出来。”①

过了半年，赵树理又接待了一位记者。这次是新华社著名的战地记者李普。他久慕赵树理的大名，在一次返回后方的间隙中，特地化了两天功夫，赶了四十里路到武安县赵庄

① 以上引文参见杰克·贝尔登著的《中国震撼世界》。

去拜访他。

这时，赵树理的次子二湖刚刚出世，他在家里照料母子。他俩相见的第一面，也是别有风味的。当陪同的村干部向一个剃着光头，其貌不扬的人喊“老赵”时，李普大吃一惊，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从外表看，这是一个纯粹的农民，是一个从俗流的眼光看来的十足的乡巴老。要不是有人介绍，即使你已经知道这个多产的作家就住在这屋子里，你也不会想到这个农民是一个应该穿制服的‘公家人，’更不会想到他就是这位作家自己。”——事后，李普写下了这一印象。

赵树理穿着青色的中式对襟衣服，按北方农民的习惯，敞着衣领，正在把一张浸湿了的草纸贴到墙上去。他看到李普，便搓搓手，热情地让着请他进屋、一边解释着：“这两天吃的青菜有一种涩味，我怀疑那菜里可能有硝质，所以把草纸在菜汤里浸透了，看能不能变成一种较好的打火纸。”

已是中午时分了。赵树理自己动手，用令人咋舌的快速与熟练烙起饼来。

李普一面惊讶地看着他烙饼，一面问他会不会种地。

“会的，我是个好把式，最拿手的是扬场。”他集中注意边翻着烙饼，诚恳地答道。

李普更加惊讶了。他知道他对民乐有精湛的造诣，便又随口问道：“那么你会不会盖房子、刷墙壁？”

赵树理抬起头来，用袖子擦擦汗、既不矜持也不轻率地说：“会的，这些我都做过。”

于是李普得出了第二个印象：“和鲁迅先生所悲叹的那种空头文学家相反，赵树理是一个富有生活经验和生活能力的

人。他生活在群众中，饱有劳动的知识和经验，我想他之所以能够写出有生命力的作品来，这是主要的原因之一。”

饭后，李普提出了他最感兴趣的问题：“老赵，请你谈谈，你是怎样开始写作的，好吗？”

也许是相互熟悉了吧，赵树理欣然应允。他一纵身蹲在椅子上，腰一挺头一扬，侃侃而谈，详细介绍了自己对新文学漫长而又艰辛的探索过程。

“十几年前，我就发觉新文学的圈子狭小得可怜，真正喜欢看这些东西的人，大部分是学这种东西的人。等到学的人也登上了文坛，他的东西实际上又只是给另一些新的人看，让他们也学会这一套，爬上文坛上。新文学只在极少数人中间转来转去，根本打不进农民中去。我父亲是个农村知识分子，但他对这种宝贝一点也不感兴趣。新文学其实应叫做‘文坛文学’或者‘交换文学’。因此，我不想上文坛，不想做文坛文学家。”

他顿了一下，看着李普说：“你逛过农村的庙会集市吗？那里有一种地摊，摆满了《封神榜》、《施公案》、《七侠五义》、《笑林广记》之类的小册子和廉价的小唱本，生意真好啊！我的目标就是要拿着自己的作品去赶庙会，跟它们一起摆在地摊上，三两个铜板可以买一本，这样一步一步去夺取那些封建小唱本的阵地。做这样一个文摊文学家，就是我的志愿。”

这个意见深为李普所赞赏，他相信这是新文艺的一条前途无限广阔的道路。两人有了共同语言，于是话题进一步深入。

“老赵，我觉得你的作品中最吸引人的是语言，完全是农民的口语，那么生动简练，那么光彩闪烁，读起来真叫人喜欢。我看见有些成名的作家教育后辈，叫他们随身带一个小本子，记群众的语汇，有的人也真的这样在做。那么你的办法是什么呢？”

这时，赵树理的一双富有农民表情的眼睛突然流露出俏皮的目光。他笑笑说：“小本子倒是有，但记的全是工作中的问题。有人说好记性不如烂笔头，那是因为少接触的缘故。你要是长期到群众中去工作，搞群众运动或者基层政权工作，真正了解他们的思想、感情、生活习惯，他们的语言自然而然就记在你的心里了，写的时候信手写下来，不用临时去寻找。

“我有点特殊，出身于农民而又上过学校，自然是既不得不与农民说话，又不得不与知识分子说话。过去回乡同父老兄弟们谈起话来，一不留心，往往就带点学生腔，可是一带出这种腔调，立刻就要遭到他们的议论。碰惯了钉子就学了点乖，以后即使向他们介绍知识分子的话，也要翻译成他们的话来说，时候久了就变成习惯。跟知识分子说知识分子的话，跟农民说农民的话。写起文章来便也在这方面留神。比方‘然而’听不惯，咱就写成‘可是’，‘所以’生一点，咱就写成‘因此’，不给他们换成顺当的字眼儿，他们就不愿意看。当然，偶而夹个把比较生僻或者高深的字眼是难免的，这种‘拦路虎’并不要紧，识字不多的读者可以跳过去，把上下文连起来看还是能懂的。最糟糕的是‘拦路羊’，比如那种复杂的甚至古雅的欧化句子，就象羊一样，一群一群的来，他们就看不明白了。因此我就把这种长句子搞得简短些，多说

几句，象‘鸡叫’、‘狗咬’，老百姓本来就很习惯，何必把它写成‘鸡在叫’‘狗在咬’呢？

“不瞒你说，我在写作中倒是有一条信条的。我曾经读过许许多多的旧式章回小说以及弹词唱本，凡是我得到的，我都看过。结果，我发觉旧文学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这就是故事曲折，引人入胜。尽管它们宣扬的全是封建迷信，荒唐不经的事情，内容极为反动，但老百姓却听得津津有味，茶饭不思，我看主要的诀窍就在这里。而且老百姓也养成了爱听故事的习惯。所以，我要走文摊这条路，就得继承这个传统特色，作品除了必须有典型人物外，还一定要有曲折的故事情节，想方设法引人入胜。有的人觉得这样做会降低作品的艺术性，但我以为，只要能叫大多数人爱读，总不算赔钱买卖吧。”

两个半天一晃就过去了。分手时，李普得出了第三个印象：“这是一个有思想的人，他的一切思想的出发点是为群众服务。这也是和那些空头文学家相反的。他们只为他们自己，除了一己一私的渺小的肮脏念头之外，脑子里空空如也，怎么能写出象样的东西来？”①

中外名记者的相继来访，本身就是赵树理声名大噪的鲜明迹象。而他的作品也确乎家喻户晓、深入人心。连知识分子也渐渐地喜爱起来。北方大学的学员们对他崇拜得五体投地，若是有人表示轻视或反对，他们甚至会不顾一切地冲上去，赏给对方一个耳光。

① 以上引文参见李普的《赵树理印象记》和赵树理的《也算经验》。

这一事实，不能不引起宣传部门的极端重视。在解放区，诚如赵树理所言，“广大的群众翻身以后，大家都有了土地，这土地不但能长庄稼，而且还能长艺术。因为大家有了土地后，物质食粮方面再不用去向人求借，而精神食粮的要求也就提高了一步。”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宣传部指示边区文联，举行一次文艺座谈会，专门讨论赵树理的创作。

会议于七月二十五日开始，历时整整半个月。“在讨论过程中，大家实事求是的研究作品，并参考郭沫若、茅盾、周扬等对赵树理创作的评论及赵树理创作过程、创作方法的自述，反复热烈讨论。”① 八月十日，主持文联日常工作的副理事长陈荒煤集中大家的意见，总结出赵树理在三个方面值得全体文艺工作者学习：

> 第一，赵树理同志的作品政治性是很强的。他反映了地主阶级与农民的基本矛盾，复杂而尖锐的斗争。他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来写的，爱憎分明，有强烈的阶级感情，思想情绪是与人民打成一片的。
>
> 第二，赵树理同志的创作是选择了活在群众口头上的语言，创造了生动活泼的，为广大群众所欢迎的民族新形式。
>
> 第三，赵树理同志的从事文学创作，真正做到全心全意的为人民服务。他具有高度的革命功利主义，和长期埋头苦干、实事求是的精神。

最后，他说道：“因为以上我们所能共同认识到的几点，我们

① 据《人民日报》1947年8月10日报道。

觉得，应该把赵树理同志的方向提出来，作为我们的旗帜，号召边区文艺工作者向他学习、看齐！为了更好的反映现实斗争，我们就必须更好的学习赵树理同志！大家向赵树理的方向大踏步前进吧！”①

在发言之前，陈荒煤曾经征求过赵树理的意见。他诚惶诚恐，一再指出：“我不过是为农民说几句真话，也象我多次讲的，只希望摆个地摊，去夺取农村封建文化阵地，没有做出多大成绩，提‘方向’实在太高了，无论如何不提为好。”

其实，与会者对于“方向”之说也并不十分在意，讨论研究得最热烈的，倒是陈荒煤总结的第二个方面。

在现代文学的土壤上，居然能丝毫不受西风欧雨的影响而结出如此鲜艳夺目的奇葩，实在令人无法不对它的艺术特色发生兴趣。这也是所有赵树理研究者最关心的论题，所以我们也有必要在这里略加探讨。

艺术固然是永久的，形式却是时代的产物。一个作家在采取新的艺术表现手法时，总是把心目中的读者当作一种举足轻重的因素加以考虑的，因为他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取得最大的影响力量。赵树理曾反反复复地说过：“我每逢写作的时候，总不会忘记我的作品是写给农民读者读的。”为此，他确立了一条坚定不移的艺术法则——照顾群众的欣赏习惯。在这一独特的艺术法则的规范下，赵树理的小说形成了三个鲜明的艺术特征。

第一个特征是口头性。

① 陈荒煤：《向赵树理方向迈进》，载1947年8月10日《人民日报》。

口头性是劳动人民传统的欣赏习惯和审美要求之一，也是作家文学语言与民间文学语言的主要区别之一。但在当时当地，口头性对于作家的书面文学语言却具有极端重要的意义。好的谈吐是叫人爱听易懂的艺术，这种艺术随着不同时代、不同听众而变动不居。知识分子喜闻乐见的欧化语言、文言腔调，在目不识丁的老百姓那里却不受欢迎，认为艰深晦涩、不知所云。因此，赵树理决定借鉴民间文学语言的口头性特征。他斩钉截铁地说："我一开始写小说就是要它成为能说的。"

赵树理是个知识化的农民，农民化的文人，在他的身上混合着农民和文人的气质。他的语言造诣，与其说得力于正规教育，作家文学，不如说受益于民间文艺、活人的唇舌。少年时代的"八音会"活动，使他耳濡目染，初步感受到民间戏曲中唱词念白的韵味和农民语言朴素明快、幽默风趣的特色。后来，他又长期致力于农村的宣传工作，经常接触，运用民间艺术形式，在大众风格上狠下过功夫，所以他彻底地厌弃欧化文体是不难理解的。而作为一个知识化的农村干部，对于说唱文学中古老陈腐的封建气息显然也是深恶痛绝的。尤其因为他的小说要及时反映快速发展的社会生活，达到寓教于乐，老妇能解的目的，传统韵语中那些虚浮夸大，笨拙铺张的套语烂调就必须一脚踢开，新文学中矫揉造作，浮华罗嗦的冗言赘语也需要清除干净，改用一种充满了泥土气息的日常口头语调来娓娓动听地叙述描写。赵树理说过，"我写作用的语言，自然的多一点，加工的少一点。加工在什么地方呢？加工在更合乎'说'这上头。"请看：

这地区是个山野地方，从前人们说“山高皇帝远”，现在也可以说是“山高政府远”吧，离区公所还有四五十里。为这个原因，这里的风俗还和前清光绪年间差不多；婆媳们的老规矩是当媳妇时挨打受骂，一当了婆婆就得会打骂媳妇，不然的话，就不象个婆婆派头；男人对付女人的老规矩是：“娶到的媳妇买到的马，由人骑来由人打”，谁没有打过老婆就证明谁怕老婆。

《孟祥英翻身》

这种口头性文体的最大优点，在于比说书人那种纯然叙述者的口吻远为亲切、自然，好比知心朋友的促膝交谈，作者不是为了自我满足或自我宣泄，而是以极大的真诚与信任的态度，向读者或听者喁喁倾诉着自己的见闻与理解。而对方只要懂得这种日常口语的意思，也会友好地、自然而然地分享作者的思想感情，带着一颗坦率而富于同情的心进入作者所创造的世界。

再请对照着比较下面两段描写：

夕阳西斜，天空轻轻地抹了彩霞，湖畔的芦荻，象新拭了的列在架子上的刀枪，青翠的小草，仿佛刚刚浴罢。两珠留在草木叶上，被夕阳照得莹莹闪烁，堤上的垂柳，一株株整队的平平排成一列，垂着微尾无力的拂打。远山一望无际的翠屏，归鸟在在际散队的疏落的游行。碧绿湖水，又缀了几多点水的蜻蜓。

《白马的故事》

她一路走着，看见跟山里的情况不同了：一块一块平展展的好地，没有种着庄稼，青蒿长得一人多高，大路上也碰不上一个

人走，满长的是草；远处只有几个女人小孩提着篮子拔野草。

《李家庄的变迁》

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画面。前面几乎每个句子都有比喻，每个比喻都辅之以某种文诌诌的词语——“轻轻的抹了”、“轻俏的拂打”、“莹莹闪烁”、“缀了几多”……它好象一幅初学油画者的习作，画布上涂满了浓彩艳色，令人眼花缭乱，疲于辨别。后者则是一轴纯用白描的水墨画，没有矫饰的企图，没有外加的粉彩，整个画面由二妞的眼中透视出来，凡是不符合农妇身份的比喻、词语，都被坚决无情地一刀砍掉，使一字不识的村妇听了后也会觉得如临其境，眼前浮现出一派满目凄凉的萧杀景象。

用口语把描写对象由听觉转化为视觉，让读者或者听者产生历历在目的感受，正是赵树理孜孜以求的艺术效果。而这种效果对于不识字、无文化，需要由听觉来接受文化作品的工农兵来说，则是何等重要啊！

第二个特征是故事性。

故事性是区别中国读者的审美情趣之雅俗、文野的标志之一。古之雅人文士，欣赏的是诗词歌赋中所表达和创造出来的那种可意会而不可言传、难以形容却动人心弦的情感、意趣和韵味，追求那种“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的艺术境界。而世俗民众则嗜好故事情节曲折离奇、细节描写生动真实的说唱文学、话本小说，所谓“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便是他们对于小说的主要审美标准。今天的知识分子与劳动人民的审美情趣，大致上仍

然可以这样区分，所以赵树理非常重视如何加强作品的故事性。

口头性必然导致故事性。赵树理既是个说书行家，又是个革新能手。譬如，《小二黑结婚》套用了有头有尾、以大团圆结局的传统公式，但它化腐朽为神奇，用母亲的婚姻悲剧开头，女儿的爱情喜剧结尾，把悲剧性与喜剧性、偶然性与必然性巧妙地糅合于这个公式。悲剧性与喜剧性往往是同一生活现象的两面。就封建包办婚姻这一旧中国极其普遍的生活现象而言，三仙姑也是个受害者、牺牲品。作为前后庄上第一个俊俏媳妇，却嫁给了“不多说一句话，只会在地里死受”的于福，内心肯定一百个不愿意。她借装神弄鬼去勾引男人的变态性心理，无疑就是这没有任何爱情基础的结合的后遗症。她的悲剧既控诉了包办婚姻的罪恶，更促进了人们对小芹命运的担忧：难道那么美丽纯洁的姑娘也将重蹈母亲的复辙吗？因此当小说以大团圆的喜剧告终时，便给人一种如释重负的愉悦和今非昔比的快感。

传统的大团圆常常不是依靠偶然的机遇，就是表现为一种盲目的乐观主义。对照小二黑的真实结局，似乎赵树理也难免这种通病。其实，任何作家都不能避免偶然性的因素，不然，一切生活现象都将显得死板而抽象，关键在于这种因素必须是既出乎意料之外，又合乎情理之中，这样才能扣人心弦，燃起读者的兴趣。如果说小二黑与小芹的美妙结合在当时确是一种偶然现象，那么他俩的精神支柱则是合情合理的。全体翻身农民早就认识到：有共产党撑腰，一切正当合理的要求都可以如愿以偿。艺术真实的一个最通常的意义就是可

接受性。正是这种思想的共鸣性、内在的感应力，使小说的大团圆摆脱了赤裸裸的偶然性，以真实可信的艺术力量引人入胜。

又如，传统小说的故事情节一向只用单线发展的结构艺术，即使花开两朵，也是单表一枝。但《李有才板话》却有两条并行的线索：一条是主线——工作方法问题，另一条是辅线——李有才的命运。主线使小说形成了两幕在地点时间上相对集中的场景：第一幕由章工作员主演，先“打虎”、次“丈地”、结果以失败告终。第二幕由老杨同志登台，从第七节到第九节，三天之内解决了阎家山的问题。而李有才这条辅线则担任了缀连这两幕相对独立的场景，使之保持内在联系的任务。小说用他的遭遇来开头结尾，又用他的快板来褒贬章、杨的工作方法，从而使情节的发展虽然在横向上出现了较大的回旋，但始终在纵向上不断地流动着，按时间的先后循序渐进，连贯到底，不见层次之间的裂痕。这种两幕剧似的独特的“戏剧式”结构，是对传统的单线结构和西方的横断面结构的融会贯通，显得新颖别致、不落俗套。

当然，赵树理也从民间文艺中承受了一些不良传统。例如《小二黑结婚》和《李有才板话》都显而易见地沾染了“清官戏”的俗气。再如裁章铸篇时，过分强调章节的连贯性，寸步不拉，唯恐跳跃，以及缺乏暗示，一览无余等。但总的看来，赵树理对于故事性是既照顾习惯，又因势利导，既迎合大众，又有所革新的。

第三个特征是幽默感。

幽默感不但因文而异、而且因时而异，作家的个人气质、

思想感情以及时代、社会诸因素都对幽默感发生调味作用。赵树理所在的社会是一片光明的解放区，他成名的时代是中国革命的黎明时期，所以在他的笔下，那种鲁迅式的充满了愤怒与悲哀的辛辣嘲笑声已经音沉响绝，销声匿迹，继之而起的是农奴们压抑了几千年而终于爆发出来的开怀大笑。其中没有眼泪、没有悲伤、也没有怒气，没有愤慨，洋溢着新兴阶级豪迈进取的蓬勃朝气和明朗隽永的乐观情调，令人心情舒畅、意气风发。这是赵树理有别于以前任何一种笑声的特殊的幽默感。

赵树理的幽默常常引起广大群众的纵情欢笑。这种作者与读者之间罕见的契合，毫无疑义，不能完全归结翻身感的共鸣，还在于他的笑声中饱和着劳动人民特有的美德——善良、正直、机智、风趣。没有对人的同情和关怀，是不会有幽默的。赵树理是个与人为善，充满爱心、具有民族性快乐气质的作家，他从来不用笑声去报复人，损害人的自尊心，使之羞愧得无地自容，而总是谑而不谑，寓庄于谐，把严肃性、同情心和激励心融化在愉悦的笑声中，亲切友好地揶揄对方落后可笑的一面，热情善意地劝导他幡然醒悟，洗心革面，从而无所顾虑地走向新生活。

比如，《小二黑结婚》中有一个令人捧腹的喜剧场面：一群妇女围着三仙姑叽叽咕咕地评头品足，把她平时习以为常的服饰在大庭广众之下特别一提，使她自己也猛然发现这身打扮何其可笑，一道道热汗顿时在那半辈子没有红过的脸上奔流而下。结果，她“回去对着镜子研究了一下，真有点打扮得不象话，又想到自己的女儿快要跟人结婚，自己还卖什

么老俏？这才下了个决心，把自己的打扮从头到底换了一遍，弄得象个当长辈的样子，把三十年来装神弄鬼的那张香案也悄悄拆去。”就在这善意的笑声中，无价值的东西被否定、被撕毁了，三仙姑也愉快地同过去诀别了。

很明显，赵树理的笑声同民间的相声艺术有着一脉相承的亲缘关系，鲜明地反映出传统的劝善惩恶的民族心理：反对邪恶贪婪、忘恩负义、损人利己、提倡见义勇为、同情弱者、大公无私，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认清好坏善恶，分辨美丑贤愚，识别是非敌友。

文学上的风格，是天才与形势相结合的产物。战争时代的文学主流是“文章入伍、文章下乡”，向民间汲取营养，彻底实行大众化。从这一点来看，赵树理堪称天才：他土生土长，爱民若父，精通民间文艺。鲁迅在一九三二年就说过：“我相信，从唱本说书里是可以产生托尔斯泰、弗罗培尔的。”[①] 十五年后，赵树理的创作印证了鲁迅的预言，他就是从唱本说书中产生出来的时代的歌手。在现代中国的文学史上，如果说是鲁迅首先把外国文学的新鲜血液注射进中国小说已经硬化的动脉，使之返老还童的话，那么赵树理便是第一个让新文学呈现出刚健清新的民间风格，使之由洋而土的艺术家。把小说交到老百姓的手里，使它容易了解，易于欣赏，确以赵树理为第一人。他是文学群众化、通俗化方面当之无愧的泰斗。

八月二十日，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第一次文教奖揭晓，赵

① 鲁迅：《南腔北调集·论“第三种人”》。

树理的小说荣获特等奖金。

第十章 邪不压正

一九四七年，是赵树理独步文坛的显赫的一年，也是中国革命争取胜利的关键的一年。

是年二月，发动全面内战的蒋介石力不从心，乃改为重点的钳形攻势，并引黄河之水归还故道，把它当作“四十万大军”以阻挠骁勇的晋冀鲁豫野战军。谁知在七月一日那天，刘邓大军轻而易举地渡过黄河，实行千里之战略跃进。当记者去采访那位令敌丧胆的独眼将军时，刘伯承谈笑风声地说：“我们打断了敌人钳形攻势中间的‘铰’，进入大别山，达到了长江边上，在牯岭休养的蒋介石也听到了我们武穴江边的炮声，这样直达蒋介石的卧榻之侧，可真是出乎他意料之外了。”说着，将军更高兴地大笑起来，“从此就粉碎了蒋介石的所谓重点进攻，也从此我们南线的陈粟、陈赓、刘邓三路野战军，就在中原逐鹿的战场，摆了南向南写的品字阵势，而与蒋介石的战略重点防御相周旋了。”①

配合这全面的军事大反攻，十月十日，中共中央公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新法令以斩钉截铁的语言，宣布了曾是

① 金凤：《四战之地，四战之军—— 谈第二野战军》

天经地义的封建土地制度的死刑：

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有其田的土地制度。

废除一切地主的土地所有权。

废除一切祠堂、庙宇、寺院、学校、机关及团体的土地所有权。

废除一切乡村中土地改革以前的债务。

乡村中的一切地主的土地及公地，由乡村农会接收，连同乡村中其他一切土地，按乡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统一平均分配，在土地数量上抽多补少，质量上抽肥补瘦，使全乡村人民均获得同等的土地，并归个人所有。

乡村农会接受地主的牲畜、农具、房屋、粮食及其他财产，并征收富农的上述财产的多余部分，分给那些缺乏财产的农民及其贫民，并分给地主同样的一份。分给个人的财产归本人所有，使全乡村人民均获得适当的生产资料及生活资料。

于是，一场伟大而又深刻的社会变革，首先在解放区一亿农民中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有几位外国友人亲身参加了土地改革，他们说："新发布的《土地法大纲》在一九四六年至一九五〇年中国内战时期的作用，恰如林肯的《黑奴解放宣言》在一八六一年至一八六五年美国南北战争期间的作用。"[①]"共产党人着手改变中国旧的传统土地关系之日，也就是开始改造整个中国社会之时。对于中国几亿无地和少地的

① 韩丁：《翻身》第7页。

农民来说，这意味着砸碎无所不在的地主阶级统治的枷锁，意味着第一次获得牲口和房屋。这是一场激发农民破除久以养成的卑怯心理和改变附庸地位的斗争，奋起反抗长期压迫他们的人的斗争。”①

为贯彻这个划时代的文献，晋冀鲁豫中央局召开了一次漫长的土地会议。在会上，赵树理破天荒第一次登上了主席台。《人民日报》也赠以“农民作家”的尊称，又刊登了一幅他的木刻像。这幅画像颇为别致：他头戴瓜皮毡壳帽，身穿对襟黑棉袄，双唇紧闭，双眉微皱，一对悲天悯人的眼睛忧戚地注视着前方，好象正在考虑怎样才能使贫苦农民彻底翻身。

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一个与农民心心相印的知识分子，赵树理在半年之前就全身心地投入了这场翻天覆地的运动。八月间，王春在一篇文章中顺便谈到：“赵树理同志注重驻村群众运动，在他的组织推动下，书店组成了一个驻村工作组，从群众运动的小组酝酿直到大会斗争，无不全过程的参加。后来更号召全体同志参加，替群众发现‘防空’的麦子，帮群众维持会场秩序，给群众讲道理撑腰，回来座谈感想，比论道理。”②《人民日报》也作了如下报道：“作家赵树理同志，今年以来，经常帮助驻村的群运工作。在改善干群关系，动员干部洗脸时，他为了解决某一些干部和积极分子的思想疙瘩，

① 柯鲁克夫妇：《十里店—— 中国一个村庄的群众运动》第 1 页。

② 王春：《换一个看法想想》载 1947 年 8 月 30 日《人民日报》。

常给他们耐心地解释，甚至一连搞四、五黑夜。”①

这里所谓的“干部洗脸”，是当时边区土改中的一个重要的内容。中央“五四指示”下达后，“乡村干部、积极分子、民兵以功臣自居，普遍占有多而好的土地、房产、牲畜、窃取更多的现金、器具等。”②致使农村仍有许多赤贫的窟窿户。幸而领导上及时发现，采取各种方法，反复教育干部：革命不是为了自己发财，毛主席是领导大家都翻身，而不是领导咱少数人翻身，千万不要忘记穷兄弟，大家一起翻身才有力量。然后动员他们深刻反省，割自己的尾巴，“匀出”多占的果实。这个运动，俗称干部“洗脸、擦黑”。

但是，要这些刚翻身的小生产者认真诚恳地“匀出”已经据为己有的财产，真是比登天还难。所以，赵树理同志要连续化四、五夜的时间去做他们的思想工作。

由于中国农村几千年来根本没有民主，只有封建宗法专制统治，不少干部自觉不自觉地承袭了专横跋扈、长官意志的官僚作风，惯于向群众发号施令，蔑视多数，依赖少数积极分子来开展工作。因此不但不愿“洗脸擦黑”，还想趁机再捞一把。结果，在具体落实政策时，便出现了扩大打击面、把富裕中农当作“封建尾巴”来大割特割的偏差。在《邪不压正》中，赵树理对这种情形作了精彩的描写：

“有人说：‘光补窟窿啦？咱们就不用再分点？’元孩说：‘区

① 《新华书店帮助驻村群众翻身》载1947年9月4日《人民日报》。

② 《薄一波关于晋冀鲁豫区土地改革情况的报告》。

分委讲话不是说过了吗？不是说已经翻透身的就不要再照顾了吗？”小旦说：“什么叫个透？当干部当积极分子的管得罪人，斗出来的果实光叫填窟窿，自己一摸光不用得？那只好叫他们那四十七个窟窿户自己干吧！谁有本事他翻身，没有本事他不用翻！咱不给他当那个驴！”元孩说：“小旦！你说那不对！在区上不是说过，……”元孩才要批评这自私自利的说法，偏有好多人打断了他的话，七嘴八舌说：“小旦说得对！”“一摸光我先不干！”我也不干！”“谁没果实谁去斗！”元孩摆着两只手好久才止住了大家的嚷吵。元孩说：“咱们应该先公后私，要是果实多了的话，除了填了窟窿，大家自然也可以分一点，现在人多饭少，填窟窿还填不住，为什么先要把咱们说到前头？咱们已经翻了不少了，现在就应该先帮助咱们的穷兄弟”。小昌说：“还是公私兼顾吧？我看叫这伙人不分也行不通，因为这任务要在两个月内完成，非靠这伙人不行。要是怕果实少分不过来，咱们想想还能不能再找出些封建尾巴来？”这意思又有许多人赞成。小旦说：“有的是封建尾巴！刘锡恩还不是封建尾巴？他爹在世时候不是当过几十年总社头？还不跟后来的刘锡元一样？”元孩说：“照你那么提出来可多啦！”跟小旦一样的那些人说：“多啦就提吧！还不是越多越解决问题？”元孩说：“不过那都是三四十年前的事，从我记得事，他家就不行了……。”有人说：“不行了现在还能抵你两户？”元孩说：“那是人家后来劳动生产置来的！”又有人说：“置来的就不给他爹还一还老账？”元孩听见他们这些话，跟在区上开会那精神完全不对头，就又提出在区上开会时候，区分委说那不动中农的话来纠正他们。小旦他们又七嘴八舌说：“那叫区上亲自做吧！”元孩说：“不要抬扛！有什么好意见正正经经提出来让大家商量！”那些人又都一起说：“没意见了！”以后就谁也不开口，元孩一个一个问着也不说，只说“没意见”。会场又冷静了好大一会。有些人就交头接

耳三三两两开小会，差不多都是嘟噜着说：‘象锡恩那些户要不算，那里还有户啦？”要不动个几十户，那里还轮得上咱分果实？’……小昌说：‘我看还是叫大家提户吧！提出来大家再讨论，该动就动，不该动就不动。’顿时会场又热闹起来，哗啦哗啦就提出了二十多户。一提户，元孩越觉着不对头，他觉得尽是些中农。他说：‘我一个人也扭不过大家，不过我觉着这些户都不象是封建尾巴。咱们一户一户讨论吧！要说哪一户应该斗，总该说出个条件来！’小昌说：‘可以！咱们就一户一户说！’元孩叫记录的人把大家提出来的户一户一户念出来，每念一户，就叫大家说这一户应斗的条件。象小旦这些积极分子专会找条件，又是说这家放过一笔帐，又是说那家出租过二亩地；连谁家爷爷打过人，谁家奶奶骂过媳妇都算成封建条件。元孩和小宝他们几个说公理的人，虽然十分不赞成，无奈大风倒在“户越多越好”一边，几个人也扭不过来。”

这种乱割封建尾巴的极“左”倾向，造成了中农人人自危的恶果。他们害怕象韭菜似的没完没了地被割，于是又穿起了破衣烂褂，人前装穷，背后大吃，也不愿再往地里送粪，甚至干脆把驴卖了，把猪杀了，把树砍了，省得眼睁睁地被收走分掉。

看到中农挨整，赵树理总觉得不对劲。他凭借“自来熟”的本领，早对驻地赵庄的二百来户人家作过详尽的调查。哪家几口人，几个劳力，种几亩什么样的地，好年成打多少，坏年成收多少，一年穿几件衣服，吃多少盐，喝几斤油，有什么门堂差事，走亲戚待客人得花多少粮食……诸如此类的生活琐事，他掌握得一清二楚。因而也知道中农的生活富裕

点，全靠自己勒紧裤带用双手从地里刨挖来的，没有剥削过什么人，哪能算是封建尾巴呢？所以也坚决反对斗争劳动致富的中农，认为这样做既不符政策也不合民意。他一面劝告中农。“这样做太不上算了，消耗的财产是自己的，自然是自己吃亏。土地改革过后，别的中农都去犁地，你把驴卖了看人家犁；别的中农猪长肥了，你早把小猪杀了，看人家吃肉、卖钱；别的中农的树长大了，你的小树早做了抬杆，看人家做梁做柱。……”一面又力劝那些“翻得高”的新贵们退出部分多占的果实，匀给赤贫的窟窿户。但在“左”风正烈的时候，正确的意见常常会被当成右倾言论。于是，“在我们工作团内部，在对问题的认识上分成了两‘派’。”也在赵庄搞土改的王中青说，“赵树理一个人为一派，我和其他的人为另一‘派’。我们感到赵树理有点‘右’，所以在讨论问题时经常和他‘斗’。”也许，这就是赵树理的忧虑之所在吧。

十二月二十六日，开了两个多月的土改会议终于结束。中央局本着实事求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原则，认为“老区不应机械的再来一次平分运动。可采取抽补调剂、动少数不动多数的办法，而且应使土改与整党及建立从村到县的人民代表大会的民主运动相结合，吸收非党贫雇农及中农参加党的支部大会，与群众大会结合为一，借以公开党的支部及整党、查阶级、查思想、查立场、查作风与查行动，在群众意见下处理坏干部坏党员。”①

随后，中央局直接派出三个大工作团，进行调查、试验、

① 《薄一波关于复查前的补充指示的报告》。

搜集材料。其中由中央局宣传部、人民日报社、新华书店和晋冀鲁豫文联等单位组成的工作团，进驻了赵树理所在的赵庄。

土改复查和整党运动，比干部洗脸擦黑更为复杂繁琐。工作团要领导全村农民，划阶级，定成份，组织贫农团，成立农会，选举村人民代表，组成新的村政权；评议党员、查思想作风，查立场行动，纠偏，查窟窿找补丁、匀出退赔以及重新分配果实。……

在这关系到每个农民的身家命运的伟大变革中，赵树理一如既往，竭力正确地理解和执行党的政策，作出了旁人所不能及的贡献。经常跟他意见相左的王中青后来感叹道：赵树理看问题的方法和我们不一样，他对党的政策总是站在群众的立场，用群众的实际情况来衡量、理解的，所以理解得深、准，实事求是。而我们却往往站在干部的立场上，从完成任务来理解政策的，便容易脱离群众实际，出现偏差。

王中青不愧为赵树理的老同学、这段评语揭示了赵树理的主张之所以常常被历史证实是正确的奥秘。

一九四八年初春，赵庄的土改剩下了最后一个环节：分配果实。赵树理被聘为村里的估价员，把斗争来的五花八门的浮财逐一估摸掂量，然后作价、标价，以便合理分配。那几天，已上育才小学的赵广建正在家里度假。她记得："爸爸工作很忙，常在我睡醒一觉时才回家。有时我妈把做好的饭放在锅台上等了又等，热了又热，直到鸡叫他才进门，胡乱吃几口饭，就和衣倒在炕上睡觉，还没等把被子暖热，天边刚刚发白，就又要出门忙着分果实。"

她还记得，有一天下午，房东黑旦娘分回来一张红漆的大八仙桌，亮光光的，放在院子当中。黑旦娘从没见过这样好的桌子，高兴得合不住嘴，直笑。乐得她也跟着高兴，爬上桌子，用针在光溜溜的桌面上刻了“赵广建”三个歪歪扭扭的大字。正当她歪着头得意地欣赏自己的手笔时、猛听得一声吼：“下来！”只见赵树理气势汹汹地过来、劈头就给他的宝贝女儿一个巴掌——“这是我一生中仅挨过的一次打。”赵广建说。——他摸着桌子，心疼得嘴里直叨咕：“千不该呀万不该！往哪写不行呢？哎，新桌子呀！得来多不易啊！……”然后拿了些豆面跟什么和到一起往上抹。

四月十三日，赵庄的填补、整党宣告成功。赵树理回到新华书店担任《新大众报》的编辑——是年元旦，《新大众》杂志由半月刊改为周报，它是晋冀鲁豫边区发行量最大的报纸。

由于解放区的范围不断扩大，土地改革方兴未艾，这份面向大众的报纸每天要收到几十封请求解答土改问题的信件。回答信访是件麻烦的事情，但赵树理却很感兴趣。他生性急公好义，爱解纠纷，何况事关农民翻身大业，因而他针对来信，在《新大众报》上接连发表了十几篇短评和快板，有的放矢地指导各地的土改。

根据他的工作经验，“土改中最不易防范的是流氓钻空子。因为流氓是穷人，其身份很容易和穷人相混。在土改初期，忠厚的贫农，早在封建压力下折了税气，不经过相当时期鼓动不敢出头；中农顾虑多端，往往要抱一个时期的观望

态度；只有流氓毫无顾忌，只要眼前有点小利，向着哪一方面也可以。这种人往往是天然的积极分子——什么时行卖什么，吃得了谁就吃谁，谁上了台就拥护谁，分果实迟早是头一份，填窟窿又回回拉不下。要是让他们当了干部，就会把群众踏到脚底下，工作一定要搞坏。”

“其次是群众未发动起来的时候，少数当权的干部容易变坏：在运动中提拔起来的村级新干部，要是既没有经常的教育，又没有足够监督的群众力量，品质稍差一点就容易往不正确的路上去，因为过去所有当权者尽是些坏榜样，稍学一点就有利可图。”

赵树理的眼光的确尖锐。《人民日报》后来发表过一份统计材料，太行区农村中“支部不纯，历史上党群关系裂痕较大，干部作风不民主，甚至支部内有不少不纯分子存在，结束土改政策有偏差，但不很严重”的二类支部，就占百分之五十。与赵庄毗邻的十里店，原来的村长王克斌，就是十足的流氓。群众揭发道：“我们毙了李发奎（国民党的帮凶），但是，王克斌也不比李发奎好多少。”

“他前前后后几乎吊打过村里所有的人，从村北头到村南头，从街上到寨上的都有。”

“要是哪个标致的女人勾动了他的情欲，就非得顺从他不可。”……①

所以，赵树理认为，干部队伍的成份不纯和作风不正，是土改中最应该注意的两个重点，稍一放松，工作上便要吃亏。

① 柯鲁克夫妇：《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群众运动》。

他在二、三月间连续发表《穷苦人要学当家》、《干部有错要老实》、《谁也不能有特权》、《中农不要外气》、《再谈行政命令》等短评，反复强调这两点，提请大家千万要注意。

不久，他高兴地看到了毛主席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其中谈到："有许多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和流氓分子乘机混进了我们的党。他们在农村中把持许多党的、政府的和民众团体的组织，作威作福，欺压人民，歪曲党的政策，使这些组织脱离群众，使土地改革不能彻底。这种严重的情况，就在我们面前提出了整编党的队伍的任务。……全党同志必须明白，解决这个党内不纯的问题，整编党的队伍，使党能够和最广大的劳动群众完全站在一个方向，并领导他们前进，是解决土地问题和支援长期战争的一个决定性的环节。"

要解决这个关键问题，仅靠几篇千把字的短评，显然是分量太轻了。于是，一部反映土地改革的中篇小说，开始在赵树里的头脑中酝酿起来，"想写出当时当地土改全部过程中的各种经验教训，使土改中的干部和群众读了知所趋避"。但在构思过程中，他却颇费踌躇，因为"要是正面写斗争恶霸，穷人翻身，少数人多占了果实留下穷苦窟窿，二次追究连累了中农，一直写到整党、纠偏，篇幅既要增长，又容易公式化。"最后，他灵机一动，决定采取一个简便的方法：把上述一切用一个恋爱故事串连起来。因为他突然想到了一件和他有点关系的悲喜剧。

在他工作过的赵庄，有一户中农家庭，家里有个远近闻名的漂亮姑娘，惹得村里的某些干部垂涎三尺，年老的要她当儿媳，年轻的要她当老婆，结过婚的则想占便宜。不料这

个姑娘有点象智英祥，对这些心术不正的干部敬而远之，一概拒绝。可他们毫无羞愧之意，反而怀恨在心，在“填平补齐”时趁机报复，悍然宣布她家正是“封建尾巴”，连屁股都割脱，把她全家扫地出门，撵到一个破窑洞里。当时，了解内情的赵树理好生不满，再三做工作，终因孤掌难鸣，无力挽回。这个富有同情心和正义感的作家，觉得这么办实在对不起人家，好象自己也有责任似的，一有机会就到破窑洞里去坐坐，拉拉家常，表示精神上的歉意和安慰。等到复查纠偏时，在工作团的主持下，她家被评为中农，没收的土地财产退了回来，打击报复的干部也受到了应有的处分。不久，赵树里又为这个姑娘介绍了一个很合适的对象。结婚那天，新郎新娘骑着新华书店的大红马，满面春风地从街上走过，村里的农民也喜气洋洋，乐哈哈地议论着这件婚事，都说真是邪不压正啊！

姑娘的悲喜剧，启发了赵树理对小说的艺术构思。他把小说定名为《邪不压正》，打算在里边描写中农王聚财一家及其闺女软英在婚事上的四次波折。第一次，当地首富刘锡元的儿子，看中了比他小十五岁的软英，狗腿子小旦为虎作伥，强下聘礼。暗示“土改之前，封建势力占统治地位，流氓甘作地主之爪牙，狐假虎威欺压群众。贫雇农固然直接受其压制，中农也常被波及”。

第二次，八路军解放下河村，刘锡元一命呜呼，软英要就此退婚，与心爱的小宝结合，却被聚财行使父权制止了，主张“看看再说”。这意味着土改初期，封建势力虽受打击而余威尚在，中农疑虑重重，因循观望。

第三次，农会主席小昌唆使已是积极分子的小旦，逼迫软英嫁给自己十四岁的儿子，并把聚财划为“封建尾巴”。暗示少数流氓坏人钻进干部队伍，多占果实，以权谋私，扩大打击面，侵犯中农利益。

第四次，在纠偏、整党运动中，小昌挨批，小旦被揭穿，王聚财扬眉吐气，小宝和软英终成眷属。表明“追清了错误责任，教育了党员干部和群众，安定了人心，使农村工作重新走上正轨。”

这时，晋冀鲁豫和晋察冀两个边区连成一片，两区的文联便宣告合并，成立了统一的华北文艺界协会，赵树理和周扬、陈荒煤等二十一人当选为理事。接着，两区的新华书店也在九月间合并于拉河北平山。赵树理的家也随之由赵庄迁往平山。

他安顿了家庭后，便坐下来着手《邪不压正》的创作。

因为出世一年的小二湖已经活蹦乱跳，哭起来惊天动地，时时打断他的思路—— 他在年底发表过一篇《初生小儿的看护法》，大约正是养育二湖的经验总结—— 他就另外找了一个写作的“办公室”。这是老百姓放杂物的破房子，唯一可取之处是幽静，它分内外两间。外间乱堆着农具，席囤以及锅、盆、炉之类的东西，里间有一张单桌，但也放满了坛坛罐罐，后墙上还塌了一个角，阳光雨露倒很充足，所以他的地盘仅有窗前炕上那一部分。小坑桌上摆着的，仍旧是一支钢笔，一卷稿纸，一个墨水瓶，一只装烟末用的油墨盒子和三四寸长的小烟袋。

这位大作家，生活上依然是什么都不讲究，三万字的

《邪不压正》就在这间陋室中源源写出，于十月间陆续见诸《人民日报》。随后，各地又是相翻印，印数无法计算，有些竟辗转传抄得一塌糊涂，谁也读不通了，但也照样流行，因为这是赵树理写的。它甚至引起城市读者的欢迎。石家庄工人投书《人民日报》说："我们厂里，工人们都非常愿意看，有过去不看报的工人，也抢着看了，当第一次看到后，因为小说还没有登载完，工人们都在焦急：'是不是不再续了呢？'这都是说明赵树理写的好……"①

可是评论界的调子却不大和谐。他们对《邪不压正》有过一场挺有意思的讨论。有人捧之上天，有人按之入地。观点针锋相对。特别在小说的主题与主人公的问题上，竟久久争执不下，断断续续探讨了一年有余。

十二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同时刊登了两篇读后感。一篇以赞赏的口吻写道："这部小说不论从政治上艺术上都是相当成熟的，它把解放区近三四年来的农民翻身运动绘出了一幅极生动的图画，从而体现了党的政策在运动中怎样发生了偏差，又怎样得到了纠正。……我想这个故事对农民的教育比十次百次宣传教育要大得多，对今后生产情绪亦将有很大裨益。小说中充溢着农民朴实而纯洁的感情。……由于故事的生动、语言的丰富与洗练，读起来有声有色，好象身临其境地参加了他们的各种活动。"②

另一篇则批评小说"把党在农村各方面的变革中所起的

① 《石家庄工人来信，请赵树理写工人》载1949年1月25日《人民日报》

② 韩北生：《读〈邪不压正〉后的感想和建议》

决定作用忽视了，因此，纸上的软英是脱离现实的软英，纸上的封建地主是脱离现实的封建地主，于是看了这篇小说就好象看了一篇《今古奇观》差不多，对读者的教育意义不够大。”并且认为作者描写失误，“小宝应该是优秀的共产党员，应该是有骨气的。软英应是由希望、斗争、动摇、犹豫以致坚定。坚定的思想应该必须是在党的直接或间接教育培养下产生出来的。”①

此后，《人民日报》又刊登过四篇争鸣文章。其中有个漫谈《邪不压正》的评论者，坚决表示：“我不同意党自强同志那种结论。那个结论好象是从几个固定的框子里推断出来的，并没有切合实际的分析。”

“我以为赵树理这个作品不是在写一个普通的恋爱故事，而是透过这个故事在写我们党的土改政策。特别是在写一个支部在土改中怎样把党对中农的政策执行错了，而又把它改正过来。这篇小说便是在这种波动中发生在一个农家的故事。这正是我们在土改运动中的某个侧面与缩影。因此，这个作品只能拿我们党在土改中的政策去衡量。离开了这个标准，我以为很难涉及到这篇小说的本质。在我们解放区的文艺作品中，这篇小说还是第一个这样明确、生动，丰富而“又较为深刻的反映了我们党的政策。”

他对小说推崇备至，说：“我以为这是我们解放区文艺战线上一种新的成功。我甚至于这样理解：在人民作家杰出的作品之中，恐怕是划阶段的，在我们整个解放区的文艺运动

① 党自强：《〈邪不压正〉读后感》

中，恐怕也是个新的起点。因为它反映了变动社会基础的、轰轰烈烈的运动，而且反映了指导八万人生活前进的政策思想。这种小说的出现，应该引起解放区文艺界足够的重视和研究。”

看来，此人基本上猜透了赵树理的主观意图，也评论得比较中肯。可惜的是他未能再进一步，探讨《邪不压正》的客观意义。而此后三十年中，也几乎无人响应他的呼吁，给予小说足够的重视和研究。直到中国经受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深受其害的周扬才旧事重提道：“记得当时就有人说过，赵树理在作品中描绘了农村基层党组织的严重不纯，描绘了有些基层干部是混入党内的坏分子，是化装的地主恶霸。这是赵树理同志深入生活的发现，表现了一个作家的卓见和勇敢。”①

客观意义大于主观思想，是赵树理小说的一个显著特征。

不过最有意思的是评论者们还为了找出《邪不压正》的主人公而争吵不休。有的说是小宝和软英，有的则认为是聚财和元孩。后来，又有人对这两种意见各打四十大板，然后来个调和折中，从两对中各取一人，划定为聚财和软英② 不料与此文同时发表的作者自述，却表明这个论断也跟赵树理的本意风马牛不相及。赵树理明确指出：“我在写这篇东西的时候，把重点放在不正确的干部和流氓上，同时又想说明受

① 周扬：《赵树理文集·序》

② 竹可羽：《评〈邪不压正〉和〈传家宝〉》，载1950年1月15日《人民日报》

了冤枉的中农作何观感，故对小昌、小旦和聚财写的比较突出一点。”“小宝和软英这两个人，不论客观上起的什么作用，在主观上我没有把他两个当作主人翁的。”他俩的恋爱关系不过是条结构上的“绳子”而已，“把我要说明的事情都挂在它身上，可又不把它当成主要部分。”

一部中篇的主人公，居然会如此难以捉摸，引起这么大的分歧和争论，显然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不过，这种不正常的现象却在帮助我们形象地理解赵树理创作的独特方式“问题小说。”

自从赵树理独步文坛，成为“方向”，便不断有人来请他谈谈写作经验。但这位天性谦逊的作家总觉得自己才疏学浅，没啥可说，所以每次都是婉言谢绝。后来人们用了个激将法，告诉他：“你要太固执，人家要说你是摆架子啦！”他这才吓了一跳，很不情愿地写了篇短短的《也算经验》。

他说：“我在做群众工作的过程中，遇到了非解决不可而又不是轻易能解决了的问题，往往就变成了所要写的主题。这在我写的几个小册子中，除了《孟祥英翻身》与《庞如林》两个劳动英雄的报道之外，还没有例外，如有些很热心的青年同事，不了解农村中的实际情况，为表面上的工作成绩所迷惑，我便写《李有才板话》；农村习惯上误以为租出土地也不纯是剥削，我便写《地板》。……假如也算经验的话，可以说：在工作中找到的主题，容易产生指导现实的意义。”

这是一段真诚坦率、不弄玄虚的经验之谈。他写小说的确不是想创作万古不朽、传之后世的艺术珍品，而是出于纯粹的功利目的，把文学当作一种为社会现实政治直接服务的

特殊工具。“要求配合当前政治宣传任务，而且要求速效。”这种把文学使命同政治任务等量齐观的看法，势必使他不由自主地在小说中“重事轻人”，不去着力刻画人物形象并给以最充分的重视、最精细的雕刻，而是把注意力全部集中在问题的解决上。他笔下的人物，几乎全部是为问题圆满成功而设置的，他可以随意驱使，不大考虑人物自身的圆满成功。因此，就赵树理的成名作《小二黑结婚》而言，我们就很难说小二黑一定是小说的主人公。这个形象，在他的父亲和岳母跟前相形见绌。在赵树理的代表作《李有才板话》中，李有才似乎有点象主人公，然而他半途失踪了，后半部分唱主角的是老杨同志，可在前半场却连影子也没有。实际上，无论老杨同志抑或章工作员，李有才抑或阎恒元，都没有资格充当这篇名著的主人公，他们都得唯问题—— 农村工作方法 —— 之命是从。对于《邪不压正》中的人物，作者也是如此安排的。他说：“刘锡元父子、聚财、二姨、锡恩、小四、安发、老拐、小昌、小旦等人，或详或略，我都明确地给他们以社会代表性，”“使我预期的主要读者对象 （土改中的干部群众），从读这一恋爱故事中，对那各阶段的土改工作和参加工作的人都给以应有的爱憎。”这样一来，习惯于人物中心论的评论者就难免要象猜谜语似的争论主人公了。

具体问题重于人物形象，乃是赵树理小说的另一个最显著的特征。

赵树理关于《邪不压正》的说明，使竹可羽恍然大悟，原来“人物创造，在作者创作思想上还仅仅是一种自在状态。”于是他劝告作者：“人，永远是生活或斗争的核心，永远是一

个故事、事件、或问题的主题。……假使这可以算是作者创作思想上不够的地方，那么，这个弱点正好在《邪不压正》上明显地暴露了出来。”① 应该说，他的见解一针见血，“问题小说”的要害正在于颠倒了文学描写的中心。赵树理不认为“艺术的目的与社会的目的是不能以同一单位计量的。艺术家的目的不在于解决狭小的问题，而是通过无数的永不穷竭的一切生活现象，使人热爱生活。”② 因此，他虽然塑造了一大群有血有肉的农村人物，却大都缺乏高度的典型性，象《儒林外史》似的，未能给文学之林增添一个不朽的形象。

然而，我们却不能因此而苛求赵树理。艺术的历史制约性，决定了当时文艺创作如果未能提出或解决某个社会问题，就没有起码的时代精神，如果光有高度的艺术性而不给斗争增添一分力量就不易受到群众的欢迎。有一天，丁玲去参观农村的骡马大会，顺便看了一会儿那里的演出，回来后写下了这样的印象：

> 观众的心情始终被剧情（指新编的秧歌戏《娃娃病了怎么办》——引者）抓得紧紧的，欢喜、愤怒、悲哀都跟着剧情走。这幕戏虽然是两天之中赶出来的，粗糙生疏都有，但因为内容全是根据当地最近的事实编成的，所以很吸引人而又感动人。大家看后都说：“这戏太好了，它告诉咱们娃娃病了怎么办，这实在是件大事！”
>
> 接着虽然还有旧戏《长坂坡》，但观众总不象先前一样那么感

① 竹可羽：《再谈关于〈邪不压正〉》，载1950年2月25日《人民日报》

② 《托尔斯泰书信选》载《文艺理论译丛》第一册第224页。

情激动、那么被吸引了。当他们回家之后，也只有前一幕会长期留在他们心上，温习着这个问题："娃娃病了怎么办？"①

这就是产生"问题小说"的土壤。农村中一些亟需解决的问题，经过赵树理的艺术加工，变成了老百姓所希望看到的那样：明快、简约、色调鲜明、充满对比、一边是对，一边是错。

再从赵树理个人的主观愿望来看，我们同样没有理由去责备他。他说过："大家都说我是这个家那个家，其实我并不是—— 假如一定要说成个家，那我只不过是个热心家。"这句话确非客套。就其本质而言，赵树理不是个艺术家，而是个热心群众事业的老杨式干部。参加革命后，以往种种颠沛流离，求告无门的辛酸遭遇，梦魇般地压在他的心头。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一个与人民血肉相连的革命战士，强烈的责任感使他比农民自身还要迫切地希望改变农村落后、贫穷、愚昧的面貌。正是为了又快又好的开展农村工作，他才借助于文学创作的。一个采访过他的记者写道："赵树理同志不仅有着饱满的被压迫阶级的情感，而且有着老老实实为群众服务的态度，真是'俯首甘为孺子牛'，他每次参加群众工作，都是真正以当地劳苦群众的代表出现的，所以到处都受到群众欢迎，他在每次收集创作材料时，都是如此—— 即把作群众工作与收集材料工作统一起来。正因为如此，所以也就能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并把工作中普通存在的毛病，写成小说

① 丁玲：《记砖窑湾骡马大会》

来教育广大干部和群众。”①

此外，由于他和小说中的原型人物朝夕相处，同搞土改，闭着眼睛也能说出他们的心思来，因此，虽然他的描写中心在于具体问题，但笔下仍有不少呼之欲出的人物形象。譬如，从那一口咬住“看看再说”的聚财身上，我们看清了一个中农家庭老一代的灵魂及其全部善良和弱点。当他最后大发感叹：“这真是个说理的地方！”无人不会为之微笑。

然而，也许是因为第一次尝到轻微的教条主义文艺批评的滋味，赵树理在论争之后，好象对《邪不压正》失去了信心，从此再不谈起这篇小说，更没有把它选进自己的集子。

一九四八年来，敌我力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辽沈战役已大获全胜，淮海和平津二地则鏖战正酣、捷报频传。毛主席豪迈地宣称：“人民解放军不但在质量上早已占有优势，而且在数量上现在也已经占有优势。这是中国革命的成功和中国和平的实现已经迫近的标志。”② 然而蒋匪困兽犹斗，经常有敌机来党中央所在地平山县一带轰炸。为了适应这战争的环境，赵树理决定把家眷送回老家、顺便探望年过花甲的母亲。

这次回家，正值春节将临，乡亲们都在忙碌着准备过年。男人们忙着挑水扫院，铲除积土；女人们则忙着收拾家屋，扫除尘土，在新糊的窗纸上细心地贴上一朵朵红纸剪成的窗花，

① 荣安：《人民作家赵树理》载 1949 年 9 月 30 日《人民日报》

② 毛泽东：《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

然后又压碾蒸糕做年菜，满村里炊烟缭绕，油香四溢。虽然这里早已解放，人们也不大笃信神灵的存在了，而家家的大门上，除了红艳艳的大字春联，还有不少黄表纸印的门神。在锅灶上面烟熏火燎了整整一年的灶王爷，这时也面目一新了。人们恭恭敬敬地尊它为“一家之主”，但也老实不客气地请它“上天言好事，回宫降吉祥。”家家的祖宗牌位，也都陈列在堂前，享起香火祭祀。

传统习惯顽固地要人们相信，只有这样才算过年，弄得这位反迷信的斗士也无可奈何，只好回乡随俗。不过他也高兴地看到，人们“为了不忘共产党，也都爱在正屋中间挂几张毛主席、朱总司令等领袖像。他们买不到时，好写写画画的人就自己画。这些画往往还画得象个人形。可是你要硬说象谁就很难确定，原来画的是毛主席、下边写上朱总司令，别人也看不出来”。

经过一度忙乱，山村气象一新，人人喜形于色。可是除夕那天，忽然北风呼啸，彤云密布，天上竟纷纷扬扬地下起鹅毛大雪来，然而节日的气氛却更见浓厚，农民互相笑哈哈地招呼着：“瑞雪兆丰年哩！”

节日终于来到了。天才蒙蒙亮，雄鸡高唱，全体起床，家家户户，灯烛辉煌，先放“开门炮”，在院中点燃松柏枝架的“明火”；然后设香案祭祀神灵祖先，青烟直透九霄。接着，孩子们穿着新衣给父母叩头拜年，全家吃饺子喝年酒。饭后出门，互相拜年，恭喜发财。

赵树理有十一个年头不在家中过年了。这次，他重入八音会，和老小字辈们一起吹吹打打闹了一回“红火”，又逐户

访问了全村五十二家邻里，还拜访了六个亲戚。亲友们多年不见，知心话讲不完扯不断，不知不觉就住了两个来月。而山外的世界却在天翻地覆。一月三十一日，北平和平解放了。它标志着三大战役胜利结束，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基本解放，人民革命在全国的胜利指日可待。

三月五日至十三日，中共中央在平水县西柏坡举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七届二中全会。在会上，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于是，四千年文明古国翻开了新的一页，中国人民的新时代创始了！

三月十五日，设在平山县的《新大众报》迁往北平，改名为《大众日报》。消息传来，赵树理在山中呆不住了。他告别了慈母妻儿，父老乡亲，告别生他养他，患难与共了半辈子的太行山。第一次走向中国北方的最大都市北平。

赵树理的生活史，也翻开了新的一页。

卷　四

生活的主人

(1949—1962)

文章合为时而著，
歌诗合为事而作。
——白居易

第十一章 进 京

一九四九年二月三日，人民解放军的铁流在山呼海啸般的欢迎声中，浩浩荡荡，开进北平。漫漫长夜终于过去，古老的都市从此获得了新生。

严寒消逝了，满街漫巷的秧歌舞和腰鼓声迎来了四十年代最末一个春天，也迎来了全国文艺工作者的第一次大会师。被迫分离了二十多年的解放区和国统区的作家艺术家们，终于在这举世闻名的文化古城胜利相会了。

为了总结彼此的经验，交换彼此的意见，接受彼此的批评，砥砺彼此的学习，以共同确定今后全国文艺工作的方针任务，成立一个新的全国性组织，三月二十二日，这两支新文艺大军商议决定，尽快召开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由四十二人组成的筹备委员会中，尽管赵树理正在遥远的太行山，人们还是把他选进去了。同时，他又被选为中国人民的代表，将去巴黎出席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后来，赵树理未能赶上启程的日期，代表团也因法国政府拒发签证而改赴布拉格。

在这个洋溢着欢乐的城市中，人们对老解放区的老革命充满了衷心的崇敬之情。被誉为文艺界“方向”的赵树理，自

然格外惹人注目。人未进京，有关他生平的传说已经四起，并象一切名人一样，难免对他的经历增添一些不无善意的油和醋，什么出身于吹鼓手世家啦，曾经寄迹于旧戏班子啦，形形色色，不着边际。为此，王春应《人民日报》之约，发表了《赵树理是怎样成为作家的》一文，他告诉人们：

“赵树理是山西沁水人。他的家庭并不是吹鼓手，而是一个贫农家庭。这个家庭和他生长的农村环境，给赵树理同志带来三件宝，保证他一辈子使用不尽：头一宝是他懂得农民的痛苦。他家原先种着十来亩地，但地上都带着笼头，就是说指地举债，到期本利不齐，债主就要拿他管业。从有他到抗战开始三十年间，他的家和他自己一直呻吟在高利贷主的重压下的。被债主扫地出门的威胁，他经过，不得已几乎卖掉妹妹的惨痛，他经过，大腊月天躲避债主的风寒，他受过。总而言之，他是穷人，他是穷人的儿子，他真正知道农民的艰难是什么滋味。他懂得农民，自然也就懂得地主，懂得农村的经济生活，知道农村各阶层的日子都是怎么过的。

“第二宝是他熟悉农村各方面的知识、习惯、人情等等。他的父亲除了种田，还以编簸箕，治外科，诌扯奇门遁甲等为副业，《小二黑结婚》上的‘二孔明’在迷信和强调弄钱这两点上，就是取的他父亲的影子。但不管怎么说，这位聪明的父亲，却是精通农村‘知识’的；从有用的缠木叉、安镰把，到迷信的捏八字，择出行，无不知晓，无不告诉给他。赵树理自己上过村学，放过牛驴，担过炭，拾过粪，跟着人家当社头祈过雨，参与过婚丧大事，走过亲戚拜过年，总之是他在农村实顶实活了那么大，再加上他父亲给的那些‘知

识’也就算得是真正熟悉农村了。

“第三宝是他通晓农民的艺术,特别是关于音乐戏剧方面的。他参加农民的‘八音会’,锣鼓笙笛没一样弄不响;他接近唱戏的,戏台上的乐器件件可以顶一手;他听了说书就能自己说,看了把戏就能自己耍。

“他的这三件宝:极度高涨的农民求解放的义愤,非常丰富的农村生活的知识。熟悉与爱好农民艺术的热忱,就是他后来创作作品的不尽源泉。

“赵树理也不是混旧戏班子出身,他其实连一天旧戏班子也没有真正混过。他是学生出身,山西省立长治第四师范学校初中毕业。他是新文艺的爱好者,写过新诗、新小说,着实努力学习过欧化。但是从学校出来以后,他的创作思想转变了,……他一面和文艺青年来往、一面和农村老百姓接触着。他从这两方面的文化生活的对比上,看出了新文化还是停留在少数知识分子中间,而广大人民呢,和新文艺一点不发生关系,还被制造愚昧的封建迷信武侠淫荡等等读物笼罩着。许多文艺工作者不屑于去理他们,他们也攀不着文艺的门坎。他于是开始提倡给农民写东西,提倡通俗化。

“他同时又是多才多艺的,能写字下棋,还会画几笔山水画,也能刻图章,爱好工艺小创作。还能耍把戏,讲笑话,只要他一在场,管保男女老少通夜不散。……”

这篇文章,使全国人民第一次比较全面、比较准确地了解到赵树理的生平与为人。

四月初,赵树理抵达北平。他没去代表们下塌的北京饭店,住进了东单附近的《大众日报》社宿舍。

北平是个朴实而又庄严的城市，街道宽阔繁华，建筑宏伟典雅。钻在山沟里待了半辈子的赵树理，立刻感受到一种博大肃穆的气氛，对古中国都市的敬仰之情油然而生。但使他最为激动的，则是见到了神交已久的前辈、新知。周扬是最早肯定他创作价值和历史地位的“伯乐”，他俩虽说同在华北解放区，却一直无缘谋面，所以会晤时特别愉快。周扬目光锐利、思想敏捷，他对赵树理留下了这样的印象：“他懂世故，但又象农民一样纯朴；他憨直而又机智诙谐；他有独到之见，也有偏激之词，他的才华不外露，而是象藏在深处的珠宝一样不时闪烁出耀眼的光芒”。①

他也见到了刚由香港来京的茅盾先生。出乎他的意料，这位现代中国现实主义流派的重要开拓者，竟是一个极其平易谦和的小老头。留着短短上髭的脸上漾着亲切的微笑，一见面就夸赞了他的“大作”。可赵树理也许是受那深刻的自卑感的制约，在这个前辈作家面前显得手足无措，不知所对。只会农民式地连声“嘿嘿”，含含糊糊地嗫嚅几句自谦之词。

这种印象，几乎留给了所有初次见到他的人们。孙犁后来回忆道：“他恂恂如农村老夫子，我认为他是个典型的农民作家”。②

作为见面礼，赵树理不久就在《人民日报》、《大众日报》上相继发表了短篇小说《传家宝》和《田寡妇看瓜》。

这是赵树理回家探亲的额外收获，农村新气象触发了他

① 周扬：《赵树理文集·序》

② 孙犁：《谈赵树理》，载1979年1月4日《天津日报》

的创作灵感，因此不属他那特有的“问题小说”，而是两首散发着强烈时代气息的田园小诗。

《田寡妇看瓜》的篇幅无可再短，情节也无可再简，不过是解放前后南瓜地上的两幕场景而已。解放前，中农田寡妇全力以赴地看守瓜田，生怕饿得发慌的贫农秋生来偷。解放后，秋生翻身，地里的南瓜大获丰收，他慷慨地请田寡妇随意取用，于是她放心回家，再也不去看瓜了。但是，就在秋生由偷瓜而送瓜，田寡妇由看瓜而回家的鲜明对比中，正显示出新社会农民生活的全部诗意。所以很快就被译成各种文字流传国外。

《传家宝》由十年前的《变了》演变而成，题材依旧是婆媳争端，这是赵树理最感兴趣的生活素材之一，但这农村中不知重复了几千万遍的日常生活冲突，却象征着农村的生活面貌日新月异，时代潮流不可阻挡。

伟大的土地改革，彻底打乱了中国农村千古未移的生活秩序。它不但解放了生产力和旧的生产关系，而且猛烈地冲击着农民旧的生活方式和家庭关系。因此，在旧的生活轨道上一步不差地走了一辈子的李成娘，想把世代相承的传家宝——纺车、破布、针线筐——照老规矩传给媳妇金桂时，金桂却断然地拒绝继承。这个新时代的女性，自觉地反抗男耕女织的小生产老方式和妇女足不出户，永远围着锅台转的传统生活方式，坚决挣脱小家庭的羁绊而投身于集体劳动的洪流。这场农村中两代妇女的生活观念的冲突，以李成娘甘愿认输，放弃家政的喜剧结束。它揭示了中国农村的历史已由封建宗法制向新民主主义转化，新的妇女的生产生活方式已

在征服、取代旧的妇女的生产生活方式，并以无可抗拒的力量启发农民解脱因袭负担，与传统观念彻底决裂，坚定不移地跟着党走向新社会，开始新生活。小说赢得了评论界的同声赞扬，认为它决非一篇普通的小说，而是“一章历史，一面镜子”。

七月二日，首届全国文代会在京隆重开幕。赵树理跻身于九十九人组成的大会主席团。他在这里第一次见到了敬仰已久的毛主席。

七月六日那天，毛主席突然莅临，在狂风暴雨般的欢呼声中亲切地说道：“同志们，今天我来欢迎你们。你们开这样的大会是很好的大会，是革命需要的大会，是中国人民所希望的大会。因为你们都是人民所需要的人，你们是人民的文学家，人民的艺术家，或者是人民的文学艺术工作的组织者。你们对革命有好处，对于人民有好处。因为人民需要你们，我们就有理由欢迎你们。再讲一声，我们欢迎你们”。①

就象第一次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样，赵树理再次感到，领袖的心和他始终相通，他的创作要永远对革命有好处，对人民有好处，为人民所需要。

在会上，周扬代表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就解放区文艺的全部发展过程及其在各方面的成就和经验，作了简要而又概括的报告。其中，对于赵树理的创作推崇备至：

反映农村斗争的最杰出的作品，也是解放区文艺的代表之

① 载：《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

作。是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

“五四”以来，进步的革命的文艺工作者不止一次地提出过与讨论过“大众化”，“民族形式”等等的问题，但始终没有得到实际的彻底的解决。直到“文艺座谈会”以后，由于文艺工作者努力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努力学习工农群众的语言，学习他们的萌芽状态的文艺，“大众化”、“民族形式”的问题自然而然地得到了解决，至少找到了解决的正确途径。解放区文艺作品的重要特色之一，是它的语言做到了相当大众化的程度。语言是文艺作品的第一个因素，也是民族形式的第一个标帜。赵树理的突出的成功，一方面固然是得力于他对于农村的深刻了解，他了解农村的阶级关系，阶级斗争的复杂微妙，以及这些关系和斗争如何反映在干部身上，这就使他的作品具有了高度的思想价值；另一方面也是得力于他的语言，他的语言是真正从群众中来的，而又是经过加工洗练的，那么平易自然，没有一点矫揉造作的痕迹。在他的作品中，艺术性和思想性取得了较高的结合。①

因此，在人们的心目中，赵树理俨然是颗光芒四射，红得发紫的明星。然而，他自己却浑然不觉，脸上绝无骄矜自得之色，依旧是那么谦逊、随和，讲起话来也依旧是那么通俗、幽默，土气盎然。七月十日，他在会上作《我的水平和宏愿》的发言。他说：“我的‘文化水’是落后的，‘文学水’似乎高一点儿，但那只是一般老前辈拖的捧的。‘政治水’稍好一点儿，但还需提高。‘社会水’呢？我是家庭农业大学毕业，不过对乡村还不能说太熟悉，进到城市以后对工

① 周扬：《新的人民的文艺》

人更是生疏……”。

至于他的宏愿，那就是周扬在报告中提出的“仍然是普及第一，不要忘记农村。”周扬说道：“现在我们整个工作的重心已由农村移到城市，如果我们进了城，就忘了农村，那原来打下的那点基础都可能垮台的。近两年来，农村旧剧的风行已是够我们警惕的一种威胁。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说过：‘大众化就是提高农民文化’。在最近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又说了‘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因此，我们必须利用现代城市和交通的一切优越条件，采用各种方法，继续对农民进行普及工作，继续深入开展农村剧团及其它的文艺的活动。必须对原有农村剧团加以整顿和充实，对子弟班子加以改造。此外还应组织与改进说书，组织与发动群众创作，同时从上而下地供给他们以足够的可用的剧本和歌词。”①

七月十九日，首次文代会闭幕，赵树理获得一大堆头衔：全国文联常务委员、全国文协常务委员，中国曲艺改进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戏曲改进会委员，《文艺报》和《小说月刊》的编委。并担任工人出版社社长——《新大众报》进城后，先改为《大众日报》，后又改为《工人日报》，归当时最显赫的部门之一全国总工会管辖。同时成立工人出版社，由王春任《工人日报》社社长，工人出版社副社长兼总编辑。

九月二十一日，赵树理作为全国文艺界的代表，又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会议期间，来访的记者络绎不绝，

① 周扬：《新的人民的文艺》

于是他又谈起了自己的宏愿："在十五年前，我就立下了宏誓大愿，要为百分之九十的群众写点东西，那时大多数文艺界的朋友虽然已倾向革命，但所写的东西还是不能够跳出学生和知识分子的圈子，当然就谈不到满足广大劳动群众的需要，根据我自己的志愿，一九三三年我在太谷当教员时，曾写过一部长篇小说，名字叫《盘龙峪》，是描写农民和封建势力作斗争的故事。很显然，那时大多数报纸仍在封建势力手里，对于这种向他们开刀的作品当然不会被发表，自己虽然掌握着一个小报，但篇幅太小，在书店出版押金又太贵，因而这部作品只写了一半约十万字就搁笔了。但我并没有放下这一志愿。抗日战争开始后，陆续写过一些东西，直到一九四三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主席发表了文艺工作新方针之后，在党的培养和帮助下，我的这一志愿才得到畅顺的发展。"

说到这里，赵树理情不自禁地拿起桌上的三弦，眯着眼睛弹了一段欢乐的小曲。记者看到，在他的办公桌上，除了办公用具和他的烟斗烟叶之外，还有从山西寄来的胜利剧团团员们的信。于是他接着说道："至于今后如何开展大众文艺这一工作，我觉得先从改进鼓词、戏剧这方面着手，因为这种形式在中国说来，是广大群众最爱享受的精神食粮，而我们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还非常不够。这次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决定在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文化部，以后戏曲改进工作便能全面展开，我是非常满意，而且寄予极大的希望——希望这一机构能够担负起改进这一有关百分之九十的群众所需精神食粮的任务。"

会后，赵树理如愿以偿，被新成立的文化部任命为戏曲

改进局曲艺处处长。从此，他跟曲艺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信心十足，干劲百倍，上任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组织成立北京市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

由于《大众日报》归属全国总工会，因而领导上曾要他把创作的题材由农村转移到工厂来。他当然服从需要，进京不久就跑到一家生产喷雾器的小厂去体验生活，搜集素材，他满以为工厂也和农村一样，大家同吃同住同劳动，可以在日常生活中细细地静观默察，慢慢地了然于心。谁知这老一套根本行不通。工人们白天上班，无暇闲谈，晚上回家，各奔东西，简直找不到一个聊天的机会，要想介入都不容易，深入更是无从谈起。他这才觉悟到，作家的创作范围有其大致固定的领域，不能听凭行政命令随意改换。

他百无聊赖，就常到附近的天桥去闲逛。那是上等的“文明人”足迹从来不到的地方，又破又烂，然而热闹非凡。小戏园子，大席泥棚，露天书场等鳞次栉比；摔跤的，跑马的，变戏法的，走钢丝的，说相声的，讲评书的，唱鼓词的，演评剧的，什样杂耍，应有尽有。这里是北京劳动人民传统的娱乐场所，每天清早，有无数老百姓拥来欣赏这种种艺术，把天桥挤得风雨不透。留连忘返，一看就是一整天。

他从天桥的情景中认识到：城市的贫民和农村的农民一样，也把戏剧和曲艺当作最佳精神食粮。同时，京城的“庙会”和农村的庙会一样，也是封建主义的一统天下，艺人们用令人倾倒的技巧，表演着“封建君主的尊严”，“青天大老爷的恩德”，“武侠替天行道”、“吉人自有天相”，以及“私定终身后花园，落难公子中状元，奉旨完婚大团圆”，……

他同时又了解到，艺人们宣扬这老一套，其实也是出于无奈。他们早已求“新”若渴，觉得“再不改进，真对不起政府！也对不起人民！”许多大众文艺的创作者，也正陷入“无路可走”,“不敢下笔”的深重苦闷。北京当时有几十个戏班子，几十个大小书场，五千个从事说书唱戏的艺人，他们都焦急地盼望着党和政府的指导。因此，赵树理因势利导，积极张罗，组织了大众文艺创研会。

十月十五日，一百五十名大众文艺的工作者，爱好者齐集在前门箭楼，举行成立大会。主持者赵树理即席讲话，希望大家都来当“地摊文学家”，把封建主义从劳动人民的乐园中驱除净尽。他说：“我常到天桥一带去，看见许多小戏园子里，人都满满的，可是表现的却不是我们文艺界的东西。我们号称为人民文艺工作者，很惭愧，因为人民并未接受我们的东西。广大群众愿意花钱甚至站着去听那些旧东西，可见它是能吸引住人的。虽然群众很需要新的文艺作品，而我们也急于把我们的作品深入到群众中去，但两下接不上头，互相结合不起来。就天桥来说，我们的文艺作品很少能卖到天桥去。因此我们感到有组织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的必要。我们想组织起这样一个会来发动大家创作，利用或改造旧形式，来表达一些新内容也好，完全创作大众需要的新作品也好，把这些作品打入天桥去！”

办完这件大事，赵树理出国访问去了。十月二十六日，他和丁玲、沙可夫等一行十五人，作为中国工会与文化工作者代表团，赴苏参加十月革命三十二周年纪念活动。

初次出访，这位乡巴佬闹了不少笑话。他最怕寒冷，光

知道莫斯科比北京冷得多，却不晓得世界上还有“暖气”这玩意，临行时买了好几件棉衣，准备在冰天雪地中英勇地斗争一番。结果，到了苏联，棉衣用不上，扔不得，变成一堆臃肿的包袱，取笑的资料。

他也从未领教过宾馆的高级弹簧床。由于睡惯了硬帮帮的土炕，躺在软绵绵、颤悠悠的弹簧床上反而不得安宁，越辗转反侧，越晃得筋骨酸疼，最后灵机一动，滚落到地毯上，才算安稳踏实，沉沉入睡了。

这支小小的代表团，十几天的日程被安排的满满的。他们出席了莫斯科红场上的庆祝典礼，瞻仰了列宁墓，克里姆林宫，参观了工厂、学校、博物馆，访问了文学院，《文学报》和许多著名作家，还欣赏了《天鹅湖》、《青铜骑士》等最优美的芭蕾舞。全部活动丰富多彩，紧张忙碌。

其时正值《李家庄的变迁》俄文译本出版，苏联《新时代》杂志特地发表评介专文。它告诉读者，赵树理“在这里忠实地描写出中国人民的觉醒和政治力量的成长。读了这本书，你可以获得民主中国人民的精神气质的一个完整的概念。”“赵树理粉碎了伪科学的捏造，如反动的西欧‘中国专家们’所说的，中国人民具有‘谜一样的性格’，‘中国人民自古以来就是保守的’，‘对任何一件新事物有着本能的反感’，以及夸张着中国的惰性。……每一个读者能从这本书中看到和感觉到今日中国的真实情况。在这个目标上，作者得到了成功。”①

因此，赵树理回国前夕，向塔斯社记者发表谈话道：“这

① 西维特洛夫：《关于中国农村的小说》，译文载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三日《人民日报》。

是我第一次到苏联首都来，苏联人民对于他国人民的文化，特别是对于中国人民的文化，表现出热切的兴趣，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苏联读者对于刚在莫斯科出版的我的小说《李家庄的变迁》俄文译本热烈欢迎，使我深受感动”他表示，回国后要写关于苏联的文章，以便让自由中国的人民看到社会主义国家的壮观。

归国后，他如约给《中苏友好》杂志送去一篇谈“访苏印象”的文章。可是题目却叫《参观之外》，内容也不是大家爱写的异国风光或常谈的革命友谊。他说：“我是个在农村长大的人，对农村的兴趣比较大一点，早就想看一看苏联农民的生活，可惜这次不凑巧——一来是冰天雪地的时候，二来是莫斯科附近不是农业区域，所以没有接近农民生活的机会，只不过在火车、汽车、飞机上见到几点迹象。”

冬日的莫斯科，有着生长在温热带的人们所梦想不到的奇景：大地上的一切都披着缟素，唯有建筑物上的赤旗和广场上的红色标语带，在这银世界中骄傲地飘扬。柳絮般的雪花漫天飞舞，太阳却依然发出微弱的光芒，涂了色的大教堂上，金碧辉煌的圆屋顶在隆冬的静谧中闪闪发亮。可是说来奇怪，赵树理对异国风光的印象淡薄之极，但对农业方面的观察却格外敏锐，能将一闪即逝的景象照相似的摄入脑海，感觉也异乎寻常的细腻。他写道：

“在飞机上，看到大批的田地，虽然没有庄稼，还看得出用机器大规模耕种的痕迹。过了西伯利亚，就有种着小麦的农场，都是很大的整块，按那附近的房子大小作比例推测起来，每块都在百亩以上。这些麦田上，往往用播种机种成些

奇怪的花纹——有的种个圆圈，有的种个螺旋形，有的种成一两个外国字，显见得那是整块种完了之后又加上去的。从此也可以想到他们当时播种时的兴致。

“在火车和汽车上，每当车身穿过一丛丛的农村小木房，都使我觉得新鲜：他们的房子都是木质的，但不是用木板而是用整段的树身子砌成的。房子的排列也与中国农村不同——没有用四个房子碰起来的方块院子，都是在篱笆中各各独立的。小一点的房子是单独的房间；大一点的分隔为几个房间，向四面开着门窗。门窗的构造虽然简单却也很精巧，可惜白天玻璃反光，晚上又都关着窗帘子，看不见里边的陈设。有一次，遇到了一座背光的房子，看见里边的桌子和床子上都罩着洁白的布单子，可惜车走的太快，一晃就过去了。这些房子大部份有水电设备，这是从小型水塔和通进去的电线可以看出的。房子外边，常常搭着长串子洗濯过的衣服，这些衣服都很干净漂亮，没有破破烂烂的，可以说明他们日常穿的衣服好，多，而且洗濯得很勤。”

大众文艺创研会成立时，执委会就决定筹备一个综合性的通俗的文艺刊物。可是等赵树理访苏归来，这个刊物还在酝酿之中，同事们正为无关宏旨的刊名而冥思苦索。他们既觉得赵树理提议的“说说唱唱”太土太俗，又想不出更雅更妙的名称，开过几次会也确定不了。

这件事把赵树理惹火了，他大发雷霆，拍着桌子喊道：“弄了几个月时间，你们连办这个刊物的目的都没搞清！我们办它就是要提倡说唱文学，这是中国文学的正统。小说要能

说，韵文要能唱，我们叫《说说唱唱》，正好体现我们的主张、这个名字有什么不好？”大家虽然不服气，可也想不出充足的理由反驳他，于是刊名就此决定。《说说唱唱》于一九五〇年一月二十日正式发行，由赵树理和当时的北京市委文委书记李伯钊担任主编。郭沫若为之题词道：“说说唱唱要表现出新时代的新风格。”茅盾则希望它成为“民族的大众的科学的说说唱唱。”周扬也要求刊物“在群众中生根开花。”

创刊号上的第一篇作品，便是赵树理的鼓词《石不烂赶车》。他在开头写道：

“贫农石不烂，
故事一大串，
有人告田间，
写了《赶车传》。”

这四句话，原是《赶车传》，上开头的四句，《赶车传》是田间同志作的一首长诗，叙的是石不烂赶车的事，咱老赵就拿这个故事编个鼓词。

听书的朋友们或者要问：既然有了田间同志的《赶车传》为什么还要你来编鼓词呢？朋友们！这可以说各有各的路道。各人的爱好不同，有爱读诗的，有爱听鼓词的，可是诗不能当成鼓词唱。诸位想鼓词，就听我的；想读诗，请您再买一本田间同志的《赶车传》。

田间的《赶车传》，是一部颇有传奇色彩的长篇叙事诗，描写性格刚烈的贫苦农民石不烂，怎样从自己血的教训中，懂得了受苦人想翻身，个人反抗行不通，必须走这三条路：换

脑筋，结团体，要领导。作品立意甚高，故事也生动完整、惜于大量游离主线的叙述，冲淡了主题，也削弱了人物的刻画和气氛的烘托。因此，赵树理在改编时大刀阔斧，芟枝去蔓，无情地砍掉多余的铺陈，同时又增添了若干真实动人的生活细节，以深化人物的性格特征、遂使鼓词的主题和形象比原诗来得更加鲜明、突出。

田间的《赶车传》还有一大毛病：通篇采用五字上下的句式、窒碍了作者的抒写自由，有的句子干硬生涩，诗歌的勉力损害不小。而鼓词的特点是韵散相间，有说有唱，唱词便是为故事中特殊的时、地、情、景等所作的通俗诗歌，长短不拘，自由灵活，口语俚曲，妙趣横生，所以文艺界同人颇为推崇："拿赵树理的《石不烂赶车》和田间的《赶车传》相比，《石不烂赶车》对新诗可说是一个很大的'讽刺'，也可以说是一个启发。"[①]"令人看出，他不只对赶车生活知识丰富，对鼓词这一形式，也运用自如。这是赵树理一篇自鸣得意的作品。[②]

五月一日，关系到中国妇女切身利益的婚姻法公布实施了。面向大众的《说说唱唱》自然需要迅速配合、大力宣传，可是编辑部没有现成的稿子，便决定自己动手来写。"谁写呢？推来推去，最后这任务就落到了老赵头上。"也是编委的马烽回忆道，"这是命题作文章，也叫做'赶任务'，一般说来是'赶'不出什么好作品的，可是老赵却很快'赶'出了一篇评

① 肖三：《谈谈新诗》，载《文艺报》第1卷第12期。

② 孙犁：《谈赵树理》

书体短篇小说《登记》我当时曾这样想过：如果这任务落在我的头上，即使给我半年时间专门去搜集资料，也不可能写出这样动人的作品来。”①

他又说：“老赵为什么能够在短时间内”赶出《登记》来呢？最根本的原因还是他生活基础雄厚，脑子里早就形成了那些呼之即出的人物。就连那些“罗汉钱”张木匠用锯梁打老婆之类的细节，也不是临时去‘搜集材料’所能搜集起来的，而是作者长期深入农村生活的积累”。

是的，中国农民的婚细恋爱是赵树理一生中最关心的问题之一。他首先在《小二黑结婚》中告诉人们，唯有共产党，民主政府才能使有情人终成眷属。而《登记》正可以看作是《小二黑结婚》的续篇。这位卓越的现实主义作家后来逐渐发现，事情并非象他原来所写的那么简单。在共产党的革命政权中，尤其在具体执行婚姻法的区村干部中，正在出现一种新型的官僚主义者。他们不仅脑筋封建，而且主观武断，甚至以权谋私，简直成了当年男女幸福之路上难以逾越的主要障碍。倘若不予揭露、不加鞭挞，婚姻法仍将是一纸空文，妇女们仍得代代挨那锯梁子的毒打。

因此，在《登记》中，村民事主任和区助理员代替了金旺，兴旺。一个是极端的利己主义者，假公济私，只准艾艾嫁给他外甥，不然，“任你们有天大的本事，这个介绍信我不写！”另一个是标准的事务主义与文牍主义者，机械地照章办事，致使“多少假的都准了，一对真的要调查”。他们振振有

① 马烽：《忆赵树理同志》载 1978 年 10 月 15 日《光明日报》

词的“不准登记”,“调查调查”,比张木匠的锯梁子远为厉害,名正言顺地剥夺了党交给人民的自由恋爱的权利,使罪恶的封建包办婚姻合法化,现代化了。

这是赵树理在建国后的第一篇杰作、它和《小二黑结婚》一样,被人们改名为《罗汉钱》,迅速地搬上了银幕和舞台,大江南北,传颂一时,几乎无人不识“小飞娥”。这样一来,他对文艺界争论热烈的“赶任务”就有了新的认识。当时,由于新中国的革命和建设日新月异,使得敏感的作家激动不已,急于把新生活表层的每一个片段都尽快地移到纸面上,以激发新时代人民的战斗豪情,于是“写中心”“赶任务”便成了最时髦的口号。结果,未经加工的素材堆砌取代了典型人物的精雕细琢,一味欢呼的浪漫热情取代了严肃冷峻的现实主义,以致引起了一些有识之士的忧虑。但当《文汇报》记者就此来访赵树理时,他说:“如果本身生活与政治不脱离,就不会说临时任务妨碍了创作,因为人民长远的利益以及当时最重要的工作才是第一位的,不应带着应差拉伕的心情去‘赶’,而是把它当作中心任务去干,很严肃的,郑重其事的,看作长期的任务去完成”。“认为临时任务一来,妨碍创作,原来大作就永远不能完成了。这种错误的观点的产生,基本上就是因为生活与政治不能密切配合,政治水平还不够高,所以当上级已将任务总结提出后,应该是感激才对。”

实际上,赵树理的“问题小说”与“写中心”“赶任务”有着本质上的相同之处——就是为政治服务,只是由于他和农民的经济生活,传统心理,风俗文化保持着血肉联系,由于他自始至终保持坚定的现实主义精神,才使他能够把对社

会问题之敏感与文学作品的艺术性高度的结合起来，使他所揭示的问题的客观意义大于他的主观思想，使故事的“小”足以暗示出社会整体性内容的“大”。在《登记》中，他把革命政权中的官僚主义作为当年男女自由恋爱的对立面予以鞭挞，这就给作品带来了深广的社会意义，而其中专门宣传婚姻法的结尾、却恰恰是小说的败笔。在这里，婚姻法好比皇帝的圣旨，一旦公之于世，万事立刻大吉，它冲淡了前面提出的尖锐矛盾，简化了复杂的生活现象，造成小说头重脚轻的毛病。

五月末，北京市召开首届文代会，由老舍致开幕词，赵树理致闭幕词，会后，他俩分任市文联的正，副主席，同住霞公府十五号的一栋小楼，从此开始了亲密无间的友谊。

当时，老舍刚从美国回来，在欢迎他的茶会上才与赵树理结识。他俩一个洋包子，一个土包子，一个城里人，一个山里人，生活经历，思想素养截然不同，一般说来是很难投契的。然而他俩却一见如故，成了莫逆之交。其中的奥妙，据老舍夫人胡絜青观察，”是因为他们都来自穷人阶层，都是底层里钻出来的。”还有：

“他们都酷爱各种各样的民间文艺地方戏，对其中的若干形式、自己会唱，会写、会表演，而且以此相当自豪；

“他们都特别对家乡感到骄傲，一个写了一辈子的北京城，一个写了一辈子的山西农村；

“他们热情，慷慨，豪放，都象一团火；

“他们幽默，都是说笑话的能手，几句话，就能把大家乐得前仰后合，自己却一点也不笑；

“他们都很谦虚，但在原则问题上眼睛里不揉沙子，对待自己非常严格，在生活上严肃，过着简朴甚至有点古板的生活”①

胡絜青还发现，赵树理是个很有特点的人。他的一身农民气质由始至终都没有变，他的清贫的生活方式，他的特殊的生活习惯，常常成为朋友们茶余饭后谈话的好题材。

比如，他的酒量不小，却不爱在家里细饮慢斟，豪兴来时，就站在酒店的柜台前，要上一杯高粱，一仰脖子，全都进口，菜也不吃，抬腿就走。再如，他能诗善画，却不爱游山玩水，探访名胜古迹。有一次，王春邀他去游天坛，他迅速地转了一圈，连说“没意思”干脆蹲在地下抽起烟来，弄得游兴正浓的王春好不扫兴。

又有一次，机关来了个看儿子的乡下老汉，坐在会客室等几子，赵树理进来了，看见老汉，立即递过自己的小烟袋，不到几分钟，就和老汉谈得十分投机了。当然，话题都是关于农家和农业上的事，使得老汉颇有他乡遇知音之感，高兴地问道：“看你这老哥，也象是咱们庄稼人？”赵树理郑重地点点头。说着，老汉的儿子来了，他便得意地给儿子介绍道：“看，你这位大叔，也是咱乡下人！”逗得儿子和在场的人都大笑起来。

进城后，赵树理虽然名重一时，经常出入高级社交场合，参加过大大小小的宴会，物质条件也今非昔比，稿费滚滚而来，可他日常衣食一直未变，仍然披一件从太行山带来的破

① 胡絜青：《老舍与赵树理》

旧棉大衣，用小烟袋抽着揉碎的烟叶。饮食方面更不讲究，喝得是廉价的砖茶—— 据他说，这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老家，我就喝这个”。去得最勤的饭铺是霞公府两口一家专营大饼、烤白薯和老豆腐的小店、他常和赶大车、蹬三轮的老哥们挤在一起，来一碗浇着香油，辣椒油，芝麻酱的老豆腐，吃得津津有味，心满意足。他觉得这比农民过年还强哩！所以有一天，已是副省长的王中青来京出差，赵树理为尽地主之谊，便诚心诚意地领着他，也到这家小饭铺里喝了顿老豆腐，被人传为笑料。

由于身兼多职，会议连续不断，赵树理不能再象农民那样，凭日头来估摸时间了。但他到商店里一看手表的价钱，不觉又连连摇头，“够农民买五头驴啦！”要是带上这样的“五驴表”他会吃不香，睡不着的—— 过去，家里喂头毛驴多不易啊？最后，他总算在天桥的旧货摊上拾到了一块便宜货，四十元钱，连商标也没有，他恰如其分地命名为“三勤牌”，因为它必须勤上弦，勤对点，勤修理。不过这表倒是忠心耿耿地为他服务的，一直追随到史无前例的浩劫来临，被造反派“借去”为止。

至于那源源而来的稿费，有一半交了党费。此外，谁有困难，他便解囊相助，并且一定要多给点。这个历尽贫穷的作家知道，“人家找我开口不容易，总要替人家着想。”

不过，进京一年来，赵树理并非踌躇满志，一帆风顺的。他被展览在这新解放的、急剧变化的、人物复杂的大城市里，不管赵树理如何恬淡超脱，在这个经常遇到毁誉交于前，荣

辱战于心的新的环境里，他有些不适应”。①

《说说唱唱》创刊后，会员孟淑池送来一部中篇小说《金锁》。它描写一个名叫金锁的流浪汉，流落在一家恶霸地主家里当长工。那地主欠下他的工钱不给，却骗来个女难民给他当老婆，实际上是别有用心。后来因强奸不成，竟将男女一同治死，不料金锁死里逃生，投入解放军。解放后，已是连长的金锁回乡揭发，于是案情澄清，恶霸伏法。在审稿时，编辑部发现故事轮廓脱胎于《阿Q正传》，光明的尾巴也是加上去的，如果把它删去，主题又显得太灰暗了，因而请主编赵树理定夺。他看后，觉得“作者真正了解未解放前的农村，虽用了《阿Q正传》的架子，其内容并无抄袭之嫌，也没有一般写农村只写概念的毛病，发表了可使人了解革命势力来到之前自然状态下的农村具体情况如何。”所以决定把《金锁》连载在《说说唱唱》第三、四期上。

可是这一决定，给赵树理带来了许多意想不到的麻烦。其时适逢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要求报纸刊物吸引广大的人民群众经常地有系统地监督我们的工作，注意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加以改正，使我们能够继续不断地向前进步。”《文艺报》随即发表了响应的社论，并对《金锁》展开批评。这对于打破在文艺界还残留着的不批评、怕批评，背地里不负责任乱批评，用八面玲珑的庸俗方式来应付批评等等习气，固然有如发聩的惊雷，可惜人们在矫枉时，很容易过正，《金锁》便因此被全

① 孙犁：《谈赵树理》

盘否定，一棍子打死了。

刊登在《文艺报》上的批评文章认为："这篇小说看不到金锁有什么反抗，对地主有什么憎恨，有的只是对地主的羡慕"，"这是农民吗？是劳动群众吗？简直是地痞，连一点骨气都没有的脓包，只是地主的狗腿，旧社会的渣滓才有这样的性格，才可能为了吃饭连地主调戏老婆都无动于衷，而作者把这当作劳动人民的正路。"① 有个"非常愤怒"的读者甚至耸人听闻地指责道：小说"让市侩的色情在其中奔驰"，因而"要提出严重的抗议"②

对于这些批评，赵树理主动承担全部责任，作了自我检讨，同时也为作者、为自己、为现实主义作了一点辩护。他说："读者意见中，有一条是说这篇作品中的主角金锁是不真实的，是对劳动人民的侮辱，我以为这是不对的。我所以选登这篇作品，也正因为有些写农村的人，主观上热爱劳动人民，有时候就把一切农民理想化了，有时与事实不符，所以才选一篇比较现实的作品来作个参照。

"作农村工作的同志们，如果事先把农民都设想为解放军那样英雄好汉，碰上金锁这类人就无法理解，其实只要使他的生活有着落，又能在社会上出头露面，他并不是没有骨头的，解放军中象金锁这样出身的人也不少，经过教育之后，还不是和其他英雄一样吗"？

然而，这一正确的辩护却引起了某些权威的反感——态

① 邓友梅：《评〈金锁〉》，载《文艺报》第二卷第五期。

② 《读者对〈金锁〉的看法》，载《文艺报》第二卷第八期

度不好。于是赵树理不得不写了《对〈金锁〉问题的再检讨》，分别刊登在《文艺报》、《人民日报》和《说说唱唱》上，承认“大家是对的，我是错误的”。“指导我作这样辩护的思想是自己有一个熟悉农村的包袱。”

在检讨之余，这位好心人还对作者尽了最大的保护之力。他在最后写道：“我们认为作者是有写农村的特殊条件：生活熟悉，文字通俗流利，只要经过相当的政治学习，一定能写出好的作品来的”。后来，孟淑池终于因《金锁》而被错划为右派，赵树理听说后深感内疚，总觉得是自己害了他。

与此同时，有人对大众文艺创研会的工作也提出了尖刻的批评，指责他们的创作“不能更好地与当前的工作重点结合，对北京市的建设配合不够，反映工人的不多，思想性不强，缺乏生活，挖掘不到问题的本质，写不出人物，……大多是平铺直叙，变化少，穿插少，艺术的形象少，而故事的拼凑和生硬的说教多。”在组织领导上，“缺乏计划和经常性，……一切工作都是比较散漫和抓一把的现象，如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如何根据现有的力量，目的更明确地系统地进行工作，领导上还没有很好把握。”[①] 还有一些人，则在背后吹风道：“《说说唱唱》是吃吃喝喝派。”因为编委的工作是义务劳动，发表文章也不要稿费，所以每月聚餐两次，由“美食家”老舍找地方，边吃边谈，权充编务会议。

身为主席兼主编的赵树理，自然首当其冲。但他问心无

① 坪生：《北京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半年来工作情况》，载《文艺报》第二卷第三期。

愧，泰然置之。在大众文艺创研会成立一周年之际，他理直气壮地说道："我们成立这个会的目的，是想为大众作出点作品来。从这一年的成绩上来看，还没有违背了我们的目的，我们的书籍刊物，卖到大众手里了；我们的剧本，搬上舞台可以营业了，我们的鼓词评话，在游艺社唱了，在电台广播了，我们的会员们，不论在北京，不论在外埠，到处都可以见到或听到本会同人的作品了，这些都证明我们的工作没有白做，而是真正为'大众'做了点事"。

一九五一年初，赵树理改任中宣部文艺干事。这是因为"胡乔木同志批评我写的东西不大（没有接触重大题材），不深，写不出振奋人心的作品来，要我读一些借鉴性作品。"他亲自为赵树理选定了契诃夫、屠格涅夫等俄罗斯伟大作家的作品以及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列宁论文艺摘录等理论著作，让他住进中南海庆云堂，解除一切工作，闭门尽心读书。

毫无疑问，这是党和领导对他的极大关怀，为他的创作前途而采取的一项战略性措施。因为作家在艺术表现方面的成就，是同他的理论水平与艺术修养成正比的，不具备高度的理论素养和精湛的艺术技巧，纵然有相当深厚的生活底子也很难用语言完美地表现出来。所以组织上给赵树理提供了一个在战争年代无法实现的理想环境，让他潜心钻研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外国文学名著，开阔艺术视界，提高理论素养，从而能在这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转折时期跟上形势，继续成为时代卓越的歌手。

但这一绝好的学习机会，却被赵树理给浪费了。当时，严

文井和他对门而居，两人几乎天天辩论中外文学的优劣。严文井一方面惊愕于他的古典文学修养，断定他“不是个通俗作家”，另一方面则感到他不仅不想改造自己的知识结构，而且想说服别人也不必去钻研外国名著。

在一次闲谈中，有人不知怎么说起了某个人的“桃色新闻”。赵树理一下子联想到契诃夫的《在避暑山庄里》，便详细地讲了那个幽默故事的内容和细节，甚至连巴维尔妻子恶作剧写的那封假情书，都差不多背了下来，逗得大家笑出了眼泪，笑过之后，有人禁不住问：“老赵几时迷上了外国的东西？”

“‘迷’字说不上；要说迷，只可以说是它迷上了我，不是我迷上了它。”赵树理说。

是的，这次学习虽然使赵树理饱览了外国文学名著，且凭着惊人的记忆力记住了许多内容，但他在读时总觉得文字别扭，不合中国人民的欣赏习惯，因而又来了“别扭劲儿”，在感情上跟它格格不入。并且说：“翻译的东西读惯了，受了影响，说话写东西也移植过来，就成了问题，这会限制读者的圈子，限制在知识分子中，工农分子读不了。”

他真正心醉神迷的，仍然是民间文艺，有一次，几个人出去散步，闲谈中忽然提到了民间小调，赵树理的兴致便陡然高涨起来，立刻大谈起家乡和民歌小曲来，讲着讲着又独自唱开了。唱完了八大景、十段锦，再唱孝子、孝女、好婆媳、送郎、盼妹、上花轿等情歌。可惜他天生的公鸭嗓子、山西口音，边唱还要边解释，闹得别人半懂不懂，慢慢地就似听非听地议论别的去了。但他却已迷醉得出神入窍，全不理

会别人听不听，照唱不止，直到后来猛然发现是在自唱自说时方才打住道：

“嗯？你们都不听啦？”可他并无怨言，“只怪我唱得不好。歌词，曲调其实都是好的，都是农民的创作哇！”

他把这种情怀，带到了《说说唱唱》编辑部。他的女儿赵广建记得，“每当碰到一篇好稿子，爸爸总是高兴得把手里的笔放下，拿起三弦，将两眼一闭，歪头、仰脸，沉缅在稿子里动人的情节中，手拨三弦弹唱起来。那时候，我还是一个小女孩，总是一声不响地坐在爸爸身边，把眼睛睁得大大的，听得出神，爸爸偶尔睁开眼看到我这种神态，就放下三弦，抚摸着我的头，自言自语地说：‘曲艺好就好在最容易被群众接受，不管是大人小孩，识字的和不识字的，……’，说着说着，他又兴冲冲地坐到桌前看起稿来。

“有时候，爸爸也带我到街上去走走，爸爸管这个叫‘放羊’，有一次‘放羊’放到西单，经过游艺社时都快散场了，他非要领我进去看不可，走到售票门口，卖票的讲只剩下两张柱子后边的票子了，就这爸爸也买了。我嚷着不看，要回家。爸爸对我说：‘进去看看就出来，只要五分钟！’我莫明其妙地看着爸爸，跟在他后面进了场。场内满座，不时响起阵阵笑声，喝彩声和掌声，观众情绪很高。爸爸看到这种情景，脸上堆起了满意的笑容。”①

不久，燕京大学在中文系主任林庚教授的提议下，邀请赵树理去开设“民间文艺”课。

① 赵广建：《旧居门前》载《曲艺》一九七九年第八期。

燕京大学是由美国基督教会兴办的，校长司徒雷登说道："我所要求的是使燕大保持浓厚的基督教气氛和影响，而同时又使它不致成为（哪怕看起来是）宣传运动的一部分"。[①] 因此，在这所弥漫着神学味的高等学府开设民间文艺课，无疑是有革命意义的。所以赵树理一口答应，说定每两周讲一次，每次二小时，介绍一种文艺体裁。

赵树理的"民间文艺"课，一开始设在睿楼，后来移至音乐系小礼堂，但还是容纳不下听讲的人。有个当时的学生回忆道："我虽不是中文系学生，但听说是著名作家赵树理主办的，又是民间文艺课，抱着好奇的心理，兴致盎然地提前到了甘德阁。由于这个礼堂委实太小，大概只有一百多个座位，慕名而来者却接踵而至，因此，后来者都有向隅之感，只好在后边站着，或者靠在门外，可谓盛况空前。"[②]

他还锐意改革教学方法，别开生面地请有关的著名演员来现身说法，即席演唱。因而每堂课都是热闹异常，弦歌不辍。前前后后，良小楼的"京韵"，魏喜魁的"奉调"，顾崇甫和尹福来的"拆唱"，孙玉奎的"相声"，魏长林的"乐亭"以及新凤霞的"评剧"等，都闯进了曾由耶稣统治的洋学堂。

在这彻底洋化的高等学府中，居然会出现如此热烈的场面，无疑是极大地鼓舞了赵树理对民间文艺的眷恋，更加专心致志于说唱文学。然而，他很快就受到了间接的挫折。十

① 《在华五十年——司徒雷登回忆录》，第六十一页。

② 潘俊桐：《别开生面的民间文艺课》，载《山西文学》一九八二年第八期。

一月二十日，全国文联举行第八次常委扩大会议，通过两项决议。一、在北京文艺界组织整风学习；二、调整全国性的文艺刊物。其中包括“加强《说说唱唱》，《北京文艺》与其合并，使其成为发表全国优秀通俗文学作品和指导全国通俗文艺工作的刊物。”于是，这份发行量占全国第一的刊物，便改由北京市文联和北京市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联合主办，并组成新的编委会，赵树理由主编降为副主编。接着，他又在一九五二年的一月号上发表了《我与〈说说唱唱〉》一文，清算自己两年来在这刊物上所犯的错误，批评自己“不懂今日之文艺思想一定该由无产阶级领导，”“由要求‘形式通俗化’走到了‘形式主义’。”此外，他的名字也从改组过的《文艺报》编委会中消失了。

但是事情好象还没有完。调整过的《说说唱唱》才发了五期，《文艺报》上就刊登了严厉地一笔抹倒的批判文章，认为“五期以来《说说唱唱》上所发表的作品，无论是思想内容上和艺术形式上，大多数是没有能达到应有的水平。”

“虽然它们也反映了一些政治运动的情况，但却不能令人满意。这使我们想起《我与〈说说唱唱〉》一文中所说到的一种情况：该刊从前每逢有了重要的政治任务，就临时请人补空，补不起来的时候，就选一些多少与该问题有点关系的来充数。从这几期的《说说唱唱》的配合‘三反’、‘五反’的作品来看，这种情况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改变。

“缺乏生动、深刻的艺术形象，只见铺叙事实，不见人物，很难使人感受到生活的气息，这种毛病，在大多数作品中存在着。这是一个应该引起该刊编辑部注意并对作者提出如何

逐步克服意见的重大问题。

“上面的多种情况，说明了《说说唱唱》编辑部，对于人民生活中的新鲜事物还缺乏好感，对于自己所负的重大任务的认识还不够明确，而在如何更好地满足群众的要求上，还是缺乏应有努力的。……希望《说说唱唱》编辑部今后能够更多地注意提高作品的思想水平与艺术水平，否则，正如毛主席告诉我们的“普及者若不高于被普及者，则普及还有什么意义呢？””①

在此期间，赵树理还经受着另一种痛苦。他那亲如手足，肝胆相照的王春不幸得了肝癌。他几乎天天去医院看望痛苦不堪的王春，感同身受，为自己爱莫能助而遗憾。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三十日凌晨，这个为革命事业奋斗了一生的战士与世长逝了。赵树理接到噩耗，难过得懵头转向，在赶往医院时，竟一头撞在大树上，碰得头破血流。从此，他失去了唯一可以推心置腹、言听计从的知己，失去了唯一志同道合、无条件地支持他的战友。王春的死，好象抽去了他的主心骨。

一九五二年三月三十日，王春追悼会在北京嘉兴寺举行。由刘宁一主祭，赖若愚陪祭，追悼会后，赵树理开始冷静地思考自己的处境和前途。他发现，一九四九年到北京以后，和农民的联系基本上中断，创作之源泉也就几乎枯竭了。而在北京建立新的根据地的设想，终因路子太生，事倍功半而半

① 陈聪：《提高通俗文艺刊物质量——评北京文艺刊物调整后的《〈说说唱唱〉》，载《文艺报》1952年第9期

途废弃了。“所以除了三年之中写了两个小东西 （《传家宝》和《登记》）以外，所存的原料再也写不成个能给人以新感觉的东西。”

于是他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回顾一下自己从抗日战争以来的历史，可以得出这样个结论：从群众的实际生活中来，渐渐以至于完全脱离群众的实际生活，如不彻底改变一下现状，自己的写作历史是会从此停止的。”他情不自禁地怀念起在抗日根据地工作时，那些以诚相见、纯朴无私的农民群众，和那种无忧无虑，轻松愉快的心情。因此，他在毛主席的《讲话》发表十周年的纪念日，向一切关心他的同志们、朋友们郑重许诺：“照毛主席的话，下决心改变一下自己的现状，回到群众中去！”

第十二章 回 乡

一九五二年四月，晋东南农村万物回春，生机盎然。冬日冻裂了的灰白色的土地，变成了一片软塌塌、湿漉漉的黑土地，原先光秃秃的白杨树，转眼之间就绿成了一片雾，那些个香喷喷的柏蒿、香蒿、铁箭蒿，羊儿爱吃的纺棱草、羊粪梢、小猪儿蔓蔓、冻不死、山玉谷……都在急匆匆地生长起来，染绿了秃岭荒坡。地里到处有农民走动，他们在撒粪、锄麦地，种谷子和豆子。这时，平顺县川底村的人们看到一位似曾相识的陌生人来到村里。他五十上下，瘦高个子，黑红长脸，高削鼻子，大嘴圆下巴，穿一件旧袍子，戴一顶黑毡帽，挟着一个抗战时期用过的黄布包包，口袋里插着一根旱烟袋。

他就是赵树理，前来这太行山中的小村庄体验生活。

他离开家乡已有三个年头，这里又是他曾经战斗过的地方，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能勾起一种带着硝烟味的回忆，所以他分外激动，用少有的抒情笔调写道："庄稼长得还象当年那样青绿，乡土饭吃起来还是那样的乡土风味，只是人民的精神要比以往活跃得多——因为我们有了中央政府，老乡们都以胜利者的姿态来欢迎我这个回来的老熟人。"

川底村是农业部于一九五〇年颁发的全国十个金星奖章荣获者之一。早在抗战时期，这里就打下了“组织起来”的基础，全村九十四户有八十八户参加了互助组，一九五一年，这里又成为山西省第一批农业合作社之一，而且第一年就使人均总收入超过一九四九年百分之三十八点八。于是轰动全国，各部门争着来帮助工作，总结经验，艺术家抢着来体验生活，搜集素材，电影厂来拍纪录片，大学生来搞社会调查……自然，它也吸引着远在北京、却依然关心家乡农业的赵树理。

但他来这以后，感受最深的却是：“和这种老战友们共事有个痛快劲儿，那就是他们在长期战争环境中养成的不计个人得失的忘我精神。”“特别是老干部，老民兵和在抗日战争时期出过力的群众，在为公众服务时，都能既不抱怨，也不居功，不言不语，若无其事。”

这种印象，固然是基于对人事复杂、公私分明的城市生活的反感，但更主要的原因大概是同声相应，赵树理自己也充满了这种任劳任怨、无私无畏的精神。

他到川底时，农业社正为选不出会计发愁，十八个党员都不会拨拉算盘。赵树理就毛遂自荐，主动承担会计业务，搞起经济核算、合理分配来，他曾设计出一套边收边分、恰到好处的方法。后来，中央有位负责同志来访，人们告诉他：“老赵与老百姓生活在一起，简直看不出是个干部。他能打一手好算盘，夜里帮助农民算工帐，疲乏了，就倒在炕上睡一忽儿，又起来打算盘，疲乏了又躺下，不久又起来了，一直熬到深夜。白天还同农民一起下地生产。休息时候，就唱一

段上党梆子，使大家听了很高兴，向他热烈鼓掌。”①

在人们的印象中，他是一个技艺高超的上党戏迷。有一次，俱乐部里正排戏，赵树理去了。大家停止锣鼓，欢呼着请他来一段，他毫不推辞，伸手就上，一人玩起了四、五样乐器，大鼓咚咚，小鼓哒哒，锣也响了，镲也响了，口中还打着鼓点。只见他全身各个部分都在舞动，眉在飞，色在舞，满脸的肌肉，也在有节奏的颤动，俱乐部里早已人头攒动，挤得水泄不通，闻声而来的人们也沉醉在他的音乐世界中。他又唱了一段《黄鹤楼》中的赵子龙，最后还加了两句：“赵子龙是俺赵家将，赵家的美名天下扬。”逗得全场人哈哈大笑。

在人们的印象中，赵树理又是个“开会迷”。他平时从来不谈文艺创作，也不见他写什么东西，却爱参予社里的工作，事无巨细，都要了解得一清二楚。他逢会必到，跟蓬头垢面的农民们挤在一起，一边谈话，一边从荷包里掏出一小撮烟叶，把它装进豆粒大的黄铜烟锅里，点着以后就传来传去，使得它在烧完之前，至少有四五个人能吸上一口。有两次晚间开会，因为是研究派工的事，干部们出于好心没有叫他，他便生了老大的气，不满地说：“你们还躲着我开会怎么的？”他们不知道，参加会议正是赵树理深入生活，观察人，了解人的独特方式。

在开会时，人们又发现他还有个“生火瘾”，冷天开会，定要独揽生火大权。他也确有技巧，先把玉米轴一个一个摆

① 《与川底农民一夕谈话——从赵树理身上看艰苦朴素作风》，载1957年6月12日《文汇报》。

成圆圈，然后垒成底大顶小，周围有孔的“金字塔”，垒好后，用纸往中间一点，火就‘哗哗’地着了起来，又旺又没烟。——赵广建后来戏称他为“烧火专员”，说：“你这辈子恐怕就只拿到了一个生火的权。在家你和妈妈争，下乡你和同屋的人争，和服务员争，谁也别打算从你的手里夺走这个权。”

美国友人韩丁，曾在这一带参加过土地改革。他认为，“吃派饭是真正的考验，”必须具有非凡的毅力，才能作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吃饭，但是，“通过吃派饭同人民建立的联系，是参加一千次群众大会也无法做到的。”[①] 赵树理好象也有同感。他去时，农业社安排他到北京新闻电影制片厂的大灶上吃饭。可他吃不几天，就要求吃派饭。他说：“我到川底来，不是为了吃好饭，而是为了接近群众。到灶上吃饭，饭固然好一点，可是不便于接近群众。我端上饭到社员家串门，我吃的是油条，社员吃的是窝窝头，那多不协调。”

他不嫌脏、不嫌差，一户换一户吃派饭，农民平素吃什么，他就吃什么。早饭，玉茭或谷面疙瘩，沤酸菜；午饭，小米捞饭或三和面条，山药蛋菜或野菜；晚饭，米汤拌炒面。而且，不论到谁家吃饭，都象回到自己家里一样，拉家常、闹家务，看到别人忙着和面，就去帮着烧火，看到小孩在炕上哭叫，就抱在怀里哄逗哄逗，……这样，他在全村各家轮吃一遍，就认熟了川底村的男女老少，别人听不到的话他能听到，别人不知道的事情他也能知道。谁家婆媳不和，谁家妯娌有矛盾，谁家儿子不孝顺，谁家闺女在偷偷找对象，……

① 韩丁：《翻身》第 334 页。

他全部了如指掌。他认为："深入生活不能浮光掠影。生去的一个客人，一年半载也不一定有人给你谈上面这些家庭琐事，也了解不到人与人之间的复杂关系。要谈，也只是一些冠冕堂皇的话，或是就生产谈生产，不会东家长西家短的谈，或是只说一面，不说全面。不到真正成为知心人的程度，事情就了解不透，应该想办法取得这个知心人的资格。这就要不断深入，不断判断、修正判断，这样看到的东西才会是全面的、深刻的，写起来才会得心应手，反映出生活的真实。

"比如说一家子吧，婆婆总愿意媳妇的形象是按自己的希望来塑造的，上炕下炕或出地、媳妇应该是她的工具。但媳妇还有自己的社会活动，因此就有冲突。发生冲突时丈夫站在哪一边呢？他可能是团员。要是站在媳妇一边，娘就要闹；站在娘一边呢？媳妇也不饶他。他还有点封建意识，所以在外人面前对媳妇就不大客气；晚上只能对媳妇说好话。媳妇在外面有社会活动，要做个好团员；回到家里，婆婆要求的是另一码事，和丈夫又谈不在一起，自己满肚子苦衷。这时候，要是外边有思想进步而没有成家的青年给她支持，媳妇自然而然就要倾向外人，旁人再借此起哄，婆婆就有了借口，说媳妇和某人好，等等。这样，自然而然地叫媳妇和别人在感情上有了接近。这类事不属于生产，却是挡子要紧事。又如媳妇是整劳动，公婆是半劳动，但当家；小姑上学，很爱穿戴，媳妇就说自己侍候一家人，可花半个钱的自由也没有；人家小姑念书，自己外出开会也要受人管，于是冲突里又加进了经济内容。……"

这些家务事、儿女情，后来给《三里湾》增添了不少精

彩的场面。乡土的气息，也是赵树理小说的一大特色。

春去冬来，一九五二年行将结束，赵树理也要离此而去了。告别的仪式既简单又隆重。川底的男女老少倾村而出，在纷纷扬扬的第一场飞雪中默默地送了一程又一程。他们说不出热情洋溢的外交辞令，但那惜别的泪花足以打动铁石心肠。分手时，赵树理感到，今生今世，将不会有什么力量能割断他和农民的联系了。

这次回乡，使他得出一条重要的经验："深入到生活中去，首先得树立做主人的思想，要参加一定的工作，不能做客人。"他后来说："我曾到全国劳动模范郭玉恩的社里去，因为抗日战争时期我在这地方住过两三年，和这里的人有层老关系。当地的干部把我当自己人，给我一点事做。记得建立农业社的第二年，社里要搞经济核算，合理分配，建立一套会计制度，因为我是个有文化的人，他们让我协助管这件工作，还管生产计划的制订。我在那里搞了几个月，摸出了一些分配工作的经验，比如收割时如何边收边分，既不分过头，也不剩太多就找到了办法。我在做这件工作时，就没想过对写作有啥帮助，会计业务都是数目字，跟写作有多大关系呢？可是，我就是通过这些工作认识农村的人的。要真正深刻地认识一个人，一定得去工作中多次观察，靠一同打鼓唱戏，或者喝酒应酬，是不可能做到的。因为在工作中涉及到各人的切身利害关系时，农民才会鲜明地表示自己的态度，看出他的动向。"

这条经验，他终生不渝地信奉着。此后每年都要到晋东南"共事"一段时间。

一九五三年一月，赵树理奉命调往全国文协（即后来的

中国作协），担任驻会委员。他开始构思反映合作化的长篇小说《三里湾》，然而无穷无尽的社会活动，使这个习惯于打好腹稿才开手的作家迟迟不能动笔。

四月下旬，全国文协组织四十多名作家，批评家和主管文艺的领导人，在京举行为期两月的理论学习，集中讨论对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解及其和以往的现实主义的关系与区别，典型和人物创造问题，讽刺问题，文学的党性和人民性等问题。关于这一难得的学习机会，和上次入部读书一样，赵树理不置一词，只在五年后说了这样一句话："解放初期，有些搞理论的人。对《红楼梦》、《水浒》等古典作品是研究的，至于对评书之类的东西，就认为是低级的，不值得一提。"

九月二十三日，全国第二次文代大会在京开幕。与四年前的首届文代会相比，赵树理的明星色彩已消褪殆尽，几个重要报告都不曾提到他的名字，而且，也许就是针对他那"共事"论的，茅盾在报告中说道：

"在我们中间，有一种相当普遍的情形，就是着重于生活的观察和体验，而比较忽略了对于社会生活的研究和分析。"

"作家在群众生活中，应该不要忘记他自己劳动的特殊任务，人类灵魂工程师的任务。在适当时期中担任一定工作是好的，但他应该随时随地在进行对于一切人物、生活和斗争的观察、体验、分析和研究。在观察、体验、分析、研究的同时，并应尽可能的写出一些报告、速写等形式的短小作

品。”①

但是，就在此后不久的一次下乡中，当一位同去的作家无意地感叹“有个把月没写一个字了！”的时候，赵树理便连忙接过话头道：

“你是说没写创作？可是这个把月，你在农村做了多少具体的工作啊！写一篇小说，还不一定受农民的欢迎，做一天农村工作，就准有一天的效果，这不是更有意义么！”

他们这次下乡，是到河北定县去宣传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推动国家实行的第一次粮食统购统销工作，并为刚建立不久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进行整社和护社。同去的还有著名作家康濯。

康濯，湖南湘阴人，也是位瘦高个，以《我的两家房东》而声名雀起。早在一九四八年，他就因共同编选《人民文艺丛书》而结识了赵树理。他俩相差十几岁，但却一见如故，情投意合。当时，他对赵树理有个鲜明的感觉：“他把农村实在已提到了第一等最重大的、随时随地都无微不至地关心的位置。”现在，这个印象就愈益深刻了。

“我们两个在工作中合作得很愉快，但我更向他学到了不少东西。”康濯后来回忆道，“每次不论开过大会或小会后交换意见时，尽管我也能从会议上发现一些重要问题，但他发现的问题不仅常常比我多，并且考虑得也常常比我长远。我们曾主持搞了个农业社的年终分配，社员只十三户，由于干

① 茅盾《新的现实和新的任务——在中国文学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部、群众和我们都没多少经验，以至经历了数不清的复杂而麻烦的过程。我和老赵是都会算帐的，我数学水平略高，整个分配帐归我抓总；但具体算来，却往往离不了老赵。其中一个项目，每户社员要算九笔，老赵嫌繁，怕给不识字的农民添麻烦，问我能不能简化。我说不能。老赵又说：

‘是不是想想办法？’

‘无法可想。’我又说，‘要想你想去’。

老赵不吭声，走了，过了半天又来了，居然把九笔帐归并成为五笔，并说：‘不是我想出的办法，是跟几个干部、群众和会计商量出来的。’又说，‘你再看看，能不能再简化、归并。’

“我仔细看了、想了，发现是我由于对农事和农民生活不如老赵熟悉，以至固执得不去考虑简化。而一经他提醒，我们又再找人商量，终于归并成三笔帐就行了。可见，老赵对农民不仅熟悉和了解很深，更主要的是对农民感情深。他已经养成一种习惯，那就是自觉地为农民着想。”①

这段时期，中国关于农业合作化的争论逐渐明朗了。

三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关于试行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社的决议，在报上公开发表了，全国的合作社便由五一年的三百个猛增到一万四千多个。这种势头，引起了某些领导同志的忧虑。他们认为，这样的增长速度超过了农村的实际可能，超过了群众的觉悟水平，也超过了干部的经验水平，因而主张收缩，反对冒进，但毛主席却说：“个体农民，增产有限，

① 康濯：《写在前面》，载《赵树理文集续编》。

必须发展互助合作。对于农民的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难道可以说既不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又不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吗？”①

“发展农业合作社，现在是既需要，又可能，潜在力量很大。如果不去发掘，那就是稳步而不前进。脚本来是走路的，老是站着不动那就错了，有条件成立的合作社，强迫解散，那就不对了，不管哪一年，都是错的。”②

这场争论，似乎左右着《三里湾》的创作构思。赵树理原来的意图，“是反映办社过程中集体主义思想与资本主义思想的斗争。”后来，他说：“写《三里湾》时，我是感到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就是农业合作社应不应该扩大，对有资本主义思想的人，和对扩大农业社有抵触的人应该怎样批评。因为当时有些地方正在收缩农业社，但我觉得社还是应该扩大。”

十二月十六日，党中央正式发布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决定从一九五三年冬季到一九五四年秋收的时候，全国的农业合作社要由一万四千个发展到三万五千八百多个。——结果却是成倍超额，出现了十万个农业社。这表明，《三里湾》的创作赶上了党中央的任务，只苦于抽不出时间来完成它。

次年二月，赵树理刚从河北回京，便又匆匆地奔赴中南地区，去慰问人民解放军，一走就是两个月，有趣的是，无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 117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119 页。

论是南国风光，热带雨林，抑或碧波大海，天涯海角，都和莫斯科的异国情调一样，不能打动这个山沟里钻出来的作家，他连一篇随感式的印象记也没有留下。

接着，他又作为河南省的人民代表，出席了九月间在北京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随后，又参加了北京市第二次文代会，继续当选为市文联副主席。这就使《三里湾》的写作一拖再拖，迟迟不得脱稿。

在写作时，赵树理有个习惯：每逢佳句总要操起三弦弹上一曲。“有一天晚上，我听到他的三弦声音似乎特别动情而激昂。”跟他住在一起的一个青年回忆道，[①]“我走进他的屋里，只见他背对着窗前的书桌，坐在房子正中的一把椅子上，微微眯起眼睛，全神贯注地进行弹奏。我悄悄地坐在床前的一个小矮凳上静听着。

“这时，在赵树理同志神奇的手指下，正连续出现轻快峻爽、飘逸抒情的旋律。我好象听见流水的细语，绿柳的扬风，布谷欢跃枝头的鸣叫，农民荷锄归来的歌声。

“后来，老赵的乐弦一变，响起了舒缓缠绵哀悲凄恻的曲调。这声音，拖长了的韵尾，象一个弱者慨叹身世的不幸。象一个被奴役的人哭诉自己悲愤的命运。

“突然，赵树理猛一抬头，手指千回百转，弹出了强烈急切、铿锵有力的节奏。它豪迈雄浑，如同黄河翻滚，一泻千里。它威武森严，如同大将出征，金鼓齐鸣，号角雷动……。

① 杜黎均：《美好的记忆—怀念赵树理同志》，载《北京文艺》1980年第11期。

“我简直听得入迷了！”

“不知是什么时候，老赵的三弦戛然而止，室内立刻出现格外的寂静，两个人都沉浸在音乐的旋律中，久久没有说话。

“老赵把三弦挂在墙上，说：‘你觉得怎么样？这是我最喜欢的三段。’

“这三段音乐真美。一个象行云流水，一个象放声哭诉，一个象万马奔腾。是你编的吗？”

“不是”。老赵欣慰而颇有自豪感地说，“这是我的家乡戏——上党梆子的三个曲牌。”

“啊，原来是这样！想不到地方剧种还有这么美的音乐宝藏……曲牌好，你弹得更好！”他衷心赞叹着，又问道：“今天，你的三弦特别充满了感情。我在屋外就感觉到了。你今天是不是心情特别好？”

“你猜对了。今天下午五点钟，我写完了那个长篇（指《三里湾》）的最后一个字。”赵树理那双沉思的眼睛里在闪着光。

一九五五年一月，《三里湾》开始在《人民文学》上连载。

这是我国第一部反映农业合作化的长篇小说。但它写的并非合作社的创业史或全过程，却是本着创作意图，从农业社要不要扩大、能不能发展写起。它以三户典型的农家为基本核心（全心全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支书王金生一家，三心二意想发展资本主义的村长范登高一家，和一心一意做新富农美梦的中农马多寿一家），以发展生产、兴修水利为冲突焦点（马多寿挖空心思不让出“刀把地”，范登高自觉不自觉地与他联成一气，破坏修渠、反对扩社），从农民的家庭生活、

劳动生活、经济文化生活和党内生活等相当广泛的范围内，来反映合作化。合作化运动乃时代的潮流，势不可挡，社会主义新生力量必定要战胜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和小农经济习惯势力，必定要改变农民的精神面貌，生产方式和相互之间的关系。

《三里湾》与过去的“问题小说”一样，也很难确定谁是主人公，所有的人物都是围绕着问题而设置的。

赵树理认为，在农村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自然是品质高尚，有丰富的智慧和耐心细致的工作作风的好党员，于是书中就出现了王金生这个人物。

“接受党的领导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最快的是翻身贫农，而就我见到过的翻身贫农参加社的，更有两种可爱的人”，他说，“一种是生产上创造性大的人，另一种是心地光明维护正义的人。为了表现这两种人，所以我才写王宝全、王玉生、王满喜等人。”

他又觉得，“原来的农民毕竟是小生产者，思想上都有倾向发展资本主义的那一面，……那一面对农业生产合作化是一种离心力，而这种离心力时时影响着一部分社外群众，侵蚀着一部分社员，一部分青年，甚至侵蚀着一部分党员。在办社工作中，党对于这种离心力也几乎是无时无刻不在斗争。为了批评这种离心力，我所以又写了马多寿夫妇，马有余夫妇，袁天成夫妇，范登高、马有翼等人。”

这些人物，也和赵树理过去塑造的形象一样，大都可以在现实生活中找到他们的原型人物。

在川底村，和他“共事”最久的，是全国劳动模范、农

业社主任郭玉恩。赵树理长期住在郭家，几乎天天交谈社里的工作，又能随时随地静观默察郭玉恩的待人办事，因此很快就“摸透”了他的脾气秉性。他发现，郭玉恩同志所以能在领导互助合作运动中取得那样的成绩，是和他的特长分不开的。他有四个特长：第一是善于分析群众思想。在组和社的前进中，时时产生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他每逢有了这些问题，都能根据具体的人具体的事来分析问题的本质，然后再想具体的对策。第二是他能耐心说服群众。他的头脑很冷静，很少发脾气的时候。有些很不易说服的人都被他说服过。第三是他的计划性强。有农业计划，副业计划，家庭计划，有长远计划，短期计划，即使在每一小段中也都是作着第一步想着下一步，不让工作脱了节。第四是他接受新事物快。上级号召互助，他就组织互助组，开始提倡合作，他就试办合作社，即在新的生产技术和农具上，他每见一样，也都能细心钻研。

赵树理在刻画王金生时，显然就是从这四个方面去把握的。比如，他从容不迫地处理秋收大事和安排“换将”，便表现了卓越的经营之才；他对范登高的尖锐中肯的批评和必要时又有所照顾的态度，则显示了他善于处理具体的人和事；而他对付马多寿那张假帐单的策略，又表明他是个头脑冷静、深谋远虑的好领导。

郭玉恩自己也对人说：“我从小没上过一天学，农业社事情多，我也装了个笔记本，想把事情记在上面。可是不识几个字，好多字写不出来，有时候就往本子上画记号。虽然写的不是字，可是拿出来一看，也能想起来是件什么事。老赵

经常和我在一起，他知道我这个情况，有时候他也拿上我的本子看，一点一点问我在这上面记的是什么。谁知道他把这些也写进《三里湾》去了。你看金生笔记本里的高、大、好、剥、拆、公、畜、欠、配、合，就全是我本子上的那些事。”

外号“翻得高”的村长，固然脱胎于赵树理在一九五一年写的电影故事《表明态度》中的王永富，但是川底村的村长郭过成，恐怕更有资格被看作范登高的模特儿。此人原是一贫如洗的穷光蛋，当地曾有“川底村数谁穷？就算庙旮旯的郭过成”之说。土改时，他成了斗争地主的急先锋，抱着没娘的孩子东跑西颠，积极张罗。所以在分果实时，他得了三个“头等”：一头驴，三间楼房，六亩滩地，组织上还发展他入党，委以村长重任。可他翻身登高，便蜕化变质，一心只想个人发财。受到党组织的批评，便借口去湖南探亲，把组织关系开走，在回来时谎称丢失，自动退党了。

赵树理生平最厌憎这种翻身忘本的干部，一直用严厉而忧虑的眼光注视着这类人物，在《李有才板话》、《邪不压正》、《表明态度》中，都不遗余力地揭露批评小元、小昌、王永富。他在川底时，曾同郭过成反复地讲形势，讲政策，忆苦思甜，展望未来。然而郭过成执迷不悟，他的一片苦心也就化为对牛弹琴。他说：“看来忆苦思甜的办法对这种人是不起作用了，必须狠狠地讽刺、挖苦他们，也许还起点作用。”所以书中的范登高连连失算，处处碰壁，好不狼狈。但是，郭过成读后却不认帐：“有人说范登高写的就是我，我看不能那么说。我虽然也当过村长，有过退坡思想，可是我没有办过‘翻得高’那么多错误事。他姓范，我姓郭，他是他，我是我，

赵树理没有说他是我，谁要来张冠李戴，硬拿上他的帽子往我头上扣，我可不答应。”

至于那个被批评界一致首肯的“糊涂涂”，他的原型人物同赵树理的“共事”更有别样的风趣。

川底村有个未曾入社的郭海莲老太太，她虽然养了两个革命干部儿子和一个工人儿子，自己却仍是个刮刮叫的小生产者，这年春天，农业社要沿着东山根由南往北开一条水渠，渠道非通过她的一块形似刀把的土地不可。她就说什么也不肯，谁来做工作就骂谁。赵树理听说后，便搬到她家去住，为她担水、扫院、写信、推碾，在她生病时亲自给她捡药扎针，以博取她的欢心。然后再慢慢说到“刀把地”，煞费苦心地向她打比喻、讲道理、做保证，几乎磨破嘴皮，才算打通了她的思想。

没料到水渠挖好后，发生了一次意外的决堤事故，洪水浸入郭海莲的玉茭地。这下她可不饶了，大哭大闹，躺在地下直打滚，骂赵树理哄骗了她。可赵树理一点也不恼，只笑笑说：“这个人好糊涂啊！就叫她糊涂涂吧。”不过那封建古板，森严保守的“马家院”，则是取自西沟一个七八十口人的大家庭。户主李老四，还是按照祖辈相传的老古规治家，凡娶到他家的闺女，一进门就发给二斤半棉花，让她们纺纱织布，自理全年的穿衣零用，不准私自养鸡，又要轮流碾米做饭。这种情况，便成了书中“菊英的苦处。”

当然，我们不准备彻底弄清，川底村究竟给《三里湾》提供了多少素材，没完没了的追究，往往会削弱作品的思想力量。当郭玉恩问赵树理：“这《三里湾》是不是写川底事”时，

他就说过："也不是川底，要对的话也能对得上，到哪里都能对上。"

《三里湾》是又一部切合时宜的小说。它保持了赵树理作品的一贯风格，不仅雅俗共赏，而且在政治上起了重大作用。

七月三十一日，毛主席在中共中央召集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指出："目前农村中合作化的社会改革的高潮，有些地方已经到来，全国也即将到来。这是五亿多农村人口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的革命运动，带有极其伟大的世界意义。我们应当积极地热情地有计划地去领导这个运动，而不是用各种办法拉它向后退。"①

九月，毛主席在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撰写的序言中又说："在几万万农民中实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一种了不起的工作，就全国来说，时间还不算很久，经验还不算很多。特别是我们还没有在全党进行一次广泛有力的宣传工作，这就使得很多的同志对于这个问题没有提起注意，不明了这个运动的方针政策和方法，使得党内的意志还不统一。现在我们党的六中全会很快就要开会讨论这个问题，即将作出关于这个问题的新的决议。我们应当根据这个决议做一次广泛有力的宣传工作，才使得全党的意志统一起来。"②

十月，党的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一致通过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紧接着，合作化运动便以排山倒海之势，席卷中国农村的每一寸土地——虽然事实证明，这么做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168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21页。

“要求过急，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以致在长期间遗留了一些问题。”①

于是《三里湾》的价值顿然倍增。人们一面钦佩赵树理对中国农村的深刻了解和敏锐眼光，一面竞相改编《三里湾》，试图把它搬上银幕和舞台。

赵树理也一反常态，发表了《〈三里湾〉写作前后》，大谈起创作经验来。他在这里重又提出：“中国过去有两套文学艺术，一套为知识分子所享受，另一套为人民大众所享受。……我写的东西，大部分是想写给农村中的识字人读，并且想通过他们介绍给不识字人听的，所以在写法上对传统的那一套照顾得多一些。”也还就中国民间传统的特点和自己如何借鉴运用，详详细细地谈了四点体会。

一九五六年二月，中国作协召开第二次理事会扩大会议。周扬在报告中将《三里湾》推崇为同类题材作品中的最佳成果。他说：“作者以他特有的关于农村的丰富知识，热情和幽默，真实地描写了农村中社会主义先进力量和落后力量之间的斗争，农民在生产关系，家庭关系和恋爱关系上的种种矛盾冲突，显示了农村新生活的风光。作者成功地创造了‘糊涂涂’、‘常有理’等几个老中农的典型形象，同时描写了农民中的新人物。我们在《李有才板话》中见过的那些小字号的人物已经随着时代大大地成长了，他们已成为农村中实现社会主义改革的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战士。”

在同一个报告中，周扬把赵树理与茅盾、巴金、老舍和

①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曹禺并列在一起，称他们是当代语言艺术的大师。

但是，就在这次会议上，刘少奇明确指出：

> 我们的作家，如果要成为一个好的专业作家，应该具有丰富的知识，应该懂得自然科学，化学、代数、几何、微积分，也应该懂得历史知识和世界知识，至少应该懂一种外国文，要能看原文。既然是大作家，就应当懂得外国文。鲁迅就是有很丰富的知识，我们的优秀作家也应该成为这样的大作家。我们的许多作家，是革命培养出来的，有丰富的斗争经验，和群众也有联系，就是知识不够，是土作家，只懂得关于老百姓的一点东西，不知道世界知识。只当一个土作家是不行的。我们的青年作家或专业作家都要有丰富的知识。文化水平决定作家的创作水平，要让那些天才的人专业化，让他们学习历史，学习文学，给他们条件，为使他们成为一个大作家打好基础。①

毫无疑问，刘少奇的指示是针对着赵树理这样的作家而发的，而且一针见血，击中要害。时隔半年，毛主席在同中国音协的负责同志谈话时也指出：

> 近代文化，外国比我们高，要承认这一点。艺术是不是这样呢？中国某一点上有独特之处，在另一点上外国比我们高明。小说，外国是后起之秀，我们落后了。
>
> 我们接受外国的东西，会使我们自己的东西有一个跃进。中国的外国的要有机地结合，而不是套用外国的东西。

① 刘少奇：《关于作家的修养等问题》载《文艺研究》1980年第三期。

中国的文化应该发展。外国的乐曲不会听，不会奏，是不好的。外国作品不翻译是错误的，象西太后反对“洋鬼子”是错误的。要向外国学习，学来创作中国的东西。

中国的和外国的，两边都要学好。半瓶醋是不行的，要使两个半瓶醋变成两个一瓶醋。

这不是什么“中学为本，西学为用”，“学”是指基本理论，这是中外一致的，不应该分中西。①

其实，自从邵荃麟出任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后，他就一直想把赵树理这个“土包子”改造为“洋包子”。在赵树理身后劫余的文稿中，有一张开着下列书目的纸片：马列主义、哲学、哲学史、中国史、世界史、共运史、民族革命史、马克思以前各派美学，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文学史、世界文学史、中外古今文学名著。根据稿纸和字迹判断、大致可以肯定，这是赵树理在五十年代受命学习的内容，因为凭他的阅读兴趣，是不会主动去看这些著作的。

但是《三里湾》的创作表明，学习的结果收效甚微。不仅作品的最大缺陷，仍是胡乔木批评的“不大、不深、不能振奋人心”，而且在艺术追求上也越走越远，好象要把民间传统和“五四”传统对立起来，一比高下似的。至于外国的东西，尽管领袖们作了那么明确的指导，他后来却说：“有些人误以为中国传统只是在普及方面有用，想要提高就得加上点洋味，我以为那是从外来艺术环境中养成的一种门户之见。”

① 毛泽东：《与音乐工作者的谈话》，载《文艺研究》1979年第3期

他何以会出现这么大的“别扭劲儿”，对民间文学热爱到偏执的程度呢？

九月二十五日，赵树理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言道：“一个文盲，在理解高深的事物方面固然有很大的限制，但文盲不一定是“理”盲、“事”盲，因而也不一定是“艺”盲。一个人长到几十岁，很少是白吃饭的。每个人对事物接触的范围有广狭、理解的程度有深有浅，但各有其多方面的生活，也各有其集中精力的方面，而文学艺术在他们的生活中，往往或多或少已经成为构成部分，有的甚至精通了某种民间艺术。我们恃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自然形态的文学艺术源泉，正在这里。可惜我们有些人在为自己吸取养料的时候才注意这个，而在直接为群众服务的时候又把这个丢在一边，害得我们的事业未能和广大的群众更紧密地发生联系。

“任何一个作家，只要对社会主义事业某一部分感兴趣、愿意写，不论用什么体裁，什么风格写出来都是有益的——总合乎某一部分人读—— 但广大的群众缺乏合适的文化艺术食粮，似乎也是我们的责任。有些人把普及和提高的界限分得太清楚，但又都只愿当提高工作者，我以为是不太妙的现象。广大群众没有更多，更好的文学艺术食粮，作家应该负相当大的责任—— 我们在这方面的负责任的供应太少了。

“我以为在百花齐放的时候，各人应该要求自己要放之花更为多人所接受，因而也希望大家多多注意研究广大群众在文学艺术方面现有的基础，以便把自己之花培植得更为他们所爱。”

这表明，他是为了向群众提供精神食粮而去钻研连文盲也精通的民间艺术的，以为从这个基础去提高才合乎中国的民情。所以他仍然抱定二十年前的志向，不想上文坛，不想创造“和者必寡”的阳春白雪、只愿进文摊，但求“老百姓喜欢看，政治上起作用。”其它别的观点，不管合理不合理，也不管是哪个大人物讲的，他一概听不进去。

但是这种追求，对于赵树理的发展利少弊多。他甚至因此而忽视了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基本规律。关于《三里湾》的评论，一片赞扬声，但也为小说前紧后松、匆匆地“大团圆”收场和没有爱情的恋爱描写感到遗憾。赵树理就此解释道：

“小说写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一夜、从满喜找房子起、到玉生算场上轱辘的大小结束；第二部分是一天、区上干部张信去查有没有面，玉生离婚，都是一天的事；第三部分是一月，何科长去那儿的那天，好象是阴历七月十五，写到八月十五；《花好月圆》便是从这个观念来的。整个工作从争取刀把地到扩社、扩了社以后开渠、到水渠开工。我原来计划写四部分，第四部分是一冬，写到春节时候。袁天成革命后，小俊参加了劳动生产。开渠施工中，满喜受了伤，一个人在家里自煮自吃，腿病得不能动，饭吃不成。领导上派人去照顾他，派的正是小俊，他们就在那里发生了爱情关系。冬季，县里办了两个训练班，玉生参加水利建设训练班，灵芝参加会计训练班，他们这两人在训练班进一步建立关系。村里剩下有翼和玉梅，有翼思前想后、觉得再追灵芝、恐怕没指望了，就去追玉梅。玉梅原来也一直爱着有翼，而且觉得有翼

也有转变了，所以仍然爱他，经过一冬，几对青年的关系确定，到春节集体结婚。后来在写的时候，临时改变了主意，把第四部分删掉了，某些情节合并到第三部分中去了。因为我写东西的时候，常常有个替读者考虑的习惯，所以我常把篇幅压缩到最少限度。现在看来，这个目的是达到了。”

文学创作的结构安排，居然不为作品内容的完美表达服务，而去服从于农村读者的财力，时间和效益，在古今中外的名作家中，恐怕是找不出第二个人的。

事实上，赵树理确如康濯所言，“把农村实在已摆到了第一等最重大的，随时随地都无微不至地关心的位置。”这是他所有工作的出发点。就在党的八大召开之前的一个月，这位刚刚歌颂过合作化无比优越的专业作家，却给长治地委的一个领导同志写了封措词严厉的长信：

“最近有人从沁水县嘉峰乡来，谈起该地区农业社发生的问题，严重得惊人。兹举数例如下：

“一、供应粮食不足：每人每月供应三十八斤粗粮，扣购细粮、不足维持一个人的生活—— 有儿童之户尚可，只有大人的户不敢吃饱或只敢吃稀的，到地里工作无力气。在产粮区可以享到三定之利，而产棉区则否。这问题在过去提过，但得不到解决。不论说多少理由，真正饿了肚子是容易使人恼火的事。在转入高级社的时候，说了好多优越性，但事实上饿了肚子，思想是不易打通的。

“二、缺草：缺草问题也是老问题，只是现在更严重了。嘉峰乡的草拨在离那里六十里的郑庄，连运费在内，合七分五厘钱一斤，而小米价才六分五厘。群众觉着社里的生产品，

一部分叫牲口吃了。

“三、缺钱：近几年来没有多少副业收入，群众手头没钱，常是靠借贷过日子，而社里又无钱可借，信贷社也不作普通贷款。从前的中农户，本年用的是上年的收入。贫农才是先行借款，凭本年收获还债。固然从前借的是高利贷，但现在就是出高利，也贷不到手。

“四、命令太死板：对棉花、花生不但要实物数字，而且播种面积也不得活动。养蚕的任务也太重，桑叶不够了，往往要经过几十里去买。牲畜老得不能用了也不让卖。

“五、买煤难：分散的小煤窑不让开了，只有指定的几个窑出煤。这样一来，距离远，买煤人集中排队，花的功夫就太多了。

“六、基本建设要求太急：打井、修地分到若干年去做是可以的，做得太快了，别的活就做不了。

“七、地荒了，麦霉了：由于运粮、运草、买煤、买桑叶、修地，打井等杂事误工太多，没有抓紧锄草，打麦两项工作，后来一遇到连阴天、非常被动，以致于地里的草比苗长，麦子垛在场上沤着。

“以上一些问题，在领导工作者看惯了，虽然有时也表同情，但并不认为是一定得到限期解决的问题，结果，‘不可终日’的事可以终‘年’，甚而可以‘多年’。试想高级化了，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了，反而使多数人缺粮，缺草，缺钱、缺煤，烂了粮、荒了地，如何能使群众热爱社会主义呢？劳动比前几年紧得多，生活比前几年困难得多，如何能使群众感到生产的兴趣呢…。

“我觉得有些干部的群众观念不实在——对上级要求的任务认为是非完成不可的，而对群众提出的正当问题则不认为是非解决不可的。又要靠群众完成任务，又不给群众解决必须解决的问题，是没有把群众当成“人”来看待的。也许我的估计不准确，给人家戴了大帽子，但“任务”都完成了，“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而且比以前增加了许多，严重了许多，都是事实。我希望迅速改变这种事实。我希望在地委开会的时候，讨论我提出的情况。”

这是赵树理自觉地反对农村工作中“左”倾错误的开端。从此他一发而不可收，不管风吹浪打，始终是坚决的农民代言人。

第十三章 青年问题

长篇小说发表后，赵树理用这笔稿费买了一所房子。

一九五一年，赵树理托人把老母和妻儿移到北京。他自一九三七年抛妻别子，投身抗战，至此才合家团聚，三代同堂（长子太湖已成家立业，是个独当一面的地方干部，没有随来）；而且，他成了四个孩子的爸爸——幼子三湖在一九四九年生于故乡。

全家迁来后，却因他的工作关系而居无定处，一会儿霞公府，一会儿罗贤胡同，一会儿石碑胡同，几乎年年搬家。赵树理过惯了战争生活，自然不以为意，当做家常便饭，况且他也的确不讲究衣食住行。刚来北京时，他住在东单三条二十四号后楼、房间里仅有一个公家的木橱，里面装的是一大堆从东安市场，护国寺买来的碑帖拓片，却没有一件细软家私。这个木橱紧靠西窗，遮住了窗户上一块破碎的玻璃。冬天，西北风从窗而入，畅通无阻，把这个绝顶怕冷的人冻得要死，拚命烤火，却想不到移开木橱追究一下风源。

而他的老母和妻子，却对接连不断的乔迁之喜不胜其烦。在农村，人们一辈子也难得搬一次家，左邻右舍熟悉得跟一家人一样。现在，搬迁的各种麻烦姑且不论，最糟糕的是住

下后人生地疏，想找个聊天的人也很困难。老太太实在享受不了这种城市生活，第二年，乘她的女儿来京治病之机，结伴回沁水过她的清贫而习惯的生活去了。

赵树理向来没有添置私有财产的习惯和爱好，所以并不打算积极解决家庭的空间问题。后来适逢组织上号召作家自己买房居住，他就随随便便地委托作协总务科代购。这样，他家才有了自己的住宅香炉营十五号。

那是一座相当舒适的四合院，十八间房、客厅、餐厅、书房、厨房、厕所等，一应俱全。房子买定时，赵树理不在家，由关连中颠着小脚张罗一切，还买了一套硬木家具摆设起来，以使屋子的“形式”与“内容”相统一，达到大作家的住房样式。

可是等赵树理回来一看，却连连摇头，说地点不合适。因为时间比空间宝贵，香炉营离他上班的作协太远，路上要化去两个小时。这时，北京正在筹建火车站，其中有座四个姑子住的庵堂也需拆除，正苦于找不到安置她们的理想地方。赵树理便自告奋勇，把香炉营十五号让给她们，自己换到东单煤渣胡同马家庙二号。这里离机关倒是近得多了，然而条件却差得远了，仅有五、六间房，还自化了修理费一千六百元，后来，王中青到这个新居来作客。他前后仔细地参观了一番，对赵树理说：

“老赵，这马家庙值不上香炉营的一半，你换它干甚？”

“为了工作方便嘛！”

“那你至少吃了五、六千元的亏”。

“钱这东西，是‘人民币’，来自人民，还给人民，我是

从来不计较其多少的，说甚吃亏不吃亏。”

“你的新作《三里湾》，一次就印了三十八万册，稿费一定不少吧？”

“你不知道，当时有三家出版社都要出这本书。我要是为了稿费多，就交给人民文学出版社了。现在送到通俗出版社，就是为了书的成本降一点，农民化的钱少一点，销路广一点。只要广大农民能看到这本书，我是不顾及稿费多少的。为了使他们化的钱少，化的时间少，而得到的效果大，我把篇幅也压缩到最少限度了。”

过了十年，赵树理调回山西文联工作时，这所住房就分文不要地交给作协成了公产。

在物质利益上，赵树理的信条是：公家的东西是公家的，我的东西也是公家的，决不计较其多寡得失。

他的工资待遇是行政十级，一九五三年调到中国作协后，有人好心劝他套成更为优厚的文艺级别，却被他谢绝了，理由是要这么多钱有甚用处？不仅如此，他又在全国作家中第一个提出建议：要求调整工资、稿费同时享受的双重待遇，主张取消版税，重新评定稿费制度，不然的话，连现有的供给也不应领取。他说到做到，自己首先放弃应得的工资，直到一九五八年有关规定下达，才恢复领工资。但从此开始，他下乡，不报销车旅费和生活补助费，看病，不享受公费医疗，都化自己的钱。这个自我规定，他至死方才取消。

他绝不允许家里的人去占公家的便宜，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小事。

一九五六年，晋东南的上党梆子剧团来京公演。这下子

可把赵树理乐坏了。他亲自到火车站迎接“娘家”来人，并在报上撰文介绍这个北京人不认识的古老剧种。他说：“近几年来我常向文艺界的同志们鼓吹上党戏，不过听我唱过几句的人总觉着不大高明。这是因为我只有那种太不高明的本钱（嗓子），向大家辩解不清。现在，凡是和我辩论过上党戏的同志们，最好请你们趁这几天看一看原剧，以后咱们再谈！”演出期间，他又是无空不来，一有机会就跑到剧场，和剧团商量演出节目，邀请中央首长和著名艺术家来观看指导。真是忙得不亦乐乎。剧团领导出于感激之情，特派专人开车去接他全家看戏。于是关连中也忙开了。她高高兴兴地按家乡看戏的风俗，把自己和孩子们梳洗打扮得整整齐齐，早早就领着孩子等在门口了。不料赵树理一见车子，就以斩钉截铁的口气告诉来人：车子开回去！因为他自己有车，老伴和孩子们坐公共汽车去。弄得关连中好不尴尬，但知道他脾气固执，没有通融余地，只好领着孩子去挤公共汽车。

事后，她指着赵树理的鼻子说：“不识尊敬的老东西，人家敬你，你就给人家那难看！”

“难看什么？不该办的事就不能办！”

“啥？那你为什么坐小车？”

“我死了能上八宝山，你能吗？各人是各人的事！”

赵树理之所以廉洁奉公，过着异常简朴的生活，还是因为他时时不忘农村和农民，他不断地强调：“我们经常要想到艰苦的生活，经常要想到今天我们广大农村的农民生活还是比较艰苦的，这样，到了城市以后，就不会被城市生活所迷惑。在今天，城市生活和农村生活自然还有差别，但我们的

目的是要消灭这种差别。在这种差别尚未消灭之前，如果我们还有意利用它的话，那我们就成了‘伪君子’了”。

这是赵树理一以贯之的生活准则，也是他要求别人——尤其是青年人——生活的准则。

赵树理调到作协后，除了从事专业创作外，还负责着普及工作部的工作。一九五五年十月，中国作协主席团决定，将普及工作改为青年作家工作委员会，以加强这方面的领导。

自从新中国诞生以来，生气勃勃的文学新人不断涌现，在短短的六年中，就有上百个青年人显露出可惊可喜的文学才华，为社会主义文学事业增添青春活力。其中的佼佼者陈登科，就是赵树理首先发现，扶植，培养的。

那是在《说说唱唱》创办之初，他从准备退回的稿件中发现了陈登科寄来的小说《活人塘》。当时的陈登科还识不了几个字，在文章中运用了大量独创的“象形文字”，再加上稿子曾经落水，泡得字迹模糊不清，真比天书还难读。可以想见，编辑部的某君一定因不堪卒读而随手把它扔进了退稿堆。但身为主编的赵树理却不怕麻烦，仔细地审阅一过后，立即推荐给田间和康濯：

“这篇稿子，看来是个工农干部写的，有些字是打的记号，还要你去猜，要把它看完，是要费点劲，耐点心，吃点苦头，不过是值得一看的。我近来看了一些来稿，能够如此打动我的心的还不多。其中的人物，虽然没有经过精雕细琢，但他们也令人忘不了。内容充实，语言生动，乡土气很浓。”

然后，赵树理亲自修改这篇“天书”，将它发表在《说说

唱唱》上，并给它配上独特的读后感《四人赞》：

一：刘根生赞

狂敌迎风倒，碉楼触手摧。
临危坚不屈，视死坦如归；
得救知群力，相依度久围；
时机才一到，拔地一声雷。

二：薛陆氏赞

白发残年百难身，冤仇未报恨沉沉。
雪中埋去连心肉，墓里刨回舍命人。
茅屋成灰尤放胆，糟糠吃尽不灰心。
黄昏斗到太阳出，敢把豺狼一口吞。

三：大凤赞

十五月来唯一事，小心翼翼护同志，
包伤喂饭病床前，递送传书生死地。
并坐还装姐妹行，相亲不避雌雄异。
船头携手一叮咛，脱尽寻常儿女气。

四：七月子赞

伶俐聪明小女孩，无辜血肉委尘埃。
遗尸也有功劳在，换得英雄雪恨来。

接着，他又给陈登科写了一封长信。“他在这封信里，特别提出要我加强文学方面的学习”，陈登科回忆道，“并开了一大串书名，要我一本一本地看。鼓励我学习要坚持不懈，生活要点滴积累、刻苦钻研，循序渐进。在写的时候，要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切不可无话找话，拉得太长。在语言上，要

说能上口，听能入耳，切不可学洋……等等。同时，他还愿与我做个朋友，经常和我通信，表示如我愿进中央文学研究所（后来改名为文学讲习所）学习，他可做个引线人……

“其实，在我接到赵树理同志信的前几天，当时《皖北日报》的负责人，已接到赵树理和田间两人的联名信，建议送我进文学研究所去学习。

“在赵树理同志的极力推荐下，我于一九五〇年底进了中央文学讲习所，我也就从此跨进文艺界的大门。

“我在文学研究所二年多的学习中，不仅听过他的课，他还多次与我单独交谈，向我传授了他的个人创作经验。他把我当作小弟弟看待，我亦把他视为良师。”①

赵树理还从《活人塘》的命运中吸取了教训，决定在编辑部里安排专人复审退稿，以免埋没人才和佳作。

可是长期以来，“在作协的工作中，以及在作协所领导的有些刊物中，却经常对新生力量采取贵族老爷式的冷淡或打击的态度”。茅盾说道，“很多编辑部，还有严重的关门主义倾向。过去《文艺报》的崇拜权威，压制新生力量的错误态度，曾经受到公正的批评（在党中央的直接干预下——引者注）。作家协会的机关刊物《人民文学》，在这点上也曾经受到各方面的指责。”

因此，在中国作协第二次理事会议上，主席茅盾亲自作了题为《培养新生力量，扩大文学队伍》的报告。他说：“彻底克服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充分运用我们已有的经验，

① 陈登科：《忆念赵树理同志》，载《文艺报》1978年第5期。

积极地帮助青年作者，更迅速地，更大量地培养我们文学的生力军，这就是我们作家协会和全体作家迫切的任务。

“实现这一任务的关键就是要反对保守主义，反对对青年作家估计不足的倾向，反对对待新生力量的贵族老爷式的态度。”

然而，在这个问题上，赵树理又有他的独到之见和特殊的态度。

建国以后，大概是因为赵树理没有什么学历而成了大作家的缘故吧，青年文艺爱好者（大部分是中学生）似乎对他最感兴趣，请教的信件雪片般地飞来。内容大同小异，不外乎要他谈谈生活经历，介绍创作经验，传授写作秘诀。

对于这些来信，赵树理往往是回了几封，把其余的留在桌子上；桌子上堆起来，用纸包住批上“待复”字样放到抽斗里；可是信还是源源而来，待复的那一包还没有来得及复，桌子上就又积够，终于一包一包把抽斗塞满，移到柜子里。到了一九五五年，因为整理柜子，他翻出历年的积信一看，居然还有一九四九年的。“这真是罪过”，他想，“那时候的初中一年级生，现在已是高中毕业生了”。

对待青年作者，赵树理绝无贵族老爷式态度，陈登科的成长就是一个明证。他所以不愿意回信，是因为在他看来，来信者大都动机不纯，字里行间流露出浓厚的名利思想，这使他产生了厌恶之感。

这几年来，他觉得文艺这一行简直可叫“名利行”了。只需一鸣惊人，便能名利双收。可惜有的人正是为此而选择了文艺这一行。他们或是为优厚的稿费而写作，或是觉得作家

高人一等而爱上的。“所谓政治上起作用，老百姓喜欢看”，恐怕连想也没想过。而且，这门学问好象没个深浅，张三李四，凡认得几个字的，都可不识天高地厚地跃跃欲试。山西有个高中生，因在县里的石印小报上发表过文章得过奖，便得意忘形，竟跑到北京来，要赵树理为他在文艺界找工作。

因此，“我对一些有名利思想表现的青年非常敏感，具有深恶痛绝之意。”这位把文艺与政治等量齐观的作家坦率地写道，“文艺界每谈到发动青年创作，以培养接班人，我也感到重要，可是一遇到上述那些青年来信来稿钻营乞怜之语，我便觉怒不可遏，不过我对他们的态度仍以说服教育为主，所复之信，也不发表。”

这个习惯不久就被他自己打破了。

一九五七年三月，赵树理和茅盾同时收到了一个名叫夏可为的青年的来信。他是长沙地质学校的学生，年方十八，兴趣广泛，文学艺术无所不爱，还写过一篇《论宇宙生成及太阳、地球、行星、卫星之生成》寄给了地质部长李四光。现在，他正在创作一部题目叫做《伟大与平凡》的长篇小说，计划四十万字，已完成二万字。但他目前又苦于没有时间，没有写作方法，经济上困难重重，情绪也渐渐低落，因此，他“怀着极大的希望”，给敬爱的茅盾、赵树理伯伯写信，“希望你们会给我精神上的安慰、鼓励、帮助，给我在技术上的指导。我深信，您们会做到这一点的。”

不幸这要求正是赵树理所反对的。他在一年前就反复告诫过，不要想在中学生时代当作家，也不要常写作乱投稿，给部长写信的行动更使他反感。赵树理断定，夏可为是个“不

安心正当的学业而把主要精力用在四面八方找出路的青年”。这样的青年不但不能给以支持鼓励，而且要让他清醒清醒，放弃写作，回头是岸。

于是赵树理明白无误地告诉夏可为：“这一切都是些不切实际的打算，你应该好好学习，毕业后好好就业，等到就业之后有了些社会经历、想写还可以写，只是在就业之前要仍以写作为目的，那不但作不好业务，而且也不会有正确的足以供给写作的真情实感。”—— 夏可为并未在信中表示要以写作为正业—— 同时，他劝夏可为不要再给部长们写信了。因为这是一种“不恰当的门路。”

《人民文学》曾约请过赵树理，“如遇有代表性的复信，转给我们发表一下”。所以这封信就破例公之于世了（由于《人民文学》因故延期，后转刊《文艺学习》上发表）。编辑部还加了一个不无讽刺意味的题目—— 《不要这样多的幻想吧？》

谁知此信的社会效果，跟赵树理的作品适成反比，它立刻引起了人们普遍的不满。不到两月，就有上百封反驳责难的信件箭也似的射来—— 赵树理称之为“兴师问罪”。据他归纳，信的内容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1．夏可为满腔热情，为何只能换得你一瓢冷水？

2．一个有作为的青年，对他的前途难道不应该有远大的理想、志愿、幻想吗？

3．鲁迅是如何帮助青年，而你是如何打击青年？

4．刊物编辑部退稿不提意见，而你们作家又不给青年阅稿，今后的青年想学写作还靠谁指导呢？你难道生来就是作家吗？你在青年时候就没有要求过前辈指导吗？

5.学生生活难道不是生活吗?为什么说一定要深入社会才能写作?

6.杜甫八岁能诗,刘绍棠在中学上学就发表作品(并举出普希金、裴多菲等少年成名者),难道年龄能决定一切吗?

其实,这个归纳并不全面。有的来信还写道,"当我一看到《不要这样多的幻想吧》这个题目时,吃惊不少。……我认为幻想可以推动人们前进,人类的一切发明创造,可以说,几乎都是从幻想开始的。我也很喜欢幻想,我从十七岁开始从事小学工作,已经六年了,而我一直没有停止过作一个中国的'桃李满天下'的乡村教师的幻想,我觉得这标题是不确切的。"

"我们记得五四年东北有个青年,直接给国防部彭德怀部长写信要求参军,彭部长亲自批准,并回信鼓励。"有的读者对他所谓"不恰当的门路"也提出了批评,'毛主席是管全国大事的,今年春天还亲自回信给臧克家同志,并给《诗刊》写稿。我们的部长,作家和报刊主编,又为何不可以接受一些群众的来信?帮助些应该帮助的青年呢?'①

显然,这样的反响是他始料所不及的。它激起了赵树理的"别扭劲儿",固执己见,自以为复信毫无失理之处,不去反躬自省何以会有这么多的人提出异议?其中有无合理的因素?反认为这些信件"把他们自己的名利熏心的思想暴露无遗了。"所以他怒火中烧,疾书一篇"极不平静的总答复"——《青年与创作》,偏激之情溢于言表:

① 《赵树理的复信发表以后》,载《文艺学习》一九五七年第七期。

幻想的性质有两种类型，一种的内容往往是当时人们还得不到的美妙境界，美妙事物；另一种的内容则为当事人不应该追求的个人名利。……而后一种的却只能助长人们“自我扩张”的野心。在我们社会主义的前途上，后一种幻想是不应该提倡的。可惜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才开始不久，传统的个人主义幻想还深深刻印在许多人的心上，不易马上消灭，以至于有些青年人沾染了这份有毒的思想遗产，并且理直气壮地坚持着，传播着，这是非常不妙的。从收到的来信中看，有好多的人把夏可为的想法、做法，说成了“伟大的理想”、“卓越的志尚”、“有作为”、“有毅力”、“不怕失败”、“能和困难作斗争”。这些词句固然足以鼓励人，但要用这些词句来鼓励一个不安心正当的学业而把主要精力用在四面八方找个人出路上的一个青年，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呢？刘绍棠不就是那样漂浮出来的吗？浮出来以后不是就对党不满以至于驾乎党之上了吗？在今天鼓励个人主义，只能鼓励出反党分子来。

夏可为在学校中热衷于出奇制胜表现自己，未有志于做个标准学生。如何能把学校生活写好呢？……鼓励急于成名的学生去写学校生活而不劝他按照毛主席的话去做，也不过是胡风“到处有生活到处有斗争”理论的翻版。在这种鼓励下，恐怕只能产生刘绍棠式的飘飘然的作家。

这时，反右斗争方兴未艾，打击面正在恶性膨胀。有人读了《青年与创作》后，便给编辑部写信道：“我过去成天梦想当作家，最想请教的就是艾青，幸而我没有这样做，否则我一定会成为一个反党的喽罗啦！”“我准备找我省的流沙河指导，幸好当时没有写信与他联系，不然也可能或多或少受

到一些对党对现实不满的思想影响，成了他的俘虏。”①

但是，为小夏鸣不平者仍然大有人在，编辑部收到了不少反驳信。夏可为自己也提出了针锋相对的意见。他洋洋洒洒地写道：“《青年与创作》这篇文章，我一共看了四遍，对赵树理伯伯提出的青年幻想多是个人名利思想在作怪，是为了出风头，卖弄自己的一点小聪明，是不大完全同意的。

“我们知道，一个人生下来，他并不是一个诗人或一个作家，并不是一个语文程度很高的人。他后来之所以成为文学家，是因为经过了知识的冶炼，才把他这块生铁炼成钢的。

“我自从那封信发表以后，收到了全国各地许多青年人的信。当然，有反对我、指责我的，但也有很多人支持我、鼓励我、帮助我。这些人（受赵伯伯批判的人，不过，我看他们不一定是一些个人名利思想熏心的人，因为他们都是为了一个同志好，并尽力的帮助同志克服困难，使同志能给党、给人民做出更多的事）在我的印象中，他们是真正的同志。象昆明五中一个不相识的同学就这样写道：“朋友，我和你，还有无数‘年纪轻轻的’，是否能接替我们敬爱的作家伯伯的事业并超过他们呢？……我想，我们可以从我们共同的理想、志愿，在前进的道路上互相帮助、支持、鼓舞、前进。”难道象这样忠诚的同志是名利熏心的人吗？我难道还有权利、还有资格、不去努力劳动，而来考虑个人的名利吗？我要在党、团的领导下，教育下，积极锻炼，为继承我们长辈的事业和超

① 《赵树理〈青年与创作〉一文发表以后》，载《文艺学习》一九五七年第十二期。

额完成我们长辈交所交给我们的任务而奋斗！”

这是一篇经过高人指点的文章，观点鲜明，批判中肯，对于赵树理的偏见颇有针砭意义。当然，赵树理毕竟不是顽固派，这场笔战就此打住，但是，结果却促使他重新思考如何培养青年作家，并且开始怀疑作家应否专业化。

四年后，他在大连会议上说：“今后的作家靠什么方式选拔出来？青年作家主要来源是什么？这在我是一个谜。”

“作家这一行道，首先应当把这个业务与其他业务平等看待，并不是那么难。天才和好嗓子，千人中必有好嗓子，其他行业也是。人是不是有天才？特长，我承认，但特长用在哪方面完全是偶然的。我十五岁是农村吹打八音会的小票友，十五岁可以打鼓，按自然条件很可以成为剧团乐队的领导人，也可能成为比较有点名的。作家这一行是不是也需要才能呢？培养作家，我看也没有什么特殊的难处。从‘五四’以来都是自由市场方式，来了就算。中国人口这么多，人口和作家要不要成正比例？我看值得怀疑。要万分之一，就有七万个作家，恐怕也用不了那么多。才能一好，在各行各业都冤枉不了他。我们的努力差，没有产生《红楼梦》那样的作品，也还没有发现大的天才。什么都有学校，历史上没有作家学校；但历史上也没有挖煤学校，现在都有了。总之，完全靠过去那样自然的方式，好象还不好。我收到很多青年作者的信，想做作家，要求告诉方法。我有很多信都没有丢掉，又不好回。真正把那些来信中的好作者，挑四分之一、二、训练七八年，恐怕也很成个队伍了。恐怕不能这样办，但也兴许可能。为了当作家而产生神经病的，总会有这样的人，在全国说来恐

怕也是浪费人力的事。用什么办法培养作家，我也想了二年多的办法，但结论还是糊涂。寄希望于大家来研究。”

这表明，在培养新生力量上，赵树理固然不存在贵族老爷式的冷嘲热讽，残酷打击的态度，但是无可否认，他的身上却有一种小生产者的狭隘情绪。以偏概全，杞人忧天，看到几个沽名钓誉，投机取巧的青年，便忧心忡忡地以为大事不好——他似乎不知道靠钻营是永远成不了大作家的，即使沾得些许名利，也是过眼云烟而已——进而因噎废食，觉得不宜给青年人创造条件，让他们一门心思从事创作。后来，他的思路想得更加片面，竟然肯定了作家不应专业化的想法，并请示过转业。幸而领导上深明事理，懂得艺术这门精神生产的特殊规律，不与他一般见识，也不批准他这偏激的要求。

但赵树理的看法既经形成，往往就不易改变。嗣后，“每逢青年请我讲创作方法，创作经验时，”他说，“我往往都只讲学习政治、学习文艺、深入生活三个要素，而且劝其安心于业余化。听的人往往是趁兴而来，兴尽而返，对我讲的十分不满意。”为此，赵树理常常接到他们写来的讽刺信，象“我顶不了你，”“你的经验准备带到棺材里去吗？”……之类的话不知有多少。但他只是一笑置之，我行我素。

就在赵树理撰写《青年与创作》一文的同时，他的女儿赵广建收到了一封家信。这就是后来举国皆知的《愿你当个有文化的青年社员》。

广建是赵树理唯一的女儿。他只身进京时，广建也随校转移到京，安排住在“中国照相馆”，赵树理得知后，就把她领回去带在身边，又当父亲又当母亲，父女俩相依为命，所

以骨肉之情超过了三个男儿，平素最为宠爱，纵容得掌上明珠一般。

一九五六年，赵广建高考落榜，面临着生活前途的选择。按理说，她要留在北京名正言顺，赵树理给她找个轻松的工作也非难事，可赵树理一反常态，竟给广建摆了这样两条出路：或者回山西老家务农，或者从事服务性行业。一个尚未涉世的妙龄少女，对于生活有着多少美妙的梦境呵？理想的翅膀直飞云天。这两条出路，她简直连想也不愿想一下。所以她撒娇作痴，要父亲收回成命。他却毫无让步的意思，父女俩第一次顶开了牛。

“那时，爸爸说我看不起劳动人民，我是不服气的”。赵广建后来写道，“每年的‘五一’节，当工人、农民的游行队伍从天安门前走过的时候，我看见他们抬的生产成绩指标和模型，是多么钦佩他们呀！你能说这是看不起劳动人民吗？不，我不能承认。但是爸爸却好象着透了我的心事似的说：‘你既然看得起劳动人民，又没作了什么丢人事儿，为什么怕见你的同学和老师呢？’这句话就象针一样，刺破了我心灵上的‘脓疮’。是的，我常常这样想：过去不是想过象爸爸一样当个‘作家’吗？同学们不是常叫我‘小作家’吗？但现在爸爸却要我去当农业社社员，几年以后，我的同学是大学生、未来的工程师、艺术家、我怎么有脸去见他们呢？所以我实在回答不出来，只好强词夺理地去堵住爸爸的嘴。”①

① 赵广建：《听爸爸的话，回家劳动去》载1958年1月22日《山西青年报》。

赵广建理屈词穷，急得她不知哭了多少回鼻子。忽然有一天，家中来了个远在新疆文联工作的稀客。这位老战友谈笑风生，大讲西北边陲的奇风异俗、壮丽景色。广建的前途顿时柳暗花明，出现了神秘的天山南北。她决定到新疆插队去，准备骑着骏马，赶着白云般的羊群，在一望无垠的草原上奔驰放牧，和能歌善舞的维吾尔姑娘一起生活……可惜她不服水土，过不多久就被疾病赶回来了。

然而赵树理并不因此改变初衷。他一面千方百计为她治病，一面却坚持着要她回老家去。并且借题发挥，为《中国青年》写了篇《“出路”杂谈》。他说：“有些青年只愿到城里找‘出路’，只愿当干部不愿回农村，也有些老人们希望青年到农村以外去找出路，戮穿了底子，这都不过是要去找‘职位’、找‘享受’，而对于能为建设社会主义服多少务，则算不到帐上。其实，职位越高，对社会负的责任越大，越不是只有一点书本知识而毫无社会阅历的人所能胜任的。我自己除了当过四十天区长以外，再没有当过什么‘长’；自己也不敢再要求当什么‘长’，因为所有带‘长’字的职位我都不在行。

“在现阶段，我承认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仍有较大范围的分工，但我以为要把两种劳动平等看待，不应当以此来分社会地位的高低。我从小参加过农业劳动，落下个劳动者的身手和习惯，至今仍以为是乐事。下了乡和农民吃起一锅饭来，既不觉得营养不足，又不会引起消化不良病，完全保持当年的胃口；三五十里山路，走起来虽不象当年那样轻便，但大体上还保持着两条可以走路的腿，可惜把挑行李的本领失掉

了，是个很大的损失，在一个地方住下来，烧炉子、扫地、洗衣服、拆被子……一些生活琐事，大体上还能作到事事不求人。我觉得保持了这种身手和习惯有很大的趣味，不到衰老得不能动的时候，我是不愿意随便失去这些的。

“我们的农业合作化还仅仅是个开始，正需要你们这些既有文化又有体力的新力量、新血液，多用一用脑子来熟悉它、研究它、和老人们一道把它改造得健全起来。我认为这是知识青年同志们的神圣任务。现在的社会出路和个人出路是统一的，只要你能在职业中全心全意为集体利益打算，逐步做出了特殊的成绩，人民大众就会逐步把更重要的责任委托给你来负。”

但是，广建也不愿改变初衷，病愈后，她离开北京，去找大哥。那时，太湖已是山西省永济县委的宣传部长，他把妹妹留在部里，负责动员毕业生参加生产的工作。

赵树理知道后，不觉哑然失笑。一个顽固的被动员者哪能当好动员者呢？但广建毕竟是他最钟爱的女儿，而她也委实最能给他带来温暖和安慰。他一时心软，也就默许了。现在，经过关于青年理想问题的争论以后，他的内心产生了自责之意。对于女儿的生活道路，自己不也是心口不一，作了无原则的迁就吗？怎么可以容忍她去口是心非地唱高调呢？

赵树理虽然脾气固执，却是个严以律己、知错即改的痛快人。他当即提笔给女儿写道：

广建：

多日不见你的来信，不知近来有何进步。

你离开学校已经一年了。在这一年中，你换了三个工作岗位，最后总算“接近”了劳动人民。我想在现在的条件下，你的思想应该有所开展，因而我又想对你一年来的生活、思想情况作一点分析，作为你今后调整生活的参考。

去年你要到新疆，我同意了。在商量这种事的过程中，你驳回了我好多建议：我要你回原籍参加农业社，你根本不愿考虑；我让你在北京参加服务业，并具体提出了当售票员、售货员、理发员等职务，你调皮地说售票、售货只售给爸爸，理发也只给爸爸理，其实自然还是根本不愿考虑。

从这一件事看来，当时我说你是看不起劳动人民，你不服气，现在我想你应该能够认识这一点了吧！自然你当时的心情是复杂的，不过不论如何复杂，其主导思想只是一种，那就是“看不起劳动人民”。“你有两个小小包袱：一个是高中学生，另一个是干部子弟。从旧社会传来一些社会职业评价，认为读了书或当了干部就应该高人一等，认为参加生产和服务业的人是干粗活的，俗人。这种与社会主义极不相容的旧观点，偷偷地流传到很多学生和干部子弟的头脑中，而你不幸也是接受了这份坏遗产的一个人。我相信你的头脑不太笨，学售票或售货还不至于连钱钞也查点不清，学理发也不至于削了顾客的耳朵，而你所以不愿干者是怕碰上你的老师、同学或和我同事的老前辈了；要是回原籍参加农业生产，你也要比从来没有见过庄稼的城市青年好得多，而你所以不愿去者，也是怕亲戚们和小朋友们，也从要不得的旧观点出发，说你一声“没出息”。同样的中学生，在生产就业问题上，劳动人民的子女要比干部子女好接受得多——他们也尽管接受过对职业评价的旧观点，可是一到了真找不到所谓‘高等职业’或开不了学的时候，农民的子女很自然地会去种地，理发师的子女很自然地会去学理发，即使思想上没有真通了，在行动上也会真

做了；即使有点不满，也不至于认为见不得人。而干部子女则往往不能这样开朗，总以为爸爸当干部儿子就不能理发，其实哪有什么坏处呢？我当作家你理发，我的头发长了请你理，我写小说来供你读，难道不是合理的社会分工吗？平等的道理，每一个中学毕业生不但能懂而且会说，干部子弟说得更会周全些，只是要让他们选择一种事业作为终身业务，他们往往偏不选择最大多数人参加的劳动生产，这除了说是“看不起劳动人民”还能有什么解释呢？

从新疆带病回来以后，我们动员你不论回原籍、不论到永济，最好是参加农业社直接生产，你说那是“不现实的”。你所谓“不现实”，似乎是指你的身体不强，又缺乏锻炼，这理由是站不住的……我和你哥哥后来答应你到永济找生产以外的工作，都是说不服你暂时对你的迁就，实际上你是不能当干部的。干部者，群众之骨干。干部一定要比群众坚强，要有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锻炼。毛主席说过，世界的知识只有两门，一门是生产斗争知识，一门是阶级斗争知识。你和一般中学生都恰巧缺这两门知识，所以都不适宜于当干部。你前次来信说你现在的任务是动员毕业生参加生产，而你自己都正是被动员的对象，难道不成了侯宝林先生说相声的材料了吗？

我相信你在这几个月农村工作中认识了好多劳动人民，懂得了一些生产中的情况，而在感情方面也应该更向劳动人民靠近一些。但我以为应该进一步在一个社里落户，当一个有文化的青年社员。只有真正参加了生产，凭工分过日子，才能深刻体会到我们的社会主义生产建设现在是什么阶段。在现有的基础上如何前进，才能深刻体会到生产中任何问题都与自己有直接关系。只要你在生产中真有所建树，你是会感到生产本身就有快乐的。

听你的同学说，你近来写了几篇文章（内容我没有打听），我

不反对，但也不敢冒然鼓励。我是从二十多岁起就爱好文艺，而且也练习过，但认真地写还是三十八岁以后的事。业余可以写作，今后的作家大部分仍会从业余中产生，但一定要认识什么是“业”什么是“余”，爱业务的精神应该超过爱写作的精神好多倍。你知道我也爱吹笛子，而且吹得很蹩脚：我不因为吹得不好而不吹，但也永远不争取登台独奏（在家自然只能独奏）。这就叫业余。业余的文艺爱好者对写作应抱这种态度——写得好了自然也可以发表；特殊好了也可以转业，也象我的笛子吹好了也可以登台演奏或参加乐队一样。有好多参加农业社的青年知识分子给我来信说，他们立志要当个作家，我不同意。农业社可以产生作家，只是把作家放在第一位，而生产就成了“业余”。农业社参加的这种人多了，也许会把社变成了小的作家协会，只是不容易把社办成个模范社。

不写了！希望你参加生产，把主要兴趣放在主要业务上。

父亲 九月十四日

赵树理象农民一样，从来不记日记，也不爱写信，这样的长信更是罕见，一九五四年去中南区慰问解放军时，他曾寄回一封家信，可是广建拆开一看，里面空空如也，一张信纸也没有，经过仔细研究，才发现信封的背面有他说明平安的八个字——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在父亲面前，赵广建常常是个任性的大孩子。接到信后，她却跑到太谷县去，准备结婚了。

说来凑巧，她的一个在《山西日报》工作的老同学也去那里，无意中发现了这封信。他凭着新闻记者的敏锐目光，一

眼就看到了它的价值，便征得这对父女的同意，给它加上《愿你做一个劳动者》的标题，发表在十一月十一日的《山西日报》上。紧接着，《人民日报》和各省市的报纸相继转载，标题改为更贴切的《愿你当一个有文化的青年社员》。

这对赵广建来说，真是竹竿捅了马蜂窝。一大群记者闻讯赶来，无数封信件也从全国各地飞向太谷。这些信都是中小学生写给“亲爱的赵广建大姐姐”的，有的还以班级名义向她致敬，表示要学习她的榜样，走上山下乡的道路，当一代新型农民。弄得广建骑虎难下，势在必行。结果，她在婚后第二天，就毅然决然地打点行装，回沁水老家去插队落户。因此，人们送给她的结婚礼物也“份量最重”——几乎全是锄头镰刀之类的生产工具。

这时，中国作协已揪出了所谓“丁陈反党集团”，其它右派分子也在源源不断地落实。但在这场人人都要表态的“大是大非之争”中，尽管有人“揭发”，丁玲背后对赵树理大为不满，颇多微词，他却异乎寻常地保持沉默，除了一篇应景的官样文章《要挖掉可右之根》，始终没有公开发表过一句指责的言论。当他得知广建终于下决心回乡，便趁机离京，送女务农去了。

他把广建送到尉迟村安顿停当，就转向高平县，去参观那里卓有成效的水利建设，不料高平县的反右斗争也在激烈地进行着。县剧团有个名叫申银洞的老艺人，就因为平时脾气太倔，说话太冲，时常不分场合对象地提意见，深遭某些领导的厌憎，一顶“右派”帽子眼看着就要落到他的头上了。赵树理了解内情后，就一面建议县里和剧团领导正确对待名

老艺人，一面跟申银洞促膝谈心，肯定了他的优点，也指出他的话有时会产生的不良影响。申银洞是个“吃软不吃硬”的人，好几场斗争会他都没有挤一滴眼泪，却被赵树理说得痛哭流涕，在大会上检讨了自己的缺点，取得了群众的谅解，就这样，一个后患无穷的政治黑锅终于没有落到申银洞的头上。

在高平，他参观了大面积丰产田和丹河、陈渠两次水利设施，“从现场看到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和高级社迅速发挥出来的优越性”，他说，“我对这次飞跃的发展是很兴奋的。”于是他坐下来，又为知识青年写了篇《“才“与“用”》的杂文。他说：

“只有劳动才能创造价值。不论一般知识分子，不论专门人材，都是由劳动人民化钱培养成的——现在的青年知识分子，更是由国家直接从劳动人民手里拿过钱来培养成的。人民化钱培养人材，为的是叫给自己办事，因此在没有托付你办事之前，就须要先考查一下你是否和他们自己一条心。当他们的心对你的心没有把握的时候，不敢只凭你的‘才’就把事情交给你办，何况连你有多大的才也还不知道呢？想要考查你的心，最简单而可靠的办法就是请你到他们队伍中过一过日子，看你和他们是否一家人。”

“现在，不但有提前完成了四十条规划的县、乡、社，而且有大大超额完成规划中亩产量的地方。要把这些社的主任让一个出来叫我这个知识分子来当，不但我自己不敢领盘，而且群众也不敢把这事交给我。也许有些群众不会怀疑我和他们不一条心，只是光凭一心也不行，还得有那种领导生产的本领，否则他们会跟着我饿肚子。我不止当不了全权主任，而

且连个队长也当不了，勉强当个社员还不能算个好社员。一个知识分子学成个好社员是可以的，但也不太容易，要耐心学下去；特别是你所缺乏的生产技术、组织经营能力、吃苦耐劳习惯、实干精神、平等观点等等，是非马上学习不可的。”

约莫也在这个时候，他还给一个名叫“常爱农”的大学生写了封回信。①

常爱农先生：

你的名字取得好。我希望这是你的真名，不过即使是在写这封信时候临时取的笔名，只要是情由衷发，我以为也比用别的名字好。

来信首先要我和其他代表们原谅你讲话不客气，正对我的脾气—— 我是不愿多听而且也不愿多说客气话的。

来信怀疑我是否完全了解农民，我以为怀疑得很有理，因为任何人对任何问题的了解都是活到老学到老，都是逐年逐月增加其深度的。在我自己，过去对农民有一些了解，以后自然还是继续了解下去。

你对其他代表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我已经转达给他们，只是我作为代表之一，也要对你提出些不同的意见和建议。

你在来信中肯定了这样一些事：

一、“广大的农民”都处于“最困苦的境地受到”最刻薄的待遇”只有“村干部”和“个别的特殊农民”的生活好。“城市郊区和重点的农业社”都是“高等农民、特权阶层。”

① 这是一封复信的底稿，且残缺后半部分，故不知它写于何时，但据信中提到“重点的农业社”，故可断定在五八年“人民公社化”之前。

二、“报纸的报道”,“国家的”统计部门和粮食部门……等机关材料以及村干部的讲话都是造谣，不许枉信。

三、代表农民的代表，都不曾深入到农村去，只是“笼统地、概括全面地、自报奋勇地”代表着“陌生的农民”。

四、报社到农村的记者很少，而且都不曾和农民一起生活过，因而只能写出些绝不可信的报道，应该“撤职”、“判刑”。你虽然抱着“常爱农”的心情，可惜你是个学生，每年不过两个月假期，对农村生活深入得不够。这是可以理解的。只是你要笼统地、概括全面地、自告奋勇地代表着陌生的农民，把广大农村都说成地狱，我便不得不告你说一点你所不了解的情况来纠正你的一些错误观念。

一、我是作家代表，不是农民代表。真正的农民代表，每省都有那么五、六、七、八个。他们不是你所说的那样每年只能有三个月至半年和农民生活在一起，而是除了来北京开个把月代表会以外，根本不会离开劳动生产的真正农民。你连这个情况也不知道，为什么偏会“概括全面地”了解广大农民呢？

二、假如国家的机关都是造谣机关，干部都是造谣干部，你那个学院也早关门了—— 因为所有的城市供应完全凭的是那些机关的统计数字，而那些统计数字又都是那些干部的原始材料。

显而易见，赵树理的态度又是极不平静的，字里行间不无挖苦之意。也许，这是因为“作家要对向上的，向幸福方向发展的社会负责，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咱的江山，咱的社稷’遇到尚未达到理想的事物，只许打积极改进的主意，不许乱踢摊子！”然而为时不久，他自己也成了“常爱农”第二。

第十四章 “神经病”

“大跃进”的一九五八年刚到人间，就有个新华社记者直奔大山深处赵树理家乡，去采访这位著名作家在农村的活动。

“当我到达尉迟村，跨进农业社办公室的门，准备打听赵树理住处的时候，想不到就在那里碰上了他。”这个记者看到，“他盘坐在炕上，正在同农业社干部研究水利建设、农村整风以及实现农业生产计划的问题。”

下午，记者跟着赵树理参观了正在兴建的水库，然后，赵树理指着面前的坡地滩田头头是道地告诉他，这块山头应该种松树，那块平地适宜种棉花，山地和坡地今后只要因地制宜、加强经营管理和增施肥料，就可以增产一倍左右……

一月三十日，《光明日报》和《文汇报》同时刊登了这位记者写的《太行山中访赵树理》。他发现，“同这里的群众接触，常常会听到这样的话：‘老赵来农村后，没有一天不是在为生产忙碌。’去年冬天，当他来到村里，一放下行李，就直奔水库工地了解情况。此后他一直关心水库的修建事项。工程进展紧张时，他动手挖土；机器坏了，他帮着技术员修理。前些日子，工程夜以继日地进行时，他一夜去工地数次。农业社的干部赵国祥告诉我，赵树理自到村里来的几个月中，没

有一天不来农业社，来了不是研究生产，便是谈社员的政治思想状况，总不让自己闲着。有时开会或研究工作到深夜，他也从来没有缺席过。

“尉迟村去年减产，他花费了很大气力和大家一起研究减产的原因，发现这个村劳力少，土地多，由于过去平均使用劳力，力量就分散了，土地经营也没有搞好。农业社的饲草不够，过去仅解决饲草问题就占去了农业社全年劳动总数的七分之一，因此社里的复种面积虽然增大了，但单位面积的产量却降低了。经过研究，他提出了集中与粗放相结合的经营方式与大量增植苜蓿的意见。并和社干部反复研究，制定了一个一九五八年生产大跃进的计划。”这就是：“西山坡顶修一个水库，沁河边上建一个抽水站，西坡那片地石子多，种粮不行改成果园，再把村南村东三百亩河滩垫平，这样，全村六百亩土地全部实行水浇，可望旱涝保收。”

这个计划，受到全村社员的拥护。嗣后，赵树理就派回乡务农的女儿，专程去外地买来苹果树苗和海棠果苗，在尉迟村建起果园。水库落成时，他又从北京汇上一千元，给社里买锅驼机和水泵。

这篇访问记见诸报端时，赵树理已经返回北京，出席全国人大一届五次会议。二月十八日，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快板《“春”在农村的变化》，热烈欢呼“今年过春天，事事大飞跃”——

整风与生产，两下结合好。
村村修水塘，社社开渠道。

开山崩石头，到处响大炮。
上工没男女，做工没老少。
把过好春天，过得很热闹。

对于中国农村的形势发展，赵树理确有敏锐感觉，常得风气之先。从此，步其后尘的这类诗歌，真是难以数计。

很快，“跃进热”象电流般地传遍了全国各行各业。三月八日，中国作协发出响亮号召：作家们！跃进！再跃进！争取今年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一个创作高潮，三、五年内实现社会主义文学的大丰收！

这天，在京的一百多位小说家，剧作家和诗人举行盛大座谈会，竟相运用火热的语言和夸张的手法来表示跃进的决心，中国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还代替几个未能出席的老作家宣布了创作计划：茅盾写一个长篇，三个中篇，巴金也是一个长篇，三个中篇，再翻译几部外国作品，曹禺则要编出五个独幕剧。然后，他又说：“赵树理同志今天到会了，他有意写《续李有才板话》，以反映当前的大跃进。”

也许是会议气氛所染，这个最讲实际的作家也头脑发热，当场谦虚地说：“计划写三部。第一部，一个月左右可完成。希望大家督促，但也不要挤的太狠；我要求大的不被挤破，小的东西也能挤出来。”

当然，他的计划终因形势的发展而成泡影。但这一挤，倒也挤出了《灵泉洞》上部（它应该说是话剧《两个世界》的续篇，《两个世界》的写作时间与《李有才板话》相差无几，邵荃麟可能因此记错，把《灵泉洞》说成了《续李有才板

话》)。

这是一部构思已久的长篇小说。赵树理一直关心着他最感亲切的太行人民,关心着他们的生活和思想面貌的变化,尤其是从山区成长起来的、留在农村或进了城的干部,想为他们造像。只因他不愿写不解决问题的小说,所以老是下不了决心。现在,这跃进的浪潮使他忽然觉悟;太行人民在战争时期形成的不计个人得失的忘我劲头,正与今天大跃进的社会主义突击精神一脉相承,这样的人民永远可爱,大有教育意义。于是他下定决心动笔赶写,不过发表的时间推迟了数月。

小说的主人公,就是《两个世界》中的金虎和银虎。据说,在全部的《灵泉洞》中,赵树理要通过这对兄弟的生活道路,来反映太行农民在各个历史时期所经历的不同思想变化,在战争与和平,艰苦与顺利的环境里,劳动人民的集体主义思想和有些人追求生活享受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之间的斗争。他要歌颂以金虎为代表的真正革命者,"在战争年代,他们表现出'有敌无我'的坚强意志,不管斗争形势如何险恶,坚持着公开的武装斗争,也坚持着艰苦的秘密活动;而当全国人民取得革命胜利后,他们不论在城市在农村,仍然始终如一地热爱劳动,忠诚、朴实、忘我地埋头苦干,保持了劳动人民的本色。"他还要批判以银虎为代表的做官思想和拜官思想。"这种人在城市里当上了干部就耍官气,摆阔气,把亲亲眷眷往城里接,逐步蜕化变了质;没在城里当上干部的也居功自傲,崇拜做官,对农村里的一切不感兴趣,时刻想往城里跑;有的还认为合作化是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

了。这种做官思想和拜官思想的合流，影响了农村里的一部分人，造成了对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阻力。”①

根据赵树理一贯的创作原则，小说自然要密切配合现实政治，因此，他的艺术构思迄止全民整风，农村大辩论、干部下放锻炼。这时，银虎已是一个报社的编辑，科长，“革命的朝气被追求物质生活的奢望日渐磨灭了。他与一个念完初中就想跑进城来当‘干部太太’的姑娘结了婚，成天沉湎在家庭和生活的圈子里，他很虚伪吝啬，鄙视劳动，喜欢别人奉承，终于成了要求支配别人，剥削别人劳动的人。在整风运动中，他受到了彻底的批判，最后才回到农村去，在劳动中改造自己。”②

可是，七万字的《灵泉洞》上部，却只从一九四〇年写到一九四三年，内容也基本上没有超过《两个世界》，写的是太行人民在国民党顽军消极抗战直至叛变投敌期间，遭受的非人生活以及组织起来抵御敌人的情景、所以作者要表现的主题思想，在上部中连眉目也看不出来，但从小说的艺术构思中，却可以看出赵树理的爱憎感情，是非态度。显而易见，他十分喜爱这个没有文化、为人憨直，绝不考虑个人得失，始终保持劳动人民本色的金虎，而非常厌恶那位耍官气，摆阔气，一心飞黄腾达、沾染腐化享乐思想的知识分子田银虎。

《灵泉洞》是继《登记》之后的又一部评书体小说。评书是我国民间艺术形式之一，艺术上讲究叙、明、暗、蹬、缝、伏、插、载、原、倒、补、惊、掩等十三种笔法，规律讲究

①、② 晓流：《赵树理在写〈灵泉洞〉》，载《读书》1958年5月号。

穿插、结构要清楚，地形、方向、摆设、人物形象要活生生的，使人听（谈）了如在眼前。一个评书演员说道："看完《灵泉洞》，坐定一想，灵泉洞村一带的地理环境如同摆在眼前一样，有条有理，十分清楚，作品的语言也十分精炼，话顶话，话拣话，针针见血，话不空登。我们评书演员拿到手就可以演说。"① 但是，追求这种技巧的结果，却使故事行进缓慢，波澜激荡幅度不广，又因过分注意奇遇巧合，过多罗列生活细节，遂使小说铺摊琐碎，给人以刻画不深的印象。

运用评书笔法，赵树理是有意为之的。他始终认为，戏剧曲艺是中国劳动人民的最佳精神食粮，可惜这良好传统一直不为新文艺界所承认，因而他颇为不平，一有机会就加以推崇。在创作《灵泉洞》期间，他一再声称：

"有些人管曲艺叫'说唱文艺'，本不妥当，评书是正经地道的小说。我还掌握不了评书，但我一开始写小说就是要它成为能说的，这个主意我至今不变，如果我能在艺术上有所进步，能进步到评书的程度就不错。现在我还想跃进一下，要写一个能说的书，发表在《曲艺》月刊上。"

"有些搞理论的人，对《红楼梦》、《水浒》等古典作品是研究的，至于对评书之类的东西，就认为是低级的，不值得一提。但是这些东西群众很欢迎，你到了说评书的地方，站上三分钟，就不想走，听了一次，下次还想来。我们的东西有时拿出去朗诵，人家一听就跑了。所以，究竟谁是低级的，谁是高级的，恐怕还是个问题。对于象评书这样受群众欢迎

① 陈萌荣：《〈灵泉洞〉的评书笔法》，载1959年4月16日《北京日报》。

的东西，不注意是不对的。搞文艺理论的同志应该研究它，承认它是一种写作方法，一种技巧。”

是年八月，中国曲艺工作者代表大会在京召开，成立了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并选举赵树理为曲协主席。这位主席便进而主张尊曲艺为中国文学之正宗。他说：“我认为曲艺的韵文是接受了中国诗的传统的，评话是接受了中国小说的传统的。我觉得把它作为中国文学正宗也可以。曲艺是高级的，同时又是普及的。当然，不是每一个作品都是高级的，而是好坏都有，其他的文学也一样，能说今天的新文学作品都是高级的吗？如果从直接为工农群众服务来看，曲艺还是比较直接一点，它的读和说差别不大，听了叫人懂，不但懂，还使你感兴趣。

“五四以来，用知识分子的语言写了很多的书，那部分书不读也是可惜的，群众掌握了文化后还是会读的；但是，不能用知识分子的条条把群众的语言彻底‘改革’掉了，不能把群众的文艺风度全部扫掉了。我们本来没有的，比如说电影在皮影戏的基础上发展，那是不对的。但是小说咱们有，诗歌咱们有，为什么要丢掉自己的，去学人家的？有些人误认为中国传统只是在普及方面有用，想要提高就得加上点洋味，我以为那是从外来艺术环境中养成的一种门户之见。即使文化普及之后，也不应该辛辛苦苦去消灭我们这并不低级的传统。

“我觉得我们的东西满可以象评话那样，写在纸上和口头上说是统一的。这并不低级，拿到外国去决不丢人。评话硬是我们传统的小说，如果把它作为正统来发展，也一点不吃

亏。它是广大群众都能接受的。”

这种艺术上浓重的民族保守性和狭隘的民间趣味性，也许应理解为他在恪守做一辈子“地摊文学家”的诺言，但也清楚地表明，胡乔木，邵荃麟等人的种种努力，一概付之东流矣！实际上，既使是评话本身，陈云在一九六〇年的一次谈话中也明确指出：“评话要受人欢迎，应该不断发展，……变得符合群众的要求，跟上时代。这是你们这一代评话艺人的责任。”“评话怎样在新时代中起作用，为群众所欢迎，这个问题要靠评话演员自己解决，主要是评话本身要提高，要多创造、突破。”①

毫无疑问，赵树理对于评话的崇拜，窒碍着他的艺术视野和技巧素养，使他难以创造更为丰硕的文学成果，成为新时代的卓越歌手。

在《灵泉洞》上部的结尾处，赵树理说道：“本来我应该接着写下去、只是再写下去就要误了我今年应该参加的劳动锻炼，所以只好等锻炼一个时期之后继续写吧。”七月间，他重返晋东南，到了与沁水毗邻的高平县。那里有一块百亩左右的大面积丰产田，引起了各方面的注意，农业部要来开北方十省谷子、高粱，玉米现场促进会，山西省也决定在这里举行十县秋田加工管理汇报会。这样的庄稼和会议，不把无时无刻不关心家乡农业的赵树理吸引过来才是怪事哩！

他到高平时，会议尚未开幕。县委领导就陪着他去参观这些丰产田。他们来到一块谷子地，只见那杆粗穗沉的谷子

① 陈云《关于评话》

密密匝匝，把地面遮盖得严严实实，犹如一块墨绿色的地毯。看这长势，收后的谷穗定然赛过狼尾巴。乐得赵树理百看不厌，流连忘返。陪同的人受不了烈日曝晒，催他快去，他却笑嘻嘻地反问道："急啥？"

上党地区是谷子的传统产地。战争年代，太行人民就是用小米养活了千千万万的子弟兵，让他们扛着步枪抗击敌寇，转战南北。小米又是上党人民最喜爱的主食，"吃得香，费得少，你要能吃一斤面，半斤小米管你饱；爱稀你就熬稀粥，爱干就把捞饭捞；磨成糊糊摊煎饼，满身窟窿赛面包。"但是，近年来，只因上级指示大力推广高产作物玉茭，又把种植面积卡死，下面有些干部就下令拔了谷子种玉茭，逼得人们"天天钻在玉茭地，常把谷子忘记了；谷子好象前房子，玉茭好象亲宝宝。"结果，一到分粮想起了——少配一斗噘着嘴，多配一斗哈哈笑。一喂牲口想起了——要是多种几亩谷，哪用天天割野草？"所以赵树理格外关心，又来了"别扭劲儿"，作快板《谷子好》一首，在现场会上大声朗诵，高唱反调：

谷子好，谷子好，
应对谷子多关照，
谁对谷子看不起，
快把偏心早去掉。
也深翻，也保留，
追肥浇水样样到，
你和玉茭一样待，
看看它能打多少！

现在，晋东南地区已有了专门研究谷子的机构。可当时，各大报刊都不敢发表这首快板。

通过这次现场参观，这个一辈子梦想着农民富裕的共产党员、人民作家，“对报上登的产量数字信以为真，以为口粮问题彻底解决了。”

他当然料不到，正在这时，“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起来。”①

八月，《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在北戴河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九月，人民公社就在山西农村全面开花。省报上开始连续放射令人目眩的丰收“卫星”，并以“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跃进哲学和哲学的跃进，不容辩护地驳斥着“保守派”、“摇头派”、“秋后算帐派”的种种谬论。任何一个稍微想实事求是一点的干部，都会遭到冰雹般的批评：这是对人的主观能动作用缺乏认识！对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估计严重不足！持续跃进的步伐大大地落后于形势的需要？等等，等等。

① 《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的问题的决议》

可是，赵树理却带着美妙的印象离开高平回京去了。

八月十八日，中国作协在颐和园召开深入生活作家座谈会，他即席发言道："我下去了两个月，可惜没有争取到主动，因而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在大跃进浪潮中，我计划先写一个回忆中的小说，可是这与生活锻炼有矛盾，写了几天就觉得应该放下它先到生产中去。不妙的是我曾在一次谈写作的会上透露过我的计划，报刊上登了，弄得我更动不得，只好坐下来写。但在大跃进的热潮中，即使你关起门来，那股热劲也会冲到你跟前。在写作中，我就悄悄找了点空隙，观光过一次谷子、高粱的现场会议和两三个社，看了看人家的育林、治水和谷子、玉米的田间管理。即使是仅仅到过几个地方，而且不曾下马，也使自己很兴奋。例如我看到一个玉米种的很好的社，好象进了竹子园，有些玉米密到每亩万株，人们看到自己的庄稼长的这样壮，他们的劲头也象这庄稼一样饱满，没牙的老头老太太们，两腮上也常笑成两个大窝窝。"

接着，家乡传来成立了人民公社的消息。他一面惋惜自己不能亲身去建造这到达共产主义的"金桥"，一面退而求其次，赶紧给尉迟村所在的潘庄公社写了一封长长的建议信，就如何发挥公社优越性发表了一通热情洋溢的宏论。

其实他不提建议，三面红旗的"优越性"也在沁水发挥的淋漓尽致了。

一九五八年元月，县委召开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会议，将粮食产量由原计划的一亿一千万斤跃进到一亿三千万斤，要求"所有公社干部和广大群众，都有愚公移山的干劲，孙悟空大闹天宫的本领，董存瑞舍身炸碉堡的勇气，红军爬雪

山过草地的精神，保证实现农业大跃进。”

半年之后，上述口号早已陈旧，流行的誓言变成：“人人学习总路线，要使跃进赛火箭，解放思想大胆干，二年改变沁水县，接受教训推经验，来个思想大转变，日夜苦战一百天，保证棉花一百五，秋粮亩产达一千。”

待到秋收结束，号外果然发出：“一年来，经过人人动脑筋，个个想办法，海阔天空地想，势如破竹地干，日以继夜辛勤劳动，因而在农业生产上取得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大丰收。”县委书记当众宣布：沁水总产粮食二亿五千八百六十九万斤，比去年增产一亿八千二百五十九万斤，提高了二点四倍；平均亩产一千零六十九斤，比去年的一百七十二斤提高五点二倍。其中的最大卫星，谷子是桃川乡曙光大队一亩四分，亩产三千一百六十八斤；玉米是郑庄乡前进公社一亩五分，亩产一万二千五百二十九斤；薯类是北留乡东方红公社二亩，亩产五万斤。—— 而这年粮食的真实亩产，是二百三十四斤。①

这些卫星，赵树理全然不知，在这跃进三年的最后一个季度，他接连两次出国访问。第一次，参加以茅盾为团长的中国作家代表团，前往苏联的塔什干，出席亚非作家会议，同行的有周扬，巴金、肖三、刘白羽、郭小川、杨朔、许广平、戈宝权、谢冰心等人。第二次则是应朝鲜作家同盟之邀，独自一人出访朝鲜。

在这次为期三周的访问中，赵树理观光了平壤、开城、元

① 上述资料均引自一九五八年的《沁水小报》。

山、咸兴等城市，领略了金刚山和三日浦的飞瀑、温井、湖光、山色、拜谒了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原军殉难烈士公墓，参观了历史古迹和板门店，还访问了四个农业社——平壤郊区的万景台、江元道的九浦里、咸镜南道的作港和富民社。可能是出于难却之国际友情吧，他这次打破了自己游而不作的惯例，为朝鲜报刊连着写了三篇文笔优美，感情真挚的访问记。

不过，朝鲜之行虽然全是轻松愉快的游山玩水、参观访问，但对赵树理来说，却也有不尽完美之处。

一是吃不饱。朝鲜作家豪爽好客，自然竭诚招待这位上宾，请他尽情品尝朝鲜特有的名产、狗肉、冷面、人参酒、沾辣椒生吃的明太鱼……可怜赵树理天生一只农民胃，无福享受这佳肴美酒，尽管饥肠辘辘，却怎么也咽不下去。幸而大使馆负责他访朝事宜的同志，恰巧是他在家乡的老相识。赵树理就经常打电话给他，要他派车接他去使馆喝稀饭，吃面条，甚至想吃拌汤疙瘩来改善生活。

二是想回家。他倒没有思念老伴孩子，而是因为《人民日报》上正不断出现从山西放出来的“卫星”：

> 山西省今年获得了山西省历史上从所未有的大丰收。夏收作物一般比过去提高了一倍，山区水平梯田翻两番、三番已成普遍现象。秋作物增产效果更为突出，太行、吕梁等山区已出现十多个夏秋粮食作物平均亩产千斤以上的县，全省今年夏秋粮食作物平均亩产达到五百斤，相当于去年平均亩产的四倍，总产量比大丰收的一九五六年提高了百分之一百三十。

今年，山西省在粮食作物空前大丰收的同时，林、牧、副、渔业等生产也都取得了空前的大丰收。全省养猪数量已达三百九十多万只，超过了今年年初实有猪数的一倍多，羊增加到七百多万只，而且百分之八十以上是改良优种。在植树造林方面，许多公社向“高山远山森林山，低山近山花果山，农田沙畔林网化，宅旁庭园葡萄架”的园林化方向发展。

山西省原阳城县的二十六万人民，在连续放射三次日产千吨钢铁和一次五万吨煤的卫星以后，继续奋力苦战，十月三十一日，又放了一颗巨大卫星，产铁二十二万五千三百七十二吨，钢二万四千七百九十一吨，超过全国冠军广西鹿寨县，夺得了胜利的锦标。

看到如此惊人的“卫星”，赵树理兴奋得眉飞色舞，喜气洋洋地向朝鲜作家大事宣传，并作诗把“千里马”和“大跃进”用文字交织起来歌颂了一通。于是，他在国外再也待不住了，归心似箭，恨不得插翅飞向太行山，和乡亲们一道“跃进”，大放“卫星”。

十二月中旬，他的两脚刚走下回国的飞机舷梯，便又踏上了开往太原的列车，去请求山西省委给他安排工作。结果他如愿以偿，被任命为阳城县委书记处书记（本年十一月一日，沁水与阳城合并，叫阳城县）。

但是，已被“五风”刮得天昏地暗的农村现实，犹如一盆冰水猛地泼向那火热的胸膛，使赵树理陡然清醒过来。他说：“到阳城上了任，一接触实际，便觉得与想象相差太远了！”

他先回尉迟村住了一个星期，考察了“大跃进”中涌现

出来的新鲜事物公共食堂——这里的公社化就是由吃大锅饭而起的。一开始，赵树理对“放开肚皮吃饭，鼓足干劲生产”颇为满意，因为“一连好几年不得痛快的解决的喊叫缺粮的现象，一经大灶化，好象变戏法的人揭去了被单，谁也找不到叫的理由了。”而且，解放了女劳动，照顾了人口多的农户，一毛不拔的小人也不再斤斤计较了。然而过不了几天，他就尖锐地看透了大锅饭的弊病：人们光愿意放开肚皮吃饭，却不肯鼓足干劲生产。他算了一下，这里的人均收入是六十到七十元，而伙食费就要化去四十以上。“因此一般农民对争取多劳多得方面的积极性不大，对留粮多少也不计较——以为总不会叫自己饿肚子。”评级的时候，一般人也不去争取高级别，因为每级相差仅有一、二元，多拿不了几元钱，评得低了倒可以少受一点累。大家不管三七二十一，穷日子当富日子过，努力地吃社、喝社，劳力少而弱的家庭似乎真的进了“共产主义”，劳力多而强的家庭反倒还在社会主义。他还卓有远见地指出：“吃饭采用现在的大锅方式，即使到将来恐怕也行不通。将来凭劳动所得的货币，什么也能得到，衣服，日用品，食品等等，但混在一起吃饭，总还是不行的。一个家，七口八口，孩子大了，娶了媳妇，经济由父亲控制，还是大儿子控制呢？媳妇要做件衣服，但婆婆公公不同意。媳妇说，我在外边干活挣一二百工分，做件衣服也不行？一个家都不好组织呢，吃大锅饭能解决问题？”

接着，他又以迫不及待的心情去考察“大跃进”的另一个新鲜事物“土高炉”。但当他来到这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小土群”工地时，却看到冶炼的原料竟是一大堆蛮好的铁器：铁

锅，铁炉犁铧、犁镜……连门鼻、门搭勾也无一幸免，统统被“钢铁兵团”的小伙子们奋力砸碎，填进土高炉。然后耗尽心血，把它们化为一块块奇形怪状的铁疙瘩。

赵树理做梦也想不到，叫他激动得热血沸腾的大办钢铁，居然是这样一种劳民伤财的恶作剧。他目瞪口呆，哭笑不得，痛心地指着那一块块废物说：“炼这玩意干甚呵！真是作孽！”

领导“大跃进”的公社干部，留给他的印象更加恶劣。

他们大多是以前的乡干部，生产管理一窍不通，工作方法因循守旧，习惯于秉承上级意旨，开大会，做报告，分指标，批方案，要数字，造表册，既不下去调查研究，又不对上级实事求是。为了表功，甚至揣摩领导意图，层层加码，强迫命令，逼得下面鸡犬不宁。“有一个书记说，凡是能走路的都要去大炼钢铁。这太过火了。”赵树理后来谈到，“因为要收豆子，有个地方把锅子搬到工地上去，不去也不行，孩子回来没饭吃就哭了。这些干部都是怎么想的呢？孩子也不管了。”

带着这些严重的问题和急于解决的希望，赵树理于一九五九年初回到阳城。然而，等待着他的却是令人咋舌的高指标、瞎指挥，以及批评和冷遇。

在县委会上，赵树理慷慨陈词，指出人民公社的优越性并没有发挥出来，大办钢铁劳民伤财，得不偿失，群众情绪低落，不想多干却想多得，生产积极性受到严重挫伤。报喜不报忧，产量大大不符实情。长此以往，如何得了，必须立即实事求是地予以纠正，想方设法刹住浮夸风，共产风、平均主义，否则，秋后征购时，老百姓就该闹饥荒了。

他的语音一落，热烈高昂的“跃进”气氛霎时就冻结了。县委成员们相顾失色，哑口无言，脸上全都划上了个大问号：这不是典型的右倾思想吗？不是只看支流不看主流的保守派吗？不是否定大跃进成绩的摇头派吗？真应狠狠地批他一顿！不过’他是下来体验生活的作家，又是全国人大代表，党的八大代表，是个通天人物呀，还是听之任之吧，只当他没说，咱没听见。

不幸赵树理毫不领情，反而公然在大会上跟县委唱开了反调。

阴历大年三十，阳城县举行三级干部会议，落实春耕生产任务。在会上，县委书记首先讲话：

“同志们！大跃进的一九五八年过去了，更大跃进的一九五九年开始了！在这新的一年中，我们的奋斗口号是：粮食亩产超万斤，今年总产翻十番，棉花亩产两千斤，不让晋南把身翻，决心全省称棉王，全国争取夺状元；林业畜牧大发展，突出林业和养蚕，一年全县绿林化，蚕桑定要压日本。

“为了夺取这新的局面的更大胜利，县委决定召开这个会议，布置落实春耕生产的跃进计划。第一项是春耕生产准备。县委要求：正月初一也就是明天，全县农村立即投入生产，过一个大跃进的春节，每个劳力，每天至少刨玉茭桩子六亩！”

“轰”的一声，台下的人们被这高指标吓得乱嚷起来。

坐在李书记旁边的赵树理忍耐不住，笑着打断了他的讲话。“老李，你等一等，让我插句话。”

“你刚才讲的每人每天刨六亩玉茭桩子，我看这个要求不实际。你算算看，一亩玉茭少说四千株，就是四千个桩子，六

亩就是两万四千。刨一个桩少说得两镢头，一镢头至少三秒钟，刨一个桩子就得六秒钟。二万四千个桩要十四万四千四百秒钟。可一天二十四小时，满打满才八万三千四百秒。一个人就是不吃饭，不睡觉、不拉屎等等，马不停蹄整干一天，他也刨不下六亩吧！况且眼下地还冻着。”

赵树理这一斧子，可把书记砍糊涂了。自他上任以来，还从没见过敢在公众场合反对他的人，好在他气派大，很快就镇定下来，说道：

“好吧，六亩不实际，会后再作研究。下面说第二项，积肥投肥。县委要求：每个生产队每亩地最少投肥一百五十担！”

“慢慢慢！老李，我再插一句。”赵树理又是半路一斧子，“我看这个指标也太高。你想想看，一个生产队有多少人？多少牲畜？能积多少肥？队里有多少劳力？多少块地？把肥料运到地里要多少时间？到那时还误不误种？”

李书记脸色骤变，怒气暗生，但最后还是按捺下去，再说第三项：

“为了秋后能放更大卫星，县委决定，今年一律推广密植，要求：一亩玉茭下籽一百二十斤，一亩谷……”

“等等！”赵树理急得又是一斧，“老李呀，这一百二十斤籽种在地里，往后庄稼还咋长呢？自古以来哪有这样种玉茭的？”

“大跃进嘛！”书记同志终于发火了，“什么人间奇迹也能创造出来！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要敢想敢干……。”

“敢想敢干我不反对，可是不能脱离实际，如果离开实事求是精神，那就成了瞎想瞎指挥。照这计划，肥料铺到地里

有半尺厚，庄稼挤到一起成了栽绒毯子，依我看连一颗粮食也收不上。”

在这位“算账派”实事求是的核计下，这个以主观代替客观，以幻想代替现实的生产规划自然不堪一击。县委书记不禁勃然大怒，也顾不得赵树理通天不通天，拍着桌子喊道：“我们什么时候落后过？可是今天到现在还定不下生产指标，眼看别的县都哗哗地定出高指标的规划，我们这里有的人就是硬咬住说这也不实事求是，那也不切实际！定低了，我们怎么向上边交帐？”

但赵树理毫不让步，针锋相对地说道：“我们做工作，不单是为了向上边交帐，而是要对人民负责。指标好定，想定多高都行；可是，我们不能这样做呵！大家想想，我们做工作不靠群众靠谁？如果把指标定得高高的，打不下那么的粮食，不是苦了老百姓吗？羊毛出在羊身上，老百姓辛辛苦苦劳动一年，结果见不到实利，他们哪里还有积极性呢？况且，如果我们定的指标太高，兑现不了，群众不是要说我们尽会吹牛吗？这样会有损党的声誉，群众也不会再跟我们走！”

“吹牛？党报上的头条新闻，套红标题，能是撒谎吗？”

“我就不信，什么亩产红薯多少万斤，照那数字，红薯竟比地里的土还多了，尽是瞎吹！”

书记同志理屈词穷，恼羞成怒，拍着桌子大叫道：“照你这么说，大跃进是错了？真是老右倾，绊脚石！”

“不管是老右倾还是绊脚石，你怎么说都行。只要组织上把我安排在这个岗位上，我就有权提出自己的意见，如果不顾实际情况瞎指挥，那你还是个共产党员吗？还对得起人民

的委托吗？”

然而，不论赵树理怎样据理力争，大会最后还是通过了高指标的生产规划，在全县实行瞎指挥。气得赵树理拍案而起，指着县委领导的鼻子，严厉斥责：“你们这样不顾群众死活的瞎闹，简直是国民党作风！”

赵树理忧心如焚，决定向地委领导再作反映。没想到领导同志气度不凡，高瞻远瞩，以稍安毋躁的口气对他说：“同志！你所说的情况也不是没有的，不过是暂时的、局部的、是个别的或很少一部分落后群众的思想表现，是某些同志方法上的疏忽，再说，对这些处于萌芽状态的共产主义新事物，要学会往远看，要看它的未来，要把发展也看进去！”

赵树理后来写道：“我看到由于以上种种不合理的措施，给农业生产带来的危害，和给群众带来的灾难，我不能熟视无睹，向公社党委、县委、地委等人提出，可是说不服他们，为这事，我日夜忧愁，念念不忘，经常奔上奔下，找领导想方法，但他们都认为我是一种干扰。”

他的奔走呼号，面折廷争，不但于事无补，反而招致一些人的窃窃私议：

“真讨厌！叽叽喳喳的老挑毛病，老提意见！”

“文化人嘛，神经病！”

有些好心人前来善意规劝，叫他多加克制，赵树理却对那种风言冷语一笑置之，说：“最遗憾的是我所反映的那些重要问题又被搁浅了。”

他得出一个结论：“识小不识大，不能治国，识大不识小亦然。中层农村干部（地、县）往往不识小。”

为了接近群众，赵树理拒绝住进县委大院，自己在县文化馆找了间耳房安顿下来。结果，他想象中的文艺卫星，和农业卫星，钢铁卫星一样，也在现实面前可悲地破碎了。

在文艺界，赵树理一向是主张发展群众创作的中坚派，所以对大跃进初期的新民歌运动估价甚高，曾赞叹道："其中有多少特殊优秀作品，多少出乎我们思想框子之外的新思想，新手法啊！"还天真地告诫专业作家，"要是脱离群众，就会被从群众中出来的新专家顶出门来。"

但是，浮夸风无空不入，在所谓"人人是诗人""每县都要出一个郭沫若"的口号下，群众创作运动已变成运动群众的创作。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四日，阳城县委作出全党全民动手创作的决定："党委号召，书记挂帅，全党动员，全民执笔，苦战一个月，立说四十万，精选一万篇，著书一百册。"

十天之后，"一中师生在这次全民创作写书运动中，首先破除了迷信，打破了写文章的神秘观点，冲开了条件、时间、材料三个关，经过昼夜的苦战，写出文章三十五万九千七百七十四篇，第一个卫星提前上了天。"他们的先进经验是三想三写加二抓："即劳动时就想，休息时就写；走路时就想，坐下来就写；吃饭时就想，放下碗就写；抓时间，日以继夜地写，抓事实，一件事要推想它联系的一切。"①

当赵树理来到阳城时，一个月的苦战已经结束，人们正在接受一九五九年的创作任务。该县一个三十二人的剧团，就要完成诗歌六万首，大型剧本四十个，中型剧本一百个，小

① 引文载1958年11月23日《阳城小报》

型剧本一千五百个，还要演出大小节目五千三百个场次。他听说后不觉哈哈大笑。

“要是真能这样，作家就该失业了。”

县团委召开青年大会，动员大家放文艺卫星，特请大作家赵树理去讲话。不料他劈头就说：“我给你们泼冷水来啦！我一个专业作家，一年还写不好一本书。诗是语言的精华，你们一晚上怎么能写出几十首呢？别说放‘卫星’，我看连个‘起火’也放不成。你们年纪轻轻，可不能养成吹嘘夸口的毛病！”

但是，他的讲话丝毫不影响团委书记布置任务。他指示道：各机关团员，每人在一九五九年出作品一百篇……

赵树理哭笑不得，默默退出，回家后顺手写下了一首打油诗《招生广告》：

人道作诗难，只因作得少。
一天二百首，一月管保好。
你若无啥写，题目向我讨：
硬自《铁铁歌》，软至《她来了》。
随便写一个，然后找材料。
“手呵动地手”，“笑呵圆的笑”。
莫谓人不懂，难懂方为妙。
我住天字街，门牌第一号。
祝尔准诗人，前来把名报。

不久，他在山西省委的理论刊物《前进》上发表了《谈

文艺卫星》一文，以这个团委为例，又算了一笔艺术生产的细帐："一百篇文章，每礼拜平均就得写两篇，专业写作者在去年大跃进中突破这个数字的，即使有也是绝对少数，而一个负有工作任务、学习任务的青年，要赶这个数字，会赶成什么样的卫星呢？要照这样数字交卷，集中到一个阅稿的地方，即使其中有卫星，想挑选一下也不是三五十个人一年半载可以挑选得出来的。照他们这样规划任务，使人在头痛的情况下写文章，只能造成一种假繁荣。我认为文化领导部门应该下令禁止这种假征硬派的作风。"

严峻无情的生活现实，使赵树理原本热乎乎的头脑冷静下来了。这位卓越的现实主义作家，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也勇于修正自己的偏见。"我这次到乡间来，没有任何一次顺利，原因是摸不住工作规律。"他在给邵荃麟的信中写道，"群众生产的积极性不象我们理想的那样高，不合乎更大更全面的跃进精神。公社的主要优越性还没有发挥出来，在工作中也没有发现先进的、成功的例子。"因此，他认为马上用文艺作品、来反映大跃进、人民公社还不是时候，毅然取消了自己预订的创作计划，并且要求邵荃麟，"如有机会见到中央管理农业工作的同志，请把我的意见转报他们。"

在这举国狂热的年头，想凭个人之力来挽回这既倒之狂澜，显然是无济于事的。然而共产党员的良心，忧国忧民的责任心，迫使赵树理要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他不愿独善其身，袖手旁观。他想，既然暂时写不出精神食粮，那么就为多生产物质食粮尽力吧。

这位实干家针对现状想好了一些对策，要求县委让他在

一个公社试行。他的对策，今天看来真可谓卓有远见。首先，他要改革公社的领导班子，内行管生产，废除终身制。他提出“验收所有大队长或村干部为公社社员代表，选出其中优秀的作为常委（即公社正副主任。各部长），规定这一部分常委不得少于全体常委人数的三分之一，而且一定要有人作副主任。现有的公社干部（即原来的乡干），将一部分下放到队，以腾出位置接受由队调上来的人。确定每年改选，使队干部有当常委的机会，而且使改选出的常委不致于把现在的当选认为升官（认为无错误，升得降不得，这样做，才能免除公社与队的隔膜，才能免除只看报表数字而不了解真实情况之弊。”

其次，他要改革公社统得太紧，卡得太死的管理制度，给生产队以尽可能多的自主权，“鼓励巧干和队的计划性，各队如何分配，可以自由一点。队自用粮食、蔬菜、肉类、油类等都从应得的产值中扣除，把其余部分作为工资给社员。这样做，队和队员的积极性都可以发挥出来——即能意识到增了产使他们有些什么直接影响。”

他的良策，在县委眼里简直是异端邪说。无论如何不同意把一个公社交给他胡闹。不过，书记同志正巴不得他离开阳城，已经在避着他开常委会，而下面的干部一见他来了，也都尽量不开会，怕他扰乱“大跃进”。因此，谈判结果，双方妥协，让赵树理去一个管理区（即生产大队）去试验他的良策——这样一来，他的首要之点就作废了。

三月上旬，赵树理回到故园，选定尉迟管理区作为自己的试点。但是尚未动手，就接到通知：他当选为第二届全国

人大代表，需立即返回北京准备参加大会。

途经太原时，山西文艺理论研究室特地召集座谈会，请他发表对当前文艺创作的看法。

半年之前，有人经过高度精确的非科学计算，发现再过两年零八十天，中国就可以进入共产主义了。《文艺报》得此喜讯，便在社论中指示道："现在提出建设共产主义文学艺术的任务，不是太早，而是适时的，必要的。……因此，反映群众中的集体主义的劳动精神，创造具有共产主义思想品质的新英雄人物的任务，就要提到头等重要的地位上。"①

针对这个当前文艺创作中头等重要的任务，赵树理说：

> 要表现新英雄人物，先要认得新英雄人物。识别的界限是，要看他是否真正在那里忘我地建设社会主义，有没有为共产主义奋斗的远大目标。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碰到许许多多这样的英雄人物。他们有远大的理想，一声不响，勤勤恳恳地在那里建设社会主义，别人知道他，也是这样干，别人不知道他，也是这样干。
>
> 英雄的品质，存在于每个人身上有多有少，作为文学作品中的英雄人物，就要选择典型的。这就是说，他们既要有社会主义觉悟和共产主义道德风格，又要有充足的干劲和实事求是的精神，既要率，又是群众的一员，这样才是新英雄人物的特色。

显而易见，这是在针砭那些光说大话不实干的"当代英

① 《掀起文艺创作高潮，建设社会主义的文学》载《文艺报》1958年第19期。

雄”。

在会上，赵树理还重申了十年前讲过的创作原则：“我的作品，我自己常常叫它是问题小说。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就是我写的小说，都是我下乡工作的在工作中所碰到的问题，感到那个问题不解决会妨碍我们工作的进展，应该把它提出来。”

只要想一想他当时不断“撞墙”的境遇和背后对他的窃窃私议，也就不难理解他为何要旧话重提了。

在举例时，赵树理提到了他在去年发表的“锻炼锻炼”。这是一篇描写农业社如何解决生产与整风的重重矛盾的小说，因此，人们对他的主人公好象又很难确定，“和稀泥”的主任王聚海，倚老卖老，敢于撒泼的“小腿疼”，自私自利，贪吃懒做的“吃不饱”，和年轻有为，工作方法灵活机动的杨小四，全部活灵活现，跃然纸上。但实际上，作者描写“小腿疼”撒泼，“吃不饱”串掇、杨小四有点偏急的处理问题，正是为了烘托这位主任老哥，揭露王聚海不讲原则，“和事不表理”，只求宁人息事的性格特征。所以他说：“我想批评中农和事佬思想。中农当了领导干部，不解决他们这种是非不明的思想问题，就会对有落后思想的人进行庇护，对新生力量进行压制。……王聚海式的，‘小腿疼’式的人，狠狠整他们一顿，犯不着，他们没有犯什么法。可是他们的思想、观点不明确，又无是无非，确实影响了工作进展。对于他们这一类型的人，我觉得最好的办法是把事实摆出来，让他们看看，使他们的思想提高一步。现在各地虽然都已经公社化了，但这类思想还是存在的，我认为写写还有用处。”

然而，他的发言未及公开，有人就对小说提出了严厉的指责。四月十一日出版的《文艺报》上，刊登了武养的读后感：《一篇歪曲现实的小说》。此人有个阅读习惯："要是读了那些并不现实的所谓'现实'作品，在读后总有一股无名的热血涌上心来，久久不能平静。"不幸在读了《锻炼锻炼》之后，这股热血又沸腾起来了，以至最后不能不执起笔来反对这篇作品：

第一，"象'小腿疼'、'吃不饱'这样典型的落后的、自私而又懒惰的农村妇女虽然会有，但不是占农村的大多数，而是极其个别的。"因此，"难道这就符合农村现实吗？难道这就是农村妇女的真实写照吗？"

第二，社干部"应该是党的化身。然而在作者的笔下，他们都成了作风恶劣的蛮汉，至少是严重脱离群众的坏干部"。"作品给予读者的印象不是社干部与社员的关系，而是民警与劳改犯的关系"，因此，"人们不禁要问：这就是社干部的形象吗？这就是农村现实情况的写照吗？"

第三，"从总的来说，在这篇作品里，作者所持的态度是错误的。……是对整个社干部的歪曲和诬蔑。"

文章气势汹汹，连声诘问，给《锻炼锻炼》以全盘否定，言下之意昭然若揭——赵树理给了读者一株毒草，我们应该把它铲除才好。

以此为开端，《文艺报》及其他刊物展开了历时数月的关于"文艺作品如何反映人民内部矛盾"的讨论。幸亏这时的文艺界形势还不象争先农业社那样，"正气碰了墙，邪气遮了天"，小说得到了大多数读者的肯定。一位老作家公正地指出：

“就《锻炼锻炼》所反映的人民内部矛盾而论，赵树理同志对生活的熟悉和理解，是远较我们深刻的，至少我个人的情况是这样。”他尖锐地批评了“认为作家只能描写实际生活里占大多数的人物”这样一种相当流行的论调。他说：“按照这种奇怪的逻辑，那么我们就没有办法来反映人民内部矛盾了，因为，在我们社会里，消极现象是正在被克服的现象。对一个热爱我们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生活的作家来说，即使是‘极其个别’的消极现象，也是眼睛里的一粒尘沙，要把它反映出来，给以批评和讽刺，使它更快地被克服。这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权利。”①

而批评家唐弢则对许多好心人既肯定杨小四是个成功的人物，又批评他的工作方法，感到大惑不解。他写道：“按理说，如果人物塑造很成功，和人物性格直接联系的他的行动——包括工作方法在内，就不应该成为訾议的对象，否则的话，杨小四的性格就被分裂，不算是一个完整的形象。难道一篇小说里能够同时存在一个成功的杨小四，又存在一个失败的杨小四吗？

“不，不可能是这样！”

“我替赵树理同志感到不平。”②

事实上，有不少读者当真是把赵树理的小说视为工作手册的。不过情况绝不象武养同志所臆测的那么糟糕。有个农

① 王西彦：《〈锻炼锻炼〉和反映人民内部矛盾》载《文艺报》1959年第10期。

② 唐弢《人物描写上的焦点》，载《人民文学》1959年8月号。

民致信《文艺报》，生动地介绍了《锻炼锻炼》是如何转化为物质力量的：他们的队长本来也是个王聚海式的人物，百事包办，面面讨好，搞得生产队三次落为后进。现在，社员给他写了张快板："队长姓周人，工作本也行，听了小说后，三夜大斗争。思想解放了，再不做光人，大公又无私，劳动定额定，经过了讨论，大家来执行，划分耕作区，负责有专人。作风大转变，生产打头阵。治好了'二痛腰'，'铁嘴'也不争（他们村里跟小腿疼、吃不饱一般无二的人物——引者注）。处理什么事，很有原则性，队长经常这样干，永远红旗不出门。"①

也有人当面询问赵树理，为什么要在大跃进中揭示这些农村的落后现象？赵树理反问道："你长期生活在农村，见过'小腿疼'和'吃不饱'没有？故事写的事情，农村有过没有？"然后又说："既是普遍存在，为甚不能写进作品？一个作家要作党的耳目，人民的喉舌。广大农村出现了这样的倾向，应该提醒同志们注意，改进工作方法，如果知而不言，避而不写，那就是对党不忠，对人民不负责任！"

也许是因为规定了讨论范围，也许是因为受到了时代的限制，人们对小说的注意力几乎全都集中在怎样看待"小腿疼"和"吃不饱"及其处理的工作方法上。其实，今天看来，《锻炼锻炼》跟赵树理别的问题小说一样，也是客观意义大于主观思想。它的内容的新颖之处，首先是第一次在当代文学

① 湖北浠水县农民张庆和：《读小说〈锻炼锻炼〉》，载《文艺报》1957年第7期

中提出了大胆选拔、积极使用青年干部和搞好承包，落实生产责任制的问题；其次，王聚海这个人物形象，至今仍是个“熟悉的陌生人”。所谓“只信自己有本领，常谈别人欠锻炼，大小事情都包揽，不肯交给别人干，一天起来忙到晚，办的事情很有限”这样一类的官僚主义者，在迄今为止的小说中，似乎还找不到一个比他更典型的人物形象。

在这场讨论中，赵树理不置一词。他默默地在京参加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又应邀出席了周总理在中南海紫光阁召集的座谈会。周总理在会上作了“关于文化艺术工作两条腿走路”的讲话，批评了文艺工作中的片面性和形而上学，从思想方法上清算了近年来文艺工作中“左”的错误。他说：“去年大跃进，这是可喜的现象。但是过份紧张，就不能心情舒畅了。写东西不能一个电话又一个电话去催，搞得太紧张了，精神产品生产不好。”“订任务的时候，不要订得太高、太紧，要留有余地，不要层层加码。订的指标要是高了，也可以低一些，退一步，若超额完成了，不是很好吗？主导方面是力争完成。任务订得低一些，超额完成，也不致浪费人力、物力、财力。所谓‘卫星’，不能白封，要人家看看以后都说好，才能算是‘卫星’。”①

周总理的讲话精神，应该说与赵树理的看法正相吻合，可他身在北京心在晋，仍然惦记着危机中的农业生产，所以会后他没有留下来讨论，又急匆匆地赶回沁水去了。

然而事实很清楚，在一九五九年，谁想在中国的土地上

① 周恩来：《关于文化艺术工作两条腿走路的问题》

开辟一块不受“五风”肆虐的角落，无异于要在撒哈拉大沙漠中建设一方绿洲。因此，赵树理的种种良策，一碰到现实就成了书生气十足的乌托邦。高指标和瞎指挥决不因为他在这里搞试点而不来滥施威权。一条条命令无休无止地从电话中传来，其口气之坚决绝无讨价还价之余地，管理区几乎没有一项生产可以自作主张，自由安排。

“在这种情况下，我到了基层生产单位的管理区，对有些事情就进退失据了。”赵树理说，“例如每天听到电话上要追肥、锡苗的亩数（一日或三日进度），管理干部怕担落后之名就报一个象样而并不确实的数字。我要代表党而向汇报的党员提出实事求是的要求，很可能马上就使他受到批评，如按当天的具体情况，他要安排劳力作其他的事，不能去锡苗、追肥上安排更多的劳力，所以不能算他的错。要把这客观情况具体说明是否可以呢？那也要受批评，因为打电话的那个具体干部此时的任务是专统计这两项数字，准备向县委生产办公室汇报的，所以他只能管这个，说其他理由是县委生产办公室不要的。正因为这样，我在管理区就失去了作用——我要是根据当地情况帮着区干部安排生产管理上的事，往往有许多不是公社布置的，也有许多是与公社布置有抵触的。”

而且，赵树理虽然对农业生产了如指掌，考虑问题之细致周到简直令人不胜惊讶，但却有个致命的弱点——没有当官之才、经营之才，缺乏领导能力、组织本领。倘若让他本人去执行自己的计划，便会力不从心，或者达不到予期的目的。所以，他自我解嘲道：“我就在这种情况下游来游去，起不到什么积极作用。不但写不成小说，也找不到对国计民生

有补的事，有时候或者还得帮一帮管理区整理点对实际生产无补的材料。”

直到这时，赵树理方始觉悟到，高指标、瞎指挥，“都是自上而下形成一套体系的工作安排，也不能由公社或县里来加以改变。”要从根本上挽救农业生产，关键在于决策机构。于是他决定上书中央，如实反映农村状况，提出自己的合理建议。

八月二十日，赵树理写成了《公社应该如何领导农业生产之我见》，投寄《红旗》杂志。

这是篇洋洋万言的理论文章。赵树理从四个方面阐述了自己的独到之见。第一，应重新认识政治挂帅的含义，它不能代替一切，同时，“判断一个地区的工作是否政治挂了帅，是要看参与工作的大多数人的工作热情是否是由他们自己的政治思想支持着的。”第二，在现阶段的农业生产中，劳动力是起决定作用的主要因素；农业生产必须“走上按劳动力安排生产的常规，”所谓，“人力是无限的”，并不能适用于具体的生产安排。第三，生产管理过分集中，经营方式过于单一，公社应当放权，’不要以政权那个身份在人家做计划的时候提出种植作物种类、亩数、亩产、总产等类似规定性的建议，也不要以政权那个身份代替人家全体社员大会对人家的计划草案作最后的审查批准，要是那样做了，会使各管理区感到掣肘而放弃其主动性，减弱其积极性。”第四，在任务、交换、分配、生活（消费）等问题上，“国家只要掌握国家市场所需要的产品，而不必也不能连集体内部自给的部分及其生产、生活的全面安排完全掌握起来。”在文章寄出的同时，赵树理又

两次致信中央某位负责人，反复说明他的写作动机：

“我自一九五一年，即以文艺写作者下乡体验生活名义参与农业合作化的事，以后每年都有一段时间参与其事。在八、九年中，前三年感到工作还顺利，以后便逐渐难于插手，到去年公社化后，更感到彻底无能为力。

“我联想到领导农业上好多好象根本特质的问题。现在先把我想到的这些问题和解决这些问题的建议，作为一个思想汇报写在下面请你看看，如略有是处，请将有用部分转给党政农业领导部门参考。

“在写这文章时候，因为要避免批评领导的口气，曾换过四、五次写法，最后这一次虽然把这种口气去掉了，可是要说的话又有好多说不进去了，即使如此，这文章仍与现行的领导方法是抵触的，我估计不便发表，请你看看给我提出些指正——说不定是我思想上有了毛病。不过即使是那样，我也应该说出来。”

赵树理就是这样一个为了人民的利益，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忠实代言人。

在全面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的今天，无论何人都得承认，赵树理确对中国农村有着无比深刻的了解，他的言论确是真知灼见。

然而众所周知，赵树理的文章正好撞在“反右倾”的枪口上了。毋庸置疑，这决非偶然的巧合，而是有着必然的因素的。

就在赵树理酝酿“我见”的时候，那位曾提携他脱颖而出，崭露头角的彭老总，已经致信毛主席，批评大跃进、人

民公社化。这个忠诚的共产主义者，怀着赤子之心，严正地写道：

“浮夸风气，吹遍各地区各部门，一些不可置信的奇迹也见之于报刊，确使党的威信蒙受重大损失。当时从各方面的材料看，共产主义大有很快到来之势，使不少同志的脑子发起热来。在粮棉高产，钢铁加番的浪潮中，铺张浪费就随着发展起来，秋收粗糙，不计成本，把穷日子当富日子过。……产生这种浮夸风气，是有其社会原因的，值得很好的研究。这与我们有些工作只有任务指标，而缺乏具体措施是有关系的。

“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在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中，我和其他不少同志一样，为大跃进的成绩和群众运动的热情所迷惑，一些左的倾向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总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抢先思想一度占了上风；把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的作风置于脑后了。在思想方法上，往往把战略性的布局和具体措施，长远性的方针和当前步骤，全体与局部，大集体与小集体等关系混淆起来。……有些指标逐级提高，层层加码，把本来需要几年或十几年才能达到的要求，变成一年或者几个月就要做到的指标。因此就脱离了实际，得不到群众的支持。诸如过早否定等价交换法则，过早提出吃饭不要钱，某些地区认为粮食丰产了，一度取消统销政策，提倡放开肚皮吃，以及某些技术不经鉴定就冒然推广，有些经济法则和科学规律轻易被否定等，都是一种左的倾向。在这些同志看来，只要提出政治挂帅，就可以代替一切，忘记了政治挂帅是提高劳动自觉，保证产品数量质量的提高，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从而加速我们的经济建设。政治挂帅不可能代替经济法则，更不能代替经济工作中的具体措施。政治挂帅与经济工作中的确切有效措施，两者必须并重，不可偏重偏废。”①

但是，在八月召开的党的八届八中全会上，彭德怀却因此而蒙冤受屈，被加上右倾机会主义，反党、反社会主义等罪名。原定批“左”的庐山会议，竟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通过了《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

九月中旬，赵树理应召回京，参加全国文联主席团扩大会议，学习座谈中共中央八届八中全会的公报和决议。这次会议紧跟形势，提出了“反右倾、鼓干劲，争取文艺更大丰收”的口号。

这时，赵树理的“我见”已落到陈伯达的手中，他岂肯轻轻放过这送上门来的“活靶子”，立即批转作协党组，让摘录印发，作彻底批判，因为文章内容跟彭德怀“一个腔调”，两人“一唱一和”，都是“大肆攻击三面红旗，复辟资本主义的农业经”。与此同时，阳城县委也闻风而动，把他的“右倾言行”整理成文，送到作协来了。于是赵树理第一次尝到了挨批的滋味。

但赵树理是个犟性子，有一股“别扭劲儿”，真理在握，就死也不认错。他认定自己的做法符合党的原则，自己的看法也符合生活现实，所以他恳切地说：“一个共产党员，在工作中看出问题不说，是自由主义，到处乱说更是自由主义。跟

① 《彭德怀 1959 年 7 月 14 日给毛主席的信》

着别人做吧，觉着人家的做法不对；自己另来一套吧，一来不合乎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二来自己也不是确有把握，所以只好向有关领导方面提意见。”

“老实说，我估计我这个党员的具体作用就在于能向各级领导反映一些情况，提出几个问题，在比较熟悉的问题上也尽可能提一点解决问题的具体建议。我觉得，只要能及时反映真实情况，协助领导及时解决必须解决的问题，也算是对党的一点贡献。

“我为什么这样估计自己的作用呢？第一，我觉得接近基层的干部缺乏调查研究的精神和向党说老实话的精神，好多重要问题很不容易上达。第二，我常把自己戏称为‘通天彻地’的干部——其实这种说法还不全面，应该说是‘通天彻地而又无固定岗位’的干部。这种干部宜于充当向上级反映情况的角色——易于了解下情，又可无保留地向上反映。我对主席的著作学得固然很差，但碰上问题总还想根据主席所提倡的调查研究精神从多方面看看、想想的。”

他的态度使领导和同志们颇感意外。经过了“反右派”斗争，一般作家早就禁若寒蝉，变得谨小慎微，唯命是从，不敢用艺术家的眼光去透视生活的最深处，更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去对抗越刮越烈的“左”风，可他不仅不认错，反觉得他们太不了解农村的情况，倒过来做起他们的思想工作来。

当同志们批评他反映征购过头粮，农民饿肚子的情况时，他说：“我是一个农村干部，就得对农业生产负责，不能叫老百姓没有口粮，牲口没有饲料。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就得对党负责，不能说假话，下级欺骗上级，地方欺骗中央。”又说：

在这个问题上，我的思想是矛盾的——在地县两级因任务紧张而发怒的时候，我站在国家方面；可是一见到增了产的地方，仍吃不到更多的粮食，我又站到农民方面。但是在发言的时候，恰好与此相反——在地县讨论收购问题时，我常为农民争口粮。而当农民对征购过多表示不满时，我却又是说服农民应当如何关心国家的。关于前者，地县两级和我熟悉的同志常常听到；关于后者，虽然说得很广泛，地县领导同志却很少能听到。

“收购任务不能减少，我是懂得的。我参加过人代会，知道国家没有那么多的农产品不能过日子，不能保证某些建设事业必须迅速完成的需要。农业生产潜力之大我也是知道的，而问题在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没有充分发挥。原因之一，就是他们不知道增产产后自己能吃多少。所以我向领导建议，事先把收购任务定死，而把争取多产的无限数字让给生产单位自己去争取，以鼓励其积极性。这种建议固然是基于‘物质刺激’而提出的，可是没有这个物质保证，去发动基层的积极性便没有物质基础。”

赵树理还多次表示，愿意不当作家，下去搞农业。他有一整套管理设想，保证农副收入年年增加，每个农户都能达到富裕中农的水平。但这样的表白，在当时只能招来更严厉的批评和不老实的罪名。他的设想被称作“反映落后农民观点的一套复辟资本主义的意见，”大会批，小会谈，持续了三月之久。

还有什么比不被党和同志们理解更为痛苦的呢？虽然，历史已经作出公正的判断：“八届八中全会关于‘彭德怀、黄克

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这场斗争在政治上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在经济上打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1] 但在当时，赵树理报国无门，心情好不沮丧。他除了接受批判，无所事事，差不多每天下午都到康濯那儿去坐一坐，—— 他正在一个宾馆里写书—— 同他一起看看刚来的晚报。那一阵，报纸上常有亚非拉民族解放和人民革命斗争高涨的消息，赵树理不止一次地说：“如果需要我去亚非拉人民中做点工作，我倒真想去去，热热闹闹地干一干哩！”

① 《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第十五章 再认识

当历史进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时候，中国人民陷入了极端困难的境地。神州大地到处是“大跃进”、“反右倾”的恶果，狂暴无情的自然灾害又从天而降，其地域之广，时间之久实为世所罕见，而苏联政府也在这时背信弃义，撕毁合同，撤走专家。国计民生损失惨重，大批农民活活饿死。

在这无法形容的艰难日子里，最关心农民的赵树理却困于批判，守在家中过了一段少有的清闲生活。这时，他家已迁往大佛寺三十七号，那里环境幽美，住房宽敞，再加上广建回乡，二湖和三湖也已上学，家里显得格外安静，正合他那郁郁寡欢的心情。

他的家庭生活十分简单。老俩口从不吵嘴，也很少交谈，衣食毫不讲究，一天三顿面食，一顿只要一菜，最爱吃的是沁水风味的烙饼、炉面、和子饭；常穿一身半新不旧的黑布制服，衣襟上落着点点饭迹，膝盖处磨出斑斑白痕。他每天清早即起，必要摆弄一阵种在院子里的南瓜、丝瓜和葫芦，好象在聊慰思农之心；平时喜读诸子百家，笔记小说，兴致来时还要摇头晃脑地大背一通，不过他最经常的功课是挥毫写字，一方面固然在研究书法，另一方面似乎是借此以抒发情

怀。有一天，他为一个画家写了个条幅：

大雪满天地，胡为仗剑游？
欲谈心中事，同上酒家楼。

那位画家正受到一次不应有的党纪处分，到处诉苦提意见。

四月，赵树理整理了建国以来在报刊杂志上发表的散文、杂感、评论和书信，编为一册《三复集》——意为再三重复、反复回味——交给作家出版社。

在《三复集》的后记中，他写道："要我自己给它加个评语，我以为用'老生常谈'这个成语十分合适——自己既是'老生'，文章又是'常谈'，其稍可自慰者是我所主张做的事与我做的还大致统一，而且往往是做过才说的。"或许，这是在含蓄而坚决地反对放空炮，不实干的浮夸之风，也是在真诚地回答那简单粗暴、不绝于耳的批判教条。

七、八月间，第三次全国文学艺术界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赵树理幸运地未受批判的影响，仍被选为主席团成员，会后也继续当选为全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协理事、中国曲协主席。

这次大会是历届文代会中"左"焰最炽的一次大会，人们的发言中充满了"跃进"、"批判"的激烈词语。可是赵树理所讲的题目却叫做《谈"久"——下乡的一点体会》。他说："按我的体会，到一个地方，应该住上一定的时间，其好处是：'一，久则亲。到一个村子里，要是只看几片丰产田，几处山

林，几个猪场……自然也有一定的收获，这种印象虽然也能引起自己的爱，但是这种爱就象抚摸了托儿所几个娃娃一样，比较单纯。假如我们参加过这个村子里的土改，互助合作，建社、扩社、高级化，公社化……这样，每当作完一个段落要离开的时候，都会感到放不下手，安不下心，每隔几天总要写封信问问我们离开之后的变化。对于那里的人也会一想起来就是具体活动的有代表的人，想忘也忘不了。

“二，久则全。农村是个广大而具体的社会面，所包涵和所联系的方面甚广，不待到个相当长的时间，是不容易把它的重要方面都接触到的。……而且按认识和实践的辩证关系来理解，是愈久愈全面的，愈久愈能随着它的发展趋势来变革它的。

“三，久则通。目前农业生产的组织领导经营计划、安排、管理等诸方面的事，其间的相互联系（互相影响、互相促成、互为因果）之处复杂得很，待得时间长了才不至于把某些不易理解的方面理解得简单化了。对现实能作融会贯通的理解，在作品中就容易避免简单化。”

显而易见，这个讲话的弦外之音仍是在批评把生活的假象看作生活的真实，仍是在反对用虚夸和狂热取代实事求是的精神。当然，也是在委婉地反驳对他的批判。赵树理愿把自己的根子永远扎在中国农村的土地上，无论怎样的批判打击，都不能动摇他的决心。

在会上，茅盾第一次论述了赵树理独特的艺术风格，他说：“赵树理的个人风格早已为大家所熟知。如果把他的作品的片断混在别人的作品之中，细心的读者可以辨别出来。凭

什么去辨认呢？凭他的独特的文学语言。独特何在？在于明朗隽永而时有幽默感。把赵树理的风格看作只是幽默，未为确论。幽默只是形成赵树理风格的一种手法，而不是它的艺术构思的骨架，就它的整个风格来说，应当认为明朗隽永是主导的。同样地，如果把赵树理作品的幽默因素仅仅归之于散在篇中的解颐妙语，亦未为确论，赵作的幽默还在于概括人物的性格而给他一个形象鲜明的绰号。”①

茅盾的论断不仅精辟之至，而且非常及时。因为从此以后，赵树理的个人风格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它的主导面由明朗隽永转向含蓄沉郁，形象鲜明的绰号也很少见到了。

这种变化，立即反映在他会后发表的短篇小说《套不住的手》中。老舍先生读完小说，第一个印象就是“文字极为朴素严整，不象树理同志以往的文章那么有风趣。”

在赵树理的作品中，《套不住的手》是别具一格的，与其算它为小说，倒不如说是特写更确切些。它几乎没有赵树理一贯注重的生动明快的故事线，描写的不过是年逾古稀的农民陈秉正的手套失而复得的两个小插曲而已。

七十六岁的陈秉正老人，生产技术在整个山区首屈一指。当他在小说中出现时，正担任着大队的教练组长，专门训练那些素不参加农业生产，做活不合规格的妇女和青年学生。看来，教练组该是故事的中心，或者说是主人公活动的舞台了。谁知不然，作者笔锋一转，描绘起陈老人的一双手来了。这双手“跟铁耙一样，什么棘针蒺藜都刺不破它。”手的形状也

① 茅盾：《反映社会主义跃进的时代，推动社会主义时代的跃进》

十分奇特："手掌好象四方的，指头粗而短，而且每一个指头都展不直，里外都是茧皮，圆圆的指头肚儿好象半个蚕茧上安了个指甲，整个看来，真象用树枝做成的耙子。"

接着，作者的笔锋又是一转，谈起了关于这双手的手套及其两个插曲：一九五九年冬天，陈秉正的儿孙们为了保护老人那双劳苦功高的手，给他买了一双毛线手套。但他虽然七十六岁了，还是天天劳作不息，害得手套仅仅露过两次面。第一次是儿子劝老人去逛街，看看物资交流会，于是手套派上了用物，可他为了给队里买木叉，又把手套摘下来装进了怀里，忙乱之中还丢了一只。好在售货员早已捡起收回，还给了他。第二次，老人去县城出席劳模大会，自然是又该戴上手套了。但在会议结束时，老人看见新修的招待所乱七八糟，行走不便，就脱下手套，招呼几个青年人一起搞了次大扫除，事后却发现手套也进了垃圾堆，幸而招待所的工作人员不怕麻烦找出来，把它洗净烘干，还给了陈老人。第二天，他回到家里，把手套交给了儿媳妇道："这副手套还给你们吧！我这双手是套不住手套的。"作者娓娓道来，到这里点明了题目，故事也就此结束。

这样的一篇小说，看来是有悖于赵树理的创作原则的。它没有针对性，没有讽刺对象，没有矛盾冲突，也没有解决什么具体问题，然而，他是个执着于时代的人，是个一心为政治服务的作家，他之所以在这个时候发表这篇小说，只要联系到时代背景，它的针对性也就昭然若揭了。在这里，赵树理还是在批评光说大话不实干的"当代英雄"，还是想解决"浮夸风"的问题，提倡一声不响，勤勤恳恳地建设社会主义，

踏踏实实地从平凡的小事做起的精神。只是由于形势所迫，使他不便直言、象以往那样爱憎分明，疾恶如仇地从正面提出问题。同时，也是由于形势所迫，这个忧国忧民的艺术家，纵然生性幽默，这时也无法乐观起来，他的个人风格自然而然地由明朗隽永转向了沉郁含蓄。但是，这个用老老实实的结构、平平实实的语言，写出来的踏踏实实的人和事，在当时那一片火炽的浮嚣中，读来真如啜饮井水一般清爽。

不过，大概是出于时代的原因吧。虽然小说一发表就获得一致好评，《光明日报》予以全文转载，但是，那些评论文章也都没有明言赵树理的用心，而是同样作了含蓄的肯定。

“这是一篇手的赞歌，树理同志赞颂了最值得赞颂的！”他的莫逆之交老舍先生写道。

“多么了不起的手！岂但那双毛线手套套不住，一切困难也套不住啊！在这里，树理同志热情地赞了一位老农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最可爱的品质。通过一双最可宝贵的手，他不仅说出我们应当劳动，而且具有说服力地道出劳动是多么可爱，多么美丽，多么崇高。陈老人的手欲罢不能，非干点什么不可！劳动与生活已经无可分开，不劳动就活不下去。多么崇高的生活呀！树理同志没有用任何标语口号去鼓动，可是我相信，谁读了这篇作品都会手痒，想干点什么，同时也会觉得懒惰是极可耻的。”①

这个主题在赵树理的心中孕育的时间，恐怕至少有二十个月了。陈秉正的性格特征，似乎也并非如他自己所说的大

① 老舍《谈〈套不住的手〉》载《文艺报》1960年第22期。

多取自郭玉恩父亲。

去年三月的太原座谈会上，谈到表现英雄人物时，赵树理唯独提起了平顺县的全国劳模武侯梨：“十四年来，他一直在他的家乡领导群众建设社会主义，不管别人知道不知道，不管别人参观不参观，都是一样干。他的家乡，原是荒山秃岭，……现在这里满山沟都是密密麻麻的果木树，松柏树，山洪也被控制住了。群众的收入，大大增加，平均每年每口人可以得到一百五十元钱。这样的人，我觉得应该好好表扬。现在我国在农业上还不能一下子实现机械化，电气化，他们只凭着二只手、十多年来竟能把山区园林化，改变了山区的旧面貌，若说宣扬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我认为写这样的人最有力量。”

可以肯定，赵树理在那时就想塑造一个这样的英雄人物了。但他对鼓噪一时的口号“共产主义文学适时而有必要”是持有异议的。他始终认为农民自己是不产生共产主义的，甚至连社会主义觉悟也很难说，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主要地“还是由集体主义的鼓舞”。“先国家后自己是教育的准则，也是最高要求。群众中不乏其人，但非多数，而且在较短时期不可能成为多数”。他毫不含糊地指出：“农村的人物如果落实点，给他加上共产主义思想，总觉不合适。什么‘光荣是党给我的’，这种话我是不写的，这明明是假话。就冲淡了。苏联写作品总是外来一个人，然后有共产主义思想，好象是外面灌的，我是不想套的。《小二黑结婚》没有提到一个党员。《三里湾》的支书、也很少写他共产主义的理论。一个队真正有一个人去搞社会主义就很了不起了。所以我的作品有时反

映不充分，脚步慢一些。自己没看透，就想慢一点写。”

也许，正是基于这一想法，赵树理把主人公的身份改为领导干部的父亲，七十多岁的老头子。这就可以把自己最熟识的父亲的特征化为人物的性格了，譬如：“教人做活，不但要求规格，而且首先要教架式。”这是赵树理自小就领教过的。又如，“爱编织，常用荆条编成各色各样的生产用具，”这是赵家世代相传的手艺。赵树理曾得意洋洋地声称：“你们只知道我编过报纸和刊物，却不知道我也是一个筐啊篓啊的编辑，我家祖祖辈辈都会编，可算是编辑世家！”。

陈秉正是赵树理心目中的一个英雄人物。也是他塑造的最成功的老农形象之一

是年冬天，赵树理终于按捺不住对受灾农民的深切关心，毅然结束清闲而无危险性的家庭生活，又回到了晋东南。

这时，沁水，阳城两县重新分开。他的县委书记职务也就此免去，又成了“通天彻地而无固定岗位”的游击战士。

仅仅一年工夫，家乡就面目皆非了。一片灾象，天聋地哑，放射过无数卫星的“小土群”灰飞烟灭，变成任人凭吊的古战场，放开肚皮吃饭的“新食堂”也寿终正寝，荡然无存。粮食紧张到一斤小米卖十元钱，一只手镯只能换二十斤萝卜。

在尉迟村，六〇年过年时，每家还能分到二两红糖，四两海带，几张糊窗纸；一户配给半斤煤油，两盒火柴——有的农民就为了这半斤煤油闹分家——而现在，分得的钱仅够买包花椒面，过年连火柴也买不到，窗纸也糊不上了。日子过成这个样子，还有什么情绪生产呢？人们纷纷向他诉苦：

“农村变成了劳改队，日子越过越困难。……”

实际上，尉迟大队算是万幸的了，由于赵树理在这里试点，多多少少抵挡住一些瞎指挥，队里添置了两驾运煤的大车，开办起一个油坊，还有养蜂的副业（这也是赵树理的功绩。他在五七年就劝大家养蜂，说：“这儿有句俗话：高平的萝卜，晋城的葱，阳城的冬瓜，沁水的‘风’。咱不能把‘风’变成‘蜂’吗？这是一本万利的副业啊？”）他们方能在特大灾难中勉强度日。而阳城县则因大力批判赵树理的忠告，人祸天灾，后患严重，致使许多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嗷嗷待哺的孩子而无法可施。

赵树理亲眼目睹这样的悲剧，真是连心都碎了。他亲自动员尉迟人民，把人家养活不起的孩子收留下来，嗣后，等到光景好过了，他又亲自说服乡亲们，把孩子送还给他们的亲父母。“文化大革命”时，阳城人民都说：这么好的人，怎么会是黑帮呢？

一九六一年一月，赵树理去沁水县城，与一个在心已久的人物，县工会主席潘永福不期而遇，他不胜自喜，造访多次，打算为他立传。

潘永福和赵树理同乡不同村，家住沁河东岸的嘉峰村，与尉迟村隔河相望，彼此从小就熟悉，曾一起在沁河里摸过鱼，捞过鳖。因为方法特别，赵树理到老还记得清清楚楚：把河边浅水处用石头垒成一道临时小堤，让这浅水与深水隔绝，只留一个口，浅水里撒上有几粒麦子的麦糠。这泡过麦糠的水从那个口里流出来，水里带有麦味，老鳖就顺着这味儿来找食物。到了夜里，把口一堵，就在这小堤里的水里摸，往往

一次就能捞到几十个。

潘永福不但聪明过人，而且是个传奇性人物，沁河两岸流传着许多关于他的动人事迹。他曾饿着肚子跳入激流，舍命将一船临危的老乡救起；也曾在严寒中破冰下水，任凭流水碎割体肤，为八路军兵工厂搭桥；他身为区长，仍是一身短工时代的打扮，办公之余，仍和同志们一起挑粪种地，当他调任农林科长时，为了不让同志们送行，竟一大早背着行李走了。……

这种急公好义，舍己为人，苦干实干的品质，正是赵树理深为赞赏的——他自己也常干这种事——所以早就想给他写个全传了。可是几经接触，却又改变了初衷，因为潘永福提供了比原来更大的“大事”。

比如，在一九五一年，潘永福到端氏镇去开辟农场，他就因地制宜，把三十亩远地种上不费工本的苜蓿和核桃树，两年后，经济收入超过了原来的十多倍。

又如，在一九五九年，县委要他去负责兴建蒲峪水库，他经过实地考察，下令迁移了原定的坝址，结果水库的容量由八十万方增加到三百万方，人力物力却反而大大节约。他又合理使用一千多民工，让他们人尽其才，把劳动与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配备成套：放牛、割草、割荆、编筐，自己打铁，自己造车，理发店、补鞋摊、缝纫房、中药铺，……各行各业，花花朵朵，把那荒无人烟的工地治理得俨然象个小梁山寨，使民工们在这大灾之年也能安心劳动。

再如，他去年秋天路过本县的中村铁厂，那里正为矿石的运输问题而一筹莫展，但潘永福在调查研究后略加指点，这

个铁厂最头痛的问题马上就迎刃而解了。

这些“大事”，潘永福不过随便谈起，然而说者无意，听者有心，赵树理立刻感到：潘永福的实干之德、经营之才，在“五风”猖獗的当今世界，是何等可贵，何等难得啊！在他的调度下，连废物也会成宝，发挥出惊人的能量，建设社会主义倘有千千万万个这样的实干家，何患浮夸不灭，灾害不绝！他认为：“我们应表扬那种不声不响的英雄人物。一个村即使只有一个主要干部，抱定决心建设社会主义，哪怕他有缺点，也不怕。”于是一篇别开生面的传记文学应运而生，《实干家潘永福》在《人民文学》四月号上发表了。

确切点说，这是一篇独具一格的报告文学，或赵树理自称的现实故事，它不为人物的一生做行状，也不记人物各方面的顺荣逆枯，单表他参加革命二十年如一日，不务虚名，不怕艰苦，坚持实地调查研究，千方百计认真做事的经历，就象那《孟祥英翻身》，专讲她由不英雄变成英雄一样，而且，大概是怕读者不懂他的良苦用心吧，赵树理在叙述完上列三件大事之后，居然打破惯例，亲自在作品中大发议论道：

“以上三个例子，看来好象也平常，不过是个实利主义，其实经营生产最基本的目的就是为了‘实’利，最要不得的就是只摆花样让人看而不顾‘实’利，潘永福同志所着手经营过的与生产有关的事，没有一个关节不是从‘实’利出发的，而且凡与‘实’利略有抵触，绝不会被他纵容过去，这是从他的实干精神发展来的，而且在他领导别人干的时候，自己始终也不放弃实干。”

这里的所谓“实利主义”，亦即当代人的口头禅“经济效

益”。

实际上、赵树理即使不来这么一段“太史公曰”，读者也能一眼看出，“作者所以为潘永福同志立传，是有所感而发的，有很明确很强的现实目的。”在《文艺报》第五期上，副主编侯金镜写道，“这篇作品我读过两遍，第二遍读的时候就忘记了看小说所用的那些尺度，把它当作形象性很强的政论，甚至是当作自己整风学习活动的参考资料来读，这是一。第二，我着重研读‘经营之才’那一段，因为它不但在全篇里占的分量最大，恐怕作品的关目也在这里。谈现实感最强的地方，主要也在这一段，可以称做‘对景挂画’。全篇前面的三大段，其目的，也是为了加深‘经营之才’这一段，给后者指明了它的来龙去脉。”

然而，正因为它是一篇卓然独立，振聋发聩的“顶风”杰作，具有强烈的现实感，尖锐的针对性，所以这位“实干家”不能见容于“左倾”舆论界。很快就有人挥舞大棒，气势汹汹地向编辑部提出抗议。邵荃麟为之叹息道：“发表颇不容易，读者还来指责。”结果，除了侯金镜的上述评论，全国的各大报刊一律对赵树理这篇后期代表作保持沉默，两篇文章都成了文坛上的空谷足音。

到了“文革”期间，它更被定为一株毒性强烈的大毒草。山西的省报批判道：“在《实干家潘永福》中，赵树理闭口不谈在三面红旗指引下，广大革命群众战天斗地的英雄业绩和精神面貌，而是大写特写了潘永福的‘经营之才’。赵树理笔下的那个潘永福，无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干尽了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罪恶勾当。他负责领导国营

农场时，不惜损害国家利益，破坏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把一切为了赚钱的资本主义经营方针，作为指导生产的唯一宗旨。他看到‘草价高’，就公然反对‘以粮为纲’的方针，将产粮土地改种苜蓿。他看到种树苗有利，就钱迷心窍，把农场改为育苗场，他领导修建水库时，竟然以‘软顶’、‘硬顶’的卑劣手段，对抗党的领导，事事同总路线、大跃进抗膀子，唱反调。他公开支持民工，在工地附近开垦小块土地，利用工地水肥来种植，产品归自己，使水库工地成了一个复辟资本主义的‘小天地’、‘小梁山寨’。”

不过，时间是最公正的评论家。它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一丝不苟地、严酷无情地筛选着文学作品。今天，那些喧闹一时的“报捷文学”烟消云散了，而这篇《实干家潘永福》，至今读来仍有亲切之感。令人不能不折服于赵树理的远见卓识。不能不嘲笑这些貌似革命的“大批判”，当今社会最需要的，不正是这种实干家、这种经营之才吗？有人指出，“就短篇小说的艺术发展而言，这是朴实的叙事性对表面化的戏剧性的胜利。能以如此平凡实在的‘小’，用简单的连缀和汇报材料式的布局，见出作家本人深切体验到的‘大’，不能不说是赵树理对人民、对生活、对艺术的那份忠诚所致。”①

这一时期，赵树理还致力于上党梆子《三关排宴》的改编工作，把它搬上了银幕。

① 黄子平：《论中国现代短篇小说的艺术发展》，载《文学评论》1984年第5期。

他与《三关排宴》的关系，真是说来话长。

《三关排宴》是上党梆子的一个传统剧目，原为杨家戏《昊天塔》连四本的最后一出。第一本《昊天塔》，写的是杨继业在两狼山为国捐躯后，肖银宗把他的骨殖放在昊天塔内。六郎杨延景梦中获悉，就命部将孟良前去盗骨，不意焦赞也暗地随往。孟良盗骨之后，误杀焦赞，义不独生，托更夫送回老令公骨殖后，自刎而死。

杨六郎在病中接到父骨，又知焦、孟俱死，悲伤过甚，以致身死。肖银宗乘机率兵南犯，杨宗保奋力抗御，陷于五绝阵中，幸亏被俘投敌的杨四郎将其救出。宋王遂命佘太君前往，她到了三关，痛夫哭子，也患病不起，是为第二本《五绝阵》的主要情节。

第三本《八姐盗发》演的是八贤王为佘太君出榜招医，仙人钟离汉声称需宋王的龙须和银宗的龙发方能治愈。杨八姐乃化装入辽，盗回龙发。佘太君服药病愈，于是披坚执锐，大败辽兵，肖银宗不得不来三关求和。

佘太君奉命在三关代主践盟。在盟约之后，太君向肖后指出，驸马木易正是她的儿子四郎延辉，并要索取回宋。气得肖银宗当场吐血，其女桃花公主也碰死三关。佘太君班师回朝，将四郎带上金殿请宋王处罚叛徒。宋王和文武百官都为四郎讲情。太君却愤激万分，痛斥儿子，杨四郎见求生不得，便碰死金殿，这就是最末一本《三关排宴》。它宣扬了佘太君忠君爱国，大义灭亲，逼死最后一个儿子；杨四郎服从母命，返回宋朝，又在悔恨中撞死金殿；而桃花公主因不能随夫南归，也甘愿自杀，以身殉节，使宋王深受感动，下令

将四郎尸首移入“忠臣庙”，封桃花公主为“节烈夫人”，所以剧本又名《忠孝节》。

赵树理非常欣赏这个戏，竟把那位无名氏作者称为“中国的莎士比亚”，因为他将儿女亲情和国家大事水乳般地交融在一起，歌颂一副忠骨、浑身赤胆的豪杰，在大敌当前之时，为了国家的利益，民族的利益，不惜斩断儿女私情，灭绝旧日恩怨，爱国主义的激情荡人心魄，催人泪下，具有鲜明的“赞英雄，重气节”的上党风格，思想性远胜过同一题材的京剧《四郎探母》。

因此，五年前，当长治专区赴京汇报演出团组成时，他就提议把《忠孝节》作为重点节目加工。可惜专家们不与他一般见识，觉得《忠孝节》是个干巴巴的大架子戏，没甚意思，连节目单也不让它进去，后经赵树理多次提出，才勉强安排了《排宴》一场，作为内部观摩。谁知它一经演出，便赢得了全国剧协和戏曲专家的一致好评。它这才身价骤涨，受人青睐，翌年就成了赴省汇演的节目，剧名也由赵树理改为《三关排宴》。过了两年，又被定为向国庆十周年献礼的重点戏，在太原精益求精。中国戏剧研究院也派了数位专家来帮助指导加工排练。

献礼演出后，有人建议长春电影制片厂把它拍为舞台艺术片。恰好周扬在一次艺术工作座谈会上传达了邓小平的指示：编一点历史戏，给群众多长一些智慧。于是长影就此拍板，请剧团去长春开拍。可是剧本虽经众多专家惨淡经营，反复修改，长影的领导和导演仍不满意。剧团不得不于一九六〇年底返回山西，继续加工。

约莫正是赵树理在长治创作《实干家潘永福》的时候，地委宣传部、专署文化局和上党戏剧院向他介绍了长影对《三关排宴》的修改意见，这个戏迷当即表示愿意尽力。长影得知后，也当即来电，指名请赵树理着手整理。于是他写完小说，就调过笔头编起剧本来。

建国后，由于职务和环境的便利，赵树理对汪洋大海般的中国戏曲慢慢地见多识广了。很快就克服了地方偏见，不再武断地认为上党梆子是天下最好听的戏曲了，但对它的眷恋还是一往情深的，因为“上党戏的好处是激烈、痛快。我爱那种痛快的气氛。”

刚进京时，赵树理不愿私爱，常向文艺界的朋友们鼓吹上党戏，然而知音甚少，听他唱过几句的人总是微笑着摇摇头，觉得不大高明。赵树理把这归咎于自己的破锣嗓子损害了唱腔的艺术魅力，害得他此后不敢象在农村那样，公开地引亢高歌了。因为“唱得很难听，在自己虽然痛快了，在别人听了却很难受，所以到了北京之后，除了带三分醉意经人怂恿破例唱几句外，从不乱唱”。不过也有例外。他住在市文联宿舍时，邻居中有京剧《将相和》作者王颉竹，此君喝了二两以后也要喊两嗓子皮黄，屋里还有一把音色刺耳的旧京胡。赵树理有时路过，听到他在唱，也会忍不住自己的“戏瘾”，进屋自拉自唱一番。当然，唱的不是皮黄而是上党梆子。据说，这两位的“歌喉”都能使听的人破涕为笑。

赵树理对于旧戏的态度，也慢慢地有了可喜的巨大转变。

过去，解放区的文艺界一度盛行“扫荡主义”，认为旧文化都是封建的，是地主的东西，不是工人农民的，所以，见

到一套《四库备要》，就把它翻过来做了笔记本，还用土改时划阶级定成份的方法来看待古人，把传统的剧目几乎全部“扫荡了”，只剩下李自成、黄巢的戏满天飞。许多剧团干脆改为化妆宣传队，编演一些直接为政治工作服务的节目，或者硬要古代人接受现代人的任务，让《卧薪尝胆》里的越王勾践负担宣传养猪和劳武结合的任务，要《焚绵山》里的介之推负担开荒造林的任务。“当时我也是参加这‘扫荡’工作的积极分子，只是一面公开‘扫荡’，另一面得空就还偷唱几句。”赵树理不无遗憾地说，“一九四九年我到了北京，参加过一些有关戏曲改革工作的讨论，才知道不是那么容易改，从而发现自己过去那种‘扫荡’之风是错的——不合乎‘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精神。”

后来，他进而正确地主张：“我们对戏剧遗产应该分一分类。打一个比方说，在战争时期，有些村子做了战场，战争过后，只剩下劫后余灰，房屋倒塌，咱们到了那种地方，就得根据情况分别对待，看看哪些需要修补的，哪些整理整理就行，还有哪些要大修，哪些可以拆砖拆瓦。有些是连砖瓦也拆不出来的，又该怎么办？传统戏剧也就和这种情况差不多。有些架子很好，只要稍加整理，有些架子不好，但还有些可用之处，如《雕翎箭》中有‘杀督’一折可用；有的则无一用，连砖瓦也拆不出一块，就只好不用，不能勉强。面对这种情况，应该就戏说戏，不能一概而论。”

关于如何整理改编传统戏，赵树理是坚持历史主义的，反对配合一定时期的具体工作。他说：“有人批评《杨门女将》里的人‘没有群众观点’。好象只有让杨文广戴上红领巾，让

穆桂英入了团，让佘太君成为党的老干部才行。这样，‘任务’给的越多，戏路也就越来越窄了。”“不能任凭作者心意，想写成什么就写成什么。有些作者原来的意图可能是好的，但因为对历史知识毫无所知或者知的很少，就会闹出笑话”。

有次下乡，赵树理和几个同志赶了十里夜路去看新编传统戏《柳毅传书》。这位改编者好象有点“左派幼稚病”，把主人公打扮成思想进步，红光满面的英雄人物，剧中充斥着庸俗的阶级斗争场面。本来，赵树理看戏总是有说有笑的，两手还要合着唱腔的板眼敲敲打打。可这回却自始至终一言不发，表情严峻。

散场后，随行的人问起他的观感来，他却答非所问地说：“柳毅入党了没有？如果还没有，该讨论他的入党问题了。”说得大家不知所以，茫然地看着他。他板着面孔，一本正经地接着说：“柳毅同志，历史清白成份好，立场坚定觉悟高，剧名可改为《柳毅入党》。”

人们这才恍然大悟，顿时笑得前仰后合。但是赵树理不笑，他严肃地指出，象这样粗暴简单的改编，是完全反历史主义的。这叫强奸传统戏，硬塞“思想性”，毫无可取之处，反把一个优美动人的戏糟蹋了。他说：“有些人用‘突破论’的理论来指导改戏，本本都要‘突破’一下，这是不正确的。越是好戏，越不应该‘突破’多了。‘突破’一定是不得已的。”

因此，在改编《三关排宴》时，赵树理力求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要多看看，看稳了才动手”。他对协助整理的同志说，“《三关排宴》的作者是个大手笔，要改人家的作品，必须特别注意叫我们的能和人家的配合得住才行”。

他呕心沥血，重写第一场和第四场，其中有几句唱词，竟推敲了整整四天，“审慎地保留了原剧中的精华，剔除了糟粕，弥补了不足，使得剧本主题突出，形象鲜明，结构严谨，语言流畅。”①

改编本毅然砍掉了原剧的一个重头戏——宣扬封建道德，同情变节叛徒，显示皇恩浩荡的尾巴，将太君责子的地点由“金殿”移到”三关”，并把公主自尽改为看清丈夫本质，愤而撞死；四郎自刎，也非出于孝心，而是走投无路所致，从而一洗过去浓重的封建味，使之成为一曲爱国主义和民族气节的赞歌。这一主题，在我国艰难困苦的六十年代初期，无疑是有教育意义和鼓舞作用的。

一九六一年六月，赵树理由长治去长春，和电影厂有关同志座谈讨论修改本。这时，批判“人道主义”，“人性论”的声浪甚嚣尘上。有人已无情地指责《三关排宴》中佘太君处理四郎的态度，“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道德观点的反映。”又说：“作为佘太君这位为国征战毕生，具有高度爱国主义原则的政治家，军事家，为什么须让我们千古歌颂的女英雄‘刻骨的伤痛’，‘心在泣血’呢？而且过分渲染这种所谓母性的心灵的创伤，对现今有什么好处呢？……这种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对革命人民来说，只能起到解除思想武装，混淆敌我界限，麻痹斗志，使对敌人——一切敌对势力分子抱有同情和

① 粟守田：《赵树理同志与〈三关排宴〉》，作者是参与改编者之一。

幻想”。①

所以，长影的同志都想对剧中的“人性”敬而远之。

但赵树理却坚决主张：佘太君要有“母子之情”。因为她虽然是个古代的民族英雄，可她又是个母亲。这时，她已经“七郎八虎一无留”了，要说她一下子见到这个亲生儿子，没有一点感触，那才是怪事呢！但是，儿子不争气，投降了自己的敌人，而且在酒席宴前表现得那样令人厌恶，能不严肃处理吗？当然不能！因而才有了深刻矛盾，有了戏。这样的人，做出这样的事，才能使人相信，也才能使人受感动。

几乎在同一时间，周总理作了一次重要讲话。他说：“几年来有一种做法，别人的话说出来，就给套框子，抓辫子，挖根子，戴帽子，打棍子。首先是个框子，非要人家这样说这样做不可，不合的就不行。……感谢上海的同志，你们建议我看《达吉和她的父亲》，我看了，小说和电影都看了，这是一个好作品。可是有一个框子定在那里，小说上写到汉族老人找到女儿要回女儿，便说这是‘人性论’。赵丹同志和黄宗英同志看电影流了泪，我昨天看电影也几乎流泪，但没有流下来。为什么没有流下来呢？因为导演的手法使你想哭而哭不出来，把你的感情限制住了。例如女儿要离开彝族老汉时，我们激动得要哭，而银幕上的人却别转身子，用手蒙住脸，不让观众看到她在流泪。思想上的束缚到了这种程度，我们要哭了，他却不让我们哭出来，无产阶级感情也不是这样的嘛！

① 曲六乙：《驳〈上党戏《三关排宴》的导演处理〉一文的人性论》载《山西戏剧》1961年第1期

听说导演提心吊胆，直到有的同志说了好；他才放下心来。导演在那个地方不敢放开手。……”①

也许正是这番讲话，才使赵树理的改编本得以通过，发表在《电影文学》九月号上。后来剧团拍完电影，路过北京时，在国务院小礼堂专场演出《三关排宴》，周总理，朱德委员长和李先念、乌兰夫、罗瑞卿副总理、包尔汉副委员长等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亲临观看，并合影留念。

在改编过程中，赵树理又来过一次“别扭劲儿”。他给桃花公主写了两句台词：“你好比糖糕撒上胡椒面，辣不辣来甜不甜”，以表达她对杨四郎的矛盾心情。当时有许多人认为桃花公主说不出这种土里土气的俗话，建议改掉，他却一口拒绝道：“其他句子可以改，唯有这两句不能动。你们可以放上注解，说是赵树理加的。”据说，戏排出上演时，这两句唱词很叫座，后来竟成了群众的口头禅。但是，这广为流传的现象，其实恰恰说明了这两句唱词不合“公主”的身份。

同时，改编本也多少犯了点反历史主义的毛病。赵树理让佘太君在“排宴”之后就退入后帐休息，避开了她和叛子以及说情者的正面冲突，这样的安排实属败笔，使这位老英雄的戏未能做足。更糟糕的是，随后又让杨排风出场，长篇大论地痛斥四郎，骂得他无地自容，一死方休。在封建社会的赫赫高门中，一个婢女，纵然是贴心丫头，竟敢当面责骂主人，把他逼死，实在是难以令人置信的。

一九六二年一月二十一日，赵树理的老母王金莲，在尉

① 周恩来：《在文艺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

迟村与世长逝，享年七十六岁。

赵树理料理丧事，一切从简，心情也并不十分悲伤，因为他这次回乡，看到大灾之后的农村正在渐渐地恢复元气。

半年之前，中共中央下达了《农业六十条》，规定公社实行三级所有，队（小队）为基础，允许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彻底纠正“一平二调”的错误，……这一系列的措施，有不少恰与赵树理在一九五九年提出的“我见”相符，欣慰之情自不待言。他还看到，尽管“前二年的灾荒，不论是地域之广，时间之久，都超过了近百年来那两次最大灾荒的程度”，但“低潮是过去了，‘五风’的十二级台风是过去了，只剩点风尾巴。”坚强的太行人民终于挺过来了，又在正确的政策鼓舞下，夺得了一九六一年的丰收，尉迟村大队产粮十二万斤，棉花二万斤，收成超过了一九五八年。

山区的农民是热情的，乐天的，好客的，年成一有转机，便又张罗着请客演戏了。潘永福的老家嘉峰村，在每年端阳节都要赶一次庙会，并要演戏祀神——祀的是五瘟神。今年的端阳节，赵树理刚好在家，便也跟大家挤在一起，坐在半块砖头上看了两天戏。可他过后记得最清楚的，却是吃饭的情景。

“当天下午的一场戏结束之后，好多亲友要邀我到家里吃饭。”赵树理写道，“只是吃饭的机会太多了也变成一种负担——每吃一次，起码吃一碗，东一碗，西一碗，跑过几家之后，再吃就只能举行个吃饭仪式了。这一天的饭以饸饹最多，饸饹之外又佐以油条。这油条大米都是亲戚来时拿的礼物。最后我在一家，因为吃得过饱，竟连仪式也不能举行了。主人

仍然以为我是客气，便指着灶边的一口锅说：‘不要客气，你看还剩下多少？’主人怀疑是客气也不无根据：前二年，我也都在故乡住过几天，那时候每逢要到亲戚朋友家里去，在吃饭方面，是抱有这种戒心的。不过自从去年秋后，我就安心了，因为我看到了当时的收成已经比前二年好得多。”

但是，这次下乡并非时时愉快的。赵树理隐隐约约地感到，他和农民似乎不象以前那样心心相印了。过去，队长们见到他无话不谈，现在却老是吞吞吐吐，欲言又止，只围着他问的意思转圈圈，照道爬，打折扣，连队里的帐目也想方设法不让他看。这使他十分苦恼。我为你们恨不得把心也掏出来，可你们还避忌我！后来他才知道，这不是冲他而来的，而是怕上级报复、受治。他说：“我的脾气急，性情直来直去，知道后就向上级党委反映，提供基层情况。后来人家发现了我这个秘密，就没人给我说实话了，他们怕报复、受治。”

其实，这种现象遍及当时的中国，一九六二年一、二月间，党中央召开了七千人大会。这是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初步总结了“大跃进”的经验教训，难得地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毛主席在会上一再强调，要发扬民主，要讲老实话，要鼓励人们敢于说心里话。指出：“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说，都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要真正把问题敞开，让群众讲话，那怕是骂自己的话，也要让人家讲。”会议前后，党中央一面采取了一系列果断的战略措施，一面着手为“反右倾”运动中遭到错误批判的同志甄别平反。

为了贯彻这次会议的精神，纠正前一时期创作中“左”的

偏向，调整党的文艺政策，我国文艺界在这一年中先后召开了两次著名的会议。一次是“广州会议”。三月间，文化部和全国剧协在广州召开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周恩来、陈毅专程赴会，就知识分子问题和艺术创作问题发表重要讲话，对整个文艺界、知识界发生了极大影响。另一次便是与赵树理有密切关系的“大连会议”——中国作协于八月间在大连召开的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座谈会。

这是一次准备已久的大会。据邵荃麟的女儿回忆：“六十年代初，一些描写农村题材的作家勇敢地揭露了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等错误思潮对国民经济的严重破坏，赵树理同志的小说《实干家潘永福》便是以实干来对抗浮夸的。这遭到了舆论界的非议，有人又挥起大棒了。这种极左思潮一方面使革命文艺的现实主义传统受到破坏，助长了在文艺作品中说大话、说假话、说空话的倾向，另一方面使一些有深厚生活基础的作家面对现实感到苦闷，感到气愤，创作数量一度明显减少”。——当赵树理完成新作《张来兴》时，这位举世闻名的作家竟在小说的末尾注上：“一九六二年五月，为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周年试笔”。

“我父亲清醒地意识到这种尖锐的矛盾”，邵小琴继续写道：“他看到再不纠正这种文艺界的左倾思潮，文艺创作的路子将越走越窄，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基础将彻底被破坏，文艺园地必将百花凋零。对于这一切他是有着切肤之痛的。他着手组织全体创研室的同志深入农村，深入基层，认真调查研究关于农村短篇小说创作的问题，探讨究竟怎样才能真实地反映农村复杂的现实斗争，反映大量存在的人民内部矛盾。

“经过多少个不眠之夜，费尽多少心血，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会议，终于在一九六二年八月在大连召开了。因为茅盾同志在那儿休养，我父亲特地选定了这个地方”。①

参加座谈的是八个省市十六位作家评论家，其中有赵树理、周立波、康濯、李准、西戎、李束为、李满天、马加、韶华、方冰、刘澍德、侯金镜、陈笑雨、胡采等人。

会议开始时，首先讨论农村形势。赵树理心情舒畅，侃侃而谈。他说：

“农民入了社，本来俊妇女婚姻美满嫁了个好丈夫，可是一瞎指挥，这个丈夫又变成了旧社会从没见过面的生人丑汉，只得好赖过下去。对浮夸，我真恨死了，我能写上十来八万字”。

他认为：“现在的农民有些空虚思想，对自己的前途看不大清楚，我们做思想工作的也讲不清楚。农民不是光要几个政治口号，他是希望具体化的。在个体生产时，他和富人比，说某人过去是个小中农，后来发了财，起了家；某人省吃俭用，每年买五六亩地，二十年来买了几顷地。这些他都很清楚。他想向他们学。某人倒了霉的，他也知道，但他不管，眼睛只看着那没倒运发了财的，反正谁强谁就挤过谁。他们的思想在肚皮里，一肚皮发财，一路上倒霉。土改后他们思想上很明确：分了土地能发家。合作化就不太明确了，地入了社怎么办？又不准买卖。什么现代化等等，他不清楚，他只

① 邵小琴：《辛勤奋斗的一生—— 追念我的父亲邵荃麟》，载《新文学史料》1983年第2期。

看见自己的村子，自己的家。所以，农民的前途观缺乏具体化；我们做思想工作的，讲抽象的也讲不清楚，更别说具体的了。过去，为了买地，可以几年十几年穿一件衣服，结一根腰带，干活还很卖劲；现在能用什么办法进行教育，使他们直接和生产的劲儿结合起来呢？总觉得缺少具体的东西。

“物质保证没有，只凭思想教育是不行的。辛辛苦苦一年，过年过不成，那是说不过去的，你真是实实在在地搞，有东西在那里，他看得见，他挨点饿也甘心，否则他就没意思。”

他的发言，尤其是他的创作，赢得了与会作家的同声肯定。岁月流逝，历史无情，时间终于让藏在深处的珠宝闪烁出耀眼的光芒。实践证明了赵树理的正确性，实践使人们重新认识了赵树理。

主持会议的邵荃麟，代表中国作协党组宣布，一九五九年对赵树理的批判是完全错误的，予以彻底平反。他说：“赵树理同志对农村的情况很熟悉，他写的文章，对农村问题讲的一些意见，都是正确的，我们对他的批评是错误的，主观主义的，全部搞错了。”

“这个会上，对赵树理同志谈得很多，有人认为前两年对他评价低了，这次要给他以翻案。为什么赞扬老赵，因为他写了长期性，艰苦性。现在看来，他是看得更深刻些。这是现实主义的胜利。”

他又说：“我们的社会独立思考往往被忽略，作家当然应该了解政策，但应该通过自己的思考去了解、认识，赵树理同志对生活的理解、独立思考能力强。”

周扬也出席了会议，他象十五年前那样，给赵树理以崇

高的评价：

中国作家中真正熟悉农民、熟悉农村的，没有一个能超过赵树理。他对农村有自己的见解，敢于坚持，你贴大字报也不动摇。

“大连会议”是继一九四七年晋冀鲁豫边区文联座谈会之后，对赵树理的一次再认识。他被誉为描写农村的“铁笔”、“圣手”。

卷　五

在劫难逃

(1963—1970)

亦余心之所善兮，
虽九死其犹未悔。
——屈原

第十六章 中间人物

八月的大连，气候宜人，风景佳丽，正是避暑的胜地。翡翠般的海面上，被海风照出几条白色的细浪，很有节奏地亲吻着著名的老虎滩，浴场上的男男女女，或支着五彩斑斓的太阳伞，或穿着色泽绚丽的游泳衣，密密麻麻地点缀在沙滩上，不时发出欢乐的笑声。……

邵荃麟一向多病，身体瘦弱，面容清癯。这时，他却顾不得去享受一下大自然的恩赐，正用那轻细但又坚定的语音，向与会作家们发表关于人物创造的卓见。他说：

“强调先进人物、英雄人物是应该的，英雄人物是反映我们时代的精神的，但整个说来，反映中间状态的人物比较少。两头小中间大，好的坏的人都比较少，广大的各阶层是中间的，描写他们是很重要的，矛盾往往集中在这些人身上。我觉得梁三老汉比梁生宝写得好，亭面糊这个人物给我印象很深。他们肯定是会进步的，但又是旧的东西（这种人物在性格上是有发展的）。毛主席也说，要写各种各样的人物，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这样就更丰满了。

“一个阶级一个典型，这是有害的理论。去年读了《城市姑娘》，觉得不应该这样理解。恩格斯是讲环境和人物的关系，

在一个典型环境中间，有各种各样的性格的人物，在一定环境中，写出各种人物之间的关系。一个阶级一个典型，我们的作家是不会相信这种理论的。但是，这种理论加给创作的压力还是很大的。写英雄人物，谁也没有规定必须写缺点，但有发展过程，在克服困难中发展过来，怎样从艰苦奋斗、复杂斗争中成长起来。《创业史》中梁生宝是最高的典型人物，但我不认为是写得最成功的。梁三老汉、郭振山等也是典型人物。谈《红旗谱》只谈朱老忠，但严志和也是很成功的典型。赵树理《锻炼锻炼》小腿疼受到责难，作家对简单化、教条主义、机械论应顶风，打破这些理论。提高、拔高的问题，也是从一个阶级一个典型来的，‘拔高’就是拔到他们订下的标准。

“茅公提出‘两头小、中间大’，英雄人物与落后人物是两头，中间状态的人物是大多数，文艺主要教育的对象是中间人物，写英雄人物是树立典范，但也应该写中间状态的人物。”

当周扬传达了中央最近会议的情况后，他又愉快地说道：“那天会后，赵树理很兴奋，道路找到了。”

这两人都不曾料到，“左倾错误在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上并未得到彻底纠正，而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还有发展。”[①]当然更不会想到，“大连会议”和上述言论将给他俩带来深重的灾难。

八月十六日，大连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圆满结

① 《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束。

九月二十四日，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在京开幕。

在这次全会上，“毛泽东同志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发展了他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以后提出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观点，进一步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①

在这次大会上，毛泽东同志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接着，一起史无前例的大冤案，在野心家康生的导演下发生了。他诬陷长篇小说《刘志丹》是“为高岗翻案的大毒草”，遂使上万名无辜的同志受到株连，许多人被迫害致死。

从此，文艺领域就成了林彪、江青、康生等党内一伙野心家、阴谋家进行篡党夺权的突破口，险象环生，恶浪迭起。

但在赵树理的头脑中，阶级斗争这根弦好象从来就没有拧紧过。早在五十年代，有人批评《三里湾》不写地主破坏，忽略了敌我矛盾，他就老实不客气地说：就是没有发现嘛！

平时，他连“成份论”也十分反感，曾风趣地对人说：“现在地主的孩子和我们贫农的孩子结婚，我们贫农的孩子不干，他们只好去找地主的孩子结婚，结婚以后生的孩子就是

① 《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小地主’，这样世世代代传下去，岂不都成了‘小地主’啦！”逗得在场的人们哈哈大笑。

这位彻底的现实主义者是决不盲从的，哪怕是党的领袖人物的号召，他也要经过自己的独立思考。他过去说过，农村的问题虽然千头万绪，总不外“个体与集体”、“集体与国家”这两类矛盾，现在依旧认为：“农村的矛盾仍以国家与集体的矛盾以及投机与‘灭机’的两条道路斗争为主”。所谓“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他做不到，也不想做。他觉得阶级斗争学说不符合生活现实，因而也就不把它放在心上，更想不到在不久的将来，自己正是个“阶级敌人”、“专政对象”。

十月下旬，赵树理前往广西壮族自治区参观访问。同行的有著名翻译家曹靖华、诗人汪静之、音乐家马可、瞿希贤和电影戏剧家章泯、凤子等人。

这次旅行，似乎是“大连会议”促成的。他在会上谈到：“过去同志们对我提意见，常说我钻在一点。以前我有个错觉，老以为作家们总是单干户，把单干户看得过死就不好。过去我老跑这个据点，而且比较固执的是，人家说我去的是比较落后的地方，在我看来，实际上是比较进步的。但即便如此，多看看也还是对的。会议以前听人家说在农村有单干户，不大相信。现在看来，应看得全面点。这个局面要打开。不只是山西老陈醋，应换点茅台、大曲。”

这表明赵树理的思想开窍了，比一九六〇年谈“久”时可喜地前进了一大步。他开始意识到，长久地钻在一个角落里，接触面小、视野不广，虽然能加深纵向认识，但是缺乏

横向的比较，经验狭隘，很难提高对这个据点的批判能力，不易发现新事物或新问题，这就势必影响创作的深度和广度。

广西有甲天下的桂林山水和胜过桂林的阳朔山水，自然是他们的必游之地。他们在桂林登叠彩山、攀明月峰，凌空俯瞰，桂林市果然是“江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真可比为浣沙归来的西施。然后他们坐在游艇上，顺漓江到阳朔去。漓江之水，清澈见底，那倒影在水中的亭亭群峰，据说比岸上的真山更为清晰、更为多姿。可是赵树理却木然地坐在船尾，双眼微眯，凝神远望，好象在思索这“七山二水一分田”的广西农民是怎样进行耕种的—— 有个记者摄下了这个镜头，把它发表在《广西日报》上。

入夜，游艇停泊在“阳朔山水在兴坪”的兴坪。不知是出于有意安排还是偶然的巧遇，他们看到了漓江夜渔的壮观奇景：上有闪闪繁星、下有点点火把，几十只渔舟来回游弋，成群的鹭鸶忽隐忽现、吞吐活鱼，渔民们的吆喝，在黑黝黝的江面山谷中回荡，使寂静的星夜显得愈益神秘。……

他们的足迹，还遍及南宁、凭祥、龙州、百色、东兰、靖江等地，访问了右江老革命根据地和韦拔群的故乡，尝到了自己从泉眼里钻出来的“没六鱼 （这种鱼小的不出来，超过六斤的出不来）……收获甚丰，观感颇多。但赵树理一如既往，只字不写，却应邀向广西的文艺界人士连着讲了四次创作谈。

此前不久，他在大连和北京也分别就创作问题讲了话。在短短三个月的时间内作了六次报告，在他的生活中是前所未见的，看来，这也是“大连会议”的余热所致。

这几次讲话的内容大同小异，基本上道尽了他的创作经验——赵树理的创作谈大同小异，采取的方式也大多是即兴式的座谈或漫谈，风趣形象有余，逻辑条理不足——其中最有特色的，是关于文学与生活的关系：作家要做生活的主人，“主人感愈强，生活就愈充实，主人感愈弱，生活就愈游离。”这是他的现实主义创作论的核心。

一方面，赵树理认为作家应抱着主人翁的态度和责任来要求自己。他说：

“我们的生活中有种种东西，进展与挫折，成就与缺点，令人愉快的和不愉快的，作家要表现生活，首先要看这对革命事业、对人民有利还是有害，下笔要讲究分寸。十九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与当时的社会是对立的，他们可以不顾一切地刻绘。但我们今天不同。我们的作家要对向上的、向幸福方向发展的社会负责，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咱的江山，咱的社稷，’遇上了尚未达到理想的事物，只许打积极改进的主意，不许乱踢摊子！”

这就是他的“问题小说”何以能成为反映人民内部矛盾的典范的根本原因。问题提得很尖锐，下笔却有分寸感，目的是为了解决，所以常用“大团圆”结局，邪不压正，明朗隽永。

另一方面，赵树理主张作家要抱着主人翁的态度去熟悉生活、接触人物。他说：

“在一切事物中，作家要抱着主人的态度去接触各种各样的人。在生活、工作中碰来碰去，你就会觉得哪个人好‘共事’，哪个人别扭；你喜欢哪些人，厌恶哪些人；哪些人该批

评，哪些人该表扬，这就提供你写作的素材。

“你和人们‘共事’了几年，你不想了解他们也不行，日久天长，你听见脚步声，就会知道那是谁从你门口走过，这说明你了解了这个人性格上独特的规律、代表性的动作和代表性的语言。这一点要抓住。在太行的时候，我们《新华日报》的同志到大伙房里去打饭，就把煤油桶切成两半来用。同志们都知道我爱做改油桶这个琐事。有一次，有两个同志想做个打饭桶，就故意不找我，叫个小孩去做，我见小孩子剪不齐，掌握不了尺寸，我就拿过来剪了，弄来弄去，最后这个桶子还是我做了。这时候，那两个同志就嘀嘀咕咕地笑了，我问他们笑什么？他们说：‘我们就知道这个小铁桶非你做不可。’这说明他们掌握了我性格上的规律”。

其实，这是赵树理的长处，也是他的短处。他只强调“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却不注意“出乎其外，方能观之”。结果，他虽然极其熟悉中国的农村和农民，在这一生活领域积累了丰富的知识，许多人物烂熟于心，听凭调遣；但对五花八门的社会生活则缺少整体的、全面的认识，只能处于略胜农民一筹的高度与视角上来体察生活，这就使他所掌握的生活素材的广度，同被他体会到的东西的深度不成比例。小说的题材大都值得思考偏偏又缺乏思考，仅仅以解决问题为满足。他的作品很少博大精深的思想容量，也没有超群不凡的典型人物。展现在读者眼前的，是一幅幅平淡无奇而又生动真实的农村生活画面，一个个琐碎烦人而又亟待解决的实际困难问题。它们常常使“富有教养”的艺术家微笑摇头，被精于鉴赏的审美家视为“小儿科”，很难在他们的心头激起深

永的兴趣。好在赵树理说得分明，他是写给文化水平低下的农村读者看的。

十一月十八日，赵树理与曹靖华受全国文联之托，结伴由广西转赴长沙，参加湖南省第三次文代大会。

会议期间，赵树理应邀欣赏了湖南花鼓戏剧院演出的《三里湾》。

在众多的改编《三里湾》的戏曲中，花鼓戏是佼佼者。粤剧名角红线女曾发表观感道："我深深地感到满意，同时，也受到很大的启发。过去我老是认为现实题材与古典艺术的结合，是很困难的。可是，看了花鼓戏的演出，把我过去的顾虑打消了。除了可以看到美妙的舞蹈，还可以使我们嗅到浓厚的生活气息。"①

赵树理也颇有同感。演出后，他与部分戏剧界代表和主要演员举行座谈，笑着称赞道："戏里的人物基本上对头的多。范登高的风度，摆老资格的架子，表现得很好。糊涂涂说话就是那么酸酸的，一看就象农村里勉强装糊涂的那种富裕中农。常有理也是这么个味，我想象的是那么些形象，扮相是那么些扮相，风度是那么些风度，有些地方经过演出，立体化了，比我写的活泼得多。满喜也符合我想象的人物，跳跳蹦蹦，非常调皮，是个正面人物。玉梅一出场，就感觉写小说时想到的是这么个人物，很自然，两个形象碰了头。"

在谈到人物处理时，这位大作家还自我批评道："范登高

① 红线女：《我喜爱〈三里湾〉——看湖南花鼓戏剧团演出》，载1958年5月16日《羊城晚报》。

的转变，小说里没有解决，他变是变了，会上大家说服了他，他在发言时还说要带头，有些丑表功，那个转变不是怎么好。”关于灵芝给有翼送糖的细节，“原作也有毛病，希望同志们给改一下，不要让人认为灵芝有些刻薄。”

他的老友康濯，适从河北调回湖南，担任省文联副主席，他陪同赵树理观看了花鼓戏。座谈会后，赵树理对他说：“你这算是落叶归根，回家乡了！不过，正象刚才看的湖南乡土气很浓的《三里湾》是我根本写不出来的一样，你写惯了北方，再要写南方的话，怕还得到生活中去滚滚呢！当然，这你会比较容易些，到底总是自己的家乡熟土，自己的根基所在。”

康濯觉得，这段话“恰恰深刻地说明了他自己毕生的经验。他正是因为富有至为深厚的生活根基和扎扎实实的革命现实主义魅力，从而才赢得了国内外读者的真挚喜爱。”①

在湘期间，赵树理还专程去韶山瞻仰毛主席故居，又参观了长沙清水塘和湖南一师，自然也游览了岳麓山、爱晚亭和桔子洲头。其时正值寒秋，他站在桔子洲头，只见湘江从天地间浩浩荡荡奔流而来，至此分为二水，向北流去，两岸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江上千帆倒影，波光粼粼，令人心旷神怡，仿佛要化入水天中去。

不过，他在这里也遇到一件很不愉快的事情。有一天，他忽然接到公安局的电话，说是一个在押的青年要见他，一问名字，果真认识，吃惊之余，便把他叫了来。

① 康濯：《根深土厚—— 忆赵树理同志》

赵树理下乡时，常有文艺爱好者来访，拿着快板、演唱、相声之类的小玩意向这个大作家请教。他是来者不拒，再忙也要在当晚给他们一字一句地修改。别人劝他珍惜自己的时间，他却说："我们搞创作是宣传，做这事也是宣传呀！你帮一个，我帮一个，这样慢慢地都有提高，一个一个越来越多，不比咱们创作还有力量？"

但当那些青年想借他之力发表作品时，那就不那么好说话了。他总是耐心地打比喻、作解释，帮助他们端正态度。他常说："我们写作品，好比蚕吐丝。以养蚕来说吧，蚕娃单吃桑叶还很不够，它一生还得四次投眠。每次投眠得十来天，其中有三四天静卧不吃东西。它每眠一次身躯就猛涨一次，四次投眠后，蚕的身躯就长大了。直到它的圪芦（头部与躯干之间）透明发黄，那就是蚕老了（成熟了），才能提上结茧架。蚕不老，你硬把它提上结茧架，顶多给你结个鼻涕茧。这种茧跟鼻涕一样软，根本不能抽丝。那蚕娃饱餐桑叶，就跟咱们体验生活、收集素材一样，蚕每次投眠，也跟咱们修改提高文章一样。不过文章有的不止修改四次，而会更多次，直到结出硬棒茧、抽出金丝绵就好了，可不敢弄出个鼻涕茧。再说，创作是无私的，不要老想着个人的名利……"

这个被扣的青年，便是常来请教者之一。他小有文才，又善于"看客下菜、看风驶船，"在赵树理跟前极尽谦恭之能事，见面必行九十度鞠躬礼，居然骗得信任，拜为门生，在创作上受惠不浅。但因品质不好，动机不纯，企图一鸣惊人，终于是一事无成。岂知他竟弃文从商，一变成为投机倒把分子。这次，他从山西装了两车皮党参来长沙高价出售，却被公安

局查获，正急得走投无路，忽听说赵树理在此，所以紧忙要求相见，求他出面去说情保释。

赵树理说："我怎么救你呢？我主观上一向以为你在我这虽接受的是无产阶级教育，可是实际上你成了个党参贩子。作为你的老师，我没有尽到我的责任——没有把你的真实思想研究清楚来作针对性的教育，却长期被你的假进步，假积极所蒙蔽，结果害了你！"

多年来，赵树理一直用忧虑的眼光注视着农村知识青年的动向，为他们鄙弃农业、向往城市、追求名利而着急、愤慨。然而，尽管他就夏可为的来信写了言辞激烈的文章，许多未谙世事的小伙子还是不断地对他说："我非常想当一个伟大的作家。"为此，他在上月发表了短篇小说《互作鉴定》，里面描写一个回乡务农的初中生刘正，他虽然揭露了这类青年"自命不凡、坐卧不安、脚不落地、心想上天"的思想问题，却由于看不到它的社会根源而未能开出救治药方。这是一篇失败的"问题小说"。

现在，他那个高足的堕落，使赵树理自己也痛感到，象这种不咸不淡的劝谕是无济于事的，再加他思想上也确实认定，农村的严重问题是投机与"灭机"的矛盾，于是，一篇以这个党参贩子为素材的小说在他的心中孕育起来了。

从一九六三年始，文艺界的火药味日益浓重了。元旦那天，柯庆施在上海提出"写十三年"的号召，周总理则正确地指出："十三年要写，一〇八年也要写。"于是在四月召开的"新侨会议"上，爆发了一场以此为焦点的激烈争论，张春桥和姚文元气急败坏，竭力反攻，与会者都有一种"山雨

欲来风满楼”之感。

赵树理对于文艺界的风云，反应似乎向来迟钝，没有迹象表明他参加过哪次运动。入春以来，他保持着去年的良好情绪，因为“各方面都在大力支援农业，我们文艺界也发起了一个面向农村的运动”。

在这年的《文艺报》第二期上，刊登了《记一次“关于小说在农村”的调查》。其中谈到：“赵树理同志的具有深厚的现实生活基础的小说，一直受到农村中广泛的欢迎，他的较早的作品，如《李有才板话》、《小二黑结婚》以及前几年写的《三里湾》，在农村中影响都很大，可以说历久不衰。特别是象《小二黑结婚》，曾经改编成戏曲演出，更是家喻户晓。”其余的如《登记》、《锻炼锻炼》，“都为不少社员所熟悉。不久前的《互作鉴定》，在一部分青年社员中也获得好评，他们认为问题提得及时，有很大的现实意义，启发人思考”。

这是中国作协创研室对河北保定地区的三个县进行调查研究后的结论。

三月二十五日，中国作协书记处决定成立农村文艺读物委员会，成员有赵树理、周立波、侯金镜、韦君宜等人。这天，《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文化艺术工作要更好地为农民服务》的社论。《文艺报》第三期也发表社论《文艺面向农民，巩固和扩大社会主义新文艺在农村的阵地》。

党的号召提醒了赵树理。他着手把建国以来的创作编成一册，准备送到农村去。五月间，他怀着赤诚之心给农村的读者同志们写了一封公开信：

“这本小书是专给你们印的，所以叫做《下乡集》。一共

八篇——除了《实干家潘永福》是真人真事的传记外，其余七篇都是小说。趁着打发这本小书下乡的时候，我想和未来的读者说几句话，提个要求。

“我是农村出身，是在华北的太行山区长大的。我每逢写作的时候。总不会忘记我的作品是写给农村的读者读的；在全国解放以前，常常能直接听到农村读者的议论。可是在全国解放以后，我的作品的主要读者不全是太行山的人了；在全国看来，我们的农村人口要占到五亿以上；每一本书的印发数量都无法满足你们那个象大海一样的要求，而你们又都分别住遍我们国界以内的任何地方，风俗语言各不相同，因此尽管我主观上是为你们写的东西，实际上能发行到农村多少份，你们哪些地方的人们愿意读，读过以后觉得怎么样，我就知道得不多了。

“现在，我这本小书要和你们广大的读者同志们见面，这样便给了我一个向你们征求意见的机会，请同志们读过之后，提醒我哪些部分和你们自己的看法一致，哪些和实际不符还须要重新了解，再作修改的打算。……”

大约在他写信的前后，从山西来了位客人。“我受《火花》文学月刊编辑部的委派，请他对刊物上正在开展的笔谈讨论写篇带总结性的文章。”这位客人回忆道，“当时讨论的题目是：文学的‘群众化’和‘通俗化’问题。讨论一经展开，来稿来信甚多，有人认为过多地强调形式上的‘两化’并不重要，只要内容是为人民所可接受的，就应当提倡和欢迎，

等等。我带了包括这方面论点的信稿打印材料，到了北京。”①

这个要求真可谓投其所好，赵树理一口应承了。

关于普及与提高的关系问题，赵树理自有一套坚定不移的独到见解。他认为，今天的中国人民在艺术欣赏习惯上，存在着两种感情体系，两种艺术境界。“戏台上挂上桌裙，搭上椅披，书场上摆开了鼓板，弦师寅起弦来，玩高跷、竹马的打开了场，广大的群众便立刻进入了艺术境界，而接受过新文艺传统的人往往不能承认这些里边有什么真正的艺术。钢琴揭开盖了，合唱队站齐了，朗诵者拿出稿子来了，新文艺爱好者便立刻进入了艺术境界，而没有接近过这种传统的群众，往往一边听着，一边瞪着眼找不到有何妙处。”

赵树理断言：“上述的这两种艺术传统中培养出来的人，在艺术兴趣上往往是互不相入的！”那么，应当从哪个基础上来提高呢？他主张后者应向前者学习，“深入体会群众的文学艺术兴趣，然后从这个基础上运用自己的艺术本领，为群众造出既合口味又有进步意义的艺术品。这种艺术品才是高级的，但同时也可以普及。我以为这正符合毛主席所讲的普及与提高的关系。”

看来，赵树理好象忘了新文艺爱好者也是人民大众，他们也需要为他们所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况且，随着时代的发展，人民大众的精神需要也比解放区时期远为多样化了，文学艺术必须锦上添花，百花齐放，而不能单从民间文艺的基

① 阿农：《大师的风度——怀念赵树理同志》，载《钟山》1981年第1期。

础上普及提高。

至于文学创作，赵树理干脆认定关键就在语言文字。他曾愤愤地对记者说："作品写给工人看，工人看不懂，写给农民看，农民看不懂，这是失败。有些工农出身的人把自己的语言抛弃，学知识分子腔，这样，知识分子多了一个不算好的朋友，劳动人民却少了一个知音。群众对这当然是要批评的，那就是不看你的作品。但有些人却说，劳动人民没有文化，等他们提高了再看。其实，这是任务不明，对象不清的说法。提高应该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不了解基础，不研究基础，如何来提高呢？我觉得要提高，就得首先了解和研究普及这个基础，而这首先应该到群众生活中去，逐步发现他们在文艺方面的传统。"

后来，"在大连会议"上，他终于认识到这是一种偏颇之见。他说："很多同志发言，对我很有启发。主席《讲话》发表二十年了，我一方面没有写文章，一方面感到阵地还没有完全占领。为工农兵及其干部的作品倒有，但为工农兵为得怎样？以前我仅看成文字语言问题不能服人，实际上涉及到写人物。"但是，他紧接着又说："我们提高的东西是不是放在普及之上？前十年我这样喊了，后来再喊就已引起有的人的讨厌。……艺术形式上我究竟走哪边，我还打不定主意。我要写的《户》，恐怕还并不是给群众看的。另方面大胆提倡评话，在文艺界恐怕要吵一阵子才行。……到群众中去，说不是我们的事，确实难说。我一人孤军作战实在不行，我的年龄也不行，过去还能叫喊一下，今年五十六岁，再过十年实在是不是还叫得出来，也不一定。"

这表明，赵树理作为农民的艺术代言人，是坚持要把民间文艺当作发展当代文学的“正统”。在这一点，他鼓足了“别扭劲儿。”而且的确是执着得“死不悔改”。在他那绝笔性质的《回忆历史。认识自己》一文中，他仍然认为，文艺界多数人主张的以新文艺传统为主的观点，“不合毛主席所说的从普及基础上求提高，在提高指导下去普及的道理。……按这个正统所要求的东西，根本要把现在尚无文化或文化不高的大部分群众拒在接受圈子之外的。而以民间传统为主则无上述之弊”。

他用这个坚定不移的观点，于年底写成了《“起码“与“高深”》一文，送交《火花》编辑部，算是了却一桩心事，准备安然过年了。编辑部的同志也为能得到他的好文章而感到欣喜。大家都万万没有料到—— 包括作者自己—— 这篇文章竟是一颗定时炸弹。为时不久，华北局就转发中央有关方面的指令，责成山西省委追查《火花》所发的赵树理的反动文章，因为里面有这样一段话：

> 最后我想谈谈该文作者以毛主席作挡箭牌这种战术的要不得。该文引了毛主席两句旧词之后接着写道：“……也只有读这样的作品才能收益更大”，才能真正地在“潜移默化中受到影响，得到教育。”这无异于说“毛主席坐了火车出去，就证明汽车坐不得；毛主席爱吃大米就证明别的粮食没有养料”。该文在一开始，把“百花齐放”写了若干遍，而后来竟又说起“只有”读什么什么“才能”如何如何来。能自圆其说吗？人各有其文化生活，在业余时间里，写写旧诗词也和拉拉小提琴，下下象棋一样。毛主席写旧诗词完全是他自己文化生活范围内的事，……

“在当时的情况下，这还了得吗？”那个前去约稿的同志追悔莫及地说，“这可触犯禁区，闯下十恶不赦的滔天大罪了，编辑部的同志和文联的领导，大家都神色慌促，急得搓手顿足，不知如何是好，人人都在自责自己的糊涂：这么明显的‘反动’言论，怎么会没有把住关、没有看得出来呢？于是大会检讨，小会追查，责任自然就不可免的了。身在北京的赵树理，不用说其罪责更难逃脱。”

在十年浩劫之初，有人就据此给赵树理定了个“狂妄诋毁毛主席的诗词和攻击伟大领袖本人”的大罪，又说：“《起码与高深》一文，公然把矛头指向毛泽东文艺思想，恶毒地贬低《讲话》的伟大意义，胡说文艺的民族化群众化在明清两代就有了’毛主席不过是‘及时的提倡’了一下而已。……请看，赵树理对于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诗词，怀着多么大的仇恨！”

接着，与这篇文章同时写就的小说《卖烟叶》，又被判定是“写中间人物”的标本而遭到口诛笔伐，真是运交华盖、祸不单行。

这篇孕育了一年的《卖烟叶》，发表在一九六四年初的《人民文学》上。它是赵树理的最后一篇小说，也是继《互作鉴定》之后的又一篇反映农村知识青年的小说，“写一个投机青年的卑污行为”。主角贾鸿年的模特儿，便是在长沙不期而遇的党参贩子，同时，作者又虚构了一个正面人物王兰，以便可以运用他最拿手的对比手法，并用他俩的爱情纠葛来结构故事，贾鸿年是个“看风驶舵、看客下菜、明似谦恭、实

则傲慢”的伪君子，而同班同学王兰的特点恰好相反，“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心直口快，有甚说甚”。只因都爱文学，才产生了彼此爱慕之意。后来两人分头回乡，但贾鸿年无心务农，一面积极“立业”—— 创作一部二十万字的长篇小说，一面忙着“成家”—— 计划用稿费去购买邻居的房屋来营建新房，结果却是鸡飞蛋打，书稿被出版社退回，王兰也从那计划中看出来他心术不正，幡然醒悟，斩断情丝。可他不思悔改，反去投机倒把，贩卖烟叶，终于触犯法网，落得个可耻的下场。

但是，《卖烟叶》诚如作者自述：“是我写的作品中最坏的一篇。”

对于农村知识青年，赵树理虽然承认：“他们有不产生于农村的普通的科学，文化知识（例如中国、世界、历史、社会、科学等观念），有青年人特有的朝气，很少有、甚而没有一般农民传统的缺点，……对这样的新生力量是应该重视的。”可在现实生活中他对他们却素无好感，尤其是不能容忍他们轻视农业的思想。在《三里湾》中，马有翼不必说了，即使是代表新生力量的范灵芝，他在这一点上也决不宽恕她，却对玉生这样的文盲流露出明显的偏爱，安排她甘拜下风，主动向玉生求婚。

现在，大概是出于对得意门生也去犯法的深恶痛绝，他的态度异常严厉，把一腔痛心疾首之概统统倾泻在贾鸿年身上。但是这些描写，从赵树理最强调的社会效果来看，除了让人认清这个青年的嘴脸之外还有什么呢？在农村知识青年中有没有普遍意义、教育作用呢？或许，作者是要揭示这种

骗子的形成在于家庭教养，贾鸿年秉承了投机商人的门风，可惜这么写其实反而为他不安心农村作了开脱。

王兰的形象更加糟糕，简直可说是赵树理笔下唯一不真实的人物，言谈举止全然不象一个在谈情说爱的知识女性——赵树理可能很少接触这种少女，一点不懂她们的恋爱心理，竟把李成娘处理破布的方法搬过来，让王兰把爱人的信件信物分门别类、编号归档，这是令人不能置信的。而且，作为贾鸿年的对立面，她也未能发挥出对比作用，仔细读来，不仅看不出她有什么值得学习的品质，而且会怀疑她是否“心直口快、有甚说甚”。

因此，小说确如赵树理自己所言，只是写了一个青年的卑污行为，别的再也没有什么，对于投机与“灭机”的矛盾斗争，也不象以往的“问题小说”那样，多少能提出些解决的方法。尔后，赵树理说过：“看来一代人只能反映一代人的生活，年轻人我不能写了。”

但是，作品虽然给人以低沉之感，思想性、战斗性以至艺术性均不如昔，倘若说他在“写中间人物”，则无疑是信口雌黄。

《卖烟叶》发表前后，正是文艺界多事之秋。所谓的“有鬼无害论”、“时代精神汇合论”已在报刊杂志上被大批特批。江青一伙兴风作浪，造谣诬蔑，一会儿痛骂这个戏剧，一会儿枪毙那个电影，并且上窜下跳，拨乱其中，遂使两道令人震惊的批示先后传来。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二日，毛主席在中宣部文艺处编印的一份关于上海举行故事会活动的材料上批示道：“各种艺术

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地抓起来，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这个批示下达后，文化部和文联各协会进行了整风。在整风中，有人提出了许多问题，比如主张文学创作要着重写中间人物等等。于是中宣部根据文联和各协会整风中揭发出来的问题，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但是还未正式报中央以前，一九六四年六月二十七日，毛主席就在这个报告的草稿上作了第二次批示。

> 这些协会和他们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这个批示一下达，文联各协会立刻开始再度整风。人们心惊胆战，越整越乱，极左势力渐占上风。两年前令人振奋的“大连会议”首先遭到全盘否定，邵荃麟的讲话竟被打成

“写中间人物”论和“现实主义深化”论，在会上受到一致肯定的赵树理，则是“写中间人物”的当然代表，证据就是他刚发表的《卖烟叶》。

有人批判道：“我很怀疑这篇小说有半点真实性。在我们的时代里，青年人都是有志气、有抱负的，象贾鸿年这样的即使有也是少数。赵树理在这篇作品中把农村写成一片乌烟瘴气，把青年塑造成投机倒把犯罪分子的典型，使人无法可信，这是赵树理对生活的丑化，对青年的歪曲……”

十月间，这个问题又由内部批判升级为公开点名，《文艺报》编辑部发表长篇大论，把“写中间人物”说成是“资产阶级文学主张”，“用来同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最主要、最中心的任务——创造英雄人物的任务相抗衡”，还耸人听闻地写道：“在他们的心目中，无产阶级的理想人物是并不存在的。他们宁愿把所谓‘中间人物’当做他们的理想人物，实际上是用落后人物的眼光来观察社会生活，用反面人物的心理来看待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斗争，用灰暗的色彩来描画广大群众的精神面貌，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来消磨群众的斗志。如果他们的主张实现了，势必要取消我们文艺的革命灵魂，使得我们社会主义文艺逐步演变为资产阶级的反动文艺。这种文艺只能腐蚀、破坏、瓦解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为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和平演变’服务。问题的严重性就在这里。”

在同时发表的《关于“写中间人物”的材料》中，编辑部又写道：“近几年来，赵树理同志的作品没有能足够饱满的热情描写出革命农民的面貌，邵荃麟同志不但没有正确指出

赵树理同志创作上的这个缺点，反而把这种缺点当作提倡的创作方向加以鼓吹。”受到同样批判的还有康濯，因为他说过：“赵树理的作品和人物，总是使人感到是从深厚的泥土中挖出，并且历经时间磨炼而总是色泽不减；另有些作品读来倒也实在充满激动人心的鼓舞力量，但冷静想想，却感到其中的人物似有点神化，因而慢慢色泽衰减。”

这次批判的真相，十五年后方才大白。一九七九年三月号的《文艺报》，发表了《评大连会议和“中间人物论”》一文，揭露那些材料纯属歪曲捏造，所谓邵荃麟用中间人物来“同革命英雄人物争地盘”的说法，完全是凭空虚构的。他的讲话，根本没有主张“要大量描写中间人物”，“大量”两个字是强加的；也根本没有主张“要集中笔力写中间人物”，“集中笔力”四个字是强加的；更没有说过什么“大家都写英雄人物‘路子就窄了’，要使路子更宽起来，就要‘写中间人物’。”笔者指出：“这些话与荃麟同志是完全不相干的。所以，当年《文艺报》编辑部的批判文章认定的几个对方的基本观点是假想的，是不能成立的，因此后面的一系列批判也就无从谈起了。”

然而首当其冲的受批者，当年的日子可不好过。有人按照历来运动的惯例，不但大批《卖烟叶》，而且对赵树理以往的作品，也根据“中间人物“的框子，抓辫子、挖根子、戴帽子、打棍子。于是，糊涂涂、常有理、铁算盘、惹不起、小腿疼、吃不饱……全被归入”不好不坏、亦好亦坏、中不溜儿的芸芸众生”。

这场斗争，是赵树理始料所不及的。两年来，他在“大

连会议”精神的鼓舞下，到处奔走演讲，一直勤奋写作，所以当批判象惊雷似的打到头上时，他根本不服，又鼓起了“别扭劲儿”拒不认错。他幽默地揶揄道：“真正的中间人物倒有一个，那就是小飞娥”——大约是指她既割不断同保安的情丝，又不愿死心塌地跟随张木匠——当然，这只能招致更加猛烈的攻击，但他却如泰山青松，屹立不动，还当真写了一首《咏松》的旧诗以明心迹：

峻岭苍松古，朝朝映赤霞。
风凄偏见劲，日暖不眩华。
出众还依众，居哪变乐哪。
涛鸣泻似海，晓夜彻天涯。

这首诗极其宝贵，鲜明而深刻地反映了赵树理当时及此后的思想信仰——一九六七年，他在逆境中重写《咏松》，赠给“一月风暴”后靠边的山西省委第一书记。

后来，有几个文学青年拿着自己的新作向赵树理请教。他看后问道：

“你说说，社会上英雄人物多，还是中不溜儿的人物多？”

“当然是英雄人物多！”

“你这后生还年轻，还需要多研究研究社会，分析社会上各种人。再多活上几岁，你所得出的结论也许和现在不一样了。”赵树理说，“其实，很先进与很落后的人，常是少数，居于中游者，倒是多数哩！我们深入生活，碰到落后人落后事，不必大惊小怪。碰到先进人先进事，也不必一见倾心，一听

就信以为真，还须多方了解才好”。

整风以后，一批人披罢了官，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兼副主席邵荃麟，调任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这位优秀的文艺理论批评家，忠诚无私的共产党员，后来又被“四人帮”以“革命”的名义囚禁起来，受到非人的待遇，最后惨死监狱里。

对于赵树理的处分，则是逐出北京，下放山西。

一九六五年二月，全家无心无绪地过了春节，然后在一个阴云密布、雪花乱飞的日子里，赵树理领着老伴孩子，默默地登上了西去的列车，与工作生活了十六年的首都告别了——不，是永别了。

第十七章 “死于《十里店》”

一九六五年二月，赵树理一家来到太原，定居于省文联近旁的南华门十六号。

北京整风，对于赵树理的思想别无影响，唯有在所谓“塑造英雄人物”的问题上，他深刻认识，承认“错误”，“调到山西省文联来便打下了写英雄的决心”。

他自一九五九年受到批评之后，就开始酝酿构思一部八十万字的长篇小说《户》。他认为自古至今，家庭总是中国农村社会的细胞。历史发展的点点轨迹，阶级关系的种种变化，必定会在各家各户的日常生活中反映出来。比如目前，“一个大队的组、户、人，可以说是生产小队下的三级制，而户就是共同生活的小单位，组成社会的细胞。”赵树理说，“一家一户的情况很不同，尤其是历史久、人口多的大家庭，几世同堂到现在的，更为复杂。有经济的牵涉，有思想的分歧，有关系的亲疏，有性格的差异，等等，明争暗斗算小帐。所谓当家人，很不易对付。当老爷爷的多有特权思想；当公婆的有个自我尊严；大媳妇养老拖小有思想包袱；二媳妇不会生育觉得吃亏；三媳妇是个城镇中学生，光会讲道理，不会做饭做衣服；弟兄们童年的感情渐渐淡薄，慢慢地产生了你争

我夺的心思；小孩子吵嘴，带出了爹妈议论对方的话；再加院邻街坊有个坏婆娘从中挑拨离间，幸灾乐祸；守旧派老讲具体事打动不了人心，先进派光讲空话没人相信。这样的家庭斗争会持续不断。但是，一家形形色色的各样人物，在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在大小队的统一领导下，又都受着一定的感召和制约，天天开窗户有新鲜空气流动，夜夜闭门有肮脏空气膨胀，这又是比较相同的一个方面。总之，一家不知一家，和尚不知道家，各家有长有短。就是富裕中农家庭，也有辛勤俭朴的好人。就是贫下中农家庭，也会产生好逸恶劳的蛮横子弟。因为父兄们里里外外都替他干了活计，他闲着没事干，就斜门歪道地去学坏。”所以，现在这部孕育着的《户》，将描写农村中三户典型的家庭—— 贫农、中农、地主—— 以反映人民公社化以后的人事变迁。据说，其中的人物多达一百多个，将有叱咤风云的英雄形象出现。

为了便于“共事”，赵树理素有“县委书记瘾”，可他在“大跃进”时代的所作所为，窗缝里吹喇叭，名声在外，早使山西的县级领导们望而生畏、避之唯恐不及。这时，省里正开模范工作者会议，他在那里遇见了一个老相识、晋城县委书记常三毛。这位书记正在会上树雄心、立壮志，定要在今年走出太行，跨过“黄河”—— 争取全县实现亩产四百斤。

“这一下和我上述的打算碰了头”。赵树理说，“我觉得到晋城有三个方便：第一是有常三毛这位老雇农出身的县级领导，而且过去也曾有一度认识，再深入了解一下，可以作为将来写县级领导的主要资料；第二是个面上先进的地区，将来借作背景写起来开阔；第三是语言、风俗都和自己的家乡

接近，便于接近群众。”他不管人家欢迎不欢迎，就让省委任命他为晋城县委副书记，主管文化宣传工作。

晋城乃古之泽州府城，相传三家分晋，晋公奉祀于此，因而得名。它位于太行山的最南端，距离奔腾的黄河倒真的不太远，但是粮食生产要“跨过去”可不容易。去年开始的“四清”运动打击一大片，使不少好干部无故挨整，形式主义瞎指挥重又抬头。赵树理上任不久，就碰上一件荒唐事：县委决定，要在中耕前的半个月内，全县打三千眼旱井，挖六千个“卧牛坑”(即小型蓄水池)。他这经济头脑积习难改，又在常委会上算起帐来，用事实说明这样的指标不切实际，定得太高。结果，自然是一九五九年的阳城旧戏在晋城重演一遍：他的忠告无人理会，当作干扰，县委照样通过决议，向各社队下达高指标；而他也照样鼓起“别扭劲儿”顶着干，奔来奔去，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量挽救，忙得连下去蹲点体验生活的大事也搁在一边。

在这位作家随身携带的笔记本上，用红笔写着：“干劲要大，步子要稳，永远做冷静的促进派”。其余则全是关于工作和生产的内容：

要落实产量先要落实思想。年轻人没有吃过“五风”之苦，不愿意从客观出发，只强调了主观能动性。

突出政治，落实思想工作，主要环节是抓好主要领导干部思想革命化，要检查革命人生观。

没有理想就没有方向，但一般号召过了头就产生瞎指挥。

会计问题甚多，账不清者甚多。要把有关部门组织起来，逐

队落实兑现。

有盲目自满情绪，对生产自救抓得不紧。

藏粮于民，藏富于民，留有余地，坚决不购过头粮（只要群众知道有余地，就不算隐瞒）。

三年包购任务，今年就算数。

发动职工向家捎款交粮。

组织副业（15—20%）。

注意妇女家庭活。

节约用粮（过年）。

……

七月的一天，赵树理忽然接到专区梆子剧团打来的长途电话，说是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要调看《十里店》，请他务必回来赶排一下。他二话没说，扔下所有工作，火速赶往长治去了。

赵树理与《十里店》的关系，又是说来话长。

继八届十中全会之后，一九六三年五月，毛主席在杭州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提出更加严重的警告：如果忘记了阶级和阶级斗争，“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国家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啊！”会后，中共中央作出“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于是由点及面地在广大农村发展起来。

虽然赵树理从未怀疑过党中央的政策路线会有失误，但

在具体问题上却善于独立思考，不愿随波逐流，轻易苟同——正是这种极可贵的品质，使他成为我国察觉“左”倾错误最早，而且反抗最力的少数人之一——因此，在作协党组学习“前十条”的扩大会议上，他又独唱异调，坚持认为目前农民的主要矛盾仍是国家与集体、投机与“灭机”的矛盾，认为“把任何问题的原因都反映为阶级斗争”乃是扩大化的倾向。又说：“老区的地主富农已经不起多大作用，农村困难的根源不在阶级斗争，而在于干部作风和如何真正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因为据他观察，“属于民主革命运动所产生的基干，到社会主义革命运动时期，不是人人都能跟上来的。在后一革命中，前一革命所涌现出来的基干化为三种思想，一是革命到底派，二是退坡派，三是不愿进步又不愿让权的表面积极派。弄虚作假，瞒上欺下，指手划脚，贪污多占等行为，往往出自第三派人。”

他的独到之见。自然又遭到同志们的批评：思想跟不上形势的发展，认识与党中央很不一致，……

后来，他听了几次大的政治报告及京郊的几个调查报告，看了《夺印》等戏，结果，或许是因为绝对信任党中央和“调查研究”吧，他终于“逐渐认识了地富篡夺领导权的可怕，回到晋东南参加黄碾的四清试点。”

八月初，赵树理来到长治市郊黄碾公社曲里大队。这个村庄得天独厚，位于上党盆地的中心，一马平川，土地肥沃，又开办了砖瓦窑、陶瓷厂，制造久负盛名的长治陶瓷。副业兴旺发达，社员生活富裕，百十来户人家，光自行车就有七、八十辆。这就引来了“四清”工作队，因为根据无产阶级专

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重副轻农，弃农经商，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但赵树理在黄碾公社只待了四十天就退出去了。“原因是所见所闻尽是我不想再要的材料。”一方面，他看到农村根本不存在什么剥削者复辟夺权的严重敌情，自己对农村主要矛盾的看法并没有过时。另一方面，他向来主张“实利主义”，提倡多种经营。凡能使农民致富的一切方法全都赞成，对于副业亦有自己的看法：“大队以副业为纲，小队以菜为纲，是农民抵制高征购的表现，也是生产积极性不高的表现。消灭此种现象之对策，则以每个生产季度开始之前，确定统购任务为有利。”“经济安排得当，才能巩固教育成果。”所以他不但不加制止，反亲自从沁水请来烧窑制陶的老师傅，给队里培养技术人员。并对工作队无限扩大阶级斗争，有意制造紧张空气，搞得人人自危的做法深为不满，曾幽默地说：“瞧咱这村死气沉沉，连鸡叫狗咬都听不到。除了这点，其余都不错。”

不过，在这四十天中，赵树理也耳闻目睹了一些令人气愤的事情。“前几年那里修大桥，铺铁轨堆积的木材、钢材，被不法分子偷去一些。路边开设的店房，也是窝赃的地方。他们自用了一小部分，更多的则是做成木材板、桌、椅、柜、小农具，出售高价坑害人！”赵树理说：“谁见了贼人赃物能不气愤？曲里大队有个老贫农党员，在洗手洗脚时，还交代他去偷过枕木。有的干部、社员偶尔为之，又检查彻底，这是好的。他们和惯偷不同，更不能写进剧本。打击的对象，是不法分子。由他们我想到过去的奸商、管家、工头，对谁都

是认钱不认人，欺下瞒上，投机倒把，贿赂干部，为他服务。对这号东西，我恨之入骨。”久而久之，这号东西就在他的脑海中化为《十里店》中的李天泰、陈焕彩和胡宗文。

他又设想，假如全国劳动模范郭玉恩有个女儿，嫁到黄碾来，那么，面对这种不法分子，她将怎么办呢？一个可能是被此地的思想势力同化了，但更大的可能性则是出现一场激烈的斗争，这就有“戏”可写了。

赵树理所以要作此设想，又是出于他的“别扭劲儿”——不愿走别人的老路，落入“支书不在”或“上级来人”的俗套。同时，还因为他的心中早就孕育着一个女青年的形象了。他曾对人说：“我在乡下，和青年们漫谈新旧婚俗，有个爱说笑的业余演员，突然低头不语，手足无措。第二天我去她家吃派饭，见了我仍是敬而远之。后来团支书道破了她的隐痛：这姑娘大方、正派、精明，是个模范团员。可是她在封建疙瘩们的眼里，就变成低三下四的贱女人了！因她找过一个对象，是个电工。他以这点优越条件，想把人家白白要到手。女家不让姑娘走，她气极之下，去到男家。为这，双方父母吵了几架。有人说：‘先奸后婚，越过越松’的坏话。更恼的是这个电工，软骨头，没正性。在其父母找不着女儿要在他家寻短见时，他供出未婚妻藏在姑母处，还负心地变了当初好意；吹牛说自带粮票的姑娘引到门上，他还得挑挑人样呢！从此两人生分了，气得姑娘病了半月。因这姑娘炎凉际遇，我老是不平。但在我的怀产作品里，好久没给她安个着落。我就想，把她移植成一个山乡的先进女社员，一个劳动英雄的女儿，在结婚前后改造她的落后环境。”可是，他在黄碾公社

找不到郭玉恩女儿式的模特儿，因此待在那里就失去了意义。

这时，恰巧有山东菏泽地区的枣梆剧团（俗称爪子戏）与河北永年县的西调剧团不约而同地来到晋城演出。这两个剧种，据赵树理考证，都是上党梆子的变种，“爪子戏已经变得另一种样子了，河北的西路梆子却还保持着原腔原调。”这个上党戏迷岂肯错过观摩良机，因此就到晋城看望“回娘家”的梆子剧团去了。

在那里，他又向演员们和前来观摩的艺术工作者大谈了一通戏剧在农村文化中举足轻重。他说：“我们说文学可以分为四个方面——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农民懂得诗歌散文不论古今中外都有一定隔阂，小说也接触得少，戏剧这个形式就成为最接近农民的了。尤其咱晋东南的群众，有欣赏戏剧的传统习惯，每年总要看上几次。虽然也有电影，人们看了电影还是要看戏。晋城是个农村小城市，两个剧团演上一个月，还有好多人看。所以说戏剧虽不是唯一的，但也是重要的为农村服务的好形式。我们戏剧界的同志们，对戏剧为农村服务这一重要性应该有足够的认识。从农民要求的角度，从农村主人的身份来要求自己。农民种地打粮食给我们吃，我们给农民演戏。这种主人翁身份就是群众观点。我们应该把自己的工作做好，不要辜负农民对我们的要求。有的村一年只能演一回戏，人们象过节日一样，邀请亲戚朋友来看戏，碾粮食，换新衣，非常隆重地迎接剧团到的来。我们在这短短的三四天中给人家一些什么呢？我们必须慎重地考虑这个问题，也就是向农民群众负责的问题。”

十一月上旬，山西省召开第三次文代会，特请赵树理谈

谈当时最热门的话题——农村中两条道路的斗争。可他一上来就声明道："这个问题是不太好讲的。"接着就又大谈了一通他早已认定的集体与个人，投机与"灭机"的矛盾斗争。他说：

"人不能没有前途观。每个人的前途打算，不在集体就在个人，靠不住集体就靠个人，靠个人，就要发生资本主义。比如一家人有三个孩子，大孩子结婚了，二孩子三孩子也大了，也快要结婚了，但没有房子，如果集体不帮助，个人就要想办法，就要做他的买卖去。又比如一个老年人，要为自己做棺材，如果集体不管，只是为他算工分，算几年后能还清，那么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出问题。不是靠集体，就是靠个人，靠个人解决了，就会造成坏观念。集体解决不了，个人怎么能解决了呢？不是挤掉集体，就是挤了国家的一部分，有占便宜的，就有吃亏的，比如私卖烟叶的问题。……"

会后，他返回北京，在中国作协的一次座谈会上又说道："我没有胆量在创作中更多加一点理想，我还是相信自己的眼睛。"

本来，由于找不到女英雄的模特儿，赵树理已放弃《十里店》的构思，与李凖相约，打算到河南去合写一个别的剧本。可是山西省预定要在八月举行全省现代戏调演，而晋东南专区的几个编剧直到四月份还拿不出一个象样的剧本来。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上上下下都急得要命，忽然听说赵树理去河南路过邯郸，便赶忙派人专程去搬他这个救兵。赵树理盛情难却，才又决定回来完成这最后的创作。

因为连日下雨，派来的小车无法行走，赵树理改乘火车

南下新乡，从焦作、晋城绕道回长治。这次旅行，很有特色。

他离开邯郸市交际处时，服务员把住宿费报销单交给他。他看也不看，就把单据撕掉，揉成一团扔进废纸篓。

在火车站，送行的交际处长要替他去买软席票，他说啥也不让，自己排队，买了张硬席票。

到达焦作时，当天发往长治的火车已经开出，他便在车站附近的一个小旅店里住下，和各色各样的乡下人一起挤睡在大通铺上。

第二天，车过晋城，他听说地委正在这里召开各县县委书记会议，急忙下车赶去，因为“这是个好机会，能更全面地了解农村的情况。”

到了长治，他知道要塑造年轻的女英雄，没有一个合适的原型人物是写不出来的——《卖烟叶》中的王兰就是一个失败的形象，心理举止全不符合一个恋爱中的女性青年——因此，他又在两个编剧的陪同下，前往陵川县黑山底大队，去访问全国“三八”红旗手，省劳动模范董小苏。

董小苏是个有志气，有抱负、有作为的知识青年。一九五六年，她在县城念完高小，就回乡务农，这在彼时彼地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招来种种非议，有的说她傻，回到这穷山沟来欺侮土坷垃，浪费了一肚子的文化水；有的说她假，不过是装样子响应党的号召，迟早要嫁个干部进城享福去。……风言风语说得小苏好生厌烦，干脆在本村找了个对象，以示决心。

纯朴的乡亲们服气了，选举她担任干部，她就团结了一伙姑娘组成突击队，跟这穷山恶水大战起来。什么样的脏活

累活都敢上。晋东南的毛厕之大之深，足以吓得外地妇女不敢使用。掏粪时，连本地的青年小伙子也躲着不愿干，她却能带头去干。几年功夫，把原先是峻岭秃坡的黑山底建设得林木葱茏，梯田入云。赵树理来后，曾为之题诗一首：

树在黑山腰，村人志气高。
一心趋集体，千亩变丰饶。
合作十年久，收成四倍超。
从此常不懈，红旗永飘飘。

这样的女社员，正是赵树理十几年来反复宣扬，梦寐以求的农村知识青年。他对董小苏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向她采访了整整三天。而小苏也刚好是个豪爽健谈的女丈夫，滔滔不绝地从个人经历谈到家庭纠纷（她和爱人的矛盾成了村里生产上的尖锐矛盾，县里曾派工作组下来解决，最后没有办法离婚了），从社史，村史谈到围绕她共同建设山区的妇女。“其中有些细节，给了我不少启示。”赵树理事后谈到，“女同志的高洁纯朴，使我的心窍顿觉开朗，马红英一闪走进了《十里店》。”

他根据去年在黄碾的设想初步构思了剧本的故事情节；十里店是个自然条件十分优越的大队，却由于旧社会的渣滓拉拢大队长，把持副业权，而党支书又软弱无能，抵制不力，他们便肆无忌惮地贪污盗窃，投机倒把，欺压贫下中农，复辟资本主义。这时，支书儿子将要娶亲，对象是一个先进队里的支书女儿，他俩决定移风易俗，婚事新办，却遭到老人

的坚决反对，于是就来了个突然袭击，新媳妇马红英提前过门，弄得老两口哭笑不得，只好打消原定的大操大办，铺张浪费的盘算。接着，马红英在一次检查卫生时，亲眼看到十里店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坏人当道，好人受气，于是她挺身而出，当场揭发，使队长支书如梦初醒，受到一次深刻的阶级教育，下决心“彻底清查一下，把这几年的乌烟瘴气消除消除。”

六月初，赵树理开始动笔，七月中旬完稿，交付晋东南上党梆子剧团排演，并且亲自谱曲，亲自导演，亲自设计舞台。他不让用布景，因为要替农民着想，农村条件差，舞台小，带着布景下去很麻烦。他每天坐在台下，泡上一壶茶，侧着头，眯着眼，晃动着身子，两手不停地在膝上打着鼓点……他对《十里店》倾注了全部心血，自我感觉良好，“自以为重新体会到政治脉搏，接触到了重大题材。”

这段时间，北京正举行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江青初露“峥嵘”，一出手就枪毙了中国戏剧研究院实验京剧团创作演出的《红旗谱》和改编的《朝阳沟》，又大放一顿“京剧革命”的厥词，攻击戏曲舞台是“牛鬼蛇神统治”，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康生与她一唱一和，在总结大会上点名攻击影片《早春二月》、《舞台姐妹》、《北国江南》、《逆风千里》，京剧《谢瑶环》和昆曲《李慧娘》，把这些作品统统打成“大毒草”。

但这股强大的冷空气，似乎并不能影响赵树理的创作情绪，他在《十里店》中无情地揭露了农村干部以权谋私，蜕化变质的现象，以无比痛恨的心情写下了这样的唱词：“土改

后本应该步步如愿，却不料这几年情况倒颠，”“不劳动修下了新房大院，劳动的住的是破瓦碎砖；不劳动每日里穿绸摆缎，劳动的常常是少吃无穿……”不过，他在排演时就预言道：“我这戏在农村演，没问题；到县里、专区，就会有人提意见；到省里就通不过，更不能招待外国朋友。”

他料事如神，《十里店》的命运不幸而被言中，到省里只演了一场就被勒令停演了。这时，赵树理已回北京参加整风，正在经受“写中间人物”的诬陷性批判。在这种情况下，一般人总是夹起尾巴，至少要稍加收敛了。他却不然，马上挂了个长途电话，对主持这次会演的一位老朋友大光其火，过后又说：“文艺作品要不要真实地反映社会现实生活？是仅供人们观赏呢？还是作战斗的武器？一个干部，一个作家，要做人民的代言人，替人民说话呀！”

这桩公案就此搁下，直到一九六五年夏天，中共中央华北局在晋祠举办读书会，才有人向李雪峰提起此事。这位老上级便提议搞一次内部调演。于是剧团紧忙给赵树理打电话，他也紧忙向晋城县委请了假，到长治和剧团排了几天戏，一道上太原去了。

但是，此行仍然没能改变《十里店》的境遇。在太原，他们等了将近一个月才让演出，演出之后，“各方面又都提了好多意见”，赵树理说，“李雪峰同志的意见没有和我单独谈过，他说他向省委谈过了，让省委结合各方面意见，一并告我。我去找王大任同志，王大任同志把好多意见单子订成一本给了我，并谈了一下总的精神，说要改就需大改，改的时候可把

那个本上的那些意见都考虑一下，能接受的就接受，（因为有互相矛盾的，所以不一定都要考虑进去）我根据他的指示，住在太原改了一个月。”

“他在修改《十里店》的时候，几乎是没明没黑地连轴干。”作家孙谦回忆说，“他边念锣鼓点，边‘拉架势’边捉摸对白；在写唱词时，他则边哼哼过门音乐边推敲字句——一找到恰当字句，他高兴了，将一张报纸一迭十六折，一手拿一只竹筷‘叭啦啦’一阵打，那十六折的报纸便从顶到底打个稀烂！”其中有一段快板，上平下仄，马烽佩服得五体投地。

十一月初，晋东南地区举行“四清”剧目会演，其中有经过修改的《十里店》。演出之前，赵树理对与会者谈道：

“晋东南地区是我的故乡，是同志们的家乡，是太行山革命根据地的一部分，我和她有母子一样的感情。多年来，我有时走，有时来，好比出门的儿女，隔一段不来家乡看看，心里头怪想念得慌。要说，革命者应以五湖四海为家，可我常想念这个‘脚盆’地方。离的时间过久了，就有些牵肠挂肚，坐卧不宁，眼不明心不灵，老怕说我写的东西离开了农民的心气儿。每次回来走走，神经的感应很灵敏，一听音乐很入耳，一看石头，也开花，谁变好了，谁进步了，谁提高了，新人新事新思想，给我增添了新的血液，新的活力。

“我爱大戏也爱小戏，喜爱民间艺术。今天参加地区十个剧团的汇报演出，我好高兴！况且大会还给我的演本《十里店》安排了场次，让它和文艺界的朋友们重新见面，借此机会，听听广泛的批评意见，这对一个作者来说，是很幸运的。……希望看了《十里店》，多收集群众意见。”

演出之后，广大观众拍手叫好、纷纷赞扬道：

“只有老赵才敢这么真实地写！”

“除了赵赵理这样的老作家，谁敢担这么大的风险？”

但是，省、地的有关领导却仍然摇头，颇为不满。为此，赵树理在十一月六日作了一次公开的答辩。

有人认为，《十里店》太阴暗了，社会主义新农村“难道是这样的吗？”

赵树理答道：“农村中有些基层干部，整天不劳动，一上台就修房盖屋，他的钱从哪儿来？所以我就写了这么几句唱词：‘不劳动修下了新房大院，劳动的住的是破瓦碎砖；不劳动每日里穿绸摆缎，劳动的常常是少吃无穿。’我也不是自然主义者。为了慎重起见，‘四清’试点时，我到过黄碾镇。‘四清’展开后，我去过长子县。我已经把比剧情严重的情节，所谓‘阴暗面’，统通删除了，尽力使剧情在真实的基础上，集中塑造马红英这个先进人物。她是全剧的灵魂。”

有人又指责道：大队支书王瑞不是个典型的“中间人物”吗？

赵树理说：“农民常说：‘村看村，户看户，干部看的是党支部。’一个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就是村子里的群众领袖，他的言论、行动，影响很大，我在乡下，特别是重点‘四清’的村庄，看到较好与较坏的支书外，还有一种‘老好人’支书。群众接近他的多，尊重他的少，他没有威信。还有人接近他的动机不纯，是为了借口气，钻空子；有时弄得他也哭笑皆非，甚至使他在执行政策中打了折扣，给国家和集体造成了不少危害。这就是王瑞这些人的基本属性，只是

没把他写成两边倒的角色。假如《十里店》的支书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威力过人，群众拥护，那就不必再搞‘四清’了。”

最后，他说：“《十里店》真实不真实？能演不能演？应由农民群众来决定，他们是生活的主人，最有发言权。在思想倾向上对不对？我是根据革命需要看重现实的。……有的同志说《十里店》是个坏戏，这也吓不倒我，我怕的是事实先生。全盘否定的态度，不利于文艺创作。我的《十里店》再过十年、二十年来看。”

现在，二十年过去了，平心而论，《十里店》固然绝非坏戏毒草，但也不是成功之作。

诚然，剧中能揭示的问题，如农村干部以权谋私、不法分子贪污盗窃、支部书记软弱无力，都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但因全被套进错误的理论模式而变形了。当时流行着这样一种不符合事实的阶级斗争学说：地富不甘灭亡、要想变天，腐蚀党内干部同流合污，破坏集体经济，遂使农村贫富悬殊、两极分化、政权变色、红旗落地。而作者正是遵循着这一概念来设计剧中人物、结构矛盾冲突、剪裁运用素材的。因此，当实践检验出这种权威性理论貌似真理实则谬论时，整个剧本也就成了建在沙滩上的金字塔，尽管其中不无可取之处。

出于同一原因，《十里店》在艺术上也有重大缺陷。作者既要反映阶级斗争，却又不想正面描写“四清”，形式上也不愿步人后尘，便设计了一个阶级斗争观念很强、由先进队初嫁到后进队的女英雄，通过她在结婚前后的活动来组织戏剧冲突（剧本原名《结婚前后》，似乎比《十里店》更切题）。但是，作者把结婚前的冲突安排为大操大办与移风易俗的矛盾，

而结婚后的矛盾却表现为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坏人逞凶，好人受压。这两组矛盾虽然以马红英为线给串连起来了，可是显然地不存在必然的内在联系，所以最后一场“查卫生”——也是全剧的高潮——就显得突兀、牵强、不合情理。我们纵观剧情的发展，看不出有什么理由非要马红英在结婚后去“查卫生”不可。它无非是为了配合宣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才硬加上去的。所谓“查卫生”意指农村要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经济上来一场大清查。

赵树理后来承认：“不采取常办法，而采取怪办法，是这个戏的致命伤。”

长期以来，赵树理的创作总是强调“政治上起作用”，“要求配合当前政治宣传任务，而且要求速效。”结果，他一方面由于极其熟悉农村生活，从而出色地描绘了一幅嵌在一个巨大的框子（两个激烈动荡的十年——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中的北中国农村的风土人情画，另一方面则由于过分注意政治、专门描写一些随着形势的发展而纷至沓来的细小矛盾，遂使画面显得长度有余，深度、广度均嫌不足，很容易蒙上时间的灰尘，逐渐地失去艺术魅力。至于《十里店》，更是因为当时的政策路线之失误而归于失败了。过不多久，当“打倒”、“横扫”的口号声响彻云霄时，赵树理还高兴地说：“我越听越觉得《十里店》没有错，因为它既重点整了党内走资派，又横扫了一切牛鬼蛇神。”

十年内乱，文艺界首当其冲，灾难最重。一九六六年二月，所谓《林彪委托江青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在上海秘密出笼了。从此以后，“文艺黑线专政论”如泰山压顶，

滥施淫威。帽子满天飞，棍子遍地打，血腥的白色恐怖日甚一日，笼罩着整个文艺界。

《纪要》把与赵树理有关的“中间人物论”和“现实主义深化论”悍然打入“黑八论”之列，大连会议也被诬陷成是一个为“反革命复辟制造舆论的黑会”，又胡说“十七年的创作，不少是中间状态的作品，还有一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它们“不写英雄人物，去写中间人物，实际上是落后人物，丑化工农兵形象。”

可能是居住在偏僻的深山沟里，消息不太灵通的缘故，赵树理对于文艺界的腾腾杀气好象浑然不觉，若无其事，照旧专心致志地搞他的创作。

会演结束后，他返回晋城，旋即到南村公社峪口大队蹲点，开始打长篇小说《户》的腹稿。他每天除了正常工作和写一篇大楷，别的什么也不看，象老僧入定似地坐在那里，左手支着右肘，右手托着上额，双眼微眯，似睡非睡，不许别人打扰他，连晚上睡觉也不脱衣服。

年关到了，赵树理回家过春节。“在太原又想到地县两级对《十里店》提的意见，又作了一番‘修改’，回到晋城又改排了一次，耗去了一两个月，《十里店》一剧真害死我也。”他说。其间，他曾回到故园，参加大队党支书赵国祥的追悼会。赵树理是他的入党介绍人，对他的评价甚高，曾说：“沁水只有一个半社会主义人，那就是潘永福和赵国祥。”三月十日，赵国祥在工地上抢救一个遇险的姑娘，自己却被大石压倒，以身殉职。葬礼完毕后，赵树理怀着沉重的心情告别乡亲，但是乡亲们没有想到，这次分手竟是永别！

四月十八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全面公布了《纪要》的观点和内容。同时《文艺报》也发表了题为《“写中间人物”论反映了哪个阶级的政治要求》一文，赵树理这才有所觉察。但他首先想到的是别人的安危。他对一个随他下乡的同志说：“你换个地方工作好不好？你在晋城呆的时间太长了，将来运动一来，对你有冲击。”随后就把他介绍到沁水县，并交给他两个任务，一是写一部反映牺盟会“十二月政变”的文学作品；二是把泽州秧歌配上丝弦，扶植成一个地方小剧种，因为当地群众很喜欢，特别是那些五六十岁的老太太不爱看戏，偏要看秧歌。

而他自己，“有一次回县城，见晋城剧团排焦作市豫剧团的剧本《焦裕禄》，觉着在技术上和上党戏有些出入，手又痒痒起来，便决定改编一次。这次本打算只在技术上改得便于上党剧团演出，可是又看了几遍之后，感到剧本把重点放在焦之死上，便觉内容上有改动的必要。于是就重新翻阅书报杂志上有关焦的材料，重新布局。”可是写完第三场时，专区剧院却打来电话，请他去修改一个急着用的剧本《两教师》，这样一来，《焦裕禄》就半途而废，未能成为赵树理的最后之作。

《两教师》是个歌颂刘少奇提倡的两种教育制度的剧本，所以创作组一行五人，跑了好几个农业中学。这时，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刚刚发出，号召全党“高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

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赵树理的神情显得异常沉郁，但也不忘他那特有的幽默。他带着一件马背褡子，里面装着瓷茶壶，瓷茶碗，茶叶，火车牌香烟，牛黄解毒丸等必需品，每到一地落脚，总是他第一声吆喝：“开茶馆喽！”

五月三十一日，他们在晋城县某村的有线广播中，听到了聂元梓的大字报。第二天，创作组就告自动解散。临分手时，赵树理亲手泡了一壶茶，分送一杯，然后笑笑说：“山雨欲来风满楼，我的茶馆也给刮塌了，待到雨过天晴你们再来品茶吧。”

赵树理一到晋城，便去拜读揭批他的大字报，并把它们抄下来，准备带回去研究研究，又在上面恭恭敬敬地写道：

尘埃由来久，
未能及时除，
欢迎诸同志，
策我去陈污。

这是一首发自内心的言志小诗，道出了赵树理对“文化大革命”的最初认识。这位“天真的人”想得很简单，以为“文化革命”不过是触触灵魂而已，而自己的灵魂是光明磊落的，对党对人民问心无愧；何况以往也没少挨批判，但事实不是证明了真理在自己一方吗？所以他坦然自若，欢迎批评。

他天真地以为，“文化大革命”主要是反对自己所痛恨的官僚主义、老爷作风。他用农民的眼光去看待物质待遇和社

会分工，觉得作协的那么几个作家，要用那么多的人来服务，又在全国好的风景区占有房子，这就是老爷作风、官僚主义。他曾说：战争年代、建国初期，我是一家人一间房子，小孩闹、房子塌个大窟窿，照样在里边写。土炕上放个炕桌，一盆木炭火，一支钢笔，一瓶墨水，一叠稿纸，作品也写出来了。那样的环境里还是写出了很多好的文章，写出来的作品还满有感情的，和劳动人民的感情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现在，你这个作家住上洋楼，用上这么多人服务，写出的东西怎么样？这是文艺界的官僚主义，真该反一反。“文化大革命”冲击一下这些东西还是有意义的—— 他似乎并未意识到反右以来文艺路线越来越左，而这才是文艺创作的路子越来越窄、作品的质量越来越差的根本原因。

看完了大字报，赵树理习惯地去找组织谈心，不料组织上拒绝和他谈话。这个时候，他才真正感到“问题严重了，但又不知从何谈起”。他无戏可改了，乡也不便再下，每天除了听听那些学《毛选》青年人介绍如何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的吹牛报告，便读了一本《欧阳海之歌》。这部长篇红极一时，名震全国。赵树理看后，却老老实实地说：“这些新人新书给我的启发是我已经了解不了新人，再没有从事写作的资格了”。

有一次，他在看大字报的时候，自言自语地说道：“我是生在《万象楼》，死于《十里店》”。他的预感不幸而再次言中，这位驰名中外的语言艺术大师从此再也无权创作。“文化大革命”真地革掉了他的艺术生命。

第十八章 “社会自有公论”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问世不久。由江青、张春桥等策划炮制的《文化部为彻底干净搞掉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线而斗争的请示报告》也于六月二十日出笼，以中央文件批转全国。它声称，文艺界有一条“又长又粗又黑的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线”，穷凶极恶地宣布，要对文艺队伍实行“犁庭扫院”，“彻底清洗”。

七月一日，《红旗》杂志公开点名诬陷周扬，给他扣上“文艺黑线”的“祖师爷”、“大红伞”、“总头目”等帽子。众所周知，周扬是文艺界中最赏识、最器重赵树理的“伯乐”。他的遭遇，意味着赵树理定然也是在劫难逃，厄运已为时不远。

八月一日，标志着“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在京开幕。

八月八日，《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在会上通过，号召全国人民“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

同一天，山西省委宣传部召开座谈会，彻底批判资产阶

级反动文学“权威”赵树理，打倒周扬黑帮树立的“标兵”赵树理。

与会者揭发批判赵树理“长期以来坚持着一套系统的资产阶级纲领，处处同毛泽东思想唱反调，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相对抗。这套反动的政治纲领，突出地表现在反对党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反对合作化，反对人民公社化。他顽固地坚持资本主义道路，诡称在互助组初级社时期，他和党的农村工作路线在认识上是‘一致’的，但从高级社以后，他就钻不进去了，和党的农村方针、路线就不一致了。他恶毒地污蔑农民在集体生产中不安心，秩序混乱，连他写作的题材也找不到了，一切都感到不顺手了。他公开喊叫没有农业经验的人不能领导农业生产，亦即取消党对农业生产的领导。他反对社会主义农业的计划生产，念念不忘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他反对国家的统购统销政策，胡说统购统销政策刺伤了农民的积极性，主张农产品应该自由买卖。他对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生产秩序与生活方式处处感到不习惯，妄图使农民停留在小农经济的状态踏步不前，这实际上是主张在我国复辟资本主义。”—— 奇妙的是，倘若去掉那些可笑的批判语气的语言，在今天看来，这是一个很不错的鉴定。

他们给赵树理扣上一大堆吓人的帽子：“赵树理早已由民主革命时期党的同路人，进一步堕落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赵树理多年来以‘农民代言人’，‘农民作家’自居，实际上他是一个钻进党内的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富裕中农的代言人，他是文艺界周扬黑帮在反动的大连会议上捧之为写农村题材的‘铁笔’，‘圣手’，树为写中间人物的‘唯一

标兵’”。

最后，批判者怒气冲霄汉，一致认为：“赵树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观点和文艺观点，毒性浓烈，流毒甚广，迷惑了不少群众，毒害了不少青年，为了捍卫党，捍卫社会主义，捍卫毛泽东思想，我们必须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资产阶级反动的文学‘权威’——赵树理揪出来，彻底清算他的反动思想，批判他的反动作品，彻底肃清他的流毒和影响。”①

从此，山西省掀起了批判赵树理的第一次高潮。

晋城是近水楼台，师范学校的红卫兵首先批斗起来，他们采用最时髦的“喷气式”姿势，把赵树理押到全场，又采用最流行的打扮，给他戴上高帽，挂上大牌，上面都写着带红叉的“黑帮分子赵树理”，后面站着一排他的“黑爪牙”：宣传部长，文化局长，剧团团长，戏校的校长、书记……

不料赵树理上台之后竟一把摘下大牌、高帽，把它们撂下台去，然后昂然挺直了他那高大的身躯。人们万没料到他会出此壮举，顿时瞠目结舌，不知所措，黑压压的会场鸦雀无声。

主持批斗的头头一看阵势不好，赶紧振臂高呼：“打倒黑帮分子赵树理！”被神圣的庄严震慑住的会场才又喧闹起来。

这个造反派头头大声喝道：“赵树理，造反派说你是黑帮，你胆敢反抗，这是反革命行为！罪该万死！我问你，你是不

① 《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文学“权威”，打倒周扬黑帮树立的“标兵”赵树理》，载1966年8月9日《山西日报》。

是黑帮？你的作品是不是大毒草？”

赵树理慢条斯理地答道：“你们说我是黑帮，我不敢当。我这个人长得黑，这是事实，可是心不黑，也没帮没派。至于我的作品，那尽是‘豆芽菜’，连‘西红柿’都够不上。要说大毒草，我真不知道怎么种呢？”

这番俏皮味儿，自然激怒了造反派。好在运动初期，江青发明的“文攻武卫”尚未诞生，所以“革命小将”采取了比较“温和”的车轮战术；分成三班，昼夜不停地跟赵树理“拼刺刀”，不容他解释，更不许他辩驳，只要他承认是“黑帮”，不获全胜，决不罢休。

刺刀拼了整整的两天两夜，倔强的赵树理就是不承认，还要抗议道：“你们这种做法怎么能叫‘拼刺刀’？你拼我也拼，那才叫拼刺刀！”现在只准你们刺我，却不许我申诉，辩驳，这叫捅刺刀！”然而小将们却不吃这一套，“造反有理！管它是拼还是捅，反正你得承认是黑帮。我们的刺刀不见血是决不罢休的！”

这时，赵树理已是年届花甲的老人，体力实在吃不消了。第三天，他就施展一种在小说里常用的技巧，跟娃娃们开了个小小的玩笑。他告诉红卫兵：“你们说是，那就是？”并且乖乖地把这句话写在纸上交给他们。然后放倒身子呼呼大睡。而欢呼雀跃而去的小将们，直到庆祝胜利时才发现上了他的当，原来这句话的后面还有个小小的问号。

八月十八日，正是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红卫兵的日子。赵树理被押往长治，隔离在地委招待所，听候晋东南地区的革命造反派愤怒声讨。

在这次批斗中，赵树理的“罪行”大大地升了级，因为有人给他平添了许多“疯狂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罪证。

赵树理其实是最赞成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不过也最痛恨弄虚作假，厌恶作样子，摆门面的形式主义。他的笔记中写着：“要把政治工作放在第一位。还得以学毛著为根本，学习毛主席活学活用马列主义，学习其立场、观点、方法，来观察问题。”“要让人自觉自愿地参加到学毛著运动中，要认真学毛著是根本大计，要经常地，不是学习一段就完了的。要以毛著改造自己的思想，不要尽在词句上找根据，不要‘读书千百篇，思想不沾边。’”他到晋城县峪口大队去蹲点时，个人迷信的造神运动方兴未艾，人们都在机械地背诵语录“老三篇”，大搞空洞撒谎的“讲用会”。赵树理就看不惯了，直言不讳地指出：“学语录是形式主义，无效劳动。”“这样宣传毛泽东思想，群众听了不入耳，接受不了。谁不认得几个中国字？”又批评道：“对口词里常说，有了这本书就能怎么怎么，也不知道能说明什么问题。”当劳民伤财的“红海洋”淹没全国、这个万山丛中的小小大队也搞“一片红”时，他又批评道：“搞这些干啥？形式主义，瞎误工！这能打出粮食来？不如到地里多干点活！”

这么几句谁都明白而谁都不敢明言的大实话，在“文革”时期是足以置人于死地的，其罪之大远胜过《“起码”与“高深”》中的几句议论。

在尔后的几年中，赵树理为它付出了难以想象的代价，受尽了难以言传的折磨，但他自始至终只有一句话：“我没有反对毛主席，我只是说了和写了几句实话。”打死他也不改口。

幸而长治市人民太熟悉赵树理了，运动初期，稍有良心的人都不相信他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对他的批斗就不象红卫兵小将那么凶猛异常了。有一次，赵树理奉命去一个剧团接受批斗，他走进会议室，二话不说，一屁股坐在地下声明道：“用不着你们往倒打，想怎么批就怎么批，戴纸帽子顶破房子也行。”说得批斗者哈哈大笑，宣读几句公式化的文章了事。

但也有个非常熟悉他的人，为了表示自己的革命之彻底，贴出了一张“惊心动魄”的大字报。他引证赵树理过去写的竹枝词《油田远眺—— 任他冰封与雪飘，江山再造看今朝。钻林不作银蛇舞，也与天公试比高。”—— 运用当时最热门的影射比附学，指控赵树理对无产阶级专政极端不满，有改朝换代，再造江山的野心，而且要和伟大领袖争高下。“上纲上线”到这个地步，使看惯了大字报的赵树理也凄然摇头了。他对几个前来安慰的同志说：“我倒没什么。可是这样下去，不知多少人要蹲文字狱了。”他无畏地在这张大字报的旁边，又写了一首发人深省的小诗：

革命四十载，真理从未违。
纵虽小人物，错误也当批。

也许是因为赵树理的气质、打扮太不象个著名作家、文学权威了，他的身上被串连的红卫兵别了许多写有“黑帮赵树理”的小纸牌，他一笑置之，不以为意，但对行动不自由，长住“交待所”，却感到非常恼火。

有一天，他在食堂里看到一个尉迟村的小同乡，竟高兴得象他乡遇故友一样，连忙邀他到宿舍去叙谈叙谈。

“当我推门进去的时候，屋里不堪入眼的情景，不由使我难过起来。”这个出来串连的中学生写道：“这里哪是叫人住的地方？已是深冬还未生火，屋子里横七竖八摆着几张桌子、破床和几把椅子。地上、桌上被一层纸烟头所覆盖，那简直象一大群遮天盖地的飞蝗。

“他把我看成好象是刚从解放区过来的人一样，又好象我是一名探监者。他用老家的话腔急切地问起家乡和亲人们的情况。他问家乡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没有，他问县、公社干部有没有被批斗，又详细地问了家乡的领导成员及生产情况。

“当他听到家乡还比较平稳，亲人还没有受制的时候，情绪渐渐地好起来了。接着他勉励我说：将来不升大学也可以，高中毕业回村子里干，把咱村搞好。小芬（赵广建）不就是在农村干过吗？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咱们的村子不错呀！那一片就数咱尉迟和郑庄的三郎强，地板好，有水，出煤炭很方便，只要干，村里还是能搞好的，老百姓会富足的。要是把水利搞好，就能多打粮，要是在山头、小沟里多栽些果木，老百姓就更消陶了。’他越说越兴奋，好象不是在‘反省’，不是在蹲牛棚，而是在空阔明亮的大礼堂里给青年们讲前途，讲理想。”

在长治隔离反省期间，赵树理先后写过三份检查材料，第三次检查便是那两万余言的《回忆历史，认识自己》。他在恐怖的高压之下，仍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回顾自己四十年的革命

生涯和创作道路，详细叙述了“真理从未违”的事实经历，同时也作了严格无情的自我解剖。

他诚挚地检讨：自己的头脑中存在着表现为自卑感的个人主义的自傲，存在着表现为目光短浅，不识大体的小生产者思想意识，未能放眼世界，大处落墨，而是小天小地钻在农村找一些问题唧唧喳喳以为是什么塌天大事。他说：“作为一个专业作家，是有愧于时代的。”

他真心实意地写道：“这八年中（公社化前后八年）我的最大错误是思想跟不上政治的主流。没有把我们的国家在反帝、反修、反右倾的一系列严重斗争中用自力更生的精神在生产建设上所取得的不可想象的伟大成绩反映在自己的创作上。但是所写的东西不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党的。”（重点号为引者所加）

在这份检查的最后，赵树理提出了“一点解释和要求”：

> “我自参加革命以来，无论思想、创作工作、生活各方面有何发展变化，有什么缺点，错误，也就是说是个什么成色，始终是自成一个体系的。入京以后，除了戏改方面受了些感染（也因本身就有爱好封建戏曲的弱点）外，其他方面未改变过我的原形。广大人民不了解内情，从某一段社会关系上把我和有些人摆也摆在一处，扫也扫在一处，但我把自己的来踪去迹向党说明之后，要求党在数年之内，经过详细调查，最后把我加一点应有的区别，放到应放的地方。
>
> “我不要求过早地加以区别，此次‘文化大革命’是触及每个人灵魂的事，文化界、文艺界的人们更应该是一无例外的。待到把我和我共过事的人都接触到，把问题都摆出来，我本人的全部

情况也会随之而出，搜集起来，便是总结。我以为这过程可能与打扑克有点相象。在起牌的时候，搭子上插错了牌也是常有的事，但是打过几圈来也就都倒正了。我愿意等到最后洗牌时候，再被检点。”

赵树理真不愧为“天真的人”，竟把这场你死我活的革命与反革命的大搏斗比喻为轻松愉快的打扑克，把自己在其中的命运看作是插错了牌。显然，他是真诚地相信，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革命运动岂有不对之理，一定有它不可估量的作用和意义，不是连郭老也公开表示他的著作应当全部烧毁，他本人愿意到生活里去滚一身泥巴吗？那么，触一触自己的灵魂—— 纵然“触”得实在过火—— 也是理所当然的，唯求党和人民能实事求是地了解他，对待他，最终给他一个正确的结论。

然而，赵树理得到的却是一次更为凶猛、遍及全国的批判浪潮。

过罢“横扫一切”的一九六六年，《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一期上就出现了文痞姚文元的《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这条乱砍乱杀的恶棒，大谈“黑线专政”史，对周扬妄加罪名，还一口气点了夏衍、田汉、阳翰笙、林默涵、齐燕铭、陈荒煤、邵荃麟、何其芳、翦伯赞、于伶等十个同志的名，又诬蔑茅盾、巴金、老舍、赵树理、曹禺等人是“资产阶级”“权威”。

一月八日，《光明日报》发表了《赵树理是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标兵”》一文。文章劈头就说：“赵树理是资

产阶级的反动作家，然而在周扬一伙的吹嘘和标榜之下，赵树理的创作简直‘代表了当代文艺的方向’。‘代表了当代文艺的胜利’。显然，周扬等人的用心，是力图在文艺界树起这个贯彻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反动文学‘标兵’，以达到为资产阶级复辟服务的罪恶目的。”

文章最后诬蔑道：“综观赵树理的整个创作，可以看出赵树理始终是顽强地表现着他的资产阶级反动的世界观。他用他的黑笔杆，为周扬一伙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制作了不少‘样板’。这些‘样板’都是丑化工农兵、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周扬一伙把赵树理捧为‘圣手’、‘铁笔”，其目的无非是为资本主义复辟鸣锣开道。现在是彻底揭露和批判周扬一伙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标兵’的时候了。只有把这些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货色彻底砸烂、彻底清除，才能为无产阶级文艺的健康发展扫清道路。”

第二天，另一家更为显赫的报纸以整整一个版面，同时刊登了三篇署名文章：《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文学“标兵”——赵树理》、《赵树理是反革命复辟的吹鼓手》、《揭开周扬和赵树理之间的黑幕》。并加了编者按语道：“赵树理二十几年来创作的历史，就是他挥舞黑笔反党反人民的历史。在民主革命的时期，他代表地主阶级说话；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他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进行反革命修正主义宣传。赵树理是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为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制造复辟舆论作准备的急先锋。”[①] 随后，全国报刊纷纷予以转载，对

① 见1967年1月9日《解放军报》

赵树理的批判便由一省扩大到全国。

这时，上海发生了有名的一月暴乱。《人民日报》一面高呼“造反派最盛大的节日来到了！一切牛鬼蛇神的丧钟敲响了！”一面号召各地造反派“凝聚起对阶级敌人的深仇大恨，咬紧牙关，斩钉截铁，下定决心：联合起来，团结起来，夺权！夺权！！夺权！！！”①

山西省的造反派率先响应，用骇人听闻的卑鄙手段夺取了党政大权，捷足先登为全国第一个夺权省份。

山西造反派对于北京发动的批赵高潮岂肯甘于落后。赵树理是山西的特产嘛！况且，江青又在二月一日声色俱厉地批判了根据《三里湾》改编的电影《花好月圆》，说它“坏透了”！于是，赵树理再度升级，被“揪回”太原。

二月下旬的一个深夜，赵树理敲开了阔别一年的家门。

自从动乱开始，老伴关连中天天都是心惊肉跳，耳朵里塞满了“打倒”、“斗臭”、“砸烂”老赵的狂喊声，可又得不到他的确切消息。家中被造反派不知抄了多少次，常常是半夜闯进来，头戴柳条帽，大口罩，手执长矛、电棒，把人赶出，大肆劫掠，临走时还威胁道：“你可不准说，我们甚都没拿你的！”孩子们吓得不敢回家，还变成了“狗崽子”，受到“红五类”同学的管制，天天要汇报思想、交待“问题”，不经他们批准，无权走进教室。她急得真象热锅上的蚂蚁一般。相见之后，看着丈夫疲惫不堪的模样和瘦成棍子似的身体，心痛地哭出声来。

① 见1967年1月22日《人民日报》

然而，太原的造反派可没有怜悯之心，他们争着抢着游斗赵树理。他几乎每天都被拖上卡车，挂上大牌，一次又一次地被人自后扭住胳膊，抓住头发猛拉后仰——仰头示众，再猛按前躬——低头认罪。……

他的儿子赵三湖说："每次，当我看着父亲挂上纸牌，戴上纸帽被人押着出去，我的心就碎了。血涌上我的脑门，浑身哆嗦起来，恨不得扑上去……可是，象每次一样，父亲回过头来，平静地安置我：'在家，不要出去惹事生非……'他好象一点也不在乎，每次游斗回来，总是阴郁地发表一通观感：市容很成问题，垃圾到处都是……唉，看来国家很困难。"有时兴致来了，还会拿个鸡毛掸子当马鞭，嘴里响着上党戏的锣鼓点，把地上当作舞台跑圆场，逗得两个小外孙也拿着小棒跟在他屁股后面跑。弄得老伴啼笑皆非，叹着气说："斗成这个样子，还把你高兴的。"女儿更是想不通，时或口出怨言，悲愤不已，他反而劝慰道："小鬼，不要软弱，相信党，相信群众。现在确实困难，但这对我们每个人的革命意志都是个很好的考验和锻炼，只要对党和人民有好处，个人受到一点冲击和委屈不该有什么怨言。"

的确，在春夏之交的某一天，进驻山西省文联的一些红卫兵，要赵树理交待是如何"秉承周扬的旨意"、利用小说来"反党"的时候。他就激动地说："我不反党，我赵树理永远不会反党！党培养教育我几十年，我热爱党，信任党，正因为这样，我常常在作品中指出党在工作中需要注意和改进的问题，这就是人家说的问题小说。我跟党革命几十年，工作中有缺点错误，一定改正，我相信党和人民是会给我做出公

正的结论的。”

接着，他向这些年轻人深情地回忆起毛主席的《讲话》发表后，延安和整个解放区文艺界为工农兵创作和演出的动人景象，情不自禁地背诵起《王贵与李香香》，用手打着节拍唱起了《兄妹开荒》，又讲述了他创作《小二黑结婚》的经过，还详细地介绍了《十里店》的创作意图。

谈到这里，赵树理深有感触地说道：“戏剧是农民喜闻乐见的好形式啊，可惜我过去写得太少了。”他的头沉重地低了下去，就象一个没有完成作业的小学生。突然，他又扬起头来，伸出手腕，指着上面青筋暴露的血管对这些青年人说：“我都六十多岁了，又是高血压，血管硬化，说不定哪一天就完了，但是我相信，我还会有提笔的机会，”顿了一下，他又说道：“不过，以后再写，我可不写小说了，要写戏剧！”

他的情绪深深地感染了“革命小将”，他们完全忘了把他找来的目的，忘了是在同“三反分子”、“反动权威”拼刺刀，都急切地等待着下文。

“过去我写的小说都是农村题材，尽量写得通俗易懂，本意是让农民看的，可是我作了个调查，全国真正喜欢看我的小说的，主要是中学生和中小学教员，真正的农民并不多。这使我大失所望。现在我国多数农民文化程度不高，劳动也繁忙，一本一本地看小说是比较困难的，而且戏比小说作用大，一本小说不能看几个人，一本戏就有几万人看。如果写成剧本，剧团在农村公演，让老老少少都能看，这有多好！”

赵树理就是怀着这样的赤诚之心来看待红卫兵的，但有时候，他却因此而闹出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笑话。

在一次批斗省美协某领导的大会上，他去弯腰九十度陪斗。那个画家曾不识时务地批评红卫兵小将“满口是道理，下车伊始就哇哩哇啦，那可是不好的！”所以小将们吵吵嚷嚷地喝令他交待“什么叫‘下车一死’？又什么叫‘哇哩又哇啦’？”在场的“牛鬼蛇神”们想笑又不敢笑，拼命咬自己的舌头。岂料赵树理却双手捧着胸前的大牌子，颤巍巍地走到那些造反者跟前，告诉他们：“是下车伊始，不是‘一死’，哇哩哇啦是不了解情况就多言多语。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话，那意思是说……”

会场“轰”的一声笑起来了。一个造反者恼羞成怒，抓住赵树理的衣领，往后一推，骂了一句：“混蛋，滚你的吧！”

另有一次，他把那些满脸杀气的造反派也逗乐了。他们就《锻炼锻炼》质问他：“社会主义时代有英雄人物，有不偷棉花的人物，你为什么不写？难道我们的时代没有英雄人物吗？”

“有哇！”赵树理很痛快地答道。

“在哪里呢？”

“在座诸位就是英雄人物。”

人们全都笑了，连陪斗者也在低头暗笑。

到了“夺取全面胜利”的一九六八年，赵树理的“罪行”又升了一大级，从十八层地狱堕入到十九层地狱。

自从康生、林彪一伙用绝对不能见人的手段，将薄一波等六十一位老同志打成“自首叛变”的“叛徒集团”——他们是遵照中央的明确指示出反省院的——之后，一股“揪叛徒”的恶浪立时波及全国，凡是坐过牢的几乎无一幸免。这

样，赵树理的头上就很自然地增加了一顶“死有余辜”的现成帽子——大叛徒。他不是在三十年代也蹲过“反省院”，写过“自首书”吗？铁证如山，罪责难逃。谁敢怀疑？

与此同时，有关方面公布了一批赵树理的从未发表过的书信和文章；一九五六年写给长治地委某领导的信；一九五九年给中央某负责人的信和《公社应该如何领导农业生产之我见》；以及一九六二年在“大连会议”上的几次发言。为彻底打倒、批臭、斗垮赵树理提供了许多“重型炮弹”。

从此，赵树理的厄运加剧了。有一次，他被揪出去批斗了一下午，傍晚才满身汗淋淋地回到机关。他一进大门就对“黑帮”友伴们说：“唉，今日可受下苦了，今儿的导演不好，心太狠，给咱们来的是真的打翻在地再踩上一只脚，真打真踩，差点儿把我给踩扁了！以前的那些次就不是这样，那些次的导演心好，让人把我们轻轻地按倒在地，背上那只脚也不怎真踩，我趴在那里尽是休息了。”

很快，他连这样的俏皮话也说不出来了，因为尝到了挨斗的滋味——两根肋骨被打断，肺叶被折骨戳通……。

关于这件暴行，有多种不同的说法。有的说是在太原“五一”广场批斗时，天下大雨，在拉下主席台时被打断了肋骨；有的说是在一次批斗会后，这位老人长时间罚站，两腿肿胀得一步也挪不动了，被人架着拖到卡车跟前，他实在无力爬上汽车去，便有一个打手猛扑上来，照着赵树理的腰窝子死命地连连几拳，打得赵树理昏倒在地，两根肋骨被打断了。还有一位“难友”则写道：“有几个造反者，在文联的大院里命令赵树理给他们背诵‘座右铭’之一的《愚公移山》，

赵树理摇摇头又是说了句实话，‘我背不上来，要说从前的古文《愚公移山》嘛，那倒还能背得几句’。一个虎彪彪的小将骂了声‘反动’，上前就当胸擂了他一拳，赵树理被擂倒在地，疼得满脸是汗。半天才哼哼着爬起来。后来才知道，那无情的一记‘铁拳’竟打折了他的两根肋骨。自此之后，赵树理便两手捧着受伤的胸膛，斜着身子一颠一颠地移步了。而且一边移步一边不住声地咳嗽，就这样也还要照常接受轮番的批斗。”①

这些不同的说法，至少证明挨打是赵树理的家常便饭。由于无法及时就医，也就搞不清究竟是哪一次打折的。

八、九月间，“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浩浩荡荡地开进了省文联，接着，又传来了“清理阶级队伍，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的指示。关在“牛棚”里的人们心头暗喜，以为问题有了解决的希望。殊不知造反派只在“抓紧”两字上下功夫。赵树理遭到严格监管，形同囚犯，连他的次子二湖“上山下乡”去，临行时要求见一次父亲，也被训斥一顿赶了出来。

当三湖把这情况告诉赵树理时，他惨然一笑，忽又异常开朗地说，“好！应该！应该这样，咱们都是从农村来的，一辈子不应该忘记农村！你二哥插队农村，最好是回老家尉迟”。接着他就滔滔不绝地讲起了故乡尉迟村，那里的山水，那里的土地庄稼，那里的水库、苹果园，还有已故的大队支书赵国祥……

① 阿农：《大师的风度—— 怀念作家赵树理同志》

在“清理阶级队伍”时，赵树理无疑是个难得的活教材，省内各地的造反派都看上了他，经常在半夜三更蒙住他的眼睛，从床上拖到卡车上，拉到全省各地去批斗，几乎“游”遍了山西的城镇乡村。

有一次，他与晋城的造反派重逢了。他们经过“大风大浪”的锻炼，斗志更加昂扬，经验也更加丰富，竟把三张桌子摞起来搭成高台，叫赵树理跪在上面低头认罪，恭听批判。然后，一个恶魔般的打手狞笑着对他说：“你不是写过《三关排宴》吗？这回就让你来个真正的‘三关排宴’吧！”说罢，从他背后猛的一推……

当赵树理从昏死中清醒过来时，发现自己的髋骨摔断了。

就这样，他被折磨得浑身是病，坐不能坐，睡不能睡，通宵坐在小板凳上，背靠火炉，胸伏床沿，爬着度日熬夜。然而，即使到了这等地步，造反派也决不怜悯“蛇一样的敌人”。难友西戎悲痛地回忆道：“他手中曾经写过许多优美作品的笔，此刻就连逼着叫他写‘检查材料’也感到十分吃力了。我们和他同住一房，为他的健康担忧，劝他上医院，医生一看病历，惊问：‘作家赵树理就是你’?他说：‘这种时候，谁还敢冒名顶替我’？医生要他立即住院治疗，赵树理说：‘我是身不由己啊！’他带着药片回来，继续接受批斗”。①

这种无休止的、往死里整人的批斗，终于斗醒了赵树理，斗正了他对“文化大革命”的误解。他开始看出，这个在堂皇名义下进行的“伟大的革命运动”，其实不仅十分不公允，

① 西戎：《怀念作家赵树理》，载《汾水》1978年11号。

不正义，而且也决非治国之策，为民之道。过去，他对“左”的理解总是中央好，地方坏，现在则是深深地失望了。在一次狂呼乱叫的批斗会上，他叹息道：

“唉，我总算是想通了，明白过来了！”

“想明白了就好，那你就要好好向党低头认罪，老实交待了！”造反派得意地吼叫着。

“我没有罪”！赵树理又一次嘶声地重复着这句重复了千百次的老话。接下去才嘴唇抖抖索索地说：“我想了又想，想了又想，昨晚睡不着，忽然想到了农民锄庄稼，原本是要锄草保苗的，有那些不高明的把式，也难免会把好苗给锄掉了……。”

“你这是什么话？你是什么人？你莫非就是个好苗子？”恼怒的造反派连声逼问。

赵树理庄重地点点头，说：“我是人民的一个儿子，不是一个坏人！”

这位老人宁折不弯，纵然被斗得连生活也不能自理了，他也决不向这疯狂的时代告过一声饶，不在邪恶和强暴的淫威下说一句假话。有人苦笑着称他是个“怪人”，然而这种“怪”劲何其可贵可敬啊！巴金后来说过：“在‘十年动乱’中我不知写过多少思想汇报和‘交待’，想起它们，我今天还感到羞耻。在我信神最虔诚的时期中，我学会了编造假话辱骂自己。”①

冬去春来，“文化大革命”进入了第四个年头。

① 巴金：《序跋集·序》

文联大院里有几株粗壮劲挺的梧桐树，被寒风刮得光秃秃的，这时又吐出了嫩绿的新叶，枝梢上也绽出了淡紫色的小喇叭花。一天傍晚，赵树理手扶扫帚把，呆立在树下，仰脸望着梧桐树，微微地摇头叹道："树尚存矣！花犹开也！"他清楚地感到，树叶凋而复苏，花儿谢了又开，自己的生命就在无穷尽的批判、折磨，打扫厕所中白白地消逝了。然而，他依旧抱着满怀的希望，他坚信，活下去就是胜利，就象那尚存的树犹能开花一样。

梧桐树从稀疏到繁茂，又从繁茂到稀疏。当人类进入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时，这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最伟大的事件"还是没有取得"最伟大的胜利"，而赵树理则已被斗得不成人样了。

"他消瘦得让人看了害怕。"赵三湖的一个同学说道："我每次走近他的屋门，听到的总是一阵阵痛苦的喘息和呻吟，但每当我进了屋，他就立刻止住了这种声音，困难地用双肘支起上半身，向我露出那熟悉的微笑。肘部的毛线因为这种动作渐渐地磨开了线，露出的仍是补过的衬衣。因为没有力量，他已很少说话了，两颊深深地塌陷下去，只有那双眼睛，还充满生机。"

这时，赵树理已是名副其实的"家徒四壁"了。本来不多的家产被"横扫"一空，一日三餐也难以为继。老伴常要气恼地数落他："你怕修，不存钱，结果你最穷，最修，最惨。"但他却笑笑说："党和人民总有一天会理解我的。"

是的，家乡的人民一直在怀念赵树理，几次有人偷偷地来看望他，安慰他，他对来人说："我现在成了黑帮，可我人

黑心不黑，以后，就是作为黑人回到家乡，我也要和乡亲们一起去开煤窑，做贡献。”

他艰难地喘息着，又说：“我本打算写完《灵泉洞》下部，以结束我的创作生涯，现在看来也办不到了。”

来人的眼泪夺眶而出，悲愤地问道：“赵老师，你的作品难道真的会这样吗？”

赵树理长长地出了口气，目光突然明亮起来，简短地答道：“社会自有公论！”

是的，社会自有公论。在赵树理的故乡尉迟村，曾有几个小爬虫秉承上级旨意，不辞辛劳，三进山村，要去肃清赵树理的“流毒”。不料三次批判会全部成了为赵树理评功摆好的表扬会。小爬虫无可奈何，灰溜溜地去了。

不只在沁水，就是在阳城，在晋城，在平顺，在赵树理所有下过乡的地方，这些小爬虫全都收集不到使他们满意的材料，川底一个七十三岁的老贫农忿怒地说出了全体农民的心里话：“保国忠良没有好下场啊！”

四月间，长子太湖来太原看望父亲。这时，赵树理的病势愈益沉重了：肋膜炎，胸膜炎，肺气肿哮喘，再加上原有的高血压，肋骨和髋骨折断。他本来还能扶着墙一步一步地挪动，现在已经接近于卧床不起了。稍一活动，胸脯就疼痛难忍，连说话、呼吸都痛。咳嗽时，只有用两肘把身子撑起来，双脚尖点着地，才能咳出一两声。

太湖看到父亲病成这个样子，难过得说不出话来。他违抗禁令，扶着赵树理到南华门近旁的工农兵医院去。有个同

时在门诊部就医的同志，事后详细地记载了当时的情景：

“医生拿起我前面的那个病历本，象喊前面无数个患者似的，漫不经心地喊了声：‘赵树理——’但话音落到‘理’字的时候，便有些不一样了，他用惊奇的眼光看着被一个身穿蓝制服的三十多岁的中年人搀扶过来的病人，用特别和气的声音拍着黄木圆凳说：‘坐下，坐下！’

“医生用听诊器仔细地检查了患者的心肺，并让他躺在诊床上把肝区和腹部扪触扣击了一阵。病人一定感到非常痛苦。他头上出着大颗汗珠，嘴唇发青，咳嗽不停，但他拼命咬着牙，一声没有呻吟。这时一个疑问突然跳入我的脑海：莫不是那些仇恨人类精神财富竟至要把制造财富的肉体也消灭掉的暴徒们打坏了他的内脏，打坏了他的双腿???

“医生急匆匆地跑上三楼去了，半天才回来。他显得很失望，用遗憾的声音对病人说：‘你的病需要住院，可是现在没有（!）床位……请你把地址告诉我，一旦有床，我就通知你。’医生拿过一张纸，病人感激地望了望他，用抖抖索索的手写下‘南华门十六号’几个工工整整的楷书小字。

“赵树理同志被那位穿蓝制服的中年人（后来人们说，那是他在晋南工作的大儿子）吃力地搀了起来，拄着双拐，蹒跚地、艰难地顺着楼梯走下去了。我想跑出诊室帮他下楼，但医生已喊我的名字，我只好扭头来目送他那高大、瘦弱而且略显佝偻的背影。我的心变得沉甸甸的，似乎要沉下去了……

“‘这就是写《小二黑结婚》的作家赵树理，’医生一边翻着我的病历，一边抬起眼睛望望楼梯口对屋里的人说。仿佛是一声号令，哗的一下，人们都拥向楼梯口遥望那高大瘦

削的背影去了。一个农村打扮的姑娘，操着河西口音，还边往外跑边说：‘《小二黑结婚》？赵树理？俺们可爱看他的书哩！’”①

是的，赵树理热爱农民，农民同样热爱赵树理。“有一次，一个熟悉的朋友，悄悄地把一本在群众中私下传阅的父亲写的《下乡集》转给我看。”在农村插队的女儿赵广建写道：“这是一本经过精心装订的旧书，磨光的书角和断口都被人用透明胶纸整齐地粘贴起来，残缺的断言也被人用清秀的小字抄写补齐，笔迹不一，显然是出自众人的手，我含泪翻着这本劫后余物，被群众精心保护下来的‘地下读物’，百感交集，心潮澎湃，真理是任何谎言和诋毁所掩盖不住的，人民是历史最公正的评判者。在人民的感情的海洋里，我看到了对父亲信任和同情的浪花。”②

但是，善良的人民岂能料及，万恶的林彪“四人帮”就要对这垂危的老人下毒手了。

六月二十三日，赵树理正静静地坐在屋里旁观三湖和同学下棋，忽然，门被推开了，进来两个穿军装的人。

“这是赵树理的家吗？”

赵树理无声地点点头。

“起来！卷铺盖，跟我们走！”

“到哪儿？”

“专案组，法院。”

① 奋飞：《病骨支离晤赵公》，载《汾水》1977年二月。

② 赵广建：《回忆我的父亲赵树理》

两个青年看不下去了，抗议道："一个瘫痪了的人，生命垂危的人，你们仍不放过，怕他跑了吗？"

赵树理摇摇头，吃力地说："三湖，扶我起来，跟他们走。"

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已奉命成立"赵树理专案组"，对他进行隔离审查。四十年前，赵树理第一次来太原，被送进国民党的监狱，而今天，当他即将走完人生的旅程时，想不到终点竟是"人民法院"。

一九七〇年七月二十五日，被农业学大寨的口号吹为半神的人物，在省报上发表批判赵树理的文章，于是，规模空前，骇人听闻的第三次批赵高潮，在山西省"轰轰烈烈"地开展了。此后一年中，光是《山西日报》，就连续刊登了八十八篇"战斗檄文"，批判专栏漫山遍野，甚至在穷乡僻壤的厕所里，也涂满了"砸烂赵树理狗头"的标语、漫画。

批判一个作家达到这等程度，即使在十年动乱中，恐怕也是"史无前例"的。其中的奥秘，正是出于林彪一伙篡党夺权的现实需要。因为"农业学大寨"已经纳入他们的罪恶活动的轨道，"大寨在山西，农业方面山西受极左危害更大。长时间流行的口号是'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堵不住资本主义的路，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农业战线的一整套大寨经验远比一九五八年的左倾错误严重得多，有些地方出现的情况比赵树理曾经反复提醒人们注意的三年困难时期的情况还要糟。而赵树理的要害问题正被指控为'一贯鼓吹走资本主义道路'。很明显，批判赵树理，足以成为推行极左路线的推动力。有些人指出，批判赵树理，特别要同当前的'一打三反'运动和城乡资本主义倾向密切结合起来；这

是当时能在山西迅速掀起批判赵树理运动的一个现实原因。”①

可赵树理却对此一无所知，莫名其妙地被押进了高级法院。因为案情“重大”，军事管制专案组对他按特殊“要犯”处理，实行彻底隔离，囚禁在单间里，但因他的的确确已病得连大小便也不能自理，专案组万般无奈，才勉强同意让三湖每天来护理、送饭。

处于这样的境地，赵树理的病情急剧地恶化了。被打断的肋骨使内脏迸发出种种炎症，烧得赵树理浑身上下火炭一样。他本来是个最怕冷的人，现在必须脱掉衣服，光着膀子才稍感凉快舒服。他得不到任何医疗措施，甚至不准走出房门去呼吸一口清新的空气。一个六十四岁的老人，需要多大的毅力才能挺住这难熬的折磨啊！况且，当孩子在身边时，他还要尽量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以免增加亲人的忧虑。

九月六日，在农村插队劳动的赵广建，费尽周折，终于在这天下午获得了探视父亲的机会。她走进囚室，只喊了一声“爸！”就哽咽着说不出话来。赵树理正背朝房门坐着，明知是自己最亲爱的女儿来了，病魔却不让他马上转身去迎接，他只好用微弱的声音说：“小鬼，你来了？”

广建一听到熟悉的“小鬼”二字，更是心如刀绞，泣不成声了。她想起二十年前父女俩在北京相依为命的岁月，那时候，爸爸是多么健康，多么乐天！她常常用头顶住爸爸的

① 王中青、李文儒：《记赵树理的最后五年》，载《新文学史料》1983年第3期。

腹部，象一头小牛，背朝天一直把他顶到桌前的转椅上，爸爸哈哈大笑，在她的背上打起“鼓”来。可是现在，父亲骨瘦如柴，面呈菜色，动一动就得冒一身汗，连苦笑也笑不出来了。

这个孤寂，悲愤而又生性乐观的垂危老人，见到爱女是多么高兴啊！赵树理忍受着不断咳嗽的巨大痛苦，滔滔不绝地跟广建整整谈了一个夜晚。有人不是说他的历史“就是一部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历史”吗？可是又不给他申辩的权利。这时，他对着女儿，也对着历史，毫无愧色地回顾了自己清白的一生。

他想起了故乡的童年，呵，潺潺的沁河水还是那么清澈吧？那些一起演“罗成戏”的小伙伴们，现在不知怎么样了？呵，上党梆子！我可爱的家乡戏。我真想放歌一曲，痛骂那些奸贼，……

他想起了长治师范的同学少年。呵，王春，我的启蒙老师，我的生死之交，你离去得实在太匆忙了！呵，王中青，史记言，杨蕉圃，我的老朋友，你们的处境可能比我还困难吧？……

他想起了国民党的反省院。呵，生活真不可思议！同样是为了几本书，同样是莫须有的罪名，却关进了性质绝然不同的监狱！难道历史真的倒退了？我是叛徒吗？不，我不是，清夜扪心，我无愧于党和人民，相反，我正是在那时决定改换名字，弃“礼”树“理”，要为共产主义的真理而奋斗一生。……

他想起了严酷的战争岁月。呵，太行！生我养我的太行，

给我以无穷无尽力量的太行。我仰望天空，日夜思念你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唉，这辈子恐怕再也见不到你了，但愿我死后能埋在你的黄土中，让我这无用的尸首化入你伟大的肌体，滋养庄稼茁壮成长，我就死而无憾了。……

他想起了三十年的创作生涯。呵，小二黑，李有才，小字辈，老字辈，我的父老兄弟们，我终身热爱的农民朋友们！近几年，我没有为你们多写作品，这是因为真话不能说，假话我不说，可是我肚子里有多少成熟的“丝”要吐呵！我要写长篇巨著《石头底》。曹雪芹写了封建大家庭的《石头记》，我要揭开这石头，来描写压在下面的你们的家庭。我还想创作八十万字的《户》，来揭示你们在新旧社会中的历史变迁。可惜腹稿已成规模，手中的笔却被夺走，看来此生是万难实现了，真是千古恨事啊！

在地狱中谈话，不可避免地要说到死。赵树理很自然地想起了鲁迅的一句话：“我们的生死久已被人们随意处置，认为无足轻重，所以自己也看得随随便便。”

不料女儿却说：“爸爸，要是死的话，我可希望我死在你前头，怕死到你后头，死到你后头可怎么办呀？”

赵树理被女儿纯真的脆弱逗乐了，他戏谑道：“哪有这么不孝顺的闺女，谁见过爸爸打发孩子？”

东方破晓，生离死别的时候来到了，赵树理坐到桌前，吃力地拾起钢笔，在一张破纸上抄录了毛主席的《卜算子·咏梅》，然后郑重地交给女儿藏好，说：“你以后想法替我交给周扬同志，党会明白我的。”广建噙着眼泪，使劲地点点头。她知道，这里凝聚着爸爸的全部感情：“已是悬崖百丈冰，犹

有花枝俏”正是他的现实写照。

十年之后，周扬饱蘸着感情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就在他遭受残酷折磨，面临死亡威胁的危急时刻，他没有屈服，对革命仍然充满了信心。他在被批斗和监禁的日子里，偷偷地用破纸片写了毛主席的《咏梅》词，以表示他对革命的信念和对党对领袖的一片忠心。他嘱咐他的女儿赵广建同志将这一有他绝笔手迹的纸片设法送到我的手中。那时我早已失去自由，我的命运处于危如垒卵的境地。但他还是信任同志，信任我们之间的友谊，相信我们总会有重见天日的一天，相信人民总会重过光明的日子。赵树理同志的信念，也就是我们每个革命者的信念，现在终于实现了。今天，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我们除了更加紧密地团结，更加勇气百倍地工作和斗争，还能说什么呢！”

九月十六日，是赵树理的生日。几个月来，他已被剥夺了吃热饭的权利，天天由三湖去食堂领一份冷饭来吃。这天，老伴违反禁令，为他做了沁水风味的炉面。吃完饭，他习惯地用筷子在碗边上敲打着上党梆子的鼓点，心情比较高兴，他不知道，正在这时，一场规模空前浩大，将致他死地的斗争大会已准备就绪了。虽然有人指出，赵树理病势沉重，已经不能动弹，但是一个青云直上的掌权者下令说，他动不了，爬也要爬到会场去。

九月十七日，赵树理第一次走出囚室，来到太原最大的湖滨会场—— 他无力爬行，最后是被架着来的—— 因他确实站不住，造反派在台上放一张桌子，叫他把双肘撑在桌面上，胸部抵住桌沿，两手捧住脑袋，认真听取批判。然而，每一

个批判者，雄赳赳地踏上讲台的第一句话就是“赵树理站起来，”接着是“抬头示众”“低头认罪”。听到这一声声的吆喝，赵树理条件反射地站起来，困难地弯下腰去，……他渐渐地支持不住了，头上滚下黄豆大的汗珠，两腿索索颤抖，过了半个小时，就一头栽倒在地……。

九月二十二日午后，护理父亲的赵三湖照例跑步回家——专案组有规定，不准他和父亲一起用餐——可是，“等我吃过饭匆匆赶去，推开门，突然吓呆了！”三湖回忆道：“父亲一脸惨白，浑身颤抖着滚在床上。见我过来，他抖索着伸出左手来，铁钳似的抓住我的一只手，死命地摇晃起来，嘴张了几张，翻出白沫，嗓子里呼噜呼噜打响——父亲再也说不出话来了。”

军管专案组这才大发慈悲，把赵树理送进医院。不过，他们的主要任务是让医生摆好抢救的架势，让他们拍摄“医疗”照片。

一九七〇年九月二十三日凌晨二时四十五分，正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光，这黑暗终于吞没了驰名中外的一代文豪赵树理，终年六十四岁。

军代表来了，命令立即火化赵树理，家属提出了抗议。但医院代表接踵而至，通知家属马上运走尸体，因为医院没有太平间。

赵树理留给妻儿的，是一道造反派发布的赶出太原、遣返老家的命令。

后 记

曾有不少人惊奇地问我：为什么偏偏选中赵树理作为研究对象、传记人物？乍一听说，真连我自己也感到纳闷。不是吗？在当今时代的青年眼里，他显然是个陌生人，至多，模模糊糊有个土里土气象山药蛋似的印象，就凭这一点，也足以使放眼世界的人们微笑着敬而远之了。然而，我却不顾这一较大读者层的口味的变化，硬是写成了这本传记。

是什么力量推动我写作的呢？或许，是因为我在北大荒摆弄过整整五年的土坷垃，而这五年的感受比过去二十年的生活远为深刻，于是对这个最熟悉中国农民的作家发生了兴趣？或许，是因为一九八二年在太原举行的赵树理学术讨论会上，我的论文得到了与会学者们的嘉许，激发了我深入研究的决心？或许，是因为出版社的提携后进，热情约稿、慷慨支持，终于促成了此事？但仔细一想，我不得不承认，推动我提笔的根本力量，并非这些无疑是很重要的因素，而是我对赵树理发自内心的敬仰之情。

有没有对于主人公的真诚的喜爱，我以为，乃是撰写传记的最起码也是最关键的条件。综观赵树理的一生，显而易见，他是迄今为止、中国文学史上最关心农民的作家。这并

不意味着，他的价值在于世界人口有五分之一是中国人，中国人口有五分之四是农民，不首先关心他们，一切都是空谈；而是指赵树理在农民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人格力量。我敢断言，农民就是他的上帝！为了农民，他可以彻底改变自己的文风，或者完全放弃作家的身份；也可以置个人的名利荣辱、安危得失于度外，甚至象彭德怀那样仗义执言、面折廷争。直到生命垂危的时候，他还在惦念着扶持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剧种，因为有一些老头老太太特爱看。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这种“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的伟大人格，是超越时代的，我喜爱，我钦佩、我浩叹，我写着写着，有时竟会抑止不住夺眶而出的热泪。

人格，向来是传记的基本主题。所以，这本书贯穿着一条“热爱农民”的主线。它是我概括赵树理的一生经历、选择生活中的大事小节，和构思全篇布局的准绳。我力图站在俯视或平视的角度上，来观察、刻画主人公。对于杰出人物，中国人素有仰视的习惯，爱用一枝涂脂抹粉的笔去描绘。可是经历过造神运动的我，却觉得这种由来已久、约定俗成的写法，颇类乎画蛇添足，反倒使人物失去了真实和灵性。而我所追求的，却正是这两点。

当然，追求的东西未必定能得到，俯视伟人更是谈何容易。但我的确在追求着，不仅追求人物的真实与灵性，还追求传记的科学性与文学性。这又是一部阐释性的著作。由于赵树理的小说同他在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和人事大有关系，因此，本书力图用文学语言来阐明，他是怎样将真人实事运用到小说中去的，以及他怎样对这些素材进行艺术想象的。可

惜，由于自己才疏学浅，再加它是我在文学天地中摸索着迈出的第一步，这些追求难免落空，还不乏缺陷以至谬误之处。但尽管如此，我还是红着脸把它奉献出来。因为我相信，对于初生之犊的幼稚拙劣，读者和专家们一定会宽容地谅解的，并且会诚挚地批评指正的。而只有这样，我才有可能把第二步走得端正些、扎实些。

最后，我要说明，假如没有赵树理的家属、战友和他家乡人民的热情支持，没有这方面的专家们和出版社编辑同志的无私帮助，可以肯定，这部三十余万言的著作将难以问世。在这里，我向他们表示衷心的谢意。此外，我还要特别感谢著名作家康濯先生和我的导师钱谷融先生，因为本书的写作，自始至终得到这两位先生的关怀、鼓励和指教。

今年，适逢赵树理的八十诞辰，我谨以此书，纪念这位农民的儿子诞生八十周年。

一九八六年七月于宁波月湖畔